

第一章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理论渊源

导言

对某一思想体系进行历史和理论渊源的考察，是思想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因为这种考察是深刻认识和确切理解思想内容的重要途径。否则，思想体系的形成不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为重要的是，它甚至可能使思想体系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基于同样的考虑，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和理论渊源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自本世纪 5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围绕着这一主题，可谓著述不断，争论迭起。本章所收录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一论题的部分代表作品。

一般而论，国外学者都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支。本世纪 60 年代曾流行于欧美学术界所谓“三 M”的说法，即马克思(Marx)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是“富裕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毛泽东(Mao)则是“贫困社会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领袖”，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同时，严肃、审慎的国外学者又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生根，必定具备许多内部的和外部的历史、理论条件。作为全球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本身具有极其鲜明和强烈的“独创性”(Originality)，绝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复或翻版。因此，国外学者又把它称之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形态”，或“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Sino-Marxism)。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理论渊源不同的研究结论，直接导致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多样化的理解和定义。概括而论，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虽然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序列，但论及思想联系，它只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学说。由于中国并不具备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时，才有可能爆发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而毛泽东则使倍受压迫的中国农民在掌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后，承担了本应由工业无产阶级充当的历史角色，因此“毛主义”不是经典、规范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异端”。这也是“毛主义”“独创性”的本质体现。

其二，另外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非常独特的一派。一方面，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承递关系，“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列宁主义为中介而间接确立的；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并且从其理论目标和革命效果的角度看，“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这一派学者的结论是：“毛主义”是以民粹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预言的“一个最为奇怪的悖论”。

其三，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华裔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其说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传统中的“大文化”（尤其儒、法典籍）与“小文化”（造反小说）的结合，应当成为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主要来源。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应做理论形式与本质内容的区分。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本文标题有两层模糊不清的意思。首先，毛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其思想的一个方面呢，还是如某些人所说，它构成了毛对革命理论和实践所做贡献的基本内容？其次，我们现在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哪家的“马克思主义”呢？

对西方那些崇拜毛的人而言，如同在对毛的态度上与之立场迥异的苏联人一样，马克思主义（就像他们所信奉的那样）就是真和善的同义语。因此，本文就要探讨一下，毛自始至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还是连一点马克思主义味道都没有？还有些人想问，毛的思想既然是集古今中外各种迥然不同的思想之大成，那么把毛的思想的这些组成部分之一置于其余部分之上是否合理。坚持认为毛的思想结构和内涵基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而否认它与其产生的文化环境有关系的人无疑忽视了如下一点：毛本人曾反复号召，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要使中西融合，结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而把毛的马克思主义看作不过是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思想中的一个成分，则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努力运用他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原理指导自己，并用马克思主义词句阐释其政策，并论证其正确性。”

至于用来评判毛的自主精神（有人也许称为“异端”，有人称为“独创性”）的标准，很多毛思想的研究者，包括本人在内，过去都指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其含义在他们看来是指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而且常常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包括进去。然而，这种用法有三个弊病。首先，它意指要有一个类似罗马教皇、最高主教或者别的制定正确教义的人，而自斯大林去世以来显然已经不存在这种先哲。其次，它暗示，如果毛对在特定的时间对某个特定的问题的态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这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和政策导向都是错误的。作为一个一般的定理，“正统思想”一词最好废弃不用。这从来不是我的观点，而是这个词似乎给人以这种印象。最后，不确切地交替使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等诸如此类的惯用语会导致混乱，因为它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尤其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几乎涉及一切可以想见的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和经济学，而列宁虽然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国家与革命》，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现已基本被人遗忘的关于科学哲学的争论上，人们普遍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缩小到仅仅集中在夺取政权斗争的策略上。一二十年前，几乎人人都这样议论毛，他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根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非欧洲国家设计了一种新的革命模式的游击战士的形象。今天，从最近出版的材料看，情况非常清楚，成熟了的毛泽东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战略家。

毛不仅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和操心（马克思比列宁更有心于此），而且还承担了掌权的重任；既要努力缔造一个革命国家（列宁在其被病魔夺去生命前几年曾这样努力过），同时要改造社会和经济。他和列宁在面临的环境和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

另一个方面他们的态度又极其相似。在夺取政权前后，毛始终认为，列宁也曾这样认为，政治是人类活动中最终规定一切其他活动的首要因素。

如此强调政治，倘若不在字面上，那是否在精神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冲突？在承认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同时，马克思同样强调了人认识这些规律的能力，在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后，运用它们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要手段是阶级斗争，而政治作为各阶级利益集团争夺社会控制权的战区之一，自成一个半独立王国。而且，马克思最后断言，政治变革必须紧随并出自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中，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行革命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不到只言片语，因而毛最终用这些言词来断言政治挂帅时，他实际上追随的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

总之，马克思并不像毛那样认为政治是发展的关键和人类自由的重要唯一领域。毛把政治权力不仅看成革命性变革的接生婆，而巨看成是大展宏图的宝座和决定道义是非的权威，使他多少更接近于传统中国思想，而不是马克思或列宁。

事实上，毛信奉并转向西化立场要比他所属于的“五四”那一代人的大多数更为缓慢和勉强。他在1916—1917年23岁时发表的处女作中暴露了从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到显赫的保守政治家曾国藩（及其湖南同乡）广泛的传统和传统主义影响的烙印。两年后，他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渴望“打倒孔家店”，并从西方的“新思想”中得到了鼓舞。但是，对毛和所有中国人来说，都在吸收西方思想上有着心理和知识上的障碍。毛本人在1958年以特有的口气提出了这个问题：

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夷狄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向自19世纪中叶以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洋人学习，确实使一个长期自奉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民族感到羞辱不堪。在理解那些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知识背景的观念和思想方面也存有思想上的障碍，虽然这种障碍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比亚洲其他国家要小。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交锋时，西方思想中强调人类经验的历史范畴这一点，对许多非欧洲国家显得陌生和不易接受。所有西方对历史主要和重大的解释，甚至包括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有胆识的反经院哲学，最初均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历史神学，多少带点这种神学悲天悯人、救世救难的色彩。尽管中国革命前的各主要思想流派都不作这些救世式的未来启示，也没有进步观念，但它们大都注重认真地看待历史。

认真地看待历史也就是认真地看待政治。不管在其他方面与儒学有多大的鸿沟，连古典的道学作者也把政治看作人类在对最终要摆脱其控制的宇宙的适应过程中的主要功能。

如果说中国由于国家长期具有的职能因而对现代的列宁主义模式的专政

《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毛泽东思想杂录》第一部分第123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225页。（在本处和其他凡列有英译文和中文原文者，我均作了核对，并对错误和晦涩之处加以改正——译者）

正如西方一位权威人士指出的，“……道德经……主张以‘无为’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而并非取消统治。”见安格斯·格雷厄姆：《列子经》.伦敦，约翰·默里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0页。

制度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那么，在那些半个世纪前就着手于革命的人的目标与现今的社会状态和组织模式之间则存在着尖锐矛盾，而以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方面的矛盾最为尖锐。

1919年7—8月，在毛刚刚投身革命，但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以铿锵有力而富有远见卓识的言辞谈到了这一基本矛盾：

原来中华民族，几千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時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

不到一年，毛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不到10年，毛对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有了基本的了解，不到20年，在延安时，毛就精通了马克思主义，足以开始写着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著作。在组织他的力量夺取政权并领导中走向社会主义时，毛不得不面对的还是那些他在1919年就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他那时信奉克鲁泡特金更甚于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新生所需要的“思想”和“实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另外，要使毛梦想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就迫切需要组织起来，而中国人民又普遍要求“解放”，毛也有此要求，并曾预言中国人民在遭受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停滞之后，“解放”的要求必将像激流那样迸发出来，人们又如何去调和这一矛盾？

早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毛就在组织城市知识分子从事政治活动、研究激进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他当了两年工会组织者。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他在上海、广东的国民党机关当了一二年的官。然而，促使毛对革命理论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则是他在1925—1927年领导农民运动时学到的知识。

在1926年9月发表的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章中，毛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1925年年中以来在农村掀起的革命活动高潮，甚至使那些最向往城市的人也不得不加以注意，其程度之深，以至不论国民党抑或共产党发言人几乎在每次讲话中都要讲一通关心农民运动的套话。但另一方面，毛依据中国社会的构成说明农民重要性的论点则确实是了不起的。

总之，可以概括为两条。首先，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它是整个反动秩序的基础；因此，必须在乡村中对其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其次，尽管有时提到“进步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农民还是被描绘成比工人更坚定和更彻底的革命者。工人目前在寻求的只是诸如结社自由等有限目标，而不是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相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换言之，工人（现在，但到底多久？）只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满脑子“工会意识”，而农民则认识到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千方百计地开展广泛的斗争。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译文载《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2月号）第86—87页。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全书均按此版本。以下凡引自《毛泽东文集》的，不再标注版本。——编者）第1卷第37页。

虽然毛从这个时期以后一直确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但他再也没有像这样从理论上赞颂农民的作用。相反，他一直反复强调农民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实，毛在随后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懈地探索把无产阶级绝对领导的原则与早在 1926 年就孜孜以求的中国社会的远景相结合的方式。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夺取政权斗争的客观条件同建设社会主义迥异，但跨越 1949 年这个伟大的分界线后，他的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就足以证明从 1926—1976 年的整个阶段，他的处世之道是始终如一的。

如果我们力图理解中国文化与源起于西方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冲突对毛本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从外部评价其结果，那么恰当的做法是从毛对这两个客观情况之间关系的看法开始。在 1938 年即将与国际派（即亲苏派）摊牌的情况下，毛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讨论了这个问题。20 年后，毛又一次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不再使用“中国化”这个提法，因为这似乎表明他一心只考虑中国的事，而实际上这个词已被多列士等欧洲共产党人用滥了。毛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论述并不完全前后一致，有些甚至自相矛盾。然而还是有可能从中找出几条始终不变的观点来，同时也可以看出几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1938 年 10 月，毛在其号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著作中，界定这一词汇的内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点，意味着毛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表达它。但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国化只是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使之适应中国国情这一更带根本性事业的外在表现。

在毛看来，这个改造工作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一方面，应该使马列的思想和方法适应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基本农业国的国情。但这还只是他的设想的一部分。他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2 年 2 月，毛再次告诫他的同志们：“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进行理论性创造。”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采用“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不仅包括从中国过去的典籍引章摘句，更要吸取其精神实质。毛所指的从“历史的中国”经验中吸取其精华的方法的本质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对它发挥作用？从毛延安时代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是指毛当时思考的可以笼统地界定为治国之道方面的问题。当他 50 年代重提此事时，这一点得到了完全证实。毛在 1959 年 3 月说道：有些事情不需要任何民族风格，诸如火车、飞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全书均按此版本。以下凡引自《毛泽东选集》的，不再标注版本。——编者）第 2 卷第 534 页。

同上。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72—173 页。（译文略有修改。——编者）

同上，第 179—180 页。

机和火炮。政治和艺术却应当具备民族形式。

到了 50 年代中期，毛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他仍然敬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但其着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因此，毛在 1956 年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它。但这个普遍真理必须与每个民族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为了回答 1960 年莫斯科会议对中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指责，他在 1961 年 1 月声称：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但枝叶上有所不同，正如树各有其不同的枝叶一样。每个国家的条件不同，过去我们就吃了只注意普遍真理的苦，而不注意调查研究。

这是一篇令人感兴趣的讲话，它反映了毛的模棱两可态度的基本特征。“枝叶”在中文中常常指无关紧要的事，但毛的阐述仍然表明有可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棵树移植到中国后，已经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嬗变。为了力图判断情况是否果真如此，我将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三个重大方面：领导模式、工农的作用以及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辩证法。

毛泽东关于社会变革中政治领导作用的思想，如同它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是由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而实际上相辅相成的方面组成的。一方面，他用严词重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重大贡献之一的由革命精英实施集中领导的原则，他在 1942 年 2 月 1 日发动整风运动的讲话中抱怨：一部分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与此同时，他号召实行“群众路线”。他在 1943 年 6 月 1 日的指示中有一段界定群众路线内容的名言：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的认识论。

认为平民百姓可以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并且认为他们反过来能够理解这种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执行政策，这标志着同中国传统思想的大决裂。孔子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毛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力图从他的同胞们头脑中铲除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虽然毛同时也号召保护中国遗产中仍然进步和有用的东西。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怀疑列宁主义原理：只能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更广义地说，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向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在上面引述的毛关于群众路线的指示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革命运动的领袖们虽然相信群众，但归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48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86 页。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二部分第 241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13 页。

同上，第 316—317 页。

《论语》（台北），卷八第九章。见詹姆斯·里吉译，《中国古典作品》，香港大家出版社 1960 年版第一卷第 211 页。

根结底仍要向他们灌输那些单靠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系统阐述的思想观念。

他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过程中的认识论，直到毛生命的最后，一直是他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核心。关于权力结构问题，他在 1956 年 4 月总结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长时间讨论时宣称：

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正当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简而言之，政府应当拥有适当的权力，这对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

建设一个“强国”是毛一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58 年 1 月，毛在一份实际上奠定了大跃进蓝图的指示中，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 1953 年创作的八句歌诀（他说，目的在于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并看作是指导政治、经济体制各司其职的原则：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接着，毛解释了八句歌诀的意思：

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

这样，留给下级的就是在执行中央“大权”决定的基本政策过程中加以创新。在毛把群众路线界定为“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情况下，虽然各基层单位权力很有限，但他们在领导过程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1962 年 1 月，毛再次强调“在党内外”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重复集中比民主更必要后，他继续说：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段话着重强调：如果希望进行正确有效的领导，则领导者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但毛也讲得很清楚：最终做出正确决定的“加工厂”是党中央。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好是坏，毛在整个一生中对政治的态度，远比别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 10 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所愿承认的更深切地充满列宁主义的影响。那时候，毛的态度似乎不仅是猛烈抨击党，甚至包括贬低以至否定这种权威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人们那时普遍认为，毛主席已经赞

施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73 页。（这段引文与国内正式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编者）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全书均按此版本。以下凡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的，不再标注版本。——编者）下册第 819—820 页。

同西方某些极“左”分子鼓吹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权力不仅最终属于群众及其各级自发组织，而且应当由他们来实际行使。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权威外，实际上竭力主张怀疑一切。而我们现在知道，当毛在1967年初明白无误地面临着要在列宁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这两种立场中何者是正确的。在1967年2月与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就上海革命委员会要求把所有的“长”都取消，他评论道：“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做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接下来，他列举了按照张、姚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建立公社，并最终把国家的名称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意见，说道：“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不管叫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公社难道能取代党吗？”

以后九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毛主席认为这一点办不到。

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毛这番话表明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然而，毛对领导总的看法和列宁有重大差别，更不用去说斯大林了。一方面，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毛强调群众要积极参与，而这个“群众”首先是指中国的农村群众。

数十年前，当毛作为一个“农民革命家”崭露头角时，与此有关的当然是权力斗争方式，尤其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游击战。在这种环境里曾提出过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但它与1949年以后所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较易处理。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共产国际经常指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缺乏正统性。因此，它在1931年8月26日的决议中宣称：“保证无产阶级统治和革命的胜利发展的唯一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其政治路线，而且在其构成上都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工人党的所有领导组织都由工人掌握。”随着中苏分歧日趋尖锐，库西宁在回忆起30年代的这些指示时，断言共产国际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一点，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共产党首先就是在沿海城市的工人中发展起来的，在党和红军中都有一些工人（虽然数量不多），而且，这两者都处于实施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位。而且，要说军队当时是一个比党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团体，这可以从斗争环境来解释。不管怎么说，毛都已明确规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949年3月，由于胜利在望，毛的思想转到了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宣布今后将按正统方式办事。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二部分第453—454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670—671页。

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伦敦，企鹅出版社1969年版第246页。

O.V.库西宁，1964年2月的谈话，见《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第333页。

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然而，“照搬苏联”的政策（正如毛在1962年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就被部分地抛弃了。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毛显然推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机械化是农村现代化和合作化必要前提的论点。他宣称：由于中国的现有条件，尽管两者要同时并进，但“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从1955年开始，中共已有充分理由将重点转移到城乡之间更加平稳的均衡，转移到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以及由于听任乡村改革落后于城市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我在此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这里重点要探讨的在于，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刻起，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中的工农关系问题，就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提出来了。

在毛的7月讲话后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于1955年12月用如下的话把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作了比较。

我国与苏联比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因此，能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有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劳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

由此可见，甚至在1955年底，当毛刚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时，他就首先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他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们是经过20年的农村斗争后取得政权，而不是一下子在首都控制政府，1949年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比1917年时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更清楚地懂得如何向基层群众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拥护。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国家。另一方面，在毛看来，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然而，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在毛看来，并不意味着要把工人、农民放在同等地位。1958年11月，毛在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之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多次强调了 this 提法，并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工人，而不是农民，在两者的关系中仍然处于“者大哥”的地位。

如果毛认为工人是农民的“老大哥”，这并非出于毛依照马列的方式，相信他们具有农民无法比拟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保证经济发展的技术领域，他们（工人）是现代知识的孕育者，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1427页。

列宁关于给农民拖拉机以改造其思想的论点，见他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大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三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7年版第564—565页。斯大林关于拖拉机构成先决条件的思想见他1929年2月27日的讲话，《斯大林全集》，莫斯科，国际出版社1953年版第12卷第171页。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27页。

同上，第247页。

同上，第12、17、49页。

而只有现代知识才能解决毛在 1949 年提出的教育农民这个“严重问题”。但另一方面，采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把城市工人阶级置于政治、经济的首要地位，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让一个远离中国社会重心的集体和某些在多方面与民族传统格格不入的观念处于特权地位。

毛采取的解决办法不像有些时候表现的那样，是用农村道德优越论的民粹派神话来颠倒马克思主义，让农民充当革命的领导。相反，他逐渐转向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是否完全找到了解决农民这个难题的理论，既把农民说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又同时称之为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小弟弟，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之，只有了解毛对中国革命中反映各个阶段特色的社会变革的设想，联系他力求实现这些设想的方法，以及联系他据以形成革命和发展态度的哲学思想，只有置于这些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才能充分理解毛关于工农关系的思想。

如果我们要比较毛和马克思的历史观，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而这两点与马克思是一个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人紧密相关。首先，马克思一直生活在产业革命高潮阶段的阴影之中。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人类征服大自然程度最迅猛的增长。作为其结果，马克思形成并自由地表达了对欧洲资产阶级在进行这一巨大事业中取得成绩的深切赞扬。他认为，资产阶级不再能促进社会进步，资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取代的时刻已经到来。然而，要达到这一步只有在资产阶级已经实现的扩大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这一条，任何社会主义思想便始终是空想。换句话说，通过技术来改善生活的思想并非赫鲁晓夫及其门徒的发明，甚至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发明，而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核心。

其次，虽然马克思早在 1848 年已看到了扫荡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幸存下来的某些“封建残余”，但他整个一生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度过的。确切地说，他写了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也密切注视着同时代诸如俄国、印度、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事态发展。但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变意味着什么，更体会不到毛及其一代人一生经受过的两次或三次这种变革的感受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精心提出了他的历史的救世观。他认为，构成人类可能取得的经验的最高形式的个人和集体自由的物质基础已经奠定。只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变革，这些理想就能实现。自由王国是人类力所能及的，至于它所安排的方向却是明白无误的。单单采取社会主义革命一个行动即使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乌托邦理想，也将为后者开辟道路。因此，不管马克思允许人类在塑造整个历史进程时可发挥多大的主动性，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就像是事前被安排好了的一样。

在所有这些方面，毛的经历和马克思的经历的差异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在中国不存在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斗争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在 20 年代，甚至在 1949 年，虽然不是无足轻重，也只是勉强够数的队伍。毛出生时的那个社会，不管我们把它叫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叫它“亚细亚社会”，或者叫它什么社会，它几乎没有受国内外资本影响的触动，地主长期以来一直行使着比资产阶级更大的权力。列宁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没有如此尖锐。但列宁创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以“先锋队党”形式出现的手段：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

这个组织在 1917 年夺取了政权，开始取代资产阶级继续进行产业革命，从而极大地壮大了无产阶级，从而也创造了它自己的阶级基础。

当毛在 1949 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由乡村转向城市”时，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主张在这些方面遵循列宁的模式。他所赖以进行这一转变的社会基础小得不能再小，过程无比地复杂，而结局则更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对待发展的态度上，甚至在对辩证法原理的阐述上，开始反映出某种他认为是一个由多层文化和风俗传统积累而成的复杂社会中含而不露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毛在许多场合常用“脱皮”的比喻来引出中国革命的各个连续阶段：

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在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

因此，在毛的思想中，一个阶段紧接着另一个阶段，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把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性质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共产主义发展将包括从集体所有制（它已取代了个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原理，长期以来作为列宁主义传统而一成不变。可是，毛恰恰没有像列宁那样看到实现这些发展的力量以及动员和联合这些力量的方法。

正是在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直觉作出这一分析的：形势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

通过这样规划出来的经济工作的格局，不再像苏联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是唯一的关键部门。毛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两年后，在大跃进的前夕，毛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重又掀起了这场讨论。“不断”这一形容词在毛理论名下包含从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结构中的两个主要方面相应产生的独特的内涵。一方面，它意指不停的变革和动荡，在毛看来这在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正进行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

毛泽东：《1957 年 10 月 13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39—140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散见第 61—81 页各处，尤其在第 62—67 页。为了对比本译文和 1976 年 12 月 26 日发表的正式译文，参阅我在《中国季刊》第 69 期（1977 年 3 月）第 126—135 页的研究笔记。

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与不断革命论，1958—1969 年》，《中国季刊》第 46 期（1971 年 4—6 月）第 221—224 页，尤其是第 222 页。

的。另一方面，它告诫领导者永远不要让人民自满，而是要通过不断提出新任务来激发他们的热情。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少一些，因此我将先探讨这个方面。

毛始终认为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但单靠它本身并不足以建设社会主义。在1958年5月论述这一问题时，毛用列宁的话来批评斯大林盲目崇拜技术和管理专家：

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讲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政治业务结合，就产生共产主义。

毛并不否认经过技术训练的专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确实经常称颂其作用。但他也长期强调人和精神因素，注重动员群众的政治热情的重要性。毛对这一作用最简炼、最有说服力的阐述之一体现在他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们（苏联）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没有讲政治，没有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倘若毛认为必须要有一场运动，那么如何发动呢？1958年1月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专门谈“不断革命”时毛写道：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当然，“不断革命”并不等于老是在同一最高强度上保持紧张。正如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反复运用战争作比喻时指出的，应当采取既进行“激战”又要“休整”，既“急促”又“审慎”的“波浪式发展形式”。这正如一个中国作者在大跃进时期所说的，“不断革命论”仍然是“一种不断激发干群革命热情的理论”。

当然，毛主张的波浪式发展与他运动实际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在1958年1月的指示中，他写道：

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乍一看来，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十分相似。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里，所有社会关系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转化。社会正在不断蜕变……在经济、技术、社会、习惯和风俗上的剧变，正如它们发生的那样，形成的联合和相互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社会不可能达到平稳状态。正是在这点上，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才展示出来了。”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216页。

这里我引自我在《中国季刊》第46期第226—229页刊载的译文第21、22段。毛并未草拟这一指示的全文，但他作了修改，并在1958年1月署上了他的名字。

1958年3月20日谈话，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高仰之的文章，载《政治学习》第18期（1959年）第19页，译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关于中国“不断革命”论文件汇编》，巴黎，莫顿1963年版第57—58页。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文，引自《中国季刊》第45期第229页。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巴黎，里德尔1932年版第36页。欲知此处未论述的有关毛、托两种不断

当然，苏联人近十年来一直指责毛是“托派”，尽管二者在运用社会“脱皮”的比喻上有惊人的巧合，但毛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两人对待农民的态度。在对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农民政治能力的估计上，托洛茨基比列宁的观点还要悲观。因此，他比列宁更强硬地坚持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绝对领导。

而另一方面，毛却更加强调政治第一和工人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在运用“红”“专”“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来论述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时，毛写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的确，对业务工作知之甚少，又不接触实际的政治领导者，只不过是“假红”，必须“使政治和技术相结合”。但这场讨论的整个重点是：不单是领导干部，而且全中国社会人人都要尽可能做到又红又专，用政治统帅一切。农民，还有工人都要进行这种改造。因此，在农村普及初步的科学技术知识，越来越显得重要。

从毛 1958 年春划分中国当时的社会成分中可以看出，他即使不是完全地，也几乎是把工农等同起来的。1958 年 3 月 20 日，当毛在成都讲话，列举构成当时中国的“三大阶级”时，他在举出“敌对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后说，“第三个就是左派，这就是说劳动人民，工人、农民。”（事实上，存在四个阶级——农民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两个星期后，毛在汉口讲话时确认存在两个“劳动阶级”。二者被说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和种地”，而且他们被当作两个剥削阶级的对立面，在两个剥削阶级中，连富裕中农也被看成老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换言之，全社会被分成两大对立集团，而且，毛看来把这种二元性看作是根本性的。

别的姑且不说，毛的这种阐述反映出他和列宁在对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各自对国家现代化的贡献问题上有分歧，毛对此是一清二楚的。60 年代初，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用精练的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起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毛把中国社会分成两支对立的队伍，双方都不是有明确界线的实体，而是不断变动的由根本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组成的联合体，这同样表现为毛在观察现实和运用他的辩证法时越来越多的模棱两可。常常有人表示，毛在 1937 年写的论文《矛盾论》包括了毛的思想的核心内容，以至毛的全部革命理论

革命论的对照比较，阅斯图尔特·施拉姆编《关于不断革命文件汇编》第 19—26 页。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译文第 22 段，载《中国季刊》第 46 期第 228—229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112—113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80—182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242 页。

都可由这篇文章提出的各个观点中演绎出来。说得客气点，这种看法多少有些言过其实。重视矛盾确实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主要特点。他不仅在矛盾中发现了一切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而且看到了现实的本质。然而，这一点在他阐释马克思主义时有其最杰出的表现，这便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在《矛盾论》中已初见端倪，但直到 50 年代才被明确地阐述。而且，毛本人曾告诉我们，在 1949 年解放以后，许多中国人认为他对矛盾的解释更多来自阴阳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毛自 1918 年起到其生命终结止的著作中，有着古代道教辩证法的余音。

1958 年 5 月，毛宣称他的辩证法观点与列宁的看法“多少一致”，但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大一致”，因为斯大林“否认矛盾”，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毛又说：“他（斯大林）逝世前又写过一篇文章否定了他自己……。”

自 1957 年起，毛反复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例外。这一点确实更多地与列宁而不是斯大林的思想一致。但在 60 年代，他就开始唱出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调子。例如，他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评论“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时写道：“‘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毛在 1958 年论不断革命的指示中，就已露出了这一类苗头，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仍然会分许多阶段。各个阶段之间会有相当于“革命”的突变，必然含有斗争。在上面引文的第一段中，毛当时也已多少表示同意人必有一死和万物有序。但到 60 年代中期，这种调子唱得更高，而且伴之以明显地提到道教经典著作。“我赞同庄子的做法”，他在 1964 年写道：“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死人应当开庆祝会。应当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死亡；不然共产主义怎么来？”毛同样表达了他在哲学上越来越多的独立看法，并表示深信不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怎样实现，都不是人类经历的最后终结，而只是宇宙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在 1964 年写道：“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

显然这种持高高在上的超世态度是毛泽东其人，尤其是他晚年的一大特色，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毛在减少他加紧革命的决心，更不是他要引退和万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9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242 页。

此处指的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最初发表于 1952 年，该书并未完全否定他在 1936 年写的东西，而是“解释”毛指出的那个意思。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183—187 页。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 22 段。引文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文，载《中国季刊》第 46 期第 229 页。

例如，见毛 1958 年 3 月 20 日的成都讲话，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108—110 页。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 227 页。

俱灰的苗头。相反，紧接着上述引文之后的一段话中，毛用更强调人们积极进取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言词，来突出他的观点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他说：

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对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上，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要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

当然，通过工业化“重新创造世界”这个概念是与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完全一致的。因而，毛不相信人类到了共产主义是否就那么自由，而是对此持一种异乎寻常的怀疑态度，而且在6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中，毛对革命是否能继续进行，共产主义能否实现表示了更深的忧虑。

毛存有这种焦虑的直接原因是他相信苏联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且他发现中国自身很可能也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应付这一威胁的措施是号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同时他也愈益转向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中寻找消除苏联模式的差距和缺陷的方法。

毛在1964年重新发现道教（以及佛教）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三大范畴”中的两个，其中包括否定之否定。他在1958年极力明确地重申过这三个范畴：“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现在他却声称不相信后两条规律，至少他不相信它们是本规律，认为质量互变仅仅是对立统一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不承认有否定之否定这条规律。

毛争辩说：“事物链条的每一环节都是既肯定又否定。”这可以认为毛从整体上严重推翻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证的“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毛把事物任意看成不断的对立，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会朝着一定的方向继续前进，把这说成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这比马克思认为的通向共产主义阶段的潮流势不可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这一辩证运动才会停止或烟消云散的思想更有说服力。（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然而，毛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却表露出了他的整个思想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对历史进程的看法越来越模棱两可，无疑

见1962年1月30日谈话，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180—181页。毛在1964年12月20日谈到中央委员会工作问题时说的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应当称为“分子”、“集团”而不要叫“阶层”，见《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杂录》第二部分第413页。

毛在1958年11月即已强调需要随着革命的深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杂录》第一部分第130—131页；在他约于1960年关于免费供给制的意见中重又谈这一问题（同上书，第233页）。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2段。载斯图尔特·施拉姆文章，《中国季刊》第46期第228页。

应当看成是毛对他所理解的中国局势的反映，而不是他运用辩证法原理的结果。同时，他的思想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导致了他对中国，以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越来越心中没底。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是——因为毛根本不打算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只是重新强调政治斗争的主观方面，强调人们对他们的客观使命的态度，这是毛自 20 年代以来就极为关注的。早在 1928 年，在井冈山上，在其军队士兵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甚至不是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农村流民的情形下，毛总结出了弥补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根据这句话和类似的段落，我以前曾提出，毛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几乎完全由其主观态度决定。我至今仍认为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同时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近几年被滥用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毛一概把凡是正确理解他的思想的人定为“无产阶级”，这种说法不仅是极端的公式化，而且否定了真正血统工人阶级在极其罕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例如 1968 年 7 月——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这种说法还可能错误地提出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说毛把思想标准作为政治标准的补充，而应该说他把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看成部分地由思想和其他主观态度决定？不妨考虑一下毛在 60 年代提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所谓“五类分子”的说法：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中两类是社会性，两类是政治性的，一类是思想性的。毛把它们搁在一起，似乎没有看到任何矛盾和问题。也许是他没有把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好人的工作？难道已有的全部材料不能说明毛在事实上和刘少奇同样具有真正中国的，尤其是儒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认为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其外在行为和整个政治王国分开。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界定毛移植到中国、打上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标记的这棵树的本质特征呢？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要到多大程度才可以从整体上与他的遗产区别开来呢？总之，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列宁主义派，但在接触中国时实际上经过修正，而且被那种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此相背离的哲学领域所丰富和充实。

毛坚持必须集中领导，以及必须由党领导使他当之无愧地处于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地位。毛在“文革”初期对党的猛烈攻击，当时西方观察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夸大了它的含义。1949—1976 年全部历史最终表明，毛不仅把党视为领导革命的有用工具，而且是领导革命的唯一合适的工具。毛认为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通过一系列过渡阶段指导和控制一个基本上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然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的这一观点同样也完全是列宁主义的。

按照苏联模式，是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技术和管理精英第一和技术第一。毛由于大大淡化这种情况而与列宁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并没有像列宁及其门徒那样使先锋或精英分子脱离，或者凌驾于普通成员之上。从这方面的情况而言，这可以看作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人类从史前期到共同控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作用，至今都是马克思思想以及列宁思想的核心。毛对无产阶级专政原理作了精心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反映

了中国社会万分复杂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则不仅贬低了工人阶级，也贬低了资产阶级，还贬低了西方城市和工业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毛不断地就人类努力的规模和意义提出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后 20 年中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毛更像马克思，而不像一心关注政治斗争技术的列宁。毛不仅想要了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想要弄清为什么这样做。他关心的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用公共利益来根除自私自利，取代私人利益。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消灭城乡差别，毛追求的目标是与马克思相同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却不同。马克思要使乡村从“农村愚昧”状态提高到城市水平；而毛则认为乡村中既有美德又十分落后，并立即从两方面努力工作。最后，毛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马克思认为自由固然只能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迅速发展，但从本质上讲是具有广泛兴趣和相当知识的现代人的自我表现。而毛作为个人自我修养目标比现代欧洲所曾有过的更严格地服从于政治和公共利益的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以及作为首先感到当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亡国奴的一代中国人的一员，必然对这些事情抱不同看法。

马克思在展望全球革命时曾给亚洲“解放战争”以一席之地，但他没有明确地把它们与根本不能和欧洲无产阶级将要实行的社会革命相比拟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他和恩格斯谈过俄国和其他“落后亚洲”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看，他们坚定地预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这种发展要由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发动和指导。列宁确曾设想过亚洲国家采取民族解放斗争形式的革命中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但是，在他看来（他的继承者更是认为），民族解放只是被用来在世界范围推动革命、保卫苏联的力量，亚洲人民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斗争对列宁来说本身毫无价值。

毛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他来说，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首先通过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然后通过把中国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同样重要）通过抵制苏联对中国的指手划脚，成了他所理解的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可以肯定，毛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虽然包括其他成份，但大量地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做出贡献？这有赖于我们大家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只属于思想家本人，还是属于历史？”如果回答是前者，则不能认为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不会接纳他为门徒。（当然，有些人完全不赞同这一结论，但我相信大量材料可反驳他们。）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毛应当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对列宁主义传统（按任何合理标准，这是源于马克思的理论流派之一），毛做出了三点重要的贡献：（1）社会主义革命与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虽然具有觉悟和广阔的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倾听下面的呼声，那么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3）农民也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要是毛能做到见好就收，至少是暂时这样），而不是像 1973 年那样又发动另一

场官方的，而实际上只是用一种官僚主义代替另一种反对新生官僚主义的运动，那毛的成就无疑会更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威望也会更高。或许，尽管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只给我们留下许多零星片断的指示，他并没有发动这些运动，而是由于年老和疾病，无法阻止有充分资格用他的名义说话的极“左”派打着他的旗号这样做。如果是这样，我们对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所做贡献的判断居然受到这一类历史事件的影响，岂不令人啼笑皆非？但历史并非总是公正的。

最后，毛留给他的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特征是什么？它是一种完整的革命思想体系呢，还是一种方法（他的继承者想用的话，必将用自己的方式运用），还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东西？虽然他在辩证法和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分析里加进了某些模棱两可的成份，但我认为，他在身后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更像开放和非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也许可以从毛自己的一个比喻中概括出它的确切特征。毛在1958年1月解释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回忆起一句湖南民谣：“草鞋冒（没有）样，边打边像。”换句话说，革命就是一个不断的即兴创造过程，而且，正如他履行他的使命一样，编织者心中对他正在打的草鞋的形状已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毛没有打完中国革命这只“草鞋”，但它已开始成形，而且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它也几乎不可能不带有他的印记。

唐秀兰译自威尔逊主编《毛泽东在历史中的地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

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第94页。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美〕本杰明·史华兹

我应邀对毛作为哲学家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我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以阐明构成毛精神世界核心的和他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尽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重要理论都属于“哲学”理论。当然，人们可以从毛的著作和谈话中找到最确切意义上的哲学，但是，这些哲学著作是否就是“事物的核心”呢？毛的哲学思考和著作证明葛兰西的话是有道理的。葛兰西说过：“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只能到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这表明在政治著作中确实包含着某种哲学。

即使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但毛的思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毛的思想的意义仅仅在于他是我们时代最成功的、最机敏的政治领袖吗？如果毛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还会这样对待他的思想吗？很显然我们是不会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考虑他的个性中坚忍与敏锐、勇敢与无情的结合，不考虑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政治直觉等因素，那么，即使是毛本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我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整体，进而把它与毛的政治生涯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当毛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他的思想世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毛的思想可能会超越，也可能没有超越这些历史条件。但他的思想的深度不可能从一组抽象的公理中推演出来。也许，有人认为毛在1937年写的小册子对宇宙内在本质——矛盾的认识，是直接导致他产生“不断革命”思想的原因，致使他反对任何静止的乌托邦思想。事实上，毛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在1958年大跃进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脱离毛作为一名政治领袖的事实来考察他的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毛是革命的领袖，他才能够以多种方式同千百万民众接触，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意义。因此不论毛的思想是否带来预期的结果，是否深刻，是否因历史原因而永存，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

有一种偏见认为，毛的思想来源于另外一个方面。如卢西恩·派伊教授在其《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中，从心理和历史的角对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那些潜心研究毛思想来源的人并不能清楚地揭示毛的思维方式，他们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原因，他们只是详细地论证毛的心理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未能揭示其发生的根据。为此，派伊教授对毛泽东的人格特征做了大量的考察。我们都承认毛的人格因素非常重要，值得研究。然而，描述毛的人格并非是派伊的目的。因为人格和思想一样，都是最终的结果。他要做的是通过对毛人格的观察去解释毛的思想。虽然派伊承认有非心理因素的存在，但是，最终他将发现，用他自己揭示的原因也不能完全解释毛的思想。

然而，问题比这种特殊的心理学解释还要复杂得多。思想世界同心理的机械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思想看成是对某些“外在事物”的反映，以及对某些，“内在的”东西的表达。我们相信思想总是由某些原因引起的。虽然心理因素对我们的思想有一定的

影响和制约，但心理因素怎样影响思想，这种影响的程度又如何？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毛自童年开始的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不能不受其思想和个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不论毛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战略）是怎样产生的，它都会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而且，通过考察毛的思想及其来源，就会发现毛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处于一个与他人共有的知识文化环境之中。

与卢西恩·派伊同样关注毛的童年的人，也应当承认毛的青年时代的思想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把问题的重心放在研究毛的家庭关系上，而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19世纪80年代初，毛早年生活过的韶山未必受到过“西方”的冲击。毛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农民兼商人，他打算让儿子受到初等教育。但他未能阻止儿子追求接受更高教育的努力。毛曾经说过：他幼年时是个学生。这意味着他早年不仅接触了乡村的通俗文化，而且也接触了传统的高级文化。实际上，后者对毛的影响可能更多些。当时公认的学者为上层社会所重视，青年时代的毛喜欢阅读通俗小说，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想成为一名学者。许多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学生也都有这一爱好。毛喜欢《三国演义》这部书，因为它不是描写通常的暴乱，而是描写英雄的业绩。《三国演义》中的将军和政治家们的娴熟的战略，表明他们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水浒》中的人物则是些非正派的英雄，替天行道，报仇雪恨，他们不是追随者而是领袖。毛喜爱这些书，表明他已为传统的身强力壮的英雄形象所吸引，而不是被孔子那样的圣人政治家的形象所吸引，尽管二者都是理想的领袖。

毛作为农民直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他能够像准确地使用古典文化中的典故一样，恰当地运用他早年学到的农民的谚语。早年在乡间的经历，使他难于同意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农民是消极的、愚昧的观点。

传统的中国思想倾向于农民，致使统治者也不得不这样做。“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民间经常表达出平等的思想，要求满足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通常爆发的起义，往往是由统治者的腐败、贪污和不法行为所致。在同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接触之前，毛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么成年的毛对“人民”所遭受的“虐待”是非常敏感的。

应当看到，毛早年在“传统的中国”的生活，对他的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美学和文学（非民粹主义的）观念全是中国式的。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甚于对西方思想的兴趣，以至他用更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包容它们。人们可以意识到，毛对上海外国租界里的西方式都市生活并不感兴趣。我们可以把列宁和毛作一个比较。列宁虽然痛恨西方资产阶级，但他却把现代欧洲城市生活看作一切文化的典范和缩影。

虽然毛出生在传统的中国，但他的阅历使他很快地同新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他很早就接触了改良派人物梁启超、严复等的著作，了解了他们的基本观念和倾向。这些也构成了他的知识世界。辛亥革命后，他的老师杨昌济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但杨本人却未因同新思想的接触而打破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毛和大多数“五四”前出生的人一样，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

尽管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传统的中国”与“现代西方”是势不两立的。他们深信传统的文化并非是一块巨石，而是由不同的或完全相反的倾向构成的复合物。不论正确与否，他们毕竟能够分辨出西方思想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相近似的、可以比较的，或者相反的成分。

我们对毛的著作研究得愈多，就愈会感到这些著作对于确定毛思想的基本问题和范围起着极大的作用。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在形成其关于社会问题的思想以前，曾经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那些改良派人物就更不用说了。旧中国的人经常是排外的，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改良派则不同。他们有着绝对的先人之见，认为应该维护和发展中国，使中国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统一体，与其他闻名的民族并立于世界。他们认为伦理和社会价值、价值和思想的取舍决定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社会统一体的生存，而不是相反。他们并不打算使“中国式”的文化与一般的文化相一致。毛作为一个学生无疑已经对传统偏见进行了反思，并开始思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应有的尊严和富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把民族主义同更广泛的目的结合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思想的困境之一，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非人格化的世界历史模式，它不仅特别适用于中国历史，而且也适用于中国的文明。的确，在中国还不曾出现过笛卡儿主义者所说的人与宇宙的对立。中国传统历来认为，历史的模式与宇宙的循环节奏是相吻合的，一种思想适用于此时此地，而在彼时彼地则不适用，这就导致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这些思想显然在19世纪为西方进化论和历史主义的传入提供了桥梁。而其中关于发展的观念——不可抗拒的改革和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却令人迷茫。发展是一种无限的能力，它能打破一切旧结构的束缚，把人类引向可能达到的最高现实。显然，这些西方思想同以往的以有限可能性为基础的循环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显然，青年时代的毛对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响。梁启超和严复的个人观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他们认为个人的动机和进取精神取决于对自我利益的觉悟。毛的个人观，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杨受康德和英国理想主义者H.格林的影响，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毛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个人主义是很特殊的，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

同样，毛对权威也产生了新的看法。旧的权威，无论是家庭、政治还是宗教，其本质是一种代表落后的黑暗势力，它们限制和破坏人民内在的活力。当然对权威的这种看法并不一定妨碍人们形成对新的权威的信任。相反，不久中国人便要求创立一个能够引导和培养人民的能力的新的政权。青年时代的毛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无政府主义只是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能力，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毛认为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启蒙的权威。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改良时期占有主导地位。毛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即把斗争和分裂看作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在青年时代阅读过的小说已经使他确信了斗争的价值。不过，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共同思想是追求和谐，对斗争表示反感并视之为纯粹的邪恶之源。严复、梁启超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就个体而言，提倡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与传统的经济相融合；就整体而言，追求国家间的超越，隐喻着一种团体冲突。这种思想吸引了对于经济解放相当敏感的毛。

影响青年时代的毛的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其说来自改良派的思想，不如说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文学，如认为人民有权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例证。我们已经讲过一些毛有关“人民”的思想。改良派赞同进化论，但进化论不认为“人民”是进化过程中的主要力量，相反，认为进化的发展或进化的演进是由一批启蒙领袖推动的，他们把无知的人民纳入进化的洪流。青年时代的毛对这种进化观感到愤慨。可以说，他当时既渴望革命的民粹主义，又为改良派认为无知的人民只是进化的工具的观点所困扰。

“民意”的概念是含混的。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主义。在这种状态下，人民是立法的力量，能冲破一切阻拦，创造出自由美好的未来。1919年底，毛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民是许多群体的总合，其中甚至包括学生和小学校教师。这篇文章认为，学生是联盟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但是，它并没指出先锋队的必要性。这种强调自发性的观点似乎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反映。但是，“民意”的观念会导致一种更为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化的观点，即认为一般群众必须在一个代表普遍意志的自觉的先锋队领导下，才能走向未来。

十月革命之前，毛和他的朋友们对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的理论原则都加以利用。受他们影响的人并非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些一般性的观念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毛在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后来，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也曾反复强调这一点。一旦我们明白了毛为什么一贯自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注意到下列事实：1949年毛曾讲过：“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与其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倒不如说非常符合他本人的实际情况。19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西方发生重要的革命，而是转变为一种日益发展的、进化的趋势，未能制止中国的混乱和不幸，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使中国变得更加贫穷和虚弱了。对毛的良师李大钊而言，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又在演变的明证。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对毛和李大钊、陈独秀同样重要。我们许多人认为，在毛的政治生涯中，他注重人类意识的力量，而忽视历史的“客观力量”。这种观点同一种更深刻的信仰并不矛盾，即历史（作为一种普遍的力量）已经成为支持毛的活动的后盾，或者说历史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十月革命正是使这种信仰燃烧起来的导火索。圣贤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圣贤。十月革命证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引起了毛和他的两个良师对革命的基本理论的关注。

巴黎和会的伟大力量和俄国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使毛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这两种理论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状况，展示了不同于西

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

列宁关于先锋队的概念，校正了毛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列宁关于革命需要职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使毛更加确信群众需要领袖，坚信共产党是最理想的先锋队组织。毛从后来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应当从政党组织和群众领袖之间识别出真正的领袖。

1920年，毛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的中译本，从中得到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认为，群体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内部动力。在这以前，毛只泛泛地知道一些法国革命初期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即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反对权力和财富占有者的斗争。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他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概念；他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社会形态依据生产关系来划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阶级实质上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列宁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只是指出了阶级的更规范的形式，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劳工组织。这表明，毛已经理解了列宁的思想。但理解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成为毛整个思想的核心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述思想被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的概念弄模糊了。在“苏维埃”阶段，毛把全部精力用在湖南和江西的农村战略方面，但他承认这是对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辅助。当毛在西北树立了精神领导权时，他的无产阶级概念已经具有新的内容，他用它来表示党和群众作为真正的集体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这同精确的阶级含义已经相差甚远了。

当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也引起了毛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毛作为政治领袖是怎样形成他的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毛的世界观的形成是由他的人格各个方面和他作为政治领袖的能力以及他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我并不打算概述毛主义的革命战略的漫长历史，不过，延安那段悠悠而又始终贯穿毛理想的经历却必须顾及。这些理想在整个历史中，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作为中国领袖的毛。

为了表述这些思想要素，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其中哪些成分是规范化的毛主义的核心，哪些更马列主义化一些。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农民，党领导着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把“无产阶级精神”作为确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情况。通过对长征经验的反思，毛特别强调这些内在品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同青年时代的毛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培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概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了。对毛而言，无产阶级意味着自我批评的美德，一切服从集体需要的献身精神，毫不松懈的努力，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铁一般的纪律等等。必须把这些品质灌输给领导，通过领导再灌输给人民大众。尽管毛强调群众是智慧和美德的基础，然而无产阶级的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仍然需要群众去努力实践。

在延安时期毛强调“群众路线”。不过，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干部与群众间的这种牢固的道德联系，就会感到这并不意味着毛要按照列宁主义的模式去组织农业。

就无产阶级精神和群众路线而言，延安的经验形成了毛的许多名言警句。他认为：把无产阶级精神灌输给干部和群众，比给予他们经济或军事上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党的干部具备了正确的精神，就能够完成任何军事、

政治、经济或教育任务；有了正确的精神(德)就能够精通各种专业技能(才)。在当时的延安，毛的这些教诲并不是不可置信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探讨，显然已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因素。这种民族主义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并不是战略上的，也不是某种权宜之计。毛关于统一战线的奥妙的观点，显然是把党和延安根据地看作是中华民族“健康”力量的先驱。

如果上述内容就是毛主义的核心，那么，我们怎样看待毛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论断呢？首先，毛在确立其自己的主张，并且成为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时，也在潜心研究苏联的意识形态。他几乎不加反思地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计划。尽管他对斯大林有一种矛盾心理，尽管他自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理论权威，但是，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本质，是深信不疑的。他喜欢斯大林那些与他相似的理论。毛不仅被斯大林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观念所吸引，而且，也喜欢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通俗易懂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缔造者，毛并未被斯大林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做法所震惊。事实上，毛更强调发展重工业。

应当承认，当时中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非常落后，复杂的经济成分需要更长的时间改造。回顾历史，毛在人民联盟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建国以后，毛依据斯大林在不发达国家用社会主义方法建设重工业的理论，特别尽力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苏联毕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毛和他的同志们不过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的那些名言也只能适用于这一革命。当延安从追随苏联模式的过程中觉醒时，毛开始形成了一种田园式的准共产主义观点。1969年他曾说过：“一直到解放初期，全体党员大体上过着平等生活，精力充沛地工作，勇敢地战斗，这同所谓的物质刺激毫无关系，实际上是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们。”

毛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明，这些理论是一种战略指导。毛依据其长期的政治经验和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使自己的战略与马列主义的范畴融为一体。

怎样看待毛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呢？人们意识到，这些著作是理解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键。这些著作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矛盾论》表明，斗争不仅是历史的推动力，而且，斗争本身就是好的一面。同时，也表明毛对事物“两方面”的关注和他倾向于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宇宙的两重性关系。《实践论》表明了毛对自然科学的经验归纳法的看法，说明毛厌恶只懂书本和抽象知识的权威。这些著作真的是理解毛政治领袖生涯的钥匙吗？人们也许会指出：毛确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具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的人才能正确地运用辩证法和认识论。区分基本的矛盾和非基本的矛盾的能力，并不能由方法本身产生。同样，把群众“分散的和不集中的意见”集中起来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做得好，有些人则不行。

1949年以来新中国迅速地得到巩固，主要是依靠把延安的方法普遍化。新中国头几年取得的成就是在法律和社会秩序方面，以及新的民族效率。然而，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情况，就会感到毛作为英雄领袖

的谨慎和与众不同。1955—1956年，中国领导人恢复了自信。中国人民已经展示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有了一种要比苏联干得更好的感觉。1956年，毛和同事们更了解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局限性。能够“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现实中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的结合，就引导出了以“百花齐放”而闻名的缓和阶段，知识分子在这时，又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

延安时代毛的意境的真正复苏，是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相并行的。这表明，延安时代的理论名言，不仅适合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也同样适合于现代化的任务。人民保持着一种无限的道德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在党和干部的领导下，就会使农业和工业生产达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如果社会主义只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那么，显然在整体意义上，这并不是中国道路的终点。延安式的无产阶级伦理道德鼓舞着群众，他们将再度走向未来。

毛忿忿地承认了大跃进的失败，但他并没有放弃完成他的梦想。相反，1960—1966年，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的官员们放弃了史诗般的长征。因而他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官僚势力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性。现在领袖与群众隔绝了，最终毛对以“红卫兵”和“革命组织”形式出现的群众，也感到失望。这时的群众，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团结和富有纪律性，而陷入无组织的抗争。也正是在这个“万里长征”中，死亡压倒了他。

也许，人们会以为毛的遗产会延续下去。我认为，只有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东西将成为真正能够延续下去的遗产。1949年以来，中国取得了社会和平与安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基本上的平等分配；毛（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认为，这就是毛主义阶段的更坚实的遗产。

高铁军摘译自迪克·威尔逊主编的
《从历史衡量毛泽东》英国剑桥大学
出版社1977年版第1章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早在 1965 年毛泽东就指出，战场就是学校。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愈来愈怀疑正规学校的学习。他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

人怎样作买卖。”他以为，高等教育过多地涉及无用的抽象观念。而提供了对世界的较好描述的却是具体概念。他赞美说：

（小孩）……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一些的概念。他家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所以，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年轻的，思想尚未受到空洞言词纷扰的人。

历来的状元都是没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这种考试方法我看要完全改革。

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些学问不足的青年

人。孔子开始提出他的体系时只有 23 岁，释迦牟尼也只有 19 岁。“耶稣有什么学问？……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搞发明的英雄们（创造者，而非知识分子）总是年轻的：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年不过 30 岁左右。还有章太炎、富兰克林、康有为、刘师培、王伯、李世民、梁启超等等。死记硬背和考试不是扼制了创造性，就是教人不切实际。人们的学问是靠实践获得的，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所以，学校的工作极大地浪费了时间。

学习年限太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进行突然袭击。……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大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但光学马列主义还不行，

《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讲话》，参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2 页。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2 页。

同上，第 3 页。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应为毛泽东 1964 年 2 月 1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译注），《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48 页。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42 页。

毛泽东：《边工边学》，参见陈志让：《毛的文章：选集和文献目录》第 83 页。亦可参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29 页和《问题和学习》第 64 卷第 79 页。

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

正如毛在 1964 年指出的，人们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花费了 28 年，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1920 年夏天，在读了柯卡普、考茨基的著作和《共产党宣言》之后，毛已经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他的行为的正确革命理论。次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组织领导了 1922 年秋的煤矿工人罢工，次年夏天他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在统一战线中。他从事联络工作。1925 年他出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这为他 1926 年间积极领导湖南的农民运动作了准备。在 1926 年末和 1927 年初国共合作的紧张岁月里，毛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合作。事实上，直至 1927 年秋收起义，他与国民党的联系才完全中止。其时，他勉强逃脱追捕，进入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偏僻的井冈山根据地。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 1935 年结束的长征（现在一般讲长征结束于 1936 年——编者）为止。1935 年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到达西北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主要地和非常巧妙地涉及了政治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际上，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1 月—2 月）（应为 1925 年 12 月——编者）表明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是混乱和含糊的。然而，1927 年在湖南和华南地区农村革命之后，毛的文章则自信得多，这表明他日益认识到农民起义的重要性。最著名的论述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也许就它忽视无产者而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就它主张政治斗争是解决经济冲突的关键而言，却颇像列宁主义。更加具体体现他上述思想的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的通信和报告。当时他面临的任务是制定一套持久战和武装农民的战略以及游击战的战术，并对农村经济结构作一精确分析。最后，是从 1935 年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始于 1937 年——编者）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受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毛于 1949 年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毛当时的主要思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集团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下进行“一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从 1920 年起，毛不断地受到几种影响，但是没有一种影响是理论上的，实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引导他提出了独特的颇为有效的游击战理论：一种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不很严密的马列主义阐述，以及一系列对党中央和苏联的指示的非常具体的见解（通常采用他所喜欢的“高潮”的形象比喻）。同时，他养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去创造和阐述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的习惯。但是，一直到长征结束，他才在 15 年里第一次有机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事实上，从 1935 年后期到 1937 年 9 月这两年

毛泽东：《论教育——与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会谈》，参见陈志让：《毛的文章：选集和文献目录》第 22—23 页。亦参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46 页。

此处我简要地摘录了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导言。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导言。

时间，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伟大的阶段，即抽象或理论阶段。

毛这时可以读到过去所读不到的著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时期（1935—1945年）才得以翻译的，诸如苏联第一流的哲学家阿·德波林、米丁等人的著作，以及毛引用过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这不是说，1935年以前中国没有人写过或出版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李季的《马克思传》和《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都是相当成熟的著作。但是，直到1936年，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才公开流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年，在中共党内外开始了一场哲学论战。这场论战在当时可与苏联的德波林唯心主义者与布哈林机械论者之间的早期论战相比拟。

德波林是俄罗斯哲学家，他领导了1924年对卢卡奇的批判。这一批判在20年代持续了7年。德波林主张“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基础”。

德波林的手、“粗俗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的机械论者”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赞成科学的实证主义。正如同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的盲目力量一样，无产阶级的科学也要把不合理的黑格尔主义残渣从社会主义共和国里驱逐出去。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或儒家学者）任何危及原则的争吵大多是注经式的，他们辩论的主题主要围绕着1925年刚出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机械论者认为，恩格斯在临终前已认识到把哲学曲解为自然科学的错误。

德波林反驳道：恩格斯一贯正确地维护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理论的不可分离性。不仅没有渗透价值的哲学假说的科学是不存在的；而且，如果苏维埃科学家们把科学与哲学分离开来以便维护“纯”研究的自主性，那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完整性就会遭到损坏，一种实际上更有害的实证主义哲学就会取而代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指出的：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德波林主义者还论证说，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理论主张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不是势均力敌的，而机械论者则强调对立面的平衡。所以，他们的机械论就像18世纪的机械论那样否认了一种真正辩证法的内在性。

德波林的观点暂时获胜了。当时他所控制的战斗唯物主义和辩证论者协

以下从1936年到1940年期间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叙述，很大一部分引自O.布里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

译自勒内·阿尔伯格：《一个被忘记了的哲学家：阿·德波林》，参见赖尔保尔拉贝兹：《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历史论文集》。

机械论几乎无法为早期的恩格斯辩护。例如，恩格斯在1873年从伦敦写信给马克思说：“亲爱的摩尔：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为有这一思想而激动，他害怕被人剽窃。他在信的末尾写着：“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页。

会和斯大林主义者一致认为，机械论者的理论（它否认德波林关于矛盾和斗争是所有存在形式的特点的观点）支持了布哈林关于党不应强化阶级斗争的“右倾”观点。在 1929 年 4 月的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讨论会上，机械论者很快受到了公开的指责。

但是德波林主义也没有长时间地占优势。1930 年，它的领导权受到了挑战。当时德波林受到了与他对机械论者的攻击相同的攻击。由于他有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他被指控为唯心主义，因而与托洛茨基主义有联系。那年 12 月，斯大林出席了红色教授学院党组会议。当时领导德波林反对派中心的是米丁、尤金和瓦西利·拉尔特塞维奇三位党员，而不是“纯”学者。会上，斯大林提到了德波林的“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这实际上是命令德波林承认错误。

德波林主义的优势也正是它的劣势。当它向科学的意识形态自主性挑战的时候，它同时也是党控制全国研究所的一个卫士。但是，当它试图将科学与哲学合为一体，肯定辩证法对各种研究形式都有效时，它也极易陷入独断的唯心主义。那样做太哲学化了，与党的十六大的实际决议太不相符了。米丁、尤金和拉尔特塞维奇在 1930 年 6 月 7 日登载在《真理报》上的抨击德波林主义的文章中，论证了这一观点：“现实正在使理论面临大量问题。必须立刻着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准备和从理论上概括这些问题。可是，我们注意到理论大大落后了。”因此，德波林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地使哲学脱离国家的实际问题。

为了使自己免于被人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德波林公开作了自我批评。1933 年在哲学研究所，他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并劝说他的追随者也放弃他们的原则。

我们基本的错误在于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我必须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懂得因果关系，因为，我始终坚持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我们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和与方法论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之间建立联系，卧而我们使理论脱离了生活。

此后不久，“德波林主义”就成为辱骂那些喜欢纯理论而放弃革命实践的哲学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术语。当这一定义传入中国共产党内时，“德波林主义”的标签就被贴在叶青这样的思想家身上。实际上，叶青并不具有德波林的观点。

叶青（任卓宣）早在 1920 年留学国外时就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于 1923 年任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的秘书长。两年后，因为组织示威运动而被驱逐出法国，赴苏联学习，1926 年回到中国，成为共产党长沙地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他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很快脱离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宣传家——至今他仍在起着这样一种作用。这在当时还不能算作今天所谓的转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民党还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政党。事实上，许多体面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叶的身边。叶在上海一家专门经销赫拉克利特、孔狄亚克、普朗克、爱丁顿、爱因斯坦、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等“科学唯物主义者”译著的书局中任总编辑。他还主持了《二十

译自阿尔伯格：《一个被忘记了的哲学家》第 137 页。

同上，第 140—141 页。

H.L.鲍曼：《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 卷第 216—219 页。

世纪》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使他的同时代人视他为德波林主义者的文章。1934年，这些理论又出现在《哲学到何处去》一书中。该书论证说：哲学按照与宗教相同的发展规律，正随着反映工业社会纯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而逐渐衰亡。1936年，她在《哲学问题》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种综合，两者被压缩成了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它对哲学史来说，意味着一种终结。

叶青的对手、延安的共产党员艾思奇和陈伯达立刻反驳说，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统一是无稽之谈。而且，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一种超历史的纯科学，忽视错误的意识，也就是忽视一切思想的社会基础。

至此，叶青的德波林主义和他的对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当陈伯达和艾思奇指责叶提出的两个不同事物之间有同一性的观点时，范畴开始变得模糊了。他们把叶的这一观点与德波林的“对立统一”混同起来，实际上是在指责叶有机机械论者的错误。而且，许多共产党人如毛本人，也常常像叶青和德波林主义者一样坚定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等同起来。毛在1938年写道：“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的结论。”事实上，毛以后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全部革命理论的唯一科学规律。他在杭州会议上论证说，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而当他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科学规律时，他热烈地欢迎有关相信他的一元论的任何科学发现或物理学理论的消息。他尤其为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著作所激动。坂田昌一在北京公开声称基本粒子是一个“错误概念”。他认为，这些亚原子微粒是实验物理学家近年来发现的，它们被错误地认为是物质的始基。依坂田昌一的观点，“基本粒子是单一的、物质的、有差别的和无限的范畴，它决定了自然的秩序”。因而，坂田并没有把物质分割成不可分的基本单元，而是相信一种内含的物质力量，通过内在的对立或矛盾而结合和分离。宇宙中只有对立，任何东西只能被一分为二。所有存在物的背后是普遍的辩证法，它已经为科学自身的发展所证实。

当毛泽东想让中国的物理学注意到坂田昌一所表述的列宁主义的思想时，他似乎察觉到有他早年在《矛盾论》中所抨击的德波林主义的错误倾向。

上述争论均见于布里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译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24页。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90卷第2页。

坂田昌一在名古屋大学任教，他以《科学与和平创造》（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版）的作者而闻名。书的最后一部分收录了他1956年在北京参加和平会议期间的旅行日记。

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参见《红旗》1965年6月25日。

确实，他可能意指相信对立同一的错误。如我所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机械论者的观点。他抨击德波林主义与他在延安同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斗争也有一种联系。因为德波林在苏联是与托洛茨基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延安时期托洛茨基影响中国的程度的描述，可参见理查德·C.卡根的哲学博士论文《陈独秀》，宾夕法尼亚大学1969年版。

他说，“讲原子物理，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在当时，“德波林主义”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可能仅仅是指那样一种人，他们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这点来看，叶青确实是一个坚定的德波林主义者，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方法论提升为经济科学。毛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加之这种经济科学在中国所遇到的理论困难，难怪毛泽东要解释自己的有关现实的学说。

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论争。所有那些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爱国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充满爱心而射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箭，脱离现实的革命目的是没有用处的。因此，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让这些新兵相信，他们所懂的东西并不比他们想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多。毛认为，只存在两种真正的知识：人类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因为书本知识（从前人斗争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就本身来说是“颠倒的，落后的和片面的”，如果学生们不想做“半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必须亲自证实理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毛认为，实际上困难愈大，就愈接近真理。打个比方，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因为“一本书放在桌上既不会跑也不会大声尖叫”。

这样的夸张说法确实有助于破坏崇拜知识的传统态度。但是，这也把毛置于和马克思（他不是屠夫！）相对立的...种窘迫境地。事实上，毛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把马克思描绘成既参加革命运动又研究无所不包的商品的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但是，毛的最初意图不是不尊重马克思，而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事实上，在30年代晚期，毛在党内的日益增长的权威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然而当他达到这一高度时，他或许也已认为有必要仿效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普遍理论贡献。这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解释的毛的三部主要理论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何以都写于这一时期的原因。

这三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单独整体的组成部分。1936年夏天，毛在延安热心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后，于同年冬天，就开始给党员和军队讲授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或许没有达到50年代以单独篇名发表的最后版本那样的理论成熟程度。但是，为了抵制当时党内的教条唯心主义而写的《实践论》的1937年版本与1950年版本显然是相同的。

毛泽东，《与毛远新同志第二次和第三次谈话概要》，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亦可见《毛主席与陈伯达和康生同志座谈》（同上）。毛已经拜读了坂田昌一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关于基本粒子的一篇文章。

为了正确地理解毛，我们应设想屠宰一头动物的困难并不在于任务的复杂性上，而在于具体情感的倾注程度上。所以，他强调被动地翻书本与主动地屠宰尖叫的猪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是想教育那些脱离实际的书本理论家从事革命。用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来讲，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然而，甚至从本原意义上的认识论观点来看，毛在这里是故意把怎样做事情与为什么做事情混淆起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1—480页。

这些文章的年代和哲学内容已经引起很多学术争论。毛的那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大多取自

《实践论》一开始就称赞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知识的历史进步。因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知识有高低之分，它依赖于社会进步的发展阶段，在哲学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它的和人们的发现的确实性，只有当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达到他们所预言的结果时才能被验证。所以，毛在论文的开头明确区分实践和认识，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认识论观点来看，成功是社会实践证实任何观点正确性的尺度，成功是一定符合客观必然性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因而，毛的实践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更多地具有指导行动成功的准则性。如同《语录》（指《毛主席语录》——编者）中的部分内容所述，《实践论》告诉了我们该如何去行事。由于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实践是改正我们的思想使之符合客观实在的规律的一种方法。毛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何以具有这种独特的实践理论的原因。辩证唯物论警告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主观情感来代替客观结果，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因而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为了证实这个主张，毛泽东没有进行本体论的讨论，而是首先假定物质，然后描述认识。他认为，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只看到作为感觉情感的反应的事物的现象方面。在这个感性阶段，人们仅有对事物的外在联系的一种粗略感觉。然而，反复的社麦实践终于在思想上引起了突变，产生出涉及更加多得多的现象之间外在联系的各种概念。就概念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这一点而言，它们在人的思想中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生命，它们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独立的判断：“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与其说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还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的“理性认识”。

正如毛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的，从概念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通过实践方式而实现的戏剧性飞跃。“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达到这样的理性认识，并不表示达到了一个直接的和绝对的真理，它只不过是一种向真理逐步上升的螺旋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每一次循环都比前一次更接近于——但似乎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的实在。

于米丁发表在《苏联百科全书》上的同名文章以及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莫斯科 1933 年版）。后者部分地被译出并收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中。参见威特福格尔的《谈毛对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讨论》，载于《苏维埃思想研究》第 3 卷第 251—277 页。一些学者，如阿瑟·A.科恩论证说，1936 至 1937 年撰写的文章与 1950 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不相同。参见他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而且有人甚至暗示后一篇文章是在内战结束后才写成的。然而施拉姆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份 1938 年的手稿，它证明所有这三篇文章事实上都是在 30 年代末期写成的，是上述系列讲授提纲的组成部分。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85—89 页。

我采用的《实践论》版本见于《“实践论”学习文选》（汉口，江南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14 页）。我曾将它与《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第一卷（纽约，国际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82—297 页）作了核对。因为这篇文章很有名，所以我对下面的《实践论》引文不再作旁注了。此处的英译文大多逐字逐句的摘自国际出版社的版本。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0 页。

因此，思想与实在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一。毛虽然受到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显然没有接受 A 等于 A 的同一律。他似乎更接近于恩格斯。恩格斯的矛盾发展规律（即仅当 A 是非 A 时，A 等于 A）辩证地描述了客观实在。A 能同时既等于 A，又等于非 A，即 A 的绝对前提条件对立存在于互补性中。当事物从量变转化到质变时，对立面就会互相转化。这种辩证转化的观念也许激励毛对体现事物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和来源于感性认识、但能指导实践的理性认识进行了区分。列宁认为，认识是从不知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种实在的反映，而是主体通过从具体的感性到抽象，从主观思想到客观真理的运动而参与其间的一种过程。然而，对于毛来说，认识并不只是循着抽象规律而运动的，它是主体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冲突即它们的“内部矛盾性”的一个认识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者只发现事物的外部联系，而后者则了解它们的“内在的矛盾”。

要使自己的思想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矛盾），人们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来创立一个概念体系。康德的批判逻辑曾假定，材料是由外在于人类精神的一种范畴的必然秩序来安排的。毛把作为主体的人看成范畴的唯一源泉。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主观主义，甚至唯心主义，所以毛断定：这种“改造过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补充说，实践使自我客观化了。因此，即使毛的方法是辩证的，他的最终的认识结构仍然是一元论的。虽然这很可能是对黑格尔逻辑的反映，但是我确信，毛泽东可能更多地是受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早年曾信奉二无论，但后来他摒弃了早年的二元论。毛不承认受到王的启发，但他的文章《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特别强调了认识论二元化的有害结果。

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别的与特殊物质的事物，另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能动地指导实践。

所以，实践就是主观参与客观实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人们为了得到一种感觉就必须变革它的来源。难道人们为了看太阳就一定要变革太阳吗？这样的谬误，在《实践论》中很快就被忽略了，因为毛把他的哲学论证从事物转移到事件，从而把参与等同于列宁的意识阶段理论。如同无产阶级通过斗争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或者如同五四青年（与盲目排外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大不相同）通过反抗帝国主义而获得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那样，人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自己的历史任务，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理论不是从观察者的脑袋里蹦出来的。毛对无所作为的哲学家们的蔑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生动的体现。毛在那里援引了马克思的名言：“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他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

V.霍勒布尼奇：《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见《中国季刊》第19期第7—9页。

在阿瑟·A.柯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10页）中有列宁观点的概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22—123页。

界。”理论产生于像恩格斯和列宁那样的行动者，他们亲自参加实践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改变现实。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概念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可以找到某种解释。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是先锋队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化。然而，作为这一理论的接受者，他却忽略了这一理论的来源。在他的分析中缺少作为一种自在力量的思想，而马克思的著作却有这样的思想。当马克思告诉左尔格“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者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时，他的意思是想表明，空想社会主义在唯物主义时代以后又出现，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但是，像《共产党宣言》一样，那句话也承认空想理论对共产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这种影响，毛却无法在严格的实践论范围内作出评价或解释。因为，他所描绘的真理性认识仅产生于内在联系为实践证明之时。对理性认识的最终证明就是它的操作效果，因此，它作为理论的重要性严格他说来就是指导行动。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认识不仅仅是认知。所谓认知，它必须是持续不断的、最充分地进行着的。这种持续的过程不是一种目的的具体化（即一种自我实现的实在的创造），而是一个自认识达于行动的完整过程。因为，“理论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由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阶段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完全解决它的唯一途径是“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那么，最终结果是绝对的必然的真理吗？毛泽东似乎回到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说：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但是，事实上毛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于列宁，毋宁说更接近于恩格斯。列宁认为，一个绝对真理是所有已知的相对真理之总和。由于毛提到相对真理是“无数的”，因此，他把现实的绝对性看成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如同马克思的第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所述，毛也认为从来没有一种神圣的或绝对的终极真理。所以，也许毛没有读过《自然辩证法》，但他还是同意恩格斯的论点：唯一普遍的真理是运动的真理。他对于先天知识或对于思想可以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怀疑，使他转向了实践：从不断变化的意义上来说，真理也就是与客观过程的不断变化保持一致的理性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5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81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1 页。

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通向普遍变化的终极真理的一条道路，因此，它不可能是永恒正确的。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声称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本质。人类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断地拒绝把历史仅仅归结为经济必然性。恩格斯曾提醒布洛赫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种更加一般的变化学说：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显然，当马克思写到变化时，毛并没有驳斥他。他们之间的差别似乎只在于：马克思这位承认变化的创始人为了控制社会的进程而从历史中概括出规律；毛相信那些规律，它们给他以自信。但是毛所感兴趣的不是如何引出规律，而是通过辩证的“知行统一”表明人们是怎样造就和改造自己及其环境，并借以指导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这样，自我在许多方面对毛比对马克思更为重要。如同泡尔生的著作有助于解放毛的革命自我一样，马克思的规律也使毛能够通过把它们主观化来实现自我。

由于这样会夸大区别，不妨让我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考察。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指出，真正的问题就是人的活动能解决的问题，其余的只不过是无关重要的经院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他是通过相信社会实践来解决物自体的两难问题的。毛泽东则完全不担心物自体。至少他在《实践论》中是这样认为的。由于认识就是参与变革客观世界，因此两者的统一是通过如下的分析阶段来进行的：外部世界/感觉/外部的量的联系/参与/推理的质的飞跃/理性认识把握对象后面的实在世界，即内在矛盾性/意识/对世界和自我的控制，即改造。认识是改造。毛的所谓自由意志决定于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的运动遵从同一种辩证原理。

这些原理，倘若不是绝对普遍的，至少在科学上也是有效的。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把哲学史描绘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军对战。唯心主义，像任何哲学理论那样，是特殊阶级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社会学说的知识分子，会崇拜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而贬低以工人为主体的物质劳动。所以，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将继续下去。唯心主义是不会在争论中消失的，一旦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失，它也将不复存在。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4—13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6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4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第 120—124 页中作了描述和分析。

毛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即能够认识到哲学是一种阶级的产物，这一点对他来说本身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具有科学性的证明，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甚至有两种不同的方向：相对（远看）和绝对（近看）。从其形式来看，意识形态似乎只是相对的。其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唯心主义哲学让位于唯物主义，阶级征服阶级，观念随时代而改变。不过，人们通过描述这种相对转化能把阶级意识现象客观化，从对于存在的唯物辩证的感性认识中引出绝对的分析原理或规律。或者直截了当他说：如果思想是阶级关系的产物，那么，（相对的）唯心主义思想是可以用唯物主义术语来（绝对地）描述的。所以，一个思想流派战胜另一个思想流派就是物质力量战胜精神，理性技术战胜非理性的宗教。征服自然，也就是人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有助于唯物主义的诞生。只有原始人无法驾驭自然力量，才不得不依赖于他们所笃信的神灵。“然而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

由于科学的真理是辩证的，因此，它的绝对本质就是斗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条法则。在其他的几次非正式的有关哲学的讲话中，毛甚至坚持说，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科学本身是斗争这一信念渗透在毛自 1956 年以来的许多理论著述中。例如，他在 1958 年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方法草案中写道：

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

毛在生活中学到的一切，无论是理论的或是实践的，都证实了这一真理：斗争就是一切。康有为无法忍受自然竞争的思想，而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的整个结构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变种，它如果不是一种目的论，那么至少也是一种科学的神义论。另外，马克思曾用达尔文来证实阶级斗争的内在性，从而抛弃了目的论。他说：“达尔文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我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自然的、科学的基础。当然，人们不得不忍受天然的英国人的发展方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给予‘目的论’以第一次致命的打击，而且它的理性意义在经验上得到了解释。”甚至对进化理论热心得多的恩格斯也同意

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第 123—124 页中作了描述和分析。

毛泽东：《我们的战略》，见《中国法律与政府》。这据说是毛在 1967 年 9 月说的一句话。由于它被印在白北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的《1968 年匪情年报》上，因此，它的可靠性是有些问题的。我还没有发现该文件与最近得到的其他文革材料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赞同《中国法律与政府》的编者认为它可能属实的说法。

毛泽东：《我们的战略》第 10 页。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2 卷第 6 页。

《马克思致费·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第 151 页。

说它最适于充当目的论的溶解剂。然而，对于毛说来，达尔文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科学发现。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科学的：它承认斗争的必然性。事实上，马克思曾经认为已经驳倒的目的论，对毛来说依然存在于科学中。如果科学发展是进步的，那么人类历史就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阶级斗争和科学本身的历史。毛认为，所有三条战线的历史越进步，人们就越能巩固唯物论哲学。因此，尽管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工具，但是他也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样板来构造所有的实在。由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原理——它叫做斗争、矛盾或辩证法——它解释所有现象，那种结构的各个部分才能保持它们的一致性。不过，这种辩证法缺乏德国逻辑的绝对两分法的范畴，往往成为一种统一的一元论原理。它像谭嗣同的“仁”一样，既是思想，又是情感。事实上，主体和客体、感觉者和被感觉者、行为者与行动之间都有辩证法。因此，《实践论》是名副其实的。为了成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模型，或者符合由他自己的成功证明存在的规律。而且，由于毛泽东不相信认识的绝对规律，因此，失败甚至比成功能更好地揭示那些原理。只有当人们被实践逼近到失败边缘的时候，他们才相信他们能够而且必须转变方向，以便寻找另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钱宏鸣译自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历史
与意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 1973 年版第 15 章

《恩格斯致 P.L.拉甫罗夫》，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第 26 页。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译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24 页。

霍勒布尼奇：《唯物辩证法》，第 27 页。

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美]莫里斯·迈斯纳

在比较现代俄国和中国的知识界时，本杰明·史华兹评论说，“在中国早已出现过与民粹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不过，它很快就被俄国革命的影响压倒。”史华兹进一步指出，191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止了“一种成熟的民粹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继续存留下来的“是天才人物统治论者，而不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外，民粹主义在中国保留下来的形式确实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从根本上说，也不是天才论的。也可以认为，毛主义的思想中更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在列宁主义式的天才人物统治论和更早的民粹主义式的信仰之间踌躇不定。这种信仰认为，“人民”本身（特别是农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和一种天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在根据俄国历史的观点考察毛主义时，毛主义思想的很多方面与正统俄国民粹主义所认定的那些信仰和矛盾之间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种密切关系在列宁与民粹主义者尖锐分歧的那些地方，看起来最为显著。

尽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按照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来给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因而将同盟会时期（大约在1905—1919年）划分为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但这个早期的民粹主义冲击是比较微弱的，大部分是在本世纪头20年期间，在外来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支持下出现的。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了一种更加重要的民粹主义论调——并且尤其自相矛盾的是，它出现在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在诸如1918年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那样的学生积极分子团体的思想和行动里，在1920年上海和其他地方到农村和农民一块劳动、拥护“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的思想和行动里，在20年代初期彭湃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到农村去组织农民的活动里，明显地存在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击波。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皈依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李大钊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令人注意的是，李在1918年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热情号召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离开城市和大学“腐败的生活”，“到农村去”，“拿起锄和犁，成为辛勤劳动的农民的伙伴”。与此同时，在农村的“整个人生”里，用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农民群众。俄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先于马克思主义

本杰明·史华兹：《共产主义中国的知识界：一个尝试性的比较》，《代达罗斯》89.3（1960年夏季）第615页。

例如，请看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第35—44页；荣孟源：《辛亥革命前中国书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新建设》1953年第3期第9页。

北平“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初发起，4月正式开始活动。（作者在引用材料上有误。——译者注）

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特别是第137—142页，提供了关于这些学生运动的有用资料。

关于李大钊的民粹主义观点，请看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哈佛大学出

阶段，而在中国，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动多少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同时出现和发展的。在俄国，民粹主义逐渐趋向于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运动最终为列宁主义所抑制，而在中国，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动继续存在下来，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性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显然，在毛成熟的理论生涯的开端，这些信念就已出现，而且不是简单地适应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的现代产物。在 1919 年下半年，在毛正式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几个月出版的早期政治著作中，他看到中国人民作为唯一的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宣布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重点号是作者所加），他大声疾呼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行动。虽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遭受压迫，羸弱不堪，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落后的历史乃是现在和将来政治上的重大有利条件，因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这里，人们可发觉毛同民粹主义一样的对人民固有的潜力的特殊信赖，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对群众自发性表示怀疑。

在毛 1927 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的倾向更加显著，当时毛泽东可能已坚定地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毛在这篇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自己。在毛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报告强调了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干预和有组织的控制。在毛看来，1927 年自发的农民运动是一种基本的革命力量，这力量大得将扫除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已被证明不愿或不能和群众在一起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就像后来一样，毛表示了对由城市知识分子得来的“知识”的深刻不信任和对农民天生的“智慧”的赞赏。

20 年代中期，在农民自发的革命活动里，毛找到了他在 1919 年就预见到的“民众的大联合”的具体表现。如本杰明·史华兹曾说过的，毛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许既是由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写的。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穿于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即便毛后来正式出版的著作是以一种更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面目出现的，1927 年那种明显的民粹主义冲动也决不会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完全淹没。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的强烈倾向中表现出来

版社 1967 年版。

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摘译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 年 7 月号、8 月号上的文章，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16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 页。

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76 页。

的。毛主义虽然是一种要求阶级分析和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它也设想过中国人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潜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存在。正如毛经常宣称的那样，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基本上是革命的（或至少潜在地是那样），不革命的那些人应从“人民”的全体成员中排除，因为他们代表和反映了外来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典型的民粹主义世界观，他们是以十分阴险的方式出现“在国内的外国代理人”。

尽管毛主义学说强调需要组织和纪律，但那些按照纯粹的列宁主义标准可能具有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必要意识的人却反复被敦促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当群众的学生”。当毛主义者宣布，“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克服一切客观的物质障碍时，这也许反映了（以极端的形式）列宁的唯意志论对历史中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强调，但却和列宁坚持这些主观因素要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天才使之产生，并且必须由他们来组织训练不是一回事。当毛在评论人口过剩的问题中坚持“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时，他并非简单附和一种陈旧的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马克思主义偏见，而是出于他自己固有的民粹主义信念，认为真正的社会创造力属于人民自己。

当然，毛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点，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虽然毛在农村成功的革命经验无疑有助于加强他思想和行动的农村方向，但在农民证明自身的革命价值很久之前，毛就很自然地为他们所吸引了。对“生活与劳动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思想的特点。毛虽然从未证明（像俄国民粹主义所做的一样）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与俄国村社相当的传统东西可赞美），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毛在1958年及后来都认为，即使中国没有传统的村社留下来，也可在他所发现的现代中国农民“自发的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上创建现代的人民公社。而这个新的公社，要在一种平等自足的农村社团（一个旧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里实现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目标，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规定的消除城乡差别的必要经济条件出现之前就要实现的目标。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阶段”，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将像政治上一样被迅速“绕过”。

然而，尽管农民自发的革命能力倍受赞扬，毛从未认为农民本身具有“无产阶级意识”。但纵使农民不具有无产阶级的美德，毛也总能在农民当中发现许多优点：我在乡下和农民一道呆了很多日子，他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使我深受感动。毛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用民粹主义特有的腔调说道：他们知识丰富，我比不上他们。

毛把农村和农民群众作为革命创造力源泉的倾向，十分自然地使他感到城市地区是社会和思想污浊之源。对城市的这种敌意当然与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的客观条件不无关系。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农村为基础，进而把农民当作“革命人民”进行颂扬时，中国的城市，正如罗兹·墨菲所说，仍然是“传统儒家制度、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正式的和象征性的堡

此评论在大跃进初期的空想狂热期间作出。请看《红旗》1958年6月第3页。

联合国出版物研究服务中心，49826：30。（下引作JPRs）

垒”。确实，毛在革命年代里对城市无产阶级缺乏兴趣，只能用1927年后城市工人阶级本身对政治近乎完全的冷淡来解释。从农村的革命力量包围并最终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革命形势中取得的经验，无疑帮助毛坚定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已显露出来的反城市倾向，特别是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藐视和对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

革命后的年代里，毛主义中那些倾向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对农民的革命长处，毛始终津津乐道，同时对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继续明显地保持沉默。实际上，城里人反而被下放到农村以变得无产阶级化，并向农民学习有关斗争、努力劳动和生活朴素的“无产阶级美德”。至少从大跃进以来，毛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多地是注重农村的工业化，而没有注重潜藏着“修正主义”的城市的工业增长。此外，若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考虑，按照毛主义独特的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落后国家这些“革命的农村”，最终将包围并压倒经济上先进但又是反动的欧洲和北美“城市”。而那个最不寻常的毛主义动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矛头就是主要指向新兴的城市贵族阶层、文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党的官僚主义者。

其实，毛的反城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均无共同之处，倒与出自于卢梭的西方理性传统中的某种论调有一定相似之处。这种论调把城市看作是一切社会邪恶和道德败坏的体现，看作是一块有毁坏农村自然的纯洁之虞的悬顶危石。这种思想在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著作里强烈地表现出来。俄国民粹主义者把现代城市看作是有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风俗和传统基础的危险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正像民粹主义者指责城市是资产阶级腐恶之源一样，毛也在城市里找到了旧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滋生地。并且正如俄国民粹主义者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和普遍瞧不起西方城市无产阶级一样，毛也是既轻视现代西方社会各阶级，又担心中国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太易于受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在两种情形里，革命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对农村的相对纯洁和对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或可能转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信赖上。

也许，毛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之间最密切的关系在于一种对“落后的好处”的特殊理解上。这里牵扯到不是简单地指出落后民族借用先进国家技术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相不相信落后有其固有的优点的问题。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集体主义传统形式，为俄国绕过资本主义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这种论点是和一种更加普遍和广泛的信念分不开的：即落后本身为革命的未来提供了道德的和社会的特殊有利条件。赫尔岑在“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俄国，而不是在受到“拙劣的利己主义”和“对物质财富令人生厌的崇拜”污染的西方国家里，看到了革命潜力。西方的前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似乎也不是较为乐观的，他宣称，历史像是“一个非常爱她最幼小的孙子们的老祖母”。其他的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861年《为了年轻一代》的宣言里宣布，“我们是一个迟到的国家，并恰好因此而得救。”

因而，民粹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不仅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之上，

罗兹·墨菲：《中国的人和自然》，《现代亚洲研究》1967年10月第325—326页。

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166—167页。

如瓦利基所引用的。见《俄国》第84页。

也不仅建立在俄国在避免西方社会错误的同时通过借用现代西方技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本是一个在民粹主义著作里相当详细展开的论点），而且还建立在对落后本身的纯洁性高度浪漫和动情的赞美之上。按照民粹主义世界观，落后既是俄国生活当中存在着野蛮性的原因，也是潜在的革命优势的源泉。没有传统的束缚，不必像西方在“过度成熟”的历史重负之下蹒跚行走，避免了在经济上更为先进的国度里那种窒息革命精神的社会和道德堕落，而这些正是年轻（不管是年轻的国家还是年轻的人民）的长处。俄国民粹主义著作里这些突出的主题，明显地与毛主义思想里一种很有影响的论调相似。在毛的早期著作中，毛痛感中国的落后，但正是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中，毛看到了积蓄着的青春活力和革命创造力。这个信念在 1958 年达到顶点。当时，毛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自然，所有这一切之中，最“空白”的是青年，因而青年是最纯洁、最革命的。在其思想发展的形成阶段，毛从构成 1915 年到 1919 年现代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特征的对青年的推崇中，产生了他对青年的特殊信任。这种信任在半个世纪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创造“红卫兵”时达到了它的政治顶点。不仅革命的活力，而且理性的创造力，都被看作是存在于青年之中。毛在 1958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正如俄国民粹党人一样，毛相信年轻人和年轻的国家有特殊的革命能力和创造能力，因为二者都比较“落后”，因而也不那么腐败。

与这种关于落后的虚构优势密切相关的是对历史传统的矛盾态度。人们可以发现，毛主义在谴责过去的封建残余的同时，又赞美农民的革命传统并褒扬“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毛与民粹主义者更相像的还有，他也提出，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革命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担。正如民粹主义者争辩说，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传统（或至少是西方式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潜藏着革命性那样，毛也在“空白”中发现了中国特有的作为革命创造力的条件。正如赫尔岑在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时宣称“我们一无所有”那样，毛也宣告中国是“一张白纸”，并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

毛主义思想的其他几个方面也应加以注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比，毛的思想与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这些方面是：毛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深怀敌意；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色彩。也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对历史的客观力量缺乏信任，对未来的观念也模糊不清。对于一个假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来说，公开宣布（正像他在 1957 年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样，甚至比这更显著、更明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没有解决，毕竟颇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毛在接见一个外国记

这个思想包含于上面提及的毛在 1919 年《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著作里。

联合国出版物研究服务中心，49826：48。

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 199 页。

自然，毛津津乐道他自己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 1959 年一次演说开始时说：“我是个粗人，没有太多的教养。”（无中文公开版本，按原文译出。——编者）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5 页。

者（毛 1965 年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时提出，他领导的革命存在着将来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可能。这里，不止是一种列宁主义唯意志论的绝对翻版，也不止是附和列宁本人对历史客观力量不耐烦的情绪。归根到底，正是列宁长期斗争反对过的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决非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它是完全依赖于人的愿望、能力和觉悟的。

与其罗列毛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密切关系的清单，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毛面临的、由民粹主义者提出来的两个主要难题和它们对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地位的影响上。第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觉悟”和群众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使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一致的问题。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指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毛满可以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但在理智上，毛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他的党（和它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但却被与之相抵触的信念，即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知识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的确，毛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自然，毛是一个以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为基础的、为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提供领导和指导的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但毛从来不像列宁那样绝对信任党和它的组织。毛总是表示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智慧，这却是列宁既不具有也不曾表示过的。毛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实际革命效力的评价，是与民粹主义对群众基本革命创造力的信任和设法把一切都“归入”群众之中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些年代里，他以列宁主义的方式强调组织和纪律的作用，同时不断劝告革命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要“和他们变成一体”（1939 年），要“跑到农村中去……穿起粗布衣……了解农民的要求”（1945 年）。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毛坚决主张共产党员要领导人民，要做革命的先锋，而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毛却宣布，“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给群众，还告诫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他强调（至少到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必不可少的领导作用，但他也热情地证明，真正的革命知识从根本上来自人民本身，因而党的领导者和干部必须“向群众学习”，“学到工人和农民的好品质”。他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既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在能够教育人民之前，必须先向人民学习。

《新共和国报》1965 年 2 月 27 日第 17—23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3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0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79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7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51 页。

同上，第 319—321 页。（经核对，该处无此话，疑作者引用有误。——译者）

1941 年毛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8 页。

这个学生—先生的两分法以多种形式十分突出地出现在毛主义的著作里，它实质上是（在一种新的思想框架内和在不同历史环境的推演中）民粹主义没能解决的关于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两难问题：即知识分子（或所谓的革命领导者）的主要责任是教育和领导群众还是向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对“无产阶级意识”的真正源泉何在没有疑问，相反，毛从未明确说清党组织的觉悟和群众的自发性意识之间的关系。对于列宁来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信任、服从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毛来说，则有两条基本的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主义时期独特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形成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毛主义对群众和党的双重信任。不仅在1949年之前，而且在1949年之后，毛都是鼓励群众自发的革命活动，然后对这些活动施加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控制。在毛主义时代的晚期，这种现象在大跃进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戏剧性的表现。在发起大跃进运动时，毛赞美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说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党则不如对群众那样非常看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起初完全绕过了党，号召群众反对党和它的大多数领导——直到这些巨大的动荡产生出混乱，才迫使他勉强地重申，党的权威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毛的“相信群众”完全是非列宁主义的，不注意这一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毛的思想在互相冲突的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之间拉锯，与毛主义对党的态度含糊，与一个也许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荒谬情形，有很大关系。在这个国家，“无产阶级意识”既不归因于党，也不归因于无产阶级，断言毛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存在于他本人和他的思想之中，以此来处理这个问题，未免过于简单。毫无疑问，毛像列宁一样，确信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一贯正确。但列宁以及毛同样面临的不是简单地由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意识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那种意识来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列宁主义里有许多含混的东西，但列宁在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代表以及如何使那些意识形成、巩固和活跃起来的问题上，是相当明确的。在这里，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远不是明晰和毫不含糊的。毛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然而他的言行却强烈地表明，他决不会完全接受那些组织原则所依据的理论假设。他对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力和群众意识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信念，这也妨碍了他坚持纯粹的列宁主义。对于毛，“意识”的问题仍是一个民粹主义式的难题。

如果说毛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非列宁主义态度制造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和思想矛盾，那么他还提出并面临着一个更普遍、常常未被典型的列宁主义者认识的矛盾：使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的不是传统的（和通常使之过分简单化的）“目的是否能证明手段正当”的伦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的这些话不是在“大跃进”时期，而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说的。作者的说法有误。——译者）

本杰明·史华兹：《善的统治时期：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和党的若干主要看法》，《中国季刊》第35期1968年7—9月第1—17页。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中的党》（《中国季刊》第38期1969年4—6月第1—26页）中，也提

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告诉我们，毛主义者对革命方法问题有任何特别的伦理上的关心，而是与一种非同寻常的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忧虑有关，人们担心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可能会全部过于轻易地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手段所破坏。

在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由于需要建立一部管理有效的国家机器并着手进行现代经济发展的困难工作，一个由新的官僚主义管理者（大部分从党内提拔上来并仍留在党内）组成的政治集团和一个由企业管理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经济人才群体产生了。而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习性可能加强了这种官僚政治化的进程，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摧毁了旧的上层人物集团，另一方面又特别推进了这个过程。正如韦伯经过充分考虑论证的那样，“消除社会差别的每一个过程，为官僚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这一点，在 1949 年后的中国，其真实可靠的程度并不亚于别处。

考虑到毛以极端的民粹主义态度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一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就不难想象革命内部这种潜在的官僚主义制度化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同样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发展，还出现了危险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趋向，它加大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特别是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鸿沟，同时加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要求缩小这个差距。毛在 50 年代中期担忧的并非简单地是经济增长进行得太慢，而是这个增长以一种有消除共产主义革命目标危险的方式在进行。

如果用毛关于手段和目的矛盾对立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中独具特色的毛主义，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达到马克思主义目标相一致这一点上（至少在毛主义的观点中），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尝试，可能并不像它通常被描绘的那样荒谬。在理论领域里，毛主义协调手段和目的的最重要的尝试，就是明确指出（它毫无疑问抛弃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革命以后的发展战略），即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本身也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更不必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更正确地说，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应对社会关系和民众意识连续不断地进行改造。毛曾以各种方式对这个观点做过系统的阐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的学说。毛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和这个学说一致的，并且总的说来，反映了对调解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的矛盾关心。人们应该记得，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防止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要求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下放运动，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各种半工半读方案和群众必须精通科学技术的号召——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义者（即使其中未必包括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话）打算用来预先阻止官僚主义者的职业道德脱离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并防止新的城市贵族阶层脱离农民群众的措施。

马克斯·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纽约，弗里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40 页。

1933 年毛的这一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4 页。

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98—101 页。施拉姆在《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穆顿出版社 1963 年版）一书里提供了一种更为充分的分析。

毛主义者用以达到预想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那些手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反映出毛主义者赞成下面自发的群众行动，不信任“来自上层的革命”，它还显示出毛主义中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具有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较少地具有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在毛主义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护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必要的社会和思想前提的意愿里——它甚至抛弃党这个实现马克思主义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列宁主义的、更不必说斯大林主义的东西。

认为列宁完全不注意他的政治行动的社会后果，对他（即使不是对列宁主义）是不公正的。在他临终时，民粹派的古老忧虑仍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发动的革命所建立的独裁统治形式，同旧的独裁统治相比几乎是换汤不换药；一个“仅仅徒具苏维埃外表”的“资产阶级专制机构”，这就是列宁最后对布尔什维克统治方式所作的痛苦的说明。但尽管有这些怀疑，甚至有道德上的犯罪感，列宁还是不愿承认在他设计的革命手段和他追求的革命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一致。在他最后分析革命中发生官僚主义腐化的原因时，他未说到这与他对党组织的设计有关，而把原因集中在俄国的与世隔绝和经济落后，特别是俄国的文化落后之上。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化落后，旧沙俄时代的官僚政治传统制服了布尔什维克。

毛是否自觉意识到列宁主义的原则与官僚主义有关，尚属疑问。即令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也不可能既承认这个结论而同时又不放弃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他要求拥有这些遗产。在这些遗产的范围内，他声称自己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而毛确曾采用过新的手段和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抛弃了革命后非常合乎逻辑的、由列宁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制度的模式。并且，他还以十足的非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革命正统性表示怀疑。毛特别关心使手段和目的一致的问题，可能更多地是出自一种历史的不确定感，而不是由于任何深刻的道德危机。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信念是动摇不定的，而毛在这方面的信念实际上等于零。他比民粹主义者更加不敢确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毛的观点，革命后的中国很容易走向共产主义，也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结局完全由人们的意识、愿望和活动来决定。同民粹主义者一样，毛认为人们是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目标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必须选择与他们追求的目标相一致的手段。至于毛选择的手段是否正在领导中国走向他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不管未来会带来什么，毛在共产党领导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按照自己的意愿，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矛盾的人。

毛主义和正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尽管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毛主义决非 19 世纪俄国的信条在 20 世纪的复活。毛是马克思和列宁自觉的继承人，而且据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虽然毛有区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思想，但他的思想目标和思想类型基本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和政治传统，他有意识地与上述传统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毛与民粹主义共有的东西又未被承认和未受到注意。在前面的篇幅中，毛主义的思想中被描述成“民粹主义”的那些方面，毛主义者却把它

关于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苏维埃制度所作的尖锐评论，可参看艾萨克·多伊彻《历史的讽刺》中的《列宁在道德上的困境》第 167—173 页。

看作是被颂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先进表达方式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自我认同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毛主义者也许是不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具有共同的信念和思想，而且，毛主义中的这类信念和思想也未必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传统。本章认为，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毛主义里的民粹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被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是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的。

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才形成的。中国传统知识的渊源可能发生的影响。虽然确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不过似乎应更多地到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因素里寻找民粹主义成分出现的原因。在这里，注意那些促进了民粹主义式的思想和运动的典型条件，也许不无裨益。这些条件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正在外来的、普遍视之为异己的现代资本主义力量之下分崩离析；本国资产阶级缺乏生存发展能力；一个与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社会大相径庭的知识界出现了；这个知识界的成员们期望通过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寻根并代表农民利益说话，填平把他们与社会分离的壕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民粹主义可以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以及它使人类和社会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由农民承受的那些代价所提出的抗议。民粹主义不是农民的思想，而是自认为代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思想。也许与中国情形特别有关，人们已经注意到，典型的民粹主义倾向“不仅起源于落后国家和比较先进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是由同一国家发达的和落后的部分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从这些一般的观点来看，毛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乃是一个受外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威胁的、经济上落后和基本上是农民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毛主义之中，马克思主义成分和民粹主义成分在与外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中彼此支援，不仅当那种制度过去冲击中国时，而且在它现在威胁中国时都是如此，从国内来说，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反映了落后的（但相对来说是革命的）农村和经济上比较先进的（但不革命的）城市地区之间的矛盾，并且（在1949年前后都）表现出一种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的革命偏向。此外，民粹主义成分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为现代中国历史实际服务的革命思想；按照典型的民粹主义方式，毛主义首先关心的是推动现代中国历史的两个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所关注的焦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现代中国社会里比较弱小，仅与共产主义革命沾一点边。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独特之处，并不是民粹主义因素的出现，而是它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不是在这个运动之前或与这个运动相对立而出现

尽管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概念来使用是困难的，但并不比将像“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这样的说法作为普遍概念使用困难来得更大（而且，或许更少使人误解）。参看伊万舒和盖尔纳编《民粹主义》里的“民粹主义的概念”，第

安格斯·斯图尔特：《社会的根源》，载于伊万舒和盖尔纳：《民粹主义》第181页。

的。这个历史的巧合，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独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尽管毛可能和列宁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他不完全具备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理智的假定，这是列宁主义的党组织和党发挥作用的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敌意，一般常伴有对现代生活模棱两可的态度。列宁将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描述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雅努斯。

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者在向现存社会制度挑战这一点上，是“进步的”；而他们在试图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又是“反动的”。最近有许多作者也根据民粹主义在反对“现代化进程”中维护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形式的愿望，对民粹主义思想的“雅努斯性质”进行了分析。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可能包括对现代技术和工业的一概摒弃，但它的两面性最典型不过地表现在试图在“传统主义”和“现代性”之间达到某种思想综合。在这个领域里，毛主义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毛主义明确地反对传统并坚决致力于现代经济发展，它表现的不是一副“雅努斯面孔”，而基本上是进步的单一面孔，虽然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倾向和陷入的困境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现代技术和工业化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引起的后果的关心，但毛主义不反对工业化，而是反对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后来在“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世界所采取的社会形式。

然而毛主义某些民粹主义方面，与某种死灰复燃的完全反动的信仰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巴林顿·穆尔称这种信仰为“卡顿主义”。在商品关系（在现代，明确他说就是资本主义关系）开始破坏农民经济的地方，穆尔注意到，“社会里的保守分子似乎想掀起一片喧嚣，颂扬农民是社会的脊柱”。这种独特的、有针对性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宣传包括：赞美农村“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深刻敌视城市及其“同谋者”；强调需要道德更新，需要“友谊”与“和谐”；反对唯理智论并赞扬武力的作用；排外主义和谴责“颓废的”、“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以民间和地方艺术为中心的艺术见解；以及一般地反对“只有一技之长”，反对产业主义。

尽管很容易看出“卡顿主义”和毛主义的某些民粹主义特点之间的类似之处，但必须知道它们之间一些本质的区别。在现代，由于上层地主阶级企图尽可能多地保持传统的和压迫人的农业社会秩序，“卡顿主义”已经成为回击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了；它赞美“农村的优点”，同时对社会变化极端害怕。穆尔指出过，在传统秩序处于瓦解过程时，在农村极端的右派和激进的左派中间，出现了表面上类似的信仰，然而，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农民受苦原因所作的现实主义分析和对一种潜在的未来所作的描绘不同。卡顿主义隐瞒这种社会原因，并且设计出一幅农民不断屈从的图景。激进的传统则强调这种原因，并且设想一幅农民最后解放的景象”。毛主义的民粹主义和卡顿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集中在将这些信仰结合起来的方

《列宁全集》第1卷第478页。（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神话中守护出口、入口的门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人们常以他来比喻两面派人物。——译者）

参见安格斯·斯图尔特：《社会的根源》第186—191页。

作为对“卡顿主义”的一种讨论，请看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6年版第490—496页。

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6年版第

法，尤其是想要它们服从的终极目的等方面。

至少在毛的一生中，毛主义坚定地保持着激进的传统。毛主义把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促进社会变革，以求在未来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毛主义之后的中国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这些民粹主义的成分（有选择地被阐明了的）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和荒谬的“毛主义”的思想遗产，很容易转而成为反动的社会目的服务。

在对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进行任何一般性的研究时，人们看到矛盾重重。如果像多伊彻提出的，“最古老的国家”中国采用了“最现代的革命学说”——列宁主义——是互相矛盾的事情，那么，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释中出现了强烈的、“前列宁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思想和信仰，则更是咄咄怪事了。列宁早就把这些思想和信仰丢进了革命历史的垃圾堆。如果说毛站得比列宁更高，他之所以如此，靠的是一种具有许多“虚构的”革命概念和列宁及列宁主义者一再称之为“反动的”、“乌托邦”的理智倾向的思想。列宁确曾对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认为他们（尽管他们的大多数民粹主义追随者不是这样）就自己的时代来说是进步的；然而列宁认为，他们的时代和民粹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的说法，民粹主义倾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异端。因此，毛被明确指控犯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过失，并不太出人意外。早在1930年，瞿秋白就附和第三国际的抱怨，谴责毛和追随他的少数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者”，谴责他们背叛了城市无产阶级，苏联的理论家们在最近的论战中，重新提出了这种指责。

然而，列宁主义的思想异端也很可能发挥某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效。首先，如果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倾向将毛吸引到农村，并且又提供给他那种对农民群众自发革命创造力完全非列宁主义的信仰的话，则极不可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毛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方面，尤其是仇视官僚主义的精英主义，不信任正统制度和特别关心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对在革命后的中国继续保存革命的希望，明确无疑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毛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毛主义者和非毛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毛的所谓“列宁主义”的一切，那大概确实有一点自相矛盾。假如毛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奇怪的一个。

还不能肯定，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毛逝世后是否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是不是毛泽东思想或某种在现代中国革命意识里更加根深蒂固的思想所特有的，依然要走着瞧。

田松年译自《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载于《布尔什维克》1930年5月12日第114、141页。

参见《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载于《苏维埃报刊最新文摘》18。

乌托邦主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
版社 1982 年版第 3 章

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美) 龚宗仪

—

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毛泽东现已去世，该是对他作出定论的时候了。鉴于评论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上的地位问题极为复杂，涉及面极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先迈出小小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分析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原是一名儒生，在 27 岁达到成熟年龄时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事实。

马克思本人不屈不挠地奋斗了 40 年，并未在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肥土沃壤即西欧和北美实现他的理想。而毛泽东在 1920 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的 30 年内，却成功地在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儒学之邦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国原来连马克思的名字都不知道，马克思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有可能在中国实现他的某些理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毛泽东是救世主吗？当然不是。倘若他像 19 世纪 50 年代洪秀全那样抱着救世主的思想，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那肯定会失败。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奥妙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首先分析其理论基础，弄清：（1）毛泽东为什么又是怎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什么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是什么？

二

现在急待历史学家撰写一部全面客观的毛泽东传，但关于毛泽东的某些情况已有定论。他原是一名儒生，受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熏陶，精通儒家典籍，擅长写古体诗词，但他却如饥似渴地从欧洲各种思潮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20 年代前后，他读了当时在国内可能见到的关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译论著，杜威和罗素在他家乡湖南讲学时，他聆听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尽管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只有片断的介绍。以下三个因素对他改变信仰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1. 中国的历史条件；2. 在哲学基本原则，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3. 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

第一，自 1839 年（应是 1840 年——编者）鸦片战争以后，眼光敏锐的中国人完全意识到，近代文明的主导模式是工业化，其政治上的特征，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倡导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孙中山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新的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以西欧北美为中心，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求生存，这已经成为举国一致的定论。毛泽东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回忆毛主席五四前后在长沙》，《工人日报》1959 年 5 月 12 日。黎锦熙：《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光明日报》1977 年 9 月 14 日。郭湛波：《近 50 年中国思想史》，香港 1965 年版第 4—8 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61 年版第 3—63 页。

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问题是，怎么学？

历史告诉毛泽东，中国曾尝试建立洪秀全式的基督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成千上万人牺牲，数十年的动乱破坏，而并未取得成功；中国又曾试图在李鸿章倡导的传统体制内，后来又试图通过康有为的儒家维新运动，实现工业化，但都失败了。此后，中国走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道路。民国取代了清王朝。孙中山有自由派民主倾向，曾期望西方援助中国实现工业化，但徒劳无益，民国名存实亡。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地位，局面比清朝统治时期更为恶化，孙中山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心灰意懒。1919年五四运动时代，胡适等人力图将继承儒家遗产同全盘美国化结合起来，此举即使能成功也需要几个世纪，不是几十年所能奏效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激进无政府主义叫得很响亮的原则显然也行不通。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深入人心，这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它又和其他各种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不同，竭力主张实现工业化，认为工业化为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必需，是社会的进步。问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儒生，思想已经成熟，还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正是因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有所相通之处而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毛泽东从未像郭沫若等人那样承认过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原则上有所相通之处。也许这种相通性不是促使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因素。对此我们尚缺乏佐证。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即毛泽东的儒学背景本来有可能妨碍他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并未形成阻力。约瑟夫·尼达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起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之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最后又回到其发源地，这个观点是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人们不难发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有以下几点相通之处：1.两者都竭力反对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2.两者都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3.两者都坚持认识论的目的性，其最终目的是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曰“道”；4.两者都坚持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5.两者都认为事物运动的根据在于矛盾或阴阳对立；6.两者都坚持认为，世界永远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发展变化过程是，对立的事物由矛盾趋向统一，统一之后，对立的双方之间相辅相成，但逐渐又产生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有科学依据，以为儒家的辩证观点简单原始而加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突破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构想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同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相比，儒家的社会制度无疑已经过时，但中国文明在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不仅中国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说，而且许多欧洲人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本人虽未详加论述，但也注意到了。在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很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关联，犹如中国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相关联一样。”毛泽东承认，中国共产党创造人陈独秀对他改变信仰是起了作用的。在怀念卡贝特和列宁时，陈劝勉中国人不要对共产主义前途失去信心，因为儒家要求平分财富，限制土地所有权，这都是社会主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0页。

郭沫若：《Tienhsioshen》，上海，1950年版第27页。

义的先例。

第三，然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仅仅在哲学原则上相通，未必意味着两者就能成功地互相移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之间有很大距离，因为旧中国并不存在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承认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缺乏了解，而且承认他们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所说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权限于西欧（和北美）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但是到1895年，甚至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他和马克思所预料的那种革命是不可能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绪论》中，恩格斯承认，改善社会秩序的道路不是靠设街垒，而是靠投票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在人口中占压倒多数，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农民的愚昧性，怎么可以指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呢？在这方面，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即列宁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如何消除了中国的条件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

在严格的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正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将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定为农业资产阶级，将农民定为农业无产阶级。通过分析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因素打破了土地所有权，将农业生产改造为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国内市场。因此，小农和自给自足经济的解体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提供了根据，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难题也就得到解决。列宁根据财产所有权、收入和阶级斗争情况划分农民阶级地位的思想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中，毛忠实地反映出列宁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列宁把农业经济定为封建经济，所以中国经济也成为封建经济。

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阐明了党在马克思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革命必须由一个权威组织进行周密、系统的谋划而进行到底，这个权威组织要由有献身精神和纪律性的职业革命家组成。所以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评这两个原则就成为基本信条。指导行动的正确理论、政治鼓动和组织领导都是极其重要的。列宁嘲笑考茨基“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用处，还嘲笑伯恩斯坦天真地认为阶级觉悟可以自发地产生。他批评“经济主义”是近视的机会主义。对以上各点，毛泽东均无保留地加以接受。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1938年）一文中，这些原则得到充分阐述。对毛泽东来说，农民若加以正确领导是可以走向革命的，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信条。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列宁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有机的辩证的观点扩大到全球范围，毛泽东不仅据以论证，中国为重新建设国家，在实现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枷锁下求得解放的目标时，采取“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方略的正确性，而且还据以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扩展到世界规模，使中国能够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国家和社会加以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2卷第1期第13页。（这一期《新青年》并无此文，引文出处不确——译注）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3卷第263页。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绪论》，纽约，1935年版。

系统化和具体化，毛泽东从中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并对人民、民主、国家等概念以及大家都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重新作出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个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对列宁的观点的阐述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两篇文章中，列宁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分两个阶段。毛泽东忠实地以此观点解释孙中山推翻满清的成功，并提出自己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显然，毛泽东是通过列宁主义的中介而获得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复兴中国。按照毛的同胞王夫之的儒家传统说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几乎所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证实，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资本论》）激动人心的感召力使毛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振奋，为他们指出了救国的道路。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反对经院哲学。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即使还不够完备，也决不会是经院哲学式的。在《反对本本主义》这本小册子中，他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联在一起，称之为马列主义。在他们同苏联共产党人的论战中，列宁主义占据中心地位。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个列宁主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作为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的地位已为其敌友双方所公认。但是，他是否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成一个体系，或者说他的思想是否以系统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做出贡献，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毛泽东的思想是由许多独创性的方针和决策构成的。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以农业和儒学兴邦的国土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而马克思本人从未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成功。有鉴于此，否定毛理应得到承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似乎缺乏根据，尤其是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来看；但另一方面，毛的许多论断超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又不能把他称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者，尤其是如果按照苏联攻击性的说法。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决定性的因素似乎在于，毛的哲学思想中带有不可否认的儒家气质，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学者，尤其是那些以西方观点分析问题的人对此又不了解。为探索这个问题，必须对毛的思想进行一番全面透彻的研究。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过，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毛的最著名的哲学理论——多重矛盾的理论。一旦这个问题弄明白，其他问题也都清楚了。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可以看出毛的哲学理论的形成。

甲、多重矛盾的理论 and 事物发展的主导因素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观点，但是将其发展过程颠倒了过来，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将辩证法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的是恩格斯，其主要著作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挑出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

例如：朱德，见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1956年版第101页；彭德怀，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96页；董必武，见《中国青年》1961年7月5日；周恩来，见丁江海《周恩来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第24页。

但未细加论述。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辩证法只作了一个简明的叙述。辩证法有四个基本规律：即变化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变化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说明事物如何变化，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辩证的观点具有真理性，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某些问题上缺乏彻底性。这些问题是：

a. 儒家在《易经》中历来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万物的变化莫不有其限度。换言之，作为每个事物运动结构的变化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从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的，或者说变化方式本身是不会变的，无不保留其本身的特殊性，或者说在任一变化过程中均采取这种方式。例如，人可以由青年变为老年，但人不能变为狗或返老还童；无机物不能变为有知觉的有机物。为什么？恩格斯未作阐述。

b. 汉儒董仲舒长期认为，如果宇宙中的两个事物绝对不同，则不能互相转化或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两事物绝对相同，或出于同一来源，就会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如果统一性意味着互相转化，就不会有真正的矛盾，而只存在着由某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问题；如果统一性意味着一方消灭另一方，就不会留下互相矛盾的对立面。列宁并未具体阐明他所说的统一性是什么意思。他只强调指出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中，斗争居于第一位。

c. 若一个事物含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正面和反面，则这两个方面必定保持和谐的平衡，这样该事物才能够存在和运动。一个事物若其构成部分失去平衡和和谐，便不能够运动。一个事物若其内部对立的双方力量相等，作用力的方向相反，不管这种力量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则该事物也不能运动。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述过于简略，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d. 如果渐进的量变如恩格斯所说纯粹是数量的增加或减少，那么，它是一种自发运动呢，还是受到外力的推动？恩格斯以化学现象为论据，但每种化学反应均需要触媒剂或中介因素才能发生。在世界进化的过程中，某些现象尤其是高级有意识的行动，似乎出于自发，但某些变化，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若无有效的外因推动，未必能够自发产生。例如，水不能自发地变为蒸气，需要施之以外因即加热。因此，恩格斯所说的量变规律涉及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诱发作用或依存关系。显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人们难于解释事物运动的起源或运动过程中的创造性。

鉴于恩格斯、列宁等人对于辩证法的阐述存在着上述问题，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著作，似乎对某些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种解答，尽管这种解答带有儒学特色，并采取《太极图说》的方式。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毛为弥补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某些方面的不足做出了哪些贡献。

第一，毛泽东重申了《易经》中事物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论断。换言之，对立面的统一为事物本身所固有。因此，矛盾是自生的。《易经》中说，一切事物均包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永无停息。这是讲事物发展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五章；W.T.陈：《中国哲学》（史料集），普林斯顿，1963年版第283—284页。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七卷和第八卷。詹姆斯·莱格：《论易经》（大附录），纽约1963年版。

的内因问题。毛说：“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故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除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外，还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第二，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偶性。这使我们联想到儒家五行相反相成之说。既然矛盾的对偶性是不可分离的，是居于第一位的，任一事物的变化就必然有一个限度。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变化的“限度”问题。毛说：矛盾着的事物同时又互为补充。“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弗塞沃劳德·霍勒布尼奇曾说过：“列宁和斯大林似乎更倾向于将对立面分开而不是将它们结合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的对偶性，而毛则易于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对立统一观点在中国人的思想和辩证法中居主导地位。”

第三，毛泽东认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本质。“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起主导作用，即决定事物的性质。其基本原理是，主要矛盾在长期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虽然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原理可能是列宁提出的，但儒家的“太极图”早已预料到了。阴盛阳衰，阴衰阳盛。毛泽东的论述当然使之更加明白易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个难题就这样得到解决。

第四，毛泽东论证了量变和质变反复相互转化的性质以解决转化中介环节问题。他说：“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可以说，事物的质变同矛盾主导方面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质变中，原居于主导地位的方面改处从属地位，原居于从属地位的方面则改处主导地位。辩证法的飞跃，使旧的质的规定性产生一次飞跃，并使之转化为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8页。

弗塞沃劳德·霍勒布尼奇：《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中国季刊》1964年7—9月第19期第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同上，第320页。

周敦颐：《太极图说》，世界书局出版第七卷第463—46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7页。

同上，第332—333页。

一种与之相对立的新的质的规定性。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不仅取决于历史连续性中新旧之间的差别，而且取决于新旧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介环节即转化阶段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飞跃，而且取决于某种特殊质的规定性。这种飞跃状态或者说第二种状态。展现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和初级阶段在高级阶段的某种复归。根据毛的论述，两种状态都证明，事物上升运动的特点是螺旋形的。

毛泽东的论断证实了“太极图”的玄妙原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达顶点则阳生，阳达顶点则阴生。《易经》明确提出中介因素推动运动并保持连续性的思想。每一卦内部，均有一系列因素在发生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因素则起较大的或者说主导的作用，这就是事物在一定形态下的本质，是最主要的因素，单有这个因素就可能引起运动。这通常是一卦的第五爻。

虽然毛泽东关于多重矛盾的理论观点继续受到攻击，但大家一致认为，他引进中介因素，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以理论性解释，是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解释和新儒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间的联系。周敦颐的以下论述可以证明其间的联系：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从这里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有其儒家渊源。

乙、群众路线的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除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性之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特色还在于坚持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所谓实践一般是指：（1）真正的知识必须来源于经验，人类只有通过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参加实践才能获得知识；（2）理论的形成和实现依赖于实践；人类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手段作用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同时改造自身；（3）认识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活动，其唯一目的是维持和丰富生活。要使认识服务于丰富人类世界必须具有三个条件：（1）认识必须是客观的、具体的；（2）有通过实践加以实现的愿望；（3）行动有目的、有计划，有改变现实的方案。

这种人定胜天的理论是和儒家相同的。它是根据这样的信念：人类因有智力和思想而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还必须有改变世界的意志。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信念呢？儒家认为，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动具有信心，或者说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自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是可行的。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若不相信自己要付诸实践的思想具有真理性，便会丧失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意志、目的和激情。所以，认识必须成为个人的一种信念，信念会使人们有决心将个人的认识付诸实践。人类是万物之灵，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所不存在的事物。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取得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论著中，唯有在坚持实践在认识论中居首要地位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列宁屡次引证恩格斯的话“布丁好坏一吃即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将“布丁”换为“梨子”。但是孔夫子早在恩格斯之前就有此思想。《论语》开篇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

朱熹：《易经》。

《列宁全集》，莫斯科，1962年版第14卷第109页。

乐乎？”在《礼记》中《学记》一章，他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以提出知行合一说而闻名的王阳明，曾反复引用儒家这条格言。

马克思主义者将儒家的知行合一说斥为唯心主义，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的阐述，至少在意趣上同儒家的悠久传统有相通之处。在儒家的学说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是实践不能完全局限于生产领域，人不能被视为一种经济动物。儒家认为，人的意识并不纯粹是生理性的，实践包括人类全部具有客观形态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儒家信念，毛泽东异常相信人有了觉悟之后所能发挥出的威力以及道德典范的力量。

要求人们以意志力自觉地采取行动改变现实，或使理论和实践达到统一，这原是马克思提出的，但如施拉姆所指出，“毫无疑问，列宁对此有发展，毛泽东则比列宁更进一步。”列宁之所以能够建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取得比马克思本人更大的成功，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他在这个问题上超过马克思。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又超过列宁，因为他在比列宁不利得多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思维一旦获得解放，就转化为实践的活力，这是一条心理定律，”毛泽东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的确进行了最充分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实现从理论思维到实践的转化需要靠提高人们的觉悟。但是毛发现促使群众觉醒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简单，而需要有一个考虑周全的严密的组织，使那些有较高觉悟的分子也持续不断地感受到有压力，并受到控制，还要灵活引导觉悟较低的分子，体谅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将人们的思想、意志和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以获得按照主观目标改造客观现实的力量。如果说毛不承认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他倒似乎相信人们固有的社会意识在高明的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之下可以发挥出威力。在《哲学研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吴江很好地概括了毛的这个论点。文章说：“人们不是客观的奴隶。只要人们的认识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推动革命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创造了客观。”

毛泽东从长期生死搏斗的艰苦历程中继承了人定胜天这一儒家传统信念，并把它作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武装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这种对于人的最高信念，似乎成了毛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原动力。这种贡献就是“群众路线”。他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也就是毛主义的认识论。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似乎持与孔夫子相似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比无产者更知道无产阶级的真实愿望；他还认为，俄国广大农民不会自我觉悟，只会自发地采取行动。他们可加以教育和引导，但不是一支可以依靠的积极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9年版第1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纽约，1975年版第1卷第85页。

吴江：《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力量。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同意列宁的这个论点，因为他们经受长达十余年的内战而能够生存下来，后来又在日军占领区卓有成效地扩大他们的控制区，完全是由于他们真正投入到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并且依靠非城市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愿意而且能够团结农民，并且指引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这个时期，千千万万由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刑场上面不改色，毛常常以杀身成仁不辱气节的儒家箴言加以赞颂。

毛泽东关于实践的理论框架也许很少创见，但这不是说他在将这种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时没有创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论点是行之有效的，那么，毛的方针政策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而且大多取得成功，则生动地证明他坚信自己是有能力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的。毛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要求人们重视客观条件的论点是有实践作为依据的，即基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极不相同条件下的实践。如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论证，在中国固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条件下，毛泽东经过理论思维，在思想上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达到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概念，从而取得了理论的重大胜利。在农村以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和夺取政权，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这在实践上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

丙、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辩证法的法则属事物本体论法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誉之为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问题是：如果说辩证的观点可以用于研究资本主义，那么是否也可用于研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如果说事物的发展均含有内在矛盾，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如果说万事万物均含有推动其发展的对立的成分，那么无阶级社会的发展靠什么对立的力量来推动？马克思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思索。恩格斯未谈过这些问题。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但未细加论述。斯大林承认有此问题，但直到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才说俄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在苏联社会，敌对阶级已经消失，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以及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采取敌对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和社会大动荡的形式，而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除了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外，斯大林仅仅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苏联人认为苏联社会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其论据有二：一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逐步和平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一是共产党能够有意识地及时觉察对抗性倾向而加以克服。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是否违背事物变化的辩证法则？斯大林和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从未加以说明。

第一次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加以区别的是否是毛泽东？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他坦率承认，无论是非对抗性矛盾还是无阶级的社会，都不是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1956年4月25日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熊杰编《毛主义的逻辑》，纽约，1974年版第1—27页。

日丹诺夫：《论文学、音乐和哲学》，伦敦，1950年版第76—112页。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论述了十大关系。在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毛泽东从未放弃这个观点。例如，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能够互相转化；和平改造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也包含对抗性的方面，等等。

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变革，这无疑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在1966年7月30日的一次指示中，他说：甚至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和否定之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矛盾的统一……自然界和社会充满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有时我们说不出具体的矛盾，但矛盾照样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凡熟悉《易经》的人都不难发现，毛泽东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和宇宙问题，同苏联人的思路不同，但同儒家形而上学的确有相似之处。《易经》上的一些论述足可证明这一点。朱熹注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易经》64卦最后两卦是“既济”（完结）和“未济”（未完结）。理查德·威廉指出，“这两卦在《易经》结尾部分，这意味着事物的每一个结束孕育着新的开始，从而给人们以希望。”根据上述，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大不亚于马克思主义。

四

总之，毛泽东是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移植于孔夫子的国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俄国的胜利对此显然起了促进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原则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之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同中国实际几乎是不相容的，毛之所以能够取得盖世无双的成功，就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和创造性，这使他能够解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上都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排除造物主；都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都怀疑自我价值观；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都认为靠实践检验真理。是否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在这些哲学问题上的根本一致性促使毛从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哲学基本原理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丰富或发展是有其儒学渊源的。

王应一译自《亚洲研究》第4卷第2期
1979年4月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的批判》，《中国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13—14页。

威市和贝恩斯：《论易经》，普林斯顿，1967年版第252页。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其继承与发展

〔日〕新岛淳良

前言

今天，我在这里谈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发展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角度，或者说我是从哪里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

我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被称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的伟大之处，分成三类来研究。

第一，他们提出了过去一般群众或者专家，其中包括学者在内，谁也没有怀疑过的问题。也就是说，对由于受到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限制，没有感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提出了疑问。总之，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这不就是作为问题提出者的伟大之处吗？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作为哲学家的伟大之处。

第二，是他们对那些问题作出了科学解释。我认为这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专家的伟大之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等等，其伟大之处正在于这些理论都对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第三，是与上述理论性的问题相区别，他们把那些解释用在实际当中，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不可以说是伟大吗？我认为这正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人的伟大。这方面虽然没有理论化，但是实际上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不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仅限于他们提出了什么新问题，他们是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

说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到现代首屈一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给予解释，或者是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解释，或者偶尔没有解释。对此，后来的列宁和毛泽东给予了解释，而且，说列宁和毛泽东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其含义是指马克思没有提出的问题，或者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那样的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马克思死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提出了认为需要重新提出的问题，或者对其他人提出的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现在，有的人承认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承认列宁主义；或者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是却在那里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些人根本不理解列宁或毛泽东提出的新问题，把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总是误认为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说，现代想成为哲学家、科学工作者和实际的革命运动家的人们，必须研究列宁是怎样不断提出新问题，怎样解释马克思尚未解释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行动的。

因此，我认为应该研究一下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说列宁是马克思的继承人？又是什么样的意义上说他有新的创造？进而，毛泽东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是一个假设，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的。

我首先把这个出发点，假设为毛泽东的“理论学习”。我想这在他担任党的主席又兼任国家主席的时期，大概是相当困难的。于是，毛泽东决心摆脱一下日常工作。1958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最后的第六十条中，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过去，许多中国问题评论家散布说，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败。但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提出之前，大概是在1957年冬，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过不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有据可查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退离国家主席的位置呢？我认为那依然是毛泽东想腾出一定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那么，为什么他需要理论学习呢？

大约在1957年以前，中国的领导人是从苏联那里寻求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靠这些还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

例如，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最后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的剩余资金，不可以全部用在中央的投资上，应该留给地方一部分资金，通过农业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多样性和机械化服务。

格雷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一文中指出，中国当时已明确地意识到不可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的著名的农业基础理论，也是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由于毛泽东有许多这样的疑问，所以曾一度想充分利用时间从根本上学习理论，而且还想对现实的中国做一番调查研究。在那种条件下，做些理论上的探讨，这是一个重要的设想。当时，他一定想以学习列宁在1918年以后的著作作为重点。因为在1917年以前的列宁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从事政治，如何开展经济建设这类问题。到了1918年以后，列宁在领导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断地提出并解决了新问题。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地重新学习这些理论，就是说，毛泽东为了领会如何指导1958、195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这个问题，想通过彻底地重新学习1918年以后的列宁著作来解决许多问题。

在此作一点解释。我以1918年为界，把列宁的著作分为两部分。其根据主要是列宁在考虑过渡时期的长度（持续多久？）、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时的认识有差异。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根据19世纪的马克思的想法，依然信守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必然会引起相邻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会短时期内取得成功这一教义。当然，马克思所谓的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都是指在西欧，即在近代市民社会中近代无产阶级已充分形成的“世界”，俄国除外。但是，列宁不能同意俄国除外的看法，认为可以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这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客观条件不同了的基础上），他对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刻会引起先进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教义不抱怀疑态度。对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当时的俄国革命家的看法也全都一致。不过，他认为这里的问题是：或者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非常短，世界革命迅速到来，于是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当然那时国家已消亡）；或者由于世界革命失败，俄国工农政府也被打倒。二者必居其一，但是不管怎样，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是相当短的。

如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如此短暂，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设想那时期独自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消亡，简直就像无政府主义者讲的一样，这并不奇怪。到了1919年，列宁打算今后再研究这个问题，但后来没有。他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今后能持续几十年，但是他明白当前“世界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无论如何也要维持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于是，产生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伟大的创举》、《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这些都是1919年。在同一年又成立了共产国际，这是值得注意的。从此，列宁碰上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问题，我想毛一定想认真地学习那些新的列宁主义。

接着说毛泽东想对中国的实际做调查研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制约，这是指什么呢？毛泽东曾在1960年对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假如不是年轻、又穷又无名，就不会干革命了。如果认为这是深入群众之中做实际调查的人讲的，就会同意这种看法。换言之，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年轻了，地位又非常高。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再具体地深入群众之中做调查，就像毛泽东本人在30年代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当时所能做的是阅读各地党组织呈送来的许多报告，然后再读地方报纸。这只不过是些“间接经验”，他得到的材料都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和整理。那么，他以什么样的观点分析那些材料呢？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是从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总结出的理论来分析；另一个是以同样的比重或者超过这一比重，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理论来分析。

那么，毛泽东从列宁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他不担任国家主席进行自由的调查研究的时间里，用这一观点阅读了地方送来的大量报告，并与列宁的理论进行彻底的对照。他不正是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这一观点研究了来自现实的调查报告吗？

众所周知，莱文写的《列宁最后的斗争》（日译本已由岩波书店出版）一书，是一本成功地再现1922年列宁患病之后到1924年1月逝世期间的政治过程的十分引人入胜的书。这本书的基本史料，来源于列宁的秘书，主要是一个名叫费奥蒂维娅的秘书的未曾发表过的材料。通过它向世界的人们表明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临着哪些问题，又想以什么样的形式解决它。这个记录公开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并很快被译成了汉语，我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定读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制度，兄弟党的重要文献都要无遗漏地译成汉语，让党员干部传阅。从这本记录中可以看出列宁在最后几年里，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问题。认为由谁来担当接班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存亡的重大问题。我想，毛泽东意识到接班人问题非常重要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或许直接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

这本书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外贸易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党内民主问题，第四个问题是民族问题。在列宁最后的斗争中，提出了以上四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对后来中国的政治进程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原因是毛泽

东深入学习了列宁最后的斗争经验。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因此，我认为通过彻底地研究列宁在 1918 年以后的著作，可以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就是说，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列宁那里学到了什么，又在哪些方面有所创造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

下面，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什么不同。我认为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与列宁主义所处的时代，即时代背景非常不同，如果排除这个因素，单纯地从思想内容上进行比较研究，那是不会得多大成果的。

以这个问题为线索，我想介绍一下 E.H. 卡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在 E.H. 卡看来，所谓列宁主义，“不是根据俄国的特殊情况产生的，它不是受客观的、冷酷的诸经济规律支配的时代，而是为实现所期望的诸目的，有意识地指挥经济的、社会的诸过程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这样讲恐怕还是很不好理解。例如，对“经济规律”如何理解？对“阶级”如何理解？对“无产阶级”如何理解？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理解？E.H. 卡指出，这些问题，正如“帝国主义”这种并非是列宁主义中特有的概念一样，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作为一个例子，我想举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正像当初被日本译成“虚伪意识”那样它不能正确地反映存在，是一种错误的反映。科学被放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位置上，也就是说，对作为追求现实中每个人具体利益的行动结果的总和而表现的经济“规律”，每个人是无法科学地认识的，就是说，无科学的意识，于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便产生错误的意识。这种错误的意识就是意识形态。因而，当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严格地讲是指“德意志式的虚伪意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是意味着非科学的意识。对于这个问题，到了列宁主义的时代就不同了。倘若原封不动地引用 E.H. 卡的话，可以看出他作了十分有趣的说明：“马克思相信新人是从新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与此相反，列宁的理解是为了创造新社会，需要造就新人。”如果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那么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含意也就发生了变化。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必然的虚伪的意识。其性质要随其内容而定。所谓革命的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党及其领导人企图向工人灌输的东西。现在苏联的哲学辞典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有的是现实的正确反映，有的是虚伪的反映，有的是科学的反映。现在中国使用的，或在毛泽东思想中使用的“思想”、“意识形态”这些词，显然是根据列宁主义的解释。我想这大概是上述 E.H. 卡给列宁主义所下定义中所反映的新时代的概念变化吧。

同样，我想也可以谈一谈“阶级”这一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是指按照生产手段的共同关系结成的经济的社会的集团。这并非是什么法律上的存在，也不是制度。当某一群人被看作是阶级时，说其共同行动是指什么？应该是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无数自发的行动中形成的无意识产物，这便成了共同的行动。这种阶级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个人的，莫如说是 19 世纪整个欧洲世界共同的。所以在那个时期，一般来说认为它与一种放任主义的概念相和谐。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也是从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中类推出来的。就是说，所谓资产阶级，就是每个人总是有意无意的

拼命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这里，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必然起支配作用。在同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也首先是由于在越加难以忍受的各种经济条件（绝对的贫困化）下工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采取一致集体行动所形成的集团。而且可以这样认为，全世界的无产者自发地团结起来，这种共同行动必然会带来资产阶级的垮台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这里恐怕没有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计划。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这样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

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

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科学的经济规律。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规律观和阶级观。而所谓列宁主义，是取代盲目的经济规律，优先开展有目的有意识的政治活动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十月革命就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其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证明和推广了这样一点：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有目的有意识的政治活动，优先于盲目的经济规律。诚然，十月革命的模式之一是巴黎公社，但是巴黎公社并非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革命。况且，在那之前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革命。与此相比，可以说十月革命是有目的进行的，而且是第一个取得胜利的革命。

如果问这次俄国革命的结果出现了什么？这就是在俄国引起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工业化以及计划性。因而，现在人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好像是提高生产力，实现工业化，而且必定伴随计划经济。但是，如果在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这三点的话，那会意外地发现这三个观念十分淡薄。这是因为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工业化和提高生产力早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完成了。在经济上，计划性这个概念完全不存在。为了弄得更清楚一些，我想研究一下列宁对计划性这个问题是怎样考虑的。列宁在 1918 年这样写道：“在政治方面，俄国最先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最先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这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一次出现了计划经济。也就是说，计划性这一概念比较先进，它具有 20 世纪的性质。换言之，如果经济规律可以受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左右的话，那它就不能叫做规律了。马克思意识到了经济规律，而在列宁的时代，认识到了计划经济，即依靠人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去指导经济，这显然是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十分不同的新见解。

上述这种情况，在对党的看法上表现最为突出。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当中，例如在国际性的工人政党组织——第一国际中，既有欧文主义者，又有拉萨尔主义者，还有普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大量存在。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期间都是如此。这里面既有大学教授参加，又有占有相当数量财产的所谓知识阶层的人物参加，而且没有后来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不允许分派的严格纪律。如果现实地研究问题，我觉得说马克思组建的党和列宁组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这并不过分。众所周知，列宁组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具有铁的纪律、不允许派别存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集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决不包括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与上述受盲目经济规律支配成对比

的、自发的政治活动占优先地位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显然，这种想法是马克思想象不到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强调：“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对此，列宁说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思想，它是 19 世纪时代背景下唯一的革命理论；而列宁主义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优先于经济规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另外，我不认为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实践上有所发展，但在理论上却停留在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关于这一点，宇野弘藏先生写了《（资本论）的经济学》（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一书。该书最后第三部分的题目是：“理论与实践”。宇野理论认为，在经济学上理论与实践毫无关系。他指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既不是工人，也没有资本家的实践，只是闭门在书斋里读书。马克思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并非对他的科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只不过是对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千篇一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有好处。要创造科学的理论，只能按照科学的程序办，无需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就是宇野理论。而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尚未确立像现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确立的那种理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只是在谈到理论的检验过程时才使用“实践”这一词。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反复提到的只不过是理论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提出革命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以上说明的是列宁主义被认为是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我想介绍一下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一个桥梁——关于阶级的新概念。

正如上面提及马克思时所讲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仅仅与生产手段有关。而且，阶级斗争也被限定在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上。而列宁在 1920 年的一次讲话非常有意思。当时是在西伯利亚的远东共和国尚存在时——因苏维埃联盟建立于 1922 年，在那之前——关于西伯利亚参加革命一事，他这样讲道：

现在，西伯利亚的农民群众已经同我们联合起来了。西伯利亚的农民握有余粮，但他们被资本主义所腐蚀，不能放弃旧时的自由买卖，认为自由买卖余粮是自己的神圣权利，他们在这点上是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弄糊涂了……他们不考虑这种所谓公民平等意味着饱食者对挨饿者的剥削，要知道，农民握有余粮而又不愿把余粮给挨饿的人，“是在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则。他们这些人受了几百年剥削，今天第一次自己当家，就要趁着被破坏的工业拿不出东西换粮食的机会，利用自己的余粮把工人变为奴隶。

总之，这里说得非常明确，吃饱肚子的农民与饿着肚子连作为抵押的工业品也不能生产的工人之间是一种剥削关系，而且这种农民所谓的公民平等，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式的各种关系的基础。与此类似的语言，在 1918 年以后的列宁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几处。在 1919 年的《伟大的创举》中，列宁重新给阶级下了定义，说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这三大差别没有消灭期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说法不是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的定义，列宁是这样下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了）不同，在社会劳动组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在这三点当中，只有第一点是继承了马克思，后面补充的两点，我认为这大概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变了形的列宁的功绩（？）吧。

因此，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正在深入学习的是被改造成适应 20 世纪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我想大体上这样说不是更好吗？毛泽东思想所直接继承的，不是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而是 1918 年以后的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下面谈一下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首先研究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列宁主义。我认为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毛泽东思想都继承了（关于农民问题，看法不一，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涉及）。我认为按照新定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存在这一观点是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1960 年以后中国发行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把阶级的定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类的定义用“注释”的形式附于文中。关于阶级定义，是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定义。

当然，使用这种新定义的优点在于：据此证明作为阶级压迫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需要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像 19 世纪那样，单纯从与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去给阶级下定义的话，那么，当革命后的俄罗斯工农新政府剥夺了所有资本家的生产手段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至少在城市就没有了。这样，就会像《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讲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确实从确立的那天起就必须开始消亡了。然而按照新定义，只要存在三大差别，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存在，也就是说，阶级社会仍将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应当作任务。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被看作是合理的。

按照旧定义，只有“世界”同时爆发革命，才能立即进入无产阶级社会，所谓“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情况下的“社会主义”，是指无产阶级社会的第一阶段，前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国内被消灭——是不能成立的。与此相反，根据新定义，进入无产阶级社会需要几十年或百年以上（这期间是“过渡时期”，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国内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必须不断地继续革命。

这里作一点补充说明，斯大林对这个新定义只是继承了一半，创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另一半没有继承，认为“过渡时期”很短。正因为如此，苏联提出至少在国内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了全民国家了。

接着，是党的建设理论。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在列宁主义中，规定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只发表高谈阔论的评论家集团，始终必须作为不允许分裂的无产阶级坚强的先锋队来建设。我认为毛从列宁那里把这些全部都继承下来了。但重要的一点是，依据这种党的建设理论在实际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比较，稍有些不同。这将在后面提及。主要是在实践方面，在理论方面是接受了列宁主义的。

然后，是帝国主义论。毛泽东接受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

—列宁在 1916 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展开的理论。例如，看一下中国发行的《列宁语录》（这是按六个问题分类的小册子）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段话就会明白，或者看一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会明白，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列宁主义。

还有一点将在后面提到，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认为，毛的这一理论几乎全部都是继承列宁主义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的问题，也是列宁 1918 年以后倾注心血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这也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再一个是军队。1917 年以前，为替换常备军，列宁设想要拥有国民卫兵，即民兵之类，彻底废除常备军。但是在 1918 年 1 月发布创建红军的命令以后，他便支持用无产阶级精神教育的常备军和全国皆兵的民兵同时存在的制度。毛泽东思想也基本上继承了这种想法。

不过，也有很多方面没有继承。

首先，我认为列宁主义有效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何时为止，争论较多——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被广泛承认的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主要区别是与优秀知识分子相对的群众的成长。因而，从领导方面和从马克思主义方面考虑，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得不提出尊重群众，或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革命的主体这种观点。于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日常生活革命化、革命的日常化具有现实性的时代吗？我觉得由此产生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很多方面的区别。

关于列宁的党是优秀知识分子的党这一问题，也许与一般的看法略有不同。不过 E.H. 卡等人却强调这种看法，我是从别的角度肯定了这一点的。证据就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篇论文很好地概括了列宁的某个侧面。的确，这是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且是带有本质性的侧面。然而，斯大林却是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某些观点中抽出这些思想并作了整理的。斯大林这样写道：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里说得很清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首先应该是懂得生产规律的优秀知识分子。苏联共产党就是忠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个教导的。所以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大学毕业的党员占大多数。在大学里，成绩优异的学生全被劝入党。这并非背离斯大林的做法，正是斯大林关于党是由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观点的实践。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涉及。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强调要掌握客观“规律”，但是毛泽东思想中所说的“规律”，任何一个群众，就是说，未必是优秀知识分子，通过正确的实践都可以获得。然而，斯大林所谓的“规律”指的却是：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

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如果这样解释规律的话，那么能够掌握规律的，自然就是专家和知识分子，只有他们领导，才能建立专家治国论者的社会。

然而，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红军中的党，制定了与此不同的“入党标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了以下新的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踏踏实实，普通群众谁都可以入党。如果说列宁和斯大林创建了“理论主义式”的党，那么毛泽东就是以日常生活革命化了的人为中心创建了党。可以说这里有决定性的差别。

后来，毛泽东把这样建党的哲学基础归纳到《实践论》中。许多学者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特点，是精神优于物质的哲学，是上层建筑优于经济基础、或者说生产关系优于生产力的哲学，这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人为的指导优于经济规律的思想潮流，这是20世纪普遍的、特有的时代特色。《矛盾论》中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表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只凭这一点还不能说是毛泽东的独创。不过，他却提出了几点在列宁的哲学中全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第一是在对矛盾的理解上，毛泽东思想常常把它分为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或者当多数矛盾存在时——这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从一开始就有——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恐怕是在毛泽东思想出现之前未曾有过的想法或概念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脱离人的意识独立存在的经济方面的各种活动是决定性因素。通常，这个方面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活动是次要的。而且，在各种经济方面的活动本身，也不分上下顺序。例如，像恩格斯的（意志的平行四边形）理论等典型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完全是作为力学运动而掌握的。而且，即使是一个事物，作为说明矛盾的例子，列宁也举出了作用和反作用。恩格斯在最初也举过这种例子，但是未能把作用和反作用区分为主要和次要，认为这种力应该是均等的。即使是恩格斯提出的平行四边形的理论，也是带引号的“科学”，是19世纪的说明。而主要和次要两方面的相互转化理论，成为20世纪的，说得再清楚一点，是包括爱因斯坦以后的物理学，包括相对论的、与经济活动决定论相对的、更重视合乎目的意图之间关系的非决定论哲学。

那么，为什么列宁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哲学，在毛泽东思想中却产生了呢？我是这样考虑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是无意识中合乎规律的实践，而且，尽管本人没有意识到，但是那种规律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马克思所做的，是探索所谓现实的人们生活过程是什么？它是怎样发展的？我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遗憾的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列宁只是涉及到理论范围。但是，毛泽东所做的是什么呢？他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意识怎样从那种生活过程中产生，具体地讲，是正确的指导怎样产生的问题。就是说，在19世纪也好，在20世纪也好，从理论上讲，实践始终是前提条件，即“科学”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如果这里有20亿人，

那么 20 亿的实践就是前提条件，作为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的任务，自然是分析作为前提条件的人的具体实践，并从前提条件的运动中寻找规律。

毛泽东所要做的，正是列宁或斯大林未能做的事，即怎样改变实践才能产生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指导这类问题。不是把实践当作前提条件，而是想通过改变实践来创造规律，决不是带引号的“规律”，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所以，正如我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实践论》不是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过去的哲学全都如此，恩格斯也是如此。应该说，毛泽东的哲学是实践一元论的哲学。毛泽东第一次把实践分为“低级实践”和“高级实践”，而且把从低级实践向高级实践发展当作问题。这在毛泽东以前是没有人持这种看法的。在恩格斯及其继承人列宁的哲学中，实践实际上被看作是存在的同义词。但是毛泽东把实践本身分为正确的实践和不正确的实践——这种区分在毛泽东以前是无意义的——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如何才能把肤浅的实践、不正确的实践转化成正确的实践或深刻的实践、高级的实践的问题。换言之，它是把有意识的行为带入无意识之中，通过把无意识进行的实践意识化，实现主观能动性而对实践进行强制性的指导的理论。我认为，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为列宁创造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果借用宇野先生的话，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经济规律，除了他读书和分析研究之外，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变革社会的实践，都是科学以外的问题，都是不相干的。而在毛泽东《实践论》中，实践不是前提条件，必须对它进行选择。换言之，与其选择书本从而得到间接经验，莫如选择生产活动和革命活动——实际变革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与其选择脑力劳动，莫如选择体力劳动。进而要选择实践方式，即不是主观式的、宗派式的、教条主义式的实践方式，而应该选择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诚实谦虚的、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实践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指导。所以，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所主张的，正如指导战争的例子（《实践论》）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或者在完成工作任务（《实践论》）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是通过确立正确的工作方法找到能够利用的规律。虽然同样使用“规律”这个词，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规律和宇野先生理解的“规律”以及毛泽东所说的规律全然不同。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等不同。的确，马克思所说的“规律”，既不能应用，也不能利用，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发现它。与此相反，毛泽东思想中的规律，只要不断地进行正确的实践，无论是谁，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和不是优秀知识分子的普通群众也都可以发现它。在这里，意思内容完全变了。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采取这种提问题的方法呢？我想这主要与中国的现实有关。就是说，在 20 世纪的世界环境中，在中国这个经济落后国家中看问题，必然得出革命的阶级——近代无产阶级几乎不存在的结论。如果把实践看成是存在，看成是前提条件的话，那么中国革命只能无限期地延长，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也好，托洛茨基也好，都是一致的，认为中国革命还很遥远。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实践也可以变革，它不是前提条件，因而理论也能为实践服务。就是说，需要可以产生理论。如若不然，每天都有因饥饿死去的中国人民就永远得不到解放，只好等待资本主义世界先进国家革命的成功。换言之，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才真正成为非资本主义社会、非西欧社会的革命理论。所以如此，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说，就是把实践看成是可变的，把规律看成是可用的，进而把实践分为正确的实践

和不正确的实践。或者是肤浅的实践和深刻的实践。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带给哲学方面的根本变化，是列宁也未能提出的变化，应该认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了第三世界。所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屡次出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样的观点。他站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高度，在他的各种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出诸如“可以变不幸为有幸”这类通过区分实践、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变革现实世界的能动性哲学。

最后，是关于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的根本区别，这反映在对农民的看法上。请回顾一下前面记述的1920年列宁的文章，当时列宁置身于城市，置身于工人阶级当中。而且，用城市工人阶级的眼光观察农民。列宁在文章中写道，农村的“饱食者”不正是我们的剥削者吗？你们农民应该把粮食分给我们这些“挨饿者”。

与此相反，毛泽东思想作为完全以农民和农业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句口号的重点是以农业为主。提出工业学大庆，就是要在大庆建立工业基地的同时，对养育10万人口的周围农村加强建设，工人阶级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劳动。我曾五次访华，我感到无论何时中国都在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且还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下放”学生和城市居民。在毛泽东看来，在总体上，城市居民，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绝对不想增加剥削者，要不断地增加生产者，而且是农业的生产者。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促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工人阶级必须为农民服务。我认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毛泽东是站在第三世界——占人口绝对优势的是农民——的前头，为人类开辟走向幸福天堂的道路。

虽然还有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以上就是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造的功绩。如上所述，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了马克思未曾提出的问题，而毛泽东提出了列宁未曾提出的问题，并重新提出了列宁提错了的问题，同时继承了列宁已经解决的至今依然有效的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列宁开始解决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张惠才译白《我的毛泽东研究》野
草社1979年5月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

[澳大利亚] 王衰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的诗词以及他对于它们的传统形式的忠诚，最能反映出毛作为中国人的特征。尽管他的崇拜者们想给他的诗词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上面的两行诗以及大量的人们熟悉的类似风格和形式的诗，都唤起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去精通这门昔日的艺术。但是，这些诗也有另外的意义，它提醒人们，我们离那个时代仍然是多么的近——那时，每一个有些文化的人都尝试着用同样的诗行、形象和陈腐的题材，抒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深沉的感情，除此而外，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形式。毛的崇拜者提醒历史学家，毛的诗，是他对发生在中国的激剧变革的观察，也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生记录。但是，他本身已经对中国人进行了改造，以至于在他死后，人们很难说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中国人。

对于绝大多数毛的传记作者来说，追寻毛的中国根，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人们设想，在那里有一种中国文化的遗产，它与构成 20 世纪前的中国的各种因素，复杂而多方面地联结着，这是一种优于西方的巨大丰富的精神矿藏，它就蕴藏在地下，只需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像矿工似的去发掘它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人们做出的努力，我们跟踪着他由封建学生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家，直到共产主义者的新阶段这一前进足迹，便能够逐渐地认识他。

对毛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已经开始，并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不可能有人真正忽视毛泽东是中国人。要写毛泽东的话，中国人愿意看到写他的整个一生的作品。毛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点，真是那么重要吗？当然，今天中国有人指责他运用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摧毁了伟大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一些最优秀的文化成就，而这是一种叛逆行为，只有那些无知的外国人，才称他为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他们虽然也认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革命领袖，但他们更多地是被毛的中国特性所吸引，而这又未必是出于无知。对于后者来说，困难只在于：怎样给中国人下定义，以及判定毛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人。

尽管毛喜爱传统的诗词，但他对于文化传统中为统治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服务的那部分，却是抱否定态度。毛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这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确信自己必须站在大多数群众一边。对于毛来说，这个大多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直是中国人，这点是明白无误的：既是中国人，同时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二者之间也是不矛盾的。在毛的眼中，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要求革命，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他的思想和行动与这样的中国人保持一致，丝毫不意味着背离革命。

为了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明了，让我对本世纪中国的另外一些统治人物，作一些简要的评论。例如，拿孙中山来看，他的政治观念中的许多东西，

含有外来的因素太多，他的一生奋斗都在努力使它更加中国化，并能被人理解。他在事业的每一阶段里，都做了极大的努力，去熔炼自己的纲领中与中国的实际相脱离的部分，以便使他早期思想中的异国特性，得到淡化。蒋介石则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的，他也是唯一能真正理解国民党遗产中的传统因素的人。因此，他信奉了卫理公会教（Methodism），以试图改变他在他的西方朋友面前的蒙昧主义者形象。但这种做法，对中国人自身来说，仍然是迷惑下解和毫无意义的，甚至几乎是与之无关的。在知识分子中，胡适是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人，并且在那些想创造出一个现代中国的中国人中间，很有吸引力。但他的现代化主张，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当作一种学究式空谈看待，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而他也始终不过是少数文雅而又老于世故的文人中的一员。即使是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陈独秀，也不能克服他的矛盾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受过美国教育的胡适相似。他由改良主义走向科学与民主，然后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继而甚至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分子，这个过程，展示了他大胆的然而主要是出于理智的决心。尽管他崇尚现代性，但实际上，他仍然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文人学士。拿鲁迅来看，他是毛泽东唯一钦佩的文化人，他成功地把外国的强烈的怀疑主义，与中国人的情感紧密结合起来，但他这种独特的成就，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得到许多中国人的理解。在他死后，他需要某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来为他的“造反”精神撑腰，以便能使之深入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就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中国杰出人物，是不同的。很难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一个精确的类比来解释毛泽东现象。也许，我们能够指出下列几点：他比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更接近群众。比义和团的领袖们要开明，比康有为甚至严复要更加平民化，他不像袁世凯和李鸿章那样利用手中的大权搞腐化，也不像冯玉祥和南方的军阀那样残酷和虚伪。但是，他也和这些人有某种共同点（而这是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些伟大人物所少有的）：从不为中国的荣誉或者说是中国文明的衰落而杞人忧天，他极易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这几乎同邱吉尔因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的做法一模一样。中国所蒙受的苦难以及民族自卑感，曾经使他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丧失了信心，但毛却从来不以为然。正是由于他摆脱了这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过敏，使他真正相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人民中间，是很顺乎自然的事情。

这种信念和真诚，在他最早期的文章中，例如，在他于1917年23岁时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中没有反映出什么卓越的洞察力，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在绝大多数他同时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有的只是还相当缺乏理性思考的赤诚，以一种沉闷而又显得能言善辩的言辞，来诉说体育锻炼的乐趣。但作为一名中国人，他做的某些事情是具有独创性的：他提出文化人应当使自己具有像乡野里的文盲那样的强健体魄。在为六种锻炼方式作结论时，他还毫不掩饰地不无骄傲地谈到了自己的自学才能，这点，他在日后的岁月里还常常自我炫耀。正是凭这种才能，他教会了自己懂得什么是农民土地所有制，什么是军事战略，什么是世界事务或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他26岁时，在湖南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这使他有资格在

下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后的六年里，毛一直在勤奋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读着、写着和工作着。当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些年是他的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他在 1917 年或 1919 年写的文章，与他于 1926 年作的最早的阶级分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变化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看来竟似乎是一个如此缓慢的渐进过程，毛似乎曾静下心来考虑做一个革命者多难的问题。

当然，他的工作不是孤独的，他的周围有许多年轻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两党的上层人物中，属于极少数几个从未出过国的人之一。他不懂外语，只能阅读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而一些与此相关的宣传工作，他必须去做；还有一些农民团体，他必须去研究、组织和讲课。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他的小小的危险仅仅是在理论上，他的理论知识受到了限制。但他能毫不困难地一点一滴地吸取理论知识，并把它们恰当地传授给他正努力唤醒和训练着的中国人民。当他把自己吸取的理论传授给全体中国人时，也给自己留下了更深的理解。他在 1926 年初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信心十足地写道：

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但是，当他列表概括各个阶级时，又表明它们是对立的。阶级人数大资产阶级 1000000 中产阶级 4000000 小资产阶级

1. 富裕部分（右翼）15000000

2. 自足部分 25000000

3. 不足部分 60000000

半无产阶级

1. 半自耕农 50000000

2. 半贫农 60000000

3. 贫农 60000000

4. 手工业工人 24000000

5. 店员 5000000

5. 小贩 1000000

（小计）200000000

无产阶级

1. 工业无产阶级 2000000

2. 都市苦力 3000000

3. 农业无产阶级 20000000

4. 游民无产阶级 20000000 总计 400000000

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让他做的那种与西方的简单类比，来妨碍自己标定出一些非西方的社会范畴。虽然他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阶级分类是多么的离奇，并不再坚持这样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但这篇文章从总体上看来，表

《毛泽东选集》中所注时间为 1925 年 12 月 1 日。——编者

上面这区活及后面的附表，在 1951 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已经被删去。

明了他打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与他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当他发现约有 24500 万人将会直接投入革命，另有约 15000 万人将会拥护革命时，他肯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现在，他能够发出号召：“39500 万人民团结起来！”另外的 500 万人，可能被当成敌人，对他们不足为虑。显然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帮他找到了革命的动力，从这时起，他终于能够给这些理论赋予一种中国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再是异国之物。我想指出，这些思想，对他的心灵和性格的影响，比起湖南的爱国人士工夫之的文章、孙子的兵书和《水浒》的故事来，不会小，甚至还要大些。因为在毛看来，这些思想更进步和有用。

上面我们谈到，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特征，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中国人形象，这就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究竟应是怎样的人？为了便于比较，让我举个罕见的例子：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他赞同杰弗逊式的民主，并忠诚地为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服务，能够说他与毛泽东相比不像中国人吗？20 年代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本来就不存在一种评判中国人的绝对标准，尤其是在 20 年代，中国人也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更具相对性。这是中国人民进行广泛选择的 10 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连改头换面了的儒家学说，也不是没人考虑。当时，不存在任何正统，只存在着用某种新的胜利了的正统去取代旧正统而引起的五花八门的论战。每一个关心中国、愿意当中国人的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只有那些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或者背叛了他们的祖国到国外生活的人，才没有资格做中国人。而这种资格的丧失，主要是出于自愿，而且这样的人也确实只是极少数。这个 10 年也是无政府主义极度自由大力扩展的 10 年，谁也没有权利来决定谁是谁不是中国人。因此，做中国人，几乎比做任何事情都容易，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力求得他们的新位置而斗争着。

这种状况，正如整个中国历史所表明的，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它是“乱”，人们希望它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治”。不过，在“乱”的时期，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行的，唯一不行的也许就是维护这种“乱”——因为这显然是一种非中国化。正如在随后的下一个 10 年里表明的，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怀疑为对混乱时期的自由抱有偏爱，成为了各种外来思想信仰者中首先遭到攻击的对象。

因此，在 20 年代，毛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丝毫不损害他的中国人形象，这点并不奇怪。其他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也都或这样或那样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关于做中国人这一有趣的问题，只是到 30 年代才变得重要起来。1927 年，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了军阀战争的胜利以及对他们的左翼伙伴的胜利后，部分地区建立了正常的秩序。国民党的领导人要求获得确认谁是谁以及怎样才是中国人这样一种特权。马上，在南京政府的眼中，“党”与“国家”差不多没有了区别，而作为中国人，则应当乐意接受这种状况。因此，“党国”政府必然要对出版和新闻媒介严加控制，以禁止某些人去鼓吹“乱”而妨碍“治”，并极力论证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有价值。如此一来，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更像是一场复旧尊孔的运动，它正好发生在向中国南方和中部的共产党根据地围剿的时候。这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

杰弗逊（1743—1826 年）是美国第三任总统。

要求，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共产党是国外来的异物，它不爱国，并在毁灭伟大中华的传统价值。如果国民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话，无疑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正统，在过去的儒学国家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之间，这种正统将会同前者有更大的连续性。不过，在新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花言巧语和号召方面，它与后者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我认为，毛的中国性，在 1927—1936 年期间，发生了疑问：他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行话去反对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不服从于中国的正统。1927 年 4 月上海的大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毛主要处于一种逃命状态，南京政府把他和他的同志们描绘成“匪徒”。与此同时，幸存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比以前更加依附于由斯大林在苏联创造的新正统，甚至于中共的六大都不得不在莫斯科举行，因为在国内已没有安全的处所。在随后的 10 年里，是按南京的方式去做一个“中国人”，还是按莫斯科的方式去做一位“国际主义者”，这种压力对毛来说一直是巨大的。所幸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南京和莫斯科的正统性都遇到了广泛的挑战，而毛同这两个首都均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以及从中国的农村受到了启迪。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最惨淡和最无建树的时期。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关于农民问题的预见得到了证实。早在 1927 年初，他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时，就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其时党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他感到满意的是农民们向地主发起攻击，“土豪劣绅”在革命行动面前低下了头，这就证实了在中国的土壤里，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在报告里说，湖南省有 7000 个左右的农会，拥有会员 1307727 人，预计还有 1000 万的群众追随着。不管这些数字真实与否，他确信贫农和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中还有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属“赤贫”。这就促使他把革命的全部希望放在这些数字上。这依然是他对南京和莫斯科采取的最大的防护措施，这种数字上的安全，把中国历来重视大小规模的传统，同按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先进思想结合起来。在残存的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些年，一直到保卫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 年）的那些年，他都不断地以极大的热情在研究着农民社会，他个人编写了几个报告，对他和他的同志们设计的新的乡村组织的每一个特点，都作了认真的考察。

这样，通过把自己摆在农民一边，毛坚定不移地表明他仍旧是中国人。即使是最保守的儒学信徒们，也不能苛责他，因为农民，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者，在儒家学说中是评价很高的。国民党对中共投靠一个敌对的外国势力所作的攻击，也因毛泽东置身于农民之中的这种姿态，而变得软弱无力。而毛的真实意图，也只是根据绝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去使他们无产阶级化。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毛泽东同那些亲斯大林的人在一块儿，并不轻松自在，特别是当这些人搬到瑞金以后，他在思想理论上受控于他们，他的一些政策受到了他们的审查。值得庆幸的是，一些事件的压力，帮助他摆脱了那种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少壮派以及共产国际顾问的刁难的窘境。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因南京政府的反共，而对其表示宽容。它继续践踏中国的主权，在满洲制造了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些给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

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主要见毛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文。

使他们能够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样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俄国人为日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感到十分忧虑，这最终促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便团结所有的中国人去反对日本。这就使得中共能让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党、毛泽东作为一个爱国者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中国人，当时除此而外，还可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呢？

另一件事情帮助了毛：在放弃江西苏区后的长征途中，毛在 1935 年 1 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对那些未能保住苏维埃共和国的人反守为攻，从而使自己成为了领着残存的部队到达延安的带头人。在这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他的统一战线的号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他和中共到达了接近日本人的北部前线，表示了与日本人作战的决心，从而扫除了绝大多数人对中共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爱国立场的怀疑。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获得了毛泽东所享有的中国形象。

对于毛泽东来说，那些遭受挫折的岁月，显然已经过去。人们只要把他在 1929—1934 年间在江西苏区写的关于农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法律草案、章程和决议，与他在 1936—1937 年写的充满生气的分析文章，对战略的谋划和对敌人的责骂作一比较，便会看到一个新人。这种差别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1935 年后，毛泽东开始成为党的真正领袖。他现在能够以日益增长的权威性来谈论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设计新的政策和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领域里，来试试身手，尽管是小心谨慎的。

但是，这种新权威的产生，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英雄史观，部分则是中国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位历史人物来看待。这些，他的传统诗词比他的文章揭示得更明白，而他后来写的诗词又比这个时期的诗词尤甚。但是，早在 1929 年在福建省西部，他写“军阀重开战”时就记述过自己的成功：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他以完美无缺的金碗，来形象地比喻完整的国家，而以掉在地上打碎的块片表示被分割的领土，由此动员中国农民起来反抗这种现实。在他的诗词中，好些地方都描写到红旗迎风招展，映红了战场，使人回想起以往历史上农民佩戴领巾，举行大起义的情形。由于他的数百万群众是“天兵”，所以当他的 20 万部队进入江西寻求根据地时，是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的，是与上天的意愿一致的：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种感情，与他的同事中那些同斯大林唱同一个调子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国际主义者”，肯定是合不来的。但这一切，在延安都得到了改变。在 1936 年，中国的斗争变成了国际斗争的一个独立部分，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承认她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并希望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再像早先那样过多地加以干涉。为了这个新的任务，毛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在他从国际主义的限制中摆脱出来，完全是立足于自己的祖国来进行战斗。

参见毛泽东的《元旦》（1929 年）、《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 年 2 月）、《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年春）等诗词。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而他的中国性，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也再没有疑问。因此，1937年，毛泽东开始热忱地贸然搞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这点显得特别有趣。他在给党的干部讲课时，草成了两篇著名的论文，即《实践论》与《矛盾论》。次年，他又发出了他的讲课提纲《辩证法唯物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已经有人作了考察，我不想涉及在他的哲学和被修订了的马克思主义后面，深藏着怎样的中国根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在43岁这样一个年纪，绽开了理论的花蕾？除了个别而外，大量的解释都可能与本文论题有关：毛是中国人。当他1938年说“我的讲课草稿也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只是开始研究辩证法”时，他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要比那些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同事们好些，因为他们往往把问题搞得深奥难懂。他必须证实，任何人都能学习理论，去过莫斯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结合革命的实践来学习，而事实上，这在中国国内便能做到。他打下了一个基础，来向那些习惯于搬苏联的理论家和教科书，甚至搬斯大林来吓唬自己的同志的人挑战。作为一个因爱国并关心农村的社会公正问题而受人敬仰的重要民族人物，毛泽东这时候感到，强调不光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置于中国的环境中这样的说法，是不很恰当的。这样一来，1937年便是他寻求一场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行动上和思想上的领导权的极好时机。

毛泽东通过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涉及到国家的领导问题时，再次提出了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已经谈到过，在“治”的时候，中国是喜欢搞正统观念的，而那些统治者，则是太乐于尽可能快地去尝试并规定这种正统性。自1928年以来，南京政府就试图确立这样一种正统性。如果它完全建立起来并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受外国支持的共产党将会成为异端，甚至连毛泽东也将不会被看成是“中国人”。不过，1937年的统一战线，推延了关于正统性的争论，给了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成为完全的“中国人”的机会。再一次地对许多类型的中国人来说，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那些打着儒家信徒招牌的民族主义者，其地位不必一定优于西化了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工农民主党、甚至托洛茨基主义者——只要他们同意团结起来反对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很快就归结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两党都在作军事准备，以便在日本被西方的盟军击败后，来一个最后的摊牌。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也许是少数几个要么完全把握了这场比赛的实质，要么对它一无所知的人之一。在这场强有力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中国特质肯定不逊于蒋介石。他们两人都在受中国传统的支配，即胜者将有权确立一种新的正统和一种新的中国特性的标尺。毛泽东显然是懂得其中利害的，这从他当时写下的著名诗行中可以看到：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些恰当地引导我看到了这样的时刻：1949年，这位风流人物赢得了一场对蒋介石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正统。这种新正统，似乎是某种大多数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东西，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开始，仿佛都是持久不变的，是由中国人所规定并被看成是儒学国家的复归。这一抉择，在30年代和40年代曾被系统地分析过。现在，已经完全掌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宣告说，台湾的国民党是离经叛道的异端的代表，必须将它予以消灭。通过引诱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的传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把他们与新秩序松散地联系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自己的代表性得以加强。人们可能会问：在这种正统性中，究竟有何种新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体现？中国特性在哪里？而毛泽东又有什么贡献？

不过，首先我想申明，中国的观念和传统对毛泽东的行为和决策上的影响，以及对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要指出它们是在什么场合什么事件上产生了影响，这将是毫无意义的。也有些东西完全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义务和责任的继续，它们或者是有文字记载的，或者是无文字记载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是下意识的。总之，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要想把它们细细分辨出来，是太难了。关于毛泽东，重要的一点是在1949年以后，他力图革除掉自己身上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内战中，曾有助于他当“统一战线”的领袖。他现在看到自己有责任去促使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去适应世界环境。现在谈论的兄弟关系，不仅是指同苏联的关系，也包括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里的工农和爱国者的关系，这时他开始由民族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

因此，在1949年，看来他在做非中国的事情。他宣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并与之建立一种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可能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毛泽东比这走得更远，他强调了国际间的联合，即把中国革命与苏联连结起来。毛知道他这样做并不会引起人们对他的爱国主义的严重怀疑，他对自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形多，怀有足够的自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解释说毛的这种决定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但过了若干年，他们也许有些吃惊地看到，毛和他的同志们是打算严肃认真地向苏联学习。确实，毛是严肃的，并有很好的理由。苏联是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榜样，而斯大林又是唯一活着的毛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中国需要援助，来挽救崩溃了的经济，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起的入侵；而中国的工业化，也不能指望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新技术。他使中国人确信，这样做不会伤害国家的主权，中国本身的版图以及她取得的壮丽辉煌的胜利，使得她不会被当作东欧的卫星国或者如蒙古那样对待。最根本的，他是想利用苏联来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然而，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有一个好的理由，那就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推进世界革命。

斯大林的死，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人的极大考验。在斯大林的死以及赫鲁晓夫1956年作的使斯大林非神化的秘密报告这二者之间，毛泽东看到

了自己将继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而他的中国同志们也看到，在苏联肯定没人能比得上毛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世界声望。但是，赫鲁晓夫在准备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时事先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他自己的许多同志似乎也打算不加批判地追随赫鲁晓夫，这使毛不得不考虑很多。在公开场合，他继续说中国必须向苏联学习，但私下里，他开始警告说不能照搬苏联。他还对中国追随苏联走得太远而忽视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始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有些好的方法和经验，特别是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但是，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赫鲁晓夫不信守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团结和平等这一条，苏联总是要坚持其领导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是否因赫鲁晓夫的失败，特别是因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而感到幻灭呢？或者说，作为中国人，毛是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上只能有一个太阳，而他便是这个太阳呢？这是仍有待于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毛泽东开始向苏联模式挑战，这促使他回到自己的中国源流上来。由于两国之间长长的国界线尚悬而未决，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给中苏两国的关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必然会同苏联产生分歧，这点是很清楚的。不过，两国关系的最后破裂以及冲突的广泛展开，是否得归咎于他的中国人品性，这点还不大清楚。我认为，这种认识将严重低估了毛的马列主义，会导致一个相当简单化的看法：是外部关系使得毛成为中国人，相反地，恰恰又是内部问题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人民共和国内部，毛泽东一开始就承认，他的中国人品格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加以证明。真正艰巨的任务，是让人民对新中国赖以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一个充分的理解。人们要想了解毛泽东对自己承担的新的国际主义责任有着怎样的自我意识，最好是去看看他战时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在 1950——1952 年出版的他的选集的头三卷里，其中最好的例子是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里所作的论述。在新版本中，毛非常认真地删去了 1939 年的原文中所有带点中华帝国主义味道的说法，省略掉了提到的附属国以及这些国家的名单。另一个例子是他采用了“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样的描述，来补充到“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之中。

不过，仅仅改变说法或者在那些旧文章中加入一些革命的口号，是不够的。毛泽东必须赢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心，特别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心——他们把毛看作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遗产。毛发现要影响这后一部分人是困难的。一个反映了他的困境的极好例子是，他想小心翼翼地在 1939 年的这篇文章中，插入一个过渡句，以有助于他的读者看到在世界历史中，中国历史占了怎样的分量。下面是他补充的句子：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概念和历史概念运用到中国来，而安排的一个内在根据，它为毛泽东在 1939 年重申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当时毛说：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

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因此，设想中国自身也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奇怪的。

令人奇怪的是，新插入的这些反映毛晚期对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认识的句子，竟带有对资本主义欢迎的激情。在这之后的六年里，数千名作家和学者搜集了文学的和历史的资料，想证明毛泽东这番话到底意味何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争论明代早期或者晚期、或者是在清朝，甚至更早一些，在宋代或唐代，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上。这些争论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不用理会。问题是，毛泽东是确实想引起这样一场牵扯到至少 1000 年历史的困难而又相当不定形的争辩呢，还是他自己有了误解？毛泽东是欢迎遵循马列主义路线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的，但他小心翼翼，含糊其辞，不说资本主义的“胚芽”能够在以前的中国扎下根来。在毛泽东实际说的话中，肯定不存在什么沙文主义的傲慢感——如果我们把他对这篇写于 1949 年前的文章所做的修改、省略和补充都读一读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句子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并且与其他一些原文的改变也是协调一致的，都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适应马列主义的框架。唯一的一个有意促使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地位低下的耻辱不以为然的价值判断，就是认为中国人也如欧洲一样的优秀和进步。这引起了很大的沙文主义骄傲情绪，也导致了一些毛泽东确实不反对但也未必接受的解释。

同样地，这些也揭示了毛泽东自身处在苏式党和千百万中国人民之间态度的矛盾。这个党是他领导的，而这些人民则把他视为国家的领袖。他自己，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并不认为做一名优秀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什么难事。在他的漫长革命生涯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他已经成熟起来。我认为，他觉得像以前那样去谈论和写作是不费力的，他不再有意识地去做一个中国人或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情况当然不同。在 50 年代，他们仍然主要是靠课本、讲座、学习会，以及通过被告知的那种努力实践，来学习马列主义的。对毛来说，在绝大多数不再年轻的人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的支持者，这些人受到过一定的外来影响。而前者更容易对毛作出响应。

因此，毛泽东必定是极有兴趣做绝大多数中国人期待他做的事：当中国的统治者。当然，他也不是一位完全自主的代理人，他领导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他惹不起斯大林。但是，他对早先的著作、讲话、文章的修改，以及他的所有行为都表明，在他身上不曾有过非马列主义化的念头。相反，在对待传统遗产方面，对传统观念的攻击，也能证明他的立场。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里，特别是在党内的讨论中，他的一些言论，都明显地带有打击资产阶级听众而取悦于工农的倾向。他喜欢对一些通常的说法加以重新阐释，赋予它们一些新的歧义，甚至使得它们与原意完全相反。他特别乐于引用儒家的一些习惯用语，来揭示儒学的追随者们的虚伪。例如，他很注重攻击保守主义和迷信，严厉地批评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也嘲笑了那些因孟子曾谈到过古代中国人吃狗肉的问题而现在不愿吃狗肉的人。在另外的场合，他赞成使中国语言拉丁文化，并嘲弄了那种认为中国文

同上，第 622 页。

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9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40 页。

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的观念。但是，他对儒学信徒的批评并未使用最尖刻的语言，最终，他愈是发现旧知识分子反对他的激进改革的号召，他对儒学的批评也就变得愈坦率。

儒学似乎给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看起来，攻击儒学，也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中国的历史及其价值。西方化了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类型的激进派和革命者，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攻击儒教是中国一切过时的、落后的事物的象征。但是，最初，毛泽东对此可能是相当慎重的，特别是在统一战线时期。他确曾赞同地毫不犹豫地引用过儒家的说法，如著名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还极力提倡按功绩来选拔干部，这与儒学说的好的明智的统治者要根据功绩来选大臣和官员的标准，是相呼应的。充其量，毛泽东也只是对孔子给予了温和的批评，例如，当他评论孔子的学生不会动手干活时，却说孔子至少是没有把自己摆在农民和菜农之上：

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

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

在 50 年代，毛泽东开始贬低孔子的名望，但真正猛烈的攻击是在 50 年代末期的“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之后。例如，在嘲笑“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时，他援引了孔子诛少正卯的事例，来说明孔子自己也是在搞宗派政治。但是，到这时，他对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渗透到中国语言文化的各方面已经非常不满，以致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批评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最终，在 60 年代，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与西方和苏联日益对立起来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开始转向中国自己的伦理和精神源流，毛泽东对此变得很不耐烦和苦闷，以致说道：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谁？爱所有的人吗？没有这种事。爱剥削者，也不是所有的剥削者，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在 1973—1975 年的批孔运动期间，毛的一些最热烈的追随者们，会热衷于出版一些歪曲和荒谬化了的孔子及儒家的言论。年轻的激进者们，模仿着毛的做法，疯狂地去混淆历史，但他们的模仿使人想起了中国的古话：“画虎不成反类犬”。

尽管毛泽东对圣人经常性地发起攻击，但他对于这昔日凌驾于中国人的想象力之上的神，内心是感到忧虑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并可能成为一个阻止中国发生迅速而深刻的革命变革的巨大障碍。显然，在 50 年代，他通过人们对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幼苗”的评论作出的强有力的却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产生了警觉。虽然，人们对他的关于批判地研究和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解释传统遗产的号召，也作出了很好的响应，但他担心，这种出于政治目的来进行历史分析的中国传统技巧，有可能被人用来反对他自身及他的统治。他自己精于从政治上利用历史，特别善于举出过去一些激剧

同上，第 3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9—53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8 页。

这是毛泽东 1958 年 1 月 28 日、30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

1943 年 6 月 6 日关于批评彭德怀《关于国民教育谈话》的一封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未名集》第 214 页。

变革的例子，来说明当前的政策。当然这种技巧，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毛泽东特别钦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他们运用历史来作学者式的研究，同时又运用它来写论战性的文章。他认为，这样运用历史，有利于造成一种新的革命秩序。如果中国人能够严格运用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和分析历史，而不是像他们老做的那样运用历史去阐释心灵和个人品格，甚至去影射君主和大臣们，那么历史会得到丰富，并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变革。

但是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固执地总是按照传统流行的方式去利用历史分析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晗对海瑞的研究，这是通过对 16 世纪的事件的分析，来攻击 50 年代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理。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涉及到王朝更替的动因，即如何评价皇帝和农民起义的作用。中国人对国王、天子、大臣的着迷症，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药方难以医治的，而他们自身对中国历史也不感兴趣。所有把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安到中国社会中来的企图，只是导致了更多的争论和分歧——这些疑难也易于导致荒谬的结论，这又肯定会破坏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身的信念。

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能够理解中国的这种劣根性，而这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根除掉的。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运用历史分析法并不必定意味着他们真正把握了历史，但这也确实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参照物，中国过去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责任就是以此为准则的。这进而表明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情性，它是不可能迅速除掉的。在这方面，毛身上的马列主义者成分，开始对他身上的中国人成分不耐烦了——结果发展成了毛泽东的冒进立场，而这与中国人的作风是不一致的。

实际上，正是以此为发端，导致了大跃进，他抛弃了他的民族所特有的谨慎，坚持要走得比他的绝大多数同事所打算的更快一些，这个速度也超出了所有工作人员和机构能够达到的程度。他以“小脚女人”的比喻，来嘲笑他的一些同志。但这个运动因准备不足而遭到了极大的失败。它的一些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加上这三年农业歉收，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延缓了中国的发展。这是毛在他的漫长生涯中遭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个人失败，给他自身以及中国都造成了创伤。在毛泽东的眼中，他自己与中国已经成为一体，因此他确信，他所要干的，也就是大多数人要干的，也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党和政府的官僚不可能拖住他们的后腿。那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检验了毛泽东的力量和自信心。在若干年前，他感到自己能完全地掌管住国家，而这时，他要扮演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求得人民的理解，他要对懒散腐化的官员采取严厉的手段而热忱服务于人民。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将他奉为祖宗的人们抛到了一边。通过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攻击他自己所领导的党，毛泽东把自己推上了中国命运的唯一主宰者的地位，这有点像传统王朝中开国皇帝的地位。毛泽东在他的对历史很敏感的人民中留下的形象，足可以反映出他的中国特性。一些来自于中国人的见解认为，他像宋太祖和秦始皇。

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可以说毛泽东更像秦始皇。秦始皇也没有简单地保留一种旧秩序，而是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新统治。当然，这种类比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蒋介石在台湾和香港的宣传家们，也正是把毛称作秦始皇，并希望他的“王朝”短命。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就对此嗤之以鼻。

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

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然而，对于他自己，他补充道：“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他身边的林彪，作了一个陈腐的中国式回答：“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在当时也并不是开玩笑，因为他的所有观众都能看出，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比作暴君，是多么的荒谬。到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比喻就更不是玩笑了。毛成了唯一的权威，他手下很少有被信得过的人，也很少有人向他反映真实的民情。尽管他在全中国周游，以便和人民接触，但他几乎不能相信人民向他讲述的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他同党内自由化和民主化倾向所作的斗争，使他获得了对于党的胜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令人生畏的成功，把他抬到了凌驾于普通凡人之上的地位，使他变成了一位令人感到疏远、冷漠的严父，这正如传统观念中的一位伟大皇帝。当然，毛泽东确实不想当秦始皇，后者仅仅只是一位贵族政治家，他利用一批法家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家，才能够揭示出，这个第一帝国，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的产物。虽然对于那些读过历史资料的学者们来说，这听起来肯定是荒谬的；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也许会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只知道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关键点，而其他方面的历史知识则几乎等于零。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我们知道，正如上面提到过的，包括毛和林彪在内，对秦始皇都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要把他同秦始皇作比较的后，那就只有把秦始皇的革命历史地位作一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才能够接受。毛泽东认为只要掌握了新的世界观，并且能够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他的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有重蹈第一帝国复辙的危险。

毛作为中国人也足以明白，他的新正统可以与孔教国家作个比较，后者在 1911 年结束了，尽管人们做各种努力试图去挽留，但都未成功。虽然孔子的名望比秦始皇更大些，他的思想延续的时间也要长过秦王朝上千倍，毛泽东也许内心里确实未想过去同孔子比。他肯定认识到了，除非自己能完全改变中国人对孔子的看法，否则，这种比较就只能是自找烦恼。因此，那场批孔运动。就不仅仅是要通过把孔子说成是企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来清除中国人心目中把他当作圣贤的先人之见，而且最终也是为了一旦把毛泽东与孔子比较的话，能使毛泽东处于有利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将看到，毛主义不仅仅是在当代比孔学在它的鼎盛时期更具进步性，而且毛主义还有着改变世界的深远意义，而这是孔学所从不曾有过的。

我以为，那种认为毛泽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中国化，并日益强有力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确信，当他仍旧是中国人的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他逝世。他的雄心勃勃的革命念头之所以受到压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自身：9 亿人口，深重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因循守旧的懒散习气。当人们考虑到他 1949 年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时，那么，他设法要使中国人走得像他一样地快和远，这事实上也是他个人成功的标志。简言之，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位较保守些的中国人或者采取一种更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他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和马列主义，二者在他的心灵和性格中，

以不可分解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纵然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感情充沛、富有思想的人，他也许能够清醒地注意到何时自己更倾向于做一位中国人，何时更倾向于做一位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也缺乏作出这种判断的证据。

自然，人们能进一步推测，是否另外一些领袖人物（他们身上的中国特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达到了毛的同样程度）也能对中国产生同样的影响，并将使与众不同的中国跻入世界之林呢？这个问题确实迫使我们去考虑：这种铸造了毛泽东的个性和政治风格的独特合成（指中国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结合——译者），究竟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我看来，毛泽东对中国的语言的掌握和生动的运用，似乎有助于把读者们对激进变革的需求和紧迫感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解说，便变得通俗易懂。这可能不利于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但这也许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外国味的深奥难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更富有成效。我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的中国式表达以及对中国的分析法的运用，比任何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或列宁的教科书，更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进步思想。

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是无所不能的，这是他的最高信念。他又知道，有些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愿做或不能做的。正是在这里，结果使得他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因为他要求他的人民做得大多太快。他简直不想稍微停顿一下以便巩固已有的成绩，在工作中对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也不够尊重。虽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书，那里发生了反革命复辟，并且他认为苏联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但这主要是出于对中国自身的担忧，他害怕中国富裕强盛起来后，也会出现复辟，因此他决心让中国总是处于不停顿的运动之中。如果说中国不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或者说如果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那么他的做法可能会不同。但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历史，都是以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为主体的，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同志们很容易对他们通过艰苦奋斗赢得的荣誉感沾沾自喜，并会打算恢复中国一直通行的能人统治。我相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腐烂了的儒家官僚，被易于腐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僚们所取代，因此，他宁愿看到中国的发展放慢。大多数中国人，有着与毛同样的担忧，他们打算帮助毛去造就完全无私的人。但是，连续不断的动乱付出的代价、经济崩溃的危险以及维持生活水准的困难，这些使人们发生疑问：是否能这样干下去？如果不能这样做而毛泽东又仍然活着的话，人们能指望会出现他死后的这种情况吗？

尽管毛泽东犯了错误，遭到失败，但是他确实做成了他作为中国人要做的一个重要事情：他的中国显然已对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中国，他也不是要求世界去简单地尊敬和崇拜那个死去了的文明的荣耀和成就。他的意思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而这个新的中国的主要之处就在于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通过他的眼睛去认识世界。他所看到的，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当今的现实，但中国将永不再把世界看成当然之物，同时也不会再接受世界曾对中国作出的估价。毛泽东所犯的大错误，就在于对这一切的时间选择上。在他 1963 年以典型的中国诗词的形式写的诗行中，至少能够反映出这种情绪，而且这也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王新松译自威尔逊编《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英国中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毛泽东：一个近代思想史的评价

[美] 纪文勋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人，是影响最大的人。他的影响不是单方面而是包罗广泛的，涉及政治、经济、个人生活和思想诸领域。他“敢叫日月换新天”，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那么毛泽东思想的本原是什么呢？一般来讲，中国现代思想家大多继承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中国和国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全然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以后我们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他的中国传统思想有着两个方面的来源：古籍和近代中国人。据说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对各个朝代的兴衰过程和原因尤有研究，他被认为发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农民革命。这种发现使他自觉地利用农民起义（用军事术语来说，叫游击战争）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从康有为和梁启超那里学习了许多现代思想。在求学时代他深受康梁影响，对他们十分敬仰，反复阅读过他们的政论文章，而且几乎篇篇都能背诵。

中国传统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宣传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给当时与后世的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醉心于其理想。许多学者指出，他的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很可能来

源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据可靠消息说，1949年当毛泽东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胜利地进入北京以后，曾私下接见了康有为的二女儿。他说他从她父亲

写的《大同书》中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常开玩笑说，他就要去见马克思了。因此，似乎他承认马克思和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我想康梁对毛泽东的影响决不止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很可能还从梁启超那儿学习了一定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梁启超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到中国，他行文流畅，饱含感情，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读他的文章。但是毛泽东真正接收了的西方自由思想可能少得可怜。我并不是说毛泽东天生就讨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问题在于，严复的翻译使人很难读懂，在《群己权界论》的译序中。严夏说有不少人抱怨他的翻译晦涩难懂，这大概是因为他用的是古文的缘故吧。试想，当时读严复译书的人大多是饱学之士，通晓古文体，他们尚且很难读懂，更别说年纪轻轻的毛泽东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所有诗词都是用古体写成的。他用古文写当代的事物，非常优美，使许多专业作家包括政治上反对他的作家都钦佩不已，赞不绝口。五四时代，一些人指责文言文是僵死的语言，不宜表达现代思想，而毛泽东的诗词驳斥了这种说法。他用古诗词来赞扬共产主义革命，而这是最现代的事物。还有，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强调文学应该用大众化的语言，但是他写诗词从来是用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学实践同他的文艺理论也是矛盾的。毛

这件事是张君勱从中国驻印度的一位高级官员那打听到，后又转告给我的，但是据另一位曾到印度访问的大陆官员说，毛泽东确实会见了康有为的二女儿，只是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在他的住所。

泽东对古文体非常熟练，可以说是随心所欲，毫不费力，这更使我们感到他的思想定然充满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一定有传统文化的成分。

然而，尽管毛泽东诗人的天才在西方得到了承认和赞扬，但是他不过是位业余诗人而已，正如他是位业余哲学家一样。与革命事业相比，诗人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头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儒家经典对毛泽东影响并不大，相反，倒是一些小说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使他获益匪浅。他在写书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其中的典故，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其中《水浒传》对他形成农民革命思想很有影响。这部小说虽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却遭到历来的文人学士的咒骂贬损。毛泽东本人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但他之所以喜欢，首先是因为这部小说对他领导农民革命有很大帮助的缘故。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学者说他是一个天才，有的则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而已。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正确评价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我们所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纯粹抽象的、学术型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他根本上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的工具而已。因此，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种工具、是种武器，而不是教条。

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马、恩、列、斯反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些把马列主义奉若神明、当作教条的人是愚蠢无知的。

同时，毛泽东阐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否则“矢”只不过是件供人玩赏的古董，完全没用处。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从以上引文来看，毛泽东不同意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人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而应当看他能在中国革命中实际运用多少。一个人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锐利武器，那么即使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无用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显然，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因为对其教条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与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打倒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两回事。毛泽东力图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了什么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79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此段引文与《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文字略有不同。——编者）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思想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的观念。毛泽东感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同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为了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毛泽东发动了数百万无地的农民同地主作斗争，然后由这些农民组成了数量庞大的军队，最终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毛泽东确信阶级斗争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他发动了农民革命、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最后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作为个人的毛泽东

要想研究毛泽东的成败，首先必须了解其性格。对此国内外曾发表过不计其数的论文。而毛泽东只对其中张奚若和陈铭枢的简短评价作过回答。张奚若曾是清华大学政治学院的教授，40年代民盟的领导人之一，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长。张奚若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威望极高、富有感召力。陈铭枢是位国民党将军，参加过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逃亡香港。共产党政权成立后，他参加了新政协。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反对蒋介石。他们都曾给毛泽东下过简短的评语：

张奚若陈铭枢

- 1.好大喜功；2.急功近利；1.好大喜功；2.偏听偏信；
- 3.轻视过去；4.迷信将来。3.喜怒无常；4.轻视古董。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张奚若所说的第一点与陈铭枢说的第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张的第三、第四和陈的第四点也是基本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的第二点和陈的第二第三点在对方的概括中却没有。总的说来，他们所使用的便是中国人惯常使用的评价治国者（包括皇帝在内）的标准。这样，我们可以把对毛泽东的批评归纳为四点：（1）急功近利；（2）严重的喜新厌旧；（3）反复无常；（4）偏听偏信。毛泽东曾在三个场合回答过这种批评，前两次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一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与其它正式的讲话不同，他的这几次讲话都相当老练而幽默。

针对张奚若的批评，毛泽东说：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然后又根据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例如第一条“好大喜功”，传统中它的字意是指一个人过于雄心勃勃，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大手大脚地做事，是个贬义词。例如秦始皇、汉武帝，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等，都算是“好大喜功”的人。毛泽东认为“好大喜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是什么人“好大喜功”，是革命派呢，还是反动派呢？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可以分为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好的是六万万人之大，喜的是社会主义之功。

张奚若的第二个批评“急功近利”是指一个人不愿付出相当的劳动却急于得到迅速有用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却指出，“急功近利”要看是不是为着主观主义的突出，是不是为着提高合乎实际的能够达到的生产指标。至于“轻视过去”，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重视过去，但也决不能每天都躺在过去的岁月中，而忘记了今天。关于“迷信将来”，毛泽东只是说人人都是如此，人人都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过去中国北方粮食亩产只不过100多斤，南方也只有两三百斤，蒋介石统治了中国20年，钢产量仅仅四万吨，中国人要是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又能希望些什么呢？毛泽东最后说这几句话“提得很好”。

针对陈铭枢的批评，毛泽东回答说，一个人不可能不偏向一边。问题在

于偏向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那一边，是偏听右派的话还是偏听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偏得不够，要继续再偏一点儿。但是，我们的同志决不能偏听陈铭枢和梁漱溟的话。关于“喜怒无常”，毛泽东认为他是“有常”的，例如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们只应喜欢好人，当他成为右派时，我们就不喜欢他了，就要怒了。在谈到“轻视古董”时，毛泽东巧妙地反驳道：难道小脚、太监、臭虫等古董不该轻视吗？其实，陈铭枢的原意是批评毛泽东轻视古代艺术品和文化。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凡“古董”多少总是有些落后的。总之，新事物总是要超过旧事物，所谓“今不如昔”是完全错误的。“古董”不能不爱，但不能爱得太过分了。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是或应该是张奚若批评的那个样子。每个阶级都“好大喜功”，如果我们不“好大喜功”，难道要“好小喜过”？历史上禹、孔子、墨子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禹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为了到各国宣传他的信念，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大搞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干什么？

毛泽东对这些评价的答复方法，使我们很难搞清楚哪一点是他肯定了的，从而无从深入研究下去。但是既然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切当作无稽之谈而断然否定，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这种评价的。而且张奚若、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许多海外知识分子对他个性的评价、印象是一致的。因此，这种评价决不是信口雌黄。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中国学者们通常用学问和政治智慧两个标准来衡量政治家的杰出与否。最早，《汉书》在评价霍光时就使用了这种标准，作为一个大将军和政治家，他缺乏学问和政治智慧。从理论上讲，政治家可以分为四类：（1）既有学问又有政治才干，这是最理想的；（2）两者都缺乏，这是最糟糕的；（3）有学识但无政治才干；（4）有政治才干但无学识。前两类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典型，很多学者型的政治家属于第三类。例如，梁启超是位学问大家和有影响的作家，却没有治国的才干，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梁武帝和李后主学问有余而政治才干不足，结果丢了皇位。第四类人包括一些敢于行动的成功者。例如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位以政治才干著称的一代明君，但是却大字不识一个。一些声名狼藉的中国军阀可以列为两种素质都不具备的第二类政治家。至于说第一类，这种政治家太少以至人们怀疑是否能够找出一个来，倒是柏拉图设想的哲学王符合这个条件，可惜在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够集二者于一身。托洛茨基比斯大林的学问渊博得多，他咒骂斯大林是“灰色的、毫无光彩的庸人”，但正是这个庸人创造了历史，而托洛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天才不仅在政治上被这位“庸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还被这位“庸人”给暗杀掉了。我想毛泽东可能会把列宁当作第一类政治家，而且自信他自己也至少接近于第一类政治家。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与“Statccraf”（政治才干）相对应的中文“术”这个词。“术”有极广泛的含义，很像英文中的“art”一词。它可以有表示高尚爱好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finearts”（美术）；也可以指高超的

技艺，相当于英文中的“artisan”（技术娴熟的工匠）；还有诡计多端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artful”（狡猾的）。总之，它的意思随上下文而定。这里，在政治意义上的“术”，是指必备的管理才干，如何团结朋友夺取和保持权力的才干。它有阴谋、残忍、毒辣等无情的政治手腕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是一种“术”。

毛泽东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自从他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领导权以后，就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去世。毛泽东深知应该如何利用人们为他的目标奋斗，如何赢得他们的忠诚。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坚决的支持者，甚至林彪也曾帮助他高居权位，毛泽东也是一位善于鼓动人民推翻政府的天才。他白手起家，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他学习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策略并加以修改，灵活运用，特别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显示了极高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以农民为军队的主干，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同《沁园春·雪》中，批评秦、汉、唐、宋各朝的开国皇帝缺少文采；成吉思汗也是个野蛮的人，他除了张弓射雕以外，什么也不懂。词的最后一句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中文表意不太明确，这句话的意思也就非常模糊。但是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只有在当前这个时代才会有伟人出现，毛泽东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唯一的一个伟人。读这首词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理解为毛泽东是当今时代唯一的伟人。毛泽东理想中的伟人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有学识（马列主义知识和文学天才），又有卓越的政治智慧的伟人。

我常常这么想，由于他具有开国皇帝的多方面的才干，即使他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能够成功地创建任何一种观念中的政权。但是，由于他以一个马列主义专家的面目出现，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者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更增加了他成功的可能性。用现代语言来说，毛泽东的愿望是想按马克思的设想来改造世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敢叫日月换新天”。他的成就可以从破坏和建设两方面来看。从破坏的一面来看，政治上他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经济上他消灭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私有制，消灭了贫富悬殊的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设想，经过破坏之后而从军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只不过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从建设方面说，我们将述及许多领域。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政府取得了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迅速的提高，同时妇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士兵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改变了过去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物质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在30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应当称之为伟大而具有重大意义，是否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水平，还需要重新估价。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很低，甚至比不上其它发展中国家。

尖锐而集中的问题是：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过一个十全的模式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谈到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很少谈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的实践措施。任何关于新社会的蓝图都只不过是令人泄气的乌托邦而已，连列宁也没这么做过。在完成了对全国的军事占领以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幻想多于具体的计划。毛泽东所能学习的唯一的榜样是苏联。除此之外，他只好自己摸索解决中国问题

的特殊方法。1958年中苏分裂以后，毛泽东被迫依靠自己的智慧，更加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

1963年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话直到今天也自然适用：“不管毛泽东将来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毋庸置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毛泽东关于在不发达国家里如何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榜样将继续产生着影响。然而他能否为中国、亚洲的其它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指出一条道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是一片空白。人们将拭目以待。”毛泽东死后他的神话被打碎了，人们开始问：他的功劳是什么？他的过失又是什么？不同的人（包括共产党内部）评价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应该七三开；有的人则相反，认为过大于功，应该三七开；也有的人认为六四开或四六开或五五开。邓小平对此避而不谈，老练地说：让历史来决定吧，历史会作出明确而公正的结论的，后世的人总要比我们聪明一些。

为什么毛泽东是胜利者

在本书论述的九位人物中，只有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两位革命家不同程度地在其政治和革命生涯里获得了成功，而其余崇尚理论的人则仅仅是思想家而已。为方便起见，这里我们把六位学者——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梁漱溟、张君勱和张东荪——称为学者群（the scholar group）。至于陈独秀，虽然我更愿将其视为学者而不是活动家，但他实际上既不是孙、毛式的革命家，也不属于学者群。现在我们来考察为什么单是毛泽东获得最终胜利的问题。

为王者师

革命家的成功与学者群的失败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原因——策略上的差别，前者进行社会变革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策略，而后者则是自上而下。显然就两位革命家自身比较来说，毛泽东动员群众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学者群则试图通过影响统治者来贯彻其社会改造方案。支配他们行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为王者师。王者师这种位置意味着其人兼有特别的职责和至高无上的道德声望。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在治国中一直居于顾问和辅佐的位置。他们自身从不是统治者。如果一位士子不能为王者师，那么他的下一个最佳选择便是做宰相。虽然这样有失清高，但为相也能使他辅佐君王，为之出谋划策。无论如何，正统士子所抱的思想总是不容他去自己谋求王位。

在现代，学者们仍然抱有为王者师或宰相的思想，只是形式不同了。自康有为时代之后，已经没有了皇帝，但学者们仍执著地试图为任何掌握权力者作导师。换句话说，他们想帮统治者就如何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来运筹谋划，但自己却无意像孙中山与毛泽东那样去努力创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我们可以用一段妇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种心理。这个故事出自毛非常嗜读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其依据是《后汉书》。

在三国鼎立时代之前，有一位名叫许劭的智者，因品评人物精当而出名。后来篡了汉位的曹操当时尚是默默无闻的官员，他去拜谒了许劭，请求他品评自己。许劭起初不肯，但在曹操的一味请求下让了步。他评说曹操的性格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曹操听后大为满意。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私下谈话里常常伤感他说：“我们在治世会成为能臣，但在乱世却只是饭桶。”

他所谓的“我们”是指他自己及其好友们，闻名的有胡适等学者。

古汉语里，“好雄”一词在某种意义上含义类似于背叛。而其现代含义可解释为与传统道德准则决裂的反叛者。丁文江借用品评曹操的那句话，用“饭桶”换掉了“好雄”，其意思是说他以及像他一类的人物只能在和平时期想方设法谋求大治，但在乱世却根本做不了革命者。这些学者被关于士子政治作用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又因缺乏无畏的勇气和创建新国家所需的过人才而裹足不前。

而且，这些属于学者群的思想家首先是学者，他们的基本兴趣在于学术而不在政治。其政治热情来源于学者要担负天下兴亡之责的崇高传统。他们的政治作用主要也只限于顾问和辅弼。但毛泽东却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务实者，一位活动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虽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吟诗赋词，但却不会满足于做一位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一位沉醉于自然美景的诗人。相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诗词都不过是工具，得为实行他所构想的革命服务。换言之，毛泽东立志要创立自己的新政府，而学者们却没有这样的雄心。

政党的重要性

决定革命家与学者群这两组人物成败的另一个因素便是有无一个作为推行其方案之工具的政党。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其他政治思想家的经历。孙中山最初推翻清政府的成功就可以主要归功于其政党的活动。学者们则根本不组织政党，即使建了党，也是半心半意。按照政党一同的严格含义说，康有为的保皇党几乎算不上是政党。梁启超组织并参加了进步党，但态度并不认真。胡适拒绝加入任何政党，即使后来其爱戴者恳求他领导一个民主政党，他也未让步。张君勱确实组建了国家社会党，打算让它作为反对党的象征发挥作用。然而，近代政党的主要功用是取得政治权力，而张君勱却未遵循这一原则。相反，他及其伙伴张东荪却保证一旦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多党制度成为现实，就解散自己的政党。他们此举意在表白自己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原则而不是谋取政治权力。梁漱溟发誓说，他及其追随者决不会追求和掌握政权。显然，他根本就没有组建政党的念头。陈独秀在其苏维埃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也宣布断绝和一切政治党派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共产党在不懈地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则是学者群的改革者们没有推行其方案的组织，而其个人行动只限于纸上谈兵。这种不想掌权的不现实态度植根于轻视实际政治事务的中国古老思想传统。于是，学者群的改革者们只能谈论和期盼着精明的政治领袖来屈尊求教和采纳自己的方案。有强大政党者的成功与没有组织者的徒劳无功，正是他们选择的不同道路的自然而明显的结果。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已看到，政党对于变革运动之成功具有重要意义，而没有政党支持的单独个人所进行的改革运动只能一无所获。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孙中山确实曾建立了一个具有严明纪律和社会改造方案的党。这个党是按照苏联模式组织的，其第一个纲领的起草者就是鲍罗廷。所以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必定还有其它关键原因。

马克思主义远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理论吸引力，也远比它系统完备。它既有理想境界令人神往，也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因而深合知识分子的心意。极度张扬的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又迷惑了知识分子，他们冀盼着中国也能仿效苏联实行同样的计划。然而在我看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是更重要的因素，它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或苏联经济成就的榜样都更有分量，驱使成功的天平大幅度偏向共产党。在大陆失败前的最后几年里，国民党陷入腐败的泥坑，这突出表现为徇私枉法、裙带作风和蠢笨无能。有抱负的严肃的知识分子感到希望破灭。因为没有别的有意义的事业可供选择，许多人投向共产党。这种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的趋向实际上是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的决定性原因。胡适在 1932 年预言是颇有远见的：如果国民党竟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的生命也就到头了。

在更广的意义上，共产党长期被看成是各种失意或绝望的人们的最后投奔地。抗日战争期间就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只有投八路。”

共产党征服大陆前夕，心怀不满的军政人员们出于种种缘由都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期待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善。在国民党圈子里也流传着一句话：“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结果，由于人们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及国民党自身的士气瓦解，国民党政权整个大厦的解体比共产党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对资本主义的厌恶

中国传统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趋近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或商人左右一切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可能令人神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对于马克思描述的这种或许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很感兴趣。相反，他们珍惜中国传统所确立的那种人际关系，特别担心资本主义会导致这种关系的消亡。同时，马克思对金钱关系和冷酷算计的抨击也触发他们的共鸣，因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个特征也为中国传统观念所憎恶。

致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的最突出的原因，就是对于个人或国家追逐利润的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论语》里，君子之道的的基本标准之一便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开篇便是孟子对梁惠王的忠告：“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商人从不受人尊敬。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最低贱。从而一个商人控制的政府会受到中国人的憎恶。在社会上，金钱也总被看成不洁之物。

不难理解，从这种反对逐利的传统里会孕育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和友爱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正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契合——的热切向往，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理想成分之诱人魅力的心醉神迷。

共产主义形象的转变

“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文明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人们对

之心驰神往。但是，西方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却往往和对西方侵略的痛苦记忆纠缠在一起。对此，毛泽东有一段极好的阐述。他评论说：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决心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怎样复兴民族和现代化。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西方民主显得不适合中国的急迫需要，因而可能离题太远。况且，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增加了政治民主的吸引力。于是，知识分子所接触到的共产主义形象就既包括苏联模式的经济民主，又包括一种全面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与名誉不佳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极为不同。

1931 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变后，共产党为了联合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便对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933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即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1937 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共产党致电国民党，内容包括有要求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召开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组成的全国救国会议等。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又号召全国人民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参加抗日。从而，共产党不仅成为民主运动的热情参加者，而且或许也被看作是运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即毛泽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卓越革命家。我们说过，他是罕见的集知识学问和治国才能于一身的人物。虽然共产党史学家认为是人民创造历史，反对英雄史观，但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历史无疑会走另一条道路。即使我们承认是人民创造着历史，人民也得被动员起来去担负这一创造的重任。正是毛泽东的才华使他意识到这种必要性，提出了一套唤醒和组织民众的方法。

共产主义思想与非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理论冲突

共产主义自被介绍到中国之日起，就日益成为一股强大有力、影响广泛的思想潮流。甚至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被迫将共产主义看成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强大势力，因为选择已经只有两种：要么赞成共产主义，要么反对它，谁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从而，我们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之间冲突斗争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主要是共产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及其各种相关相近思想之间的冲突。这些思想家里除了张东荪外，没有人是职业哲学家；也只有他一人对民主作过学术研究。他谦和地承认这工作已超出了其专业范围，只是因为没有人来做他才去涉足。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却告诉人们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考察的这些思想家，其民主思想或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染上了中国色彩就是打上了他们各自独特观点的烙印。他们的目的都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而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1470—1471 页。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56 页、174—175 页。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 2 页。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不是学术上的准确无误。下面我们要按照专题概述一下思想斗争情况，以使问题更加鲜明清晰。

阶级观念

所有中国的社会思想家都抱有一个同样伟大的目标——救国救民。对非共产主义思想家来说，中国人一词是指种族意义上的一切中国人，包括大陆的少数民族。而共产党人的态度却具有强烈的阶级意味。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先驱思想家丝毫也没有阶级概念，他们都自称力儒家，而儒家则奉博爱为美德。胡适热诚地捍卫民主，主张所有中国人一律平等。张君勱也竭力倡导民主，相信民族意识能超越一切阶级差异。其密友和同事张东荪认为，在中国无法用经济术语准确地规定各阶级特征。至于梁漱溟，他干脆否认中国社会存在有明确的、彼此对立的阶级。传统上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部分只不过意味着职业分立而不是阶级差别。他有意识地用“乡村居民”一词代替了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农民”。

孙中山主张中国人民一律平等。孙中山自己这样谈过中国的阶级：“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

接受还是排斥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之间理论冲突的焦点。根据对马克思理论的不同态度，思想家们对每个中国人便或者视之为“阶级的一员”，或者将之看作“民族的一员”。

总的说来，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不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基于和平与亲爱的仁政思想背道而驰。服膺仁爱哲学、憎恶暴力的人们自然不会皈依这样一种学说。那些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们在推翻有产阶级之后，其仇恨的习惯仍会延续，致使他们将会寻求新的毁灭目标。这样的状况与那种理想社会是凿枘不合的。阶级对抗理论还与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势如冰炭。按照共产主义学说，人们彼此不再都是兄弟，只有无产者才会彼此友爱，有产阶级则是阶级敌人。完全消灭阶级敌人后，所有的人才都是兄弟。而依照毛泽东阐述的理论，这一目标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持续革命才能实现，其过程将是漫长的。

“阶级”一词内涵的扩展导致了相当的政治后果。毛泽东的阐释使阶级斗争时期延长了。他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确立后，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会十分激烈。毛主义者断言，刘少奇主张与此对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梦想阶级消亡和阶级斗争结束。他们还把刘的理论与苏联修正主义挂上了钩。

普遍真理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者确信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在中国这种信奉普遍真理的态度以前就很流行。传统儒家就相信儒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信念在五四时期开始动摇，随后即遭唾弃。现代思想家里，胡适最引人注目地反对存在着普遍和永恒真理的观点。作为杜威的门徒，他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声称实用主义者否认有跨越时空的真理，因为真理不过是人们为实用而

创造的一种工具。他还不相信存在有一种能使社会飞跃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承认或否认普遍真理之存在的背后，存在着看待世界万物的态度方式的根本差异。可以把这种差异看成是科学态度与独断态度之间的对峙。自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科学态度即赢得了学者们的倾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都趋向这种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们是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吸取自由主义思想的，所以引用西方人的论述可以更好他说明这种思想。中国人熟知的伯特兰·罗素指出：“哲学家洛克一直不懈地强调我们大部分知识的不确定性，其出发点并非是休谟那样的怀疑论，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可能犯错误，并且在和观点不同于自己的人打交道时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中国人由此明白了知识和意见不会绝对不错，因而谁也不应该固执己见、自以为是。

关于这种知识易误性的思想，戴维·斯皮兹在评述 J.S.穆尔时的一段话中有很好的论述：“穆尔整个态度中最基本的当然就是那非常有益的忠告：我们人类不会一贯正确；在完满和最终的意义获得真理是不可能的；作为理智的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让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观点经受……新材料、新经验的检验”。共产党人一般都坚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胜利。这种信念一直激励着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明确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普遍和永恒的真理，或从更宽泛的意义说就在于接受理论的态度是教条的还是试验性的。

革命与渐进

中国救亡运动自始即面临着革命与渐进之间的思想冲突。较早的思想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渐进主义者。虽然康有为设想了极端剧烈的变革，但他从未提倡暴力或革命。其弟子梁启超也厌恶通过残酷激烈的灾难性革命来实现理想社会。康梁主张渐进的缘由在于他们只想通过立宪改良清朝统治。相形之下，孙中山则是一位革命者，他主张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然而相对于毛泽东，孙又是渐进主义者，因为他在革命倒满后却想和平地进行社会改革。其他思想家如张君勱、张东荪和胡适等都是信奉渐进主义者。梁漱溟也得归入这一类，因为他完全否认中国有必要和可能进行革命。胡适特别强调点滴改良才是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之唯一途径，厌恶激烈或盲目的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充满暴力的革命只会损耗国家的元气，激起盲目轻率的罪行，搅乱社会秩序，在人们中间播下相互屠杀的种子。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确认现在秩序必须扫除，而这必须诉诸暴力才行。于是他把渐进主义抛到一边，认为它是反动的或者修正主义性质的；还把胡适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毛崇尚通过飞跃或革命来获得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他断言中国革命无疑就是武装的暴力革命。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基本上在社会改造中是竭力谋求尽可能减少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尽可能避免暴力和流血。

民主与专政

近百年来，民主运动从无到有地崛起于中国。康梁等改革先驱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君的民主体制。孙中山在理论上赞成民主，不过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其追随者背离了他的民主主义。稍后的思想家如胡适、张君勱和张东荪等则都是民主的热诚拥护者。他们既抨击国民党的

伯特兰·罗素：《讨人厌的论文》，纽约，1962年版第14页。

戴维·斯皮兹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纽约，诺顿。

一党专政也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态度别有特色。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客观特征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中国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则是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照毛泽东的说法，第一阶段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始于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构成了一条分界线，这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把人类历史划成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在这以前，中国革命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自“五四”开始到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 1949 年，整个这一时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似乎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一种政体形式——专政，问题只在于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抑或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人称西方民主为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中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竭力追求的原则就是这种西方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

再者，民主主义思想家服膺个人主义，倾心于一种会孕育出富有创造性的独立个人的社会。而共产主义理论则在原则上强调集体的卓越，并在实践中用它来替国家的至高无上与个人的绝对服从辩护。胡适和二张所希望实现的具体措施不过是设立人民选举的议会、和平交接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和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但它们在中国至今仍未付诸实施。

最后我们谈谈对民主运动态度一度反复的陈独秀。在共产主义信仰幻灭后的晚年，他转而坚定不移地信奉民主的内在价值。在他看来，西方民主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也被一切人所向往；它永远是广大人民反对少数特权者的旗帜，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如此，到政治消亡的未来也完全一样，它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弥足珍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不同。除了这类理论阐述外，陈独秀还沉痛地指出，如果有民主体制制约斯大林，他就没法建立独裁。

许剑波译自《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
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纽约 1986
年版第 9 章结论部分

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民族形式

[美]金思恺

在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由于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的现实与马列主义诞生地所在国的情况不同，因此，毛所领导的这场适合中国现实的革命具有一种特有的民族形式。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革命不同于那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它既是物质的革命又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意识形态的主张主要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因而，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就必须在哲学的王国中进行一场革命。这是很显然的。

马克思批判了宗教、“国家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对现存制度和它的“抽象的连续性”进行批判的必要。德国的宗教全然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德国的国家哲学和中国的哲学显然植根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至于“黑格尔哲学”，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民众的口胃。因此，如果批判中国的制度和它的连续性，那么，这种批判的目标与马克思当时就德国的情形所批判的东西就不同了，这说明，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革命具有自己特殊的民族形式。

“抽象的连续性”，是指历史的发展。为了理解中国条件下的“抽象的连续性”，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的现象”，了解它的“革命的现实”是有必要的。毛认为：当代的中国是由以往的中国发展而来，在历史方法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决不可割裂历史。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继承性这一点上来理解毛的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就歪曲了毛的原意。毛在这里的真实意思是，革命的现实只有在历史的现实发展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某些历史传统可以被“革命的现实”继承下来。然而，这种继承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传统必须加以改造以使之符合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的需要。传统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反映，而且同时又作用于传统社会。旧社会的产物永远是服务于传统价值的。要使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适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将这些因素重新加以改造，清算它们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使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

特殊的民族形式就涉及上面所说的批判的继承问题。这种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继承而非内容上的继承。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理解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

传统思想之批判

我们所指的传统思想是指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它不仅包括曾一度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思想，也包括其他名气稍逊的中国思想家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些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生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含有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整个来说，这些思想家迷恋于怎样解释世界而不是去探索怎样改造世界。他们的社会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正如列宁所说，他们的目的是给旧社会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批判它，砸碎它，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发生过许许多多

的农民起义，封建朝代也不断更迭。在毛看来，这些农民革命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但是，农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仍不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架。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为特征的新社会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这方面来说，孙的革命理论也是一种主要是对社会进行修补的理论。

毛在讨论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时，提出了他批判传统思想，继承某些传统遗产的原则：首先是批判和清算所有的“封建糟粕”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颓废思想，然后继承和吸取所有“民主精华”。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分糟粕和精华，以什么作为评价的准则。

根据毛的观点，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在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进行的，这种斗争往往以妥协而告终。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解释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这样，传统文化和新共产主义文化的界限就明确了。这种共产主义文化完全是建立在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的界限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确定的。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的斗争。

在毛那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评价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思想的唯一标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因此，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不仅包括批判它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而且还要批判它们的认识论。

有关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的资料比较零散。但把这些材料加以系统化之后，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毛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武器的批判方法。

儒家思想之批判

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它的社会观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毛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我们将在后面作研究。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对儒家哲学的一般特征的批判。

儒教持有一种天命观，认为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而然存在的。毛从两个方面批判了这种传统思想。首先，天命观赤裸裸地违反了唯物论原理。第二，把天命视作不可抗拒和独立存在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它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强调物质的各种运动的观点。毛的这些批判，实际上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即建立在天命观之上的历史观和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的历史观。

在认识论方面，儒家强调通过自我修炼和自省的方法达到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对此，毛批判道：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斗争，这样，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揭示和理解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

儒家多次反复重申和详细说明自省和自我修炼的方法。如孟子强调要“尽其心，知其性”。韩愈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步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取得真知，完成大业。陆九渊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理”。王守仁详细地论述了“致良知”，良知便是心之本。这种认识论后来遭到严复的批判。严复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毛在批判儒家的认识论时，可能受到了严复思想的启发。但是，应该指出，严复和毛对儒家认识论的批判是基于不同的思想前提的。机械唯物论无疑对严复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认识论思想本质上仍是唯心主义的。而毛持有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毛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的：“人的认识决不能脱离实践。”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看来似乎与毛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相一致，然而这两个命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在王守仁那里，“知”即天理与孟子的“天生的良知”是一致的。王守仁强调在心中求得良知或发展良知。儒家思想家强调知行的一致及其同等的重要性。王守仁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一，第一个将知与行等同起来。他说：“一念发动之处便是行”。知和行的统一，表示这样一个发生在观念之中的过程：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王守仁的认识论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不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必须首先接受实践的检验，然后还必须贯彻到实践中去以接受进一步的检验。毛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毛进一步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虽然毛的这些论述不是直接针对王守仁的知行观的，但他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划分了王守仁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原则的界限。

王守仁主张“格物致知”说，他吸取了孟子的如下观点：“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也就是说，王守仁相信，万事万物的理就在人的心中，通过自省便可获得这种理。在王守仁看来，格物便是格心中之物，也就是“正心、诚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这里所指的实践，不仅是自然属性上的实践，也是人的社会实践。无疑，儒家没有看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当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问起农事时，孔子斥之为小人。由此看来，儒家蔑视体力劳动就不足为奇了。毛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思想。在毛看来，“不实行劳动”就是不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就不能认识和了解事物的本质及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还认为，书本知识除非与实践相结合，否则就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

儒教注重自省和自我修炼的方法而忽视劳动和实践。“学而优则仕”成了他们的经典原则。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现象，文人学士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把自己禁锢在书斋中，用毛的话说，就是脱离实践。在批评这种倾向时，毛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结成一体。

上述讨论集中在毛对儒家的哲学基础及儒家哲学各派的具体特征的批判上。这些批判无疑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基础的。

下面这个观点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即：儒家思想是最好的统治工具，毛虽然在其争夺权力的斗争过程中反对过儒家思想，但当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会为儒家这个古老的学派恢复名誉。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

为在毛的一生中，对儒教的批判是一贯的。

其他传统思想之批判

毛没有系统地批判中国各种传统思想学派，也未对这些学派中的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作过系统的评价。从整体上说，毛的批判是一般性的、零散的。但是，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

在评论唯物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时，毛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写道：“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清楚地说明从实践到感性的飞跃，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老子和庄子没有涉及这些，墨子虽讨论了某些认识论问题，但不甚清楚。其他像张载、李卓吾、王船山和谭嗣同等一些思想家也不能清楚地说明认识问题。”

由于老子和庄子是唯心主义者，因此，他们自然不能理解唯物主义认识论。至于张载、李贽、工夫之和谭嗣同，他们的观点的确具有唯物论倾向，但因他们的哲学主要是根植于唯心论的，所以，他们也自然不能清楚地理解唯物主义认识论。

毛也指出，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践，他评论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至于辩证法，毛写道：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在这里，毛解释了古代辩证世界观的兴衰。从另一个角度说，古代辩证法通常强调的是矛盾的统一性而不是斗争性。毛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倾向，他确认“一分为二”的原则而反对“合二而一”。

从整体上讲，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在毛看来，唯物辩证法以前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它是在近代被引入中国的。

毛也批评了那种只有唯物论而没有辩证法的机械唯物论。他把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放在同一个范畴内。他在解释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时，对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了进一步区分。他指出，机械唯物论不能认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结果它便只能解释世界不能改造世界。毛对主观能动性是极为强调的。

毛不仅批判了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而且也批判了它的认识论。他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可以说，毛对儒家的自省和自我修炼方法的批判也适合于那些机械唯物论者。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天才论和先验论。毛并不排斥天才的存在，但他坚持认为，天才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而天才论忽视了实践的本质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先验论。

在关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问题上，毛进一步指出了“唯物论”的错误在于颠倒事实，而经验论的错误则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只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表现事物的本质的。

看来毛没有对实用主义作公开的批评。应该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别在于承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毛反复强调将客观规律作为认识的标准的重要作用。他要求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想与客观外部世界的

规律相一致。

当然，不能把实用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主观主义。实用主义把“有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真实的标准。它关于有关事物的“有用”性的说法，也许与事物内部规律的符合是表面的或片面的，同样也许是与该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实用主义又有可能成为主观主义。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毛实际上把他自己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作了重要的区分。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进行的：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

张晓、韩虹摘译自《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年版

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美〕阿瑞夫·德里克

我在本文中试图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视野出发来审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固然不无风险但却是值得的。说它冒有风险是因为就我所知，毛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些术语或者借助这些术语来思考问题。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明确提到过有关这些术语所意指的问题；危险就在于当人们用概念来解读与这些概念不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可能发生歪曲甚或导致无中生有。然而冒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谓风险也是含混不清或带有矛盾的东西。如果说毛的确没有明确提到过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问题，那么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和毛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下面我力求通过考察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来把握这些问题，这一关系本身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最为深刻的见识，并同时使它所具有的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凸显出来。”

现代化 现代性

现代主义 反现代主义

马歇尔·伯曼在其富有创意的著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一书中写道：

有一种富有活力的经验，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指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冲破了一切地理和种族的界限、阶级和民族的界限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到旋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旋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旋涡。成为现代的，就是指成为这样一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

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历史“状况”，而是一种历史性经验（包括有关历史的经验）；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状况，那么它也是作为经验的状况，它总是在企图改造那些促成它产生的状况。正如大卫·哈维在他的《后现代性状况》一书中所提到的：

……现代性即使对它自身的过去也不尊重，更这论对一切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了。事

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思想不同，它是中国共产主义关于革命集体经验正统公式的表述。由于考虑到其他人参与了毛的革命政策的制定，考虑到其他人甚至参与了写作毛泽东思想基础文本的建构工作，因此我在以下的论题中文替使用毛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概念。埋藏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那些矛盾，可以在毛泽东处理现代性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最为贴切的表达。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纽约，1988 年版第 89 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比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纽约.1988 年版第 15 页。

物的易变性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任何历史连贯性意识。如果历史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必须在变化的旋涡中去发现和界定，这个旋涡不仅影响着一切被人们讨论着的事物而且影响着讨论的术语。这样，现代性不仅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一切以前的历史状况，而且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意味着一个在自身内部永无止尽地进行着内部分裂和解体的过程。

这样一来，现代化就是制造（和继续制造）现代性状况的历史过程：“科学的发现、工业的膨胀、人口的变迁、都市的扩张、民族国家、大众运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由‘正在扩张且在急剧动荡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的”。对于上面几个方面我们还可再加上革命这一项。

这些过程向我们指出了—一个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并且作为现代性的生长之源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能够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蒙运动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隐含在这种创造力之中的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构成的“铁笼”之中。这样，现代性的经验也是一个不断努力克服上述矛盾的无休止试验的经验（这个矛盾有它赖以存在的根源）。为克服这一矛盾而不断进行的努力，具体体现为从摒弃启蒙运动，同时信仰理性的启蒙到宣称只有进一步启蒙才能弥补启蒙运动的缺陷—这一系列行为（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术语来代替“启蒙”—一词，这些术语代表了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这些过程的又—种描述，诸如科学、资本主义、市场、革命、社会主义等）。所有这些试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试验中也包括那些摒弃启蒙的试验）都是受一种冲动所驱使的，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

伯曼把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们试图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成为它的主体，试图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一切努力。”现代主义要与“现代化主义”区别开来。后者是一种致力于现代化的技术、经济以及社会过程的单方面努力。另外，现代主义与矛盾并存，它即与现代化的毁灭性并存又与现代化的美好前途并存。现代主义在现代化之中刻画出主体的位置，这个主体也认识到它在历史之中要—不可避免地—被客体化；这里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相—一致的地方，后者认为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是从必然性之中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反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提出的（而也只有以现代主义为参照才可以被理解），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同样的矛盾。“成为完全现代的就是成为反现代的”，伯曼写道。如果我把这一表述倒置的话，则可以说成为完全反现代的也就是成为现代的，这不仅是因为不参照现代的事物就无法理解反现代

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状况》，牛津，1989年版第11—12页。

佩利·安德森：《现代性和革命》，《新左派研究》第144期（1984年3—4月）第96—113页。

J·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演讲：第12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英译本。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5页。

同上，第14页。

主义，并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反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试图实现某些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现代的事物露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杰克逊·里尔斯在其研究美国反现代主义的著作《没有优雅之地》中争辩道，美国的反现代主义即使逃避到过去之中（如提倡中世纪主义或东方主义），就其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而言，它也是典型现代的，而不是逃避主义的或前现代的或反动的。里尔斯提醒我们，精英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工厂纪律的抵制，遭到资产阶级剥夺的农民带着农民式的乌托邦而进行的反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运动，这些所代表的不是点残余的怀旧心理，而是来自不同阶层和权力位置上的人为克服现代性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努力（而它同时并不反对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反现代主义代表了（而且其关键就在于）对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追求；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者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这一诺言曾在理论上激励了现代化），那么新的现代化就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且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但它却不可能反对现代化性（更遑论现代化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构成同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境界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其未来理想里保存着对前现代人类共同体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仅仅以一种经过理性和现代性的主观目标加工过的形式保存着。这种矛盾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革命的动力。就社会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也许能解释这一革命的动力而言，至少在社会主义的外观上，反现代主义的矛盾性需要同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矛盾的赞美区别开来，后者对现代性之矛盾的赞美掩饰或美化了社会服从和政治服从。我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一种革命运动。作为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由国家所指导和控制。一方面，它放弃了自身的由反现代主义所激发的乌托邦观点；另一方面，它又在自己力求加以控制的现代化的破坏力量面前显得脆弱无力（直到最近，这种作为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还声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加优越）。

在此有必要指出伯曼对现代主义所作的理论分析的三个方面，因为它们与我们下面的讨论是直接相关的。首先，伯曼对现代主义的讨论是出于恢复19世纪现代主义创造性动力的目的，他认为这种创造力到20世纪已经丧失。19世纪的现代主义者之所以就其对未来的设想而言是创造性的，是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生活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这促使他们辩证地看到现代性和现代化、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以及向未来开放和向未来封闭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20世纪后来者极大地陷入了死板的极端和明显的绝对化之中。现代性要么被一种盲目而无批判的热情所环绕，要么被人们带着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蔑视所谴责；在任一种情形下，人们都把它看成为一个封闭的顽石，无法为现代人所塑造或改变。现代生活的开放眼光被人们

杰克逊·里尔斯：《没有优雅之地：美国文化的反现代主义与变形》，纽约，1981年版。

P.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第112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75—78页。

的封闭眼光取代了，既此又彼被或此或彼所取代。”于是，“倒退有可能是一种前进，即牢记住 19 世纪的现代主义能够为我们创造 21 世纪的现代主义提供眼光和勇气。”

伯曼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作的区分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分析中。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非常具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讨论中，伯曼告诉我们，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性分析家，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最深刻矛盾（说他是位伟大的分析家正是因为他把握了“发展的悲剧”并把这一悲剧内在化）。马克思的著作描绘出（资产阶级）现代化同作为它的文化表达的现代主义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在突破过去（包括资产阶级自身的过去，即它对生产进行不断革命的过去）所取得的成功颂扬，和他带着亲身感受对这些成功所必须付出的文化代价的认识是相连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资产阶级的悲剧就在于，它之所以必然走到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然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成就不加以摒弃，而是为了另一个其本身也是现代化之产物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需要而对之加以赞赏。他认为，无产阶级将会从现代性中获得丰富的（解放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则由于其意识形态的缘故而被封闭：“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就其历史基础而言，这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设想，会把那些马克思已经在资产阶级现代化中所发现的深刻矛盾带入马克思主义本身。伯曼富有洞察力地（如果不是预言式地）总结道，社会主义国家既推动现代化同时又限制现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现代化，同时又否定了现代化之最丰富的可能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代性的破坏性也会像骚扰资产阶级社会那样骚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的现代主义思想更多地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它的全部压抑性使矛盾的“辩证斗争”得以自由展开。马克思主义需要被人们召唤进 20 世纪末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不是作为“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让社会进入这些矛盾中去之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

这一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现代主义的解读，以及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现代性中的作用，在特殊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作用所具有的意义是发人深思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对矛盾的涉及以及对待矛盾的做法直接同毛的思想形成对照；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讨论的那样，在毛的思想中，矛盾具有核心的作用）。伯曼的解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暴露了伯曼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如果现代主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一局限就必须被超越（除非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只是欧洲现代主义的简单延伸）。

同上，第 124 页—125 页。

同上，第 24 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36 页。

同上，第 94 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98 页。

其实这正是伯曼对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构想，也正是我所要强调的伯曼的现代主义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在题为“不发达的现代主义”一章中，伯曼考察了19世纪俄国的现代主义，他把当时的俄国当成为“正在诞生中的20世纪第三世界的雏型”。在俄国，现代化在人们的经验中被理解为“某种基本上还没有发生的事物，或者换句话说，它是某种在远处发生着的事物；即使俄国人偶尔涉足其间，也更多地把它体验为某种不符合人世的异想天开的事物，并不是把它当作社会的现实。或者说，当现代化在俄国发生时，人们只是把它体验为某种只是以最杂乱无章的、徘徊不定的、发育异常不健全的或者说遭到了严重扭曲的方式发生的事物”。于是现代性的经验在这儿采取了“对落后和不发达的焦虑”的形式。

尽管伯曼认识到在欧洲之外的地区，“现代性的含义必然会更加复杂、难以捉摸和充满悖论”，但就其对这些地区（不只是俄国）的论述来看，他的这些分析至多只表示了对第三世界社会现代主义的一种自圆其说的、单方面的鉴赏而已；这些分析同他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探讨相似。把19世纪的俄国描述为第三世界的“雏型”，体现了伯曼第三世界思想中的化约论特征。俄国也许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但是它的政权为“发达的”欧洲覆盖了一层阴影。俄国的现代性和许多第三世界社会难以相比，后一类社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象，它们与欧洲文化的不相容性并没有由于俄国和欧洲关系所包裹着的任何不确定性因素而稍有逊色。在这些另一类的社会里，正如伯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主义是某种将会发生且必然要发生的事物，如果它们要从囚禁它们的“伪浮士德式的”规划中获得解脱的话。

佩利·安德森在其对伯曼的批评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来说明作为“仍然确实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社会”（在那里现代性的前途仍处在争议中）的特征的现代主义。在安德森看来，“曾一度在第一世界笼罩一切的阴影”在20世纪的第三世界也出现了。然而在那些地方，一旦造就现代主义的历史环境消失了，现代主义还必然走上欧洲现代主义的道路。

安德森对伯曼的现代主义研究的反对，从时间和空间这双重意义上向现代主义的历史性提出了质疑。其实值得争议的是，伯曼在单纯美学意义上对现代主义的解读，使得现代性问题被非政治化、非历史化了。他所理解的把现代主义建立在由历史确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解读，最终被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所作的现代主义的解读所推翻。在此，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系列打破了民族、阶级、性别等所有界限的态度或矛盾，不妨说，它是不受现代性之中变动不居的时间性的影响的。当伯曼把马克思请到20世纪末叶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中去之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不用说，这是一种对马克思所作的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的解读。在伯曼的论述中，马克思主

同上，第232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174页。

同上，第75—82页。

同上，第124—126页，第77页。

佩利·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第109页。

义保留其政治内容，那么也就失去了现代主义的雅致了。马克思——或是正确地或是错误地——认为他为现代生活的矛盾提供了解答。而在伯曼的解读中，这些解答消失成为对矛盾的一种审美化的崇拜（这提供了一个和毛对矛盾的解读的有趣对照）。

在伯曼对第三世界现代性问题所作的探讨中，对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混淆同样是明显的，这使他有可能把 19 世纪的俄国当成了现代性的“雏型”。现在，我要转而讨论这一问题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体现。

毛泽东，第三世界现代性及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谈论现代主义时将其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意欲何为呢？最直接的是这一问题引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浮士德的形象问题；毛将中国社会中一切可能有的矛盾都释放了出来，这可以从“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术语中推衍出来。大卫·哈维告诉我们，“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术语“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现代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来源于实施现代主义规划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哈维在描述这些困境时想到了毛泽东：

正如从歌德到毛泽东这整条思路上的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注意到的那样，你当然不可能不打碎鸡蛋来制作一个蛋糕。这一困境的文学原型……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一个划时代的英雄准备去摧毁宗教神话、传统价值以及习惯的生活方式，以便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壮丽的新世界。然而浮士德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浮士德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为了主宰自然并造就一个新景观，他把自己和所有其他的人（甚至摩菲斯特）都逼到了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痛苦和疲惫状况的边缘，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成就，它拥有把人从欲望和需要之中解放出来的潜在能力。带着要消灭任何一个横亘实现这一崇高境界之路上的人和物的心情，浮士德极度恐怖地调遣摩菲斯特去杀死一时居住在海岸边小茅屋里的非常相爱的老人，仅仅是因为这对老人无法适合他的主宰计划。“发展的真正过程表现为……即使它把废墟改造成了繁荣兴旺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它也在开拓者内心再造了新的废墟。发展的悲剧性就是这样展开的。”

我们知道“发展的悲剧”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是怎样展现的，但不知道发展是否“在开拓者的内心再造了新的废墟”。1958 年，毛带着“痛苦，也许是椰榆，但首先是自豪”对安德·马尔罗说：“我很孤单”，“我在大众面前感到孤单”。仅仅事隔几年之后，毛再一次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场反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形成的制度的行动，这一行动对于千百万中国人具有更加悲剧性的后果，也增添了毛自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悲剧形象。

在这里，我所想探求的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将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讨论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的探讨也许能向我们揭示有关毛泽东个人的一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它会展现作为第三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现象的现代性，会有助于我们把其间的“发展悲剧”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下，而毛本人则是发展的动因。在此我把现代主义看作是对发展的矛盾性的认可，它提示我们：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结构要素而把一种对现代性的极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嵌入了现代主义之中。此外这一探讨还会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的现代性看作是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它自身的矛盾性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策略。在第三世界民族的情形中，前者表现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这一思想结构反映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

矛盾。后者则体现在毛力图解决那些与其理论的信念相对立的矛盾所具有的矛盾性。毛认为，矛盾使所有力图将其包容起来的努力归于失败。毛在其政治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信念后来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相互替代而又抵触的方面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发生激烈冲突的焦点。毛对于现代性的双重心理打破了社会和历史的目的论观念，这种心理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可以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多重复杂的矛盾世界中，未来正如捉摸不定的现在一样模棱两可；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思想把矛盾的概念指定为把握一个流逝、分裂、冲突的世界的最合适的工具。作为社会和自然的能动原理，矛盾被当作原动力，它使得表述了现代主义讽刺性的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成为一种认识论。

毛对于现代性的双重心理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但是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一种掩盖了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的片面解释。在官方发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本杰明·史华兹曾论及过毛主义的幻想：

目前领导层的官方看法是，无论人们对这种幻想的解释如何变化，这种幻想不仅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只有值得人们想往的现代化才是能融合到毛主义幻想中去的现代化。另外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这种幻想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现代化遭到了失败和困难的理性化表述。

关于史华兹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这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我们有两点评论：首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都把现代化当作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后一种解释比前一种解释更难于调和。毛泽东思想“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已经是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这在毛的继承人那里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种观点甚至极端地表现为认定毛泽东的画像是“封建主义”的渣滓，认为毛主义者是保守分子，他们损害了中国的现代化。相反，毛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坚持认为毛主义的理想会带来更好、更彻底的现代化。尽管这一观点具有说明毛的现代主义思想的优点（让我们回顾伯曼在前面对马克思的分析），但是它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基本评价准则，因而掩盖了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中所必然包含的矛盾。

其次，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释上的差异（同时似乎也是评价毛泽东思想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性含义中的差异。这种差异被那种坚持用一种现代化视角反对另一种现代化视角的片面做法勉强掩盖了起来，混淆在人们对问题的或此或彼式的探讨中。如果承认不仅毛泽东思想而且现代化都是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似乎相互对立的解释都是有效的。毛泽东思想确实“完全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这里的现代化是指按照现存的现代性模式所理解的现代化。但是毛泽东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它是通过现代性的一个视角以及一种有助于领袖人物进入这种现代性之中的现代化获得的。同那些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进步和革命特征的毛主义者相反，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这一现代性的视角又是通过一种融合在毛泽东思想之中的深刻的反现代主义思想而成为可能并获得的。这种反现代主义远不是什么妨碍现代性的“封建”渣滓，它本身正是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产物，它使得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工程远比以往（甚至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更加复杂化和多向度。

本杰明·史华兹《现代化和毛主义的观点》，见《共产主义与中国：不断变动中的意识形态》，纽约，1970年版第162—185页，第179页。

马克思主义给毛提供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言，也正是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这类复杂性和矛盾最为明显。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独特的风格。因为当毛在中国的背景下阐述（准确他说应该是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时，他力求用现代性来说明中国的经验，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加以重新表述。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正是这一处境导致了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并因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社会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而被迫进入现代性之中的。在这个社会里，现代主义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让人们“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问题，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作为自发的主体确认并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有的人已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家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它帮助中国的领袖人物进入一种真正可以选择的现代性中之前，必须使自己与中国的经验容易结合在一起。

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更广义地说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样的做法也发生在毛重构马克思主义这一工作的根基处，发生在他要求在全球马克思主义中有中国的声音这一行为中，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

毛的中国学生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看起来浅显的阐述掩盖了普遍真理（或理论）同特定环境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之过程的复杂性。斯图尔特·施拉姆把具体化说成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观念”，这种含混观念明显地见于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中，而所谓的“具体化”是服从于这类解释的。在一个极端，“具体化”只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而没有更深的理论含义，或者甚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实践取向的最终实现。在另一个极端，它代表着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的民族空间和文化空间中来，这一空间不可避免地同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源头迥然不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类解释认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并不相同，它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的“气息”或“风格”。

值得讨论的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容纳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对“具体化”的认识（当然，不包括把由此界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疏远或背离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和一种历史情势的接合，中国社会则是这一历史情势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全球力量的推动下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够针对一个完全确定了的、历史情势的多重需要来说话。它之所以具有长远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什么深刻的理论贡献，而在于运用它的思维结构表述了这一历史情势中的问题；它以全球性的

《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1989年第5期第4—6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纽约，1971年版第112页。

视角重铸了马克思主义，其结果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力求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包含着这样一种双重过程。人们可以以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方式来解读毛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这些互补的过程建构起来的，出于这一原因，这些对毛的解释无论在对毛的解读上还是在另一点上，即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同毛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相反的本质，都会陷入武断的化约论；这类对毛的解释总是在上述诸种对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择一而从，而忽视了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矛盾（以及这一思想给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矛盾）。

毛的（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性，也同它的推论结构一样，不是建立于脱离中国历史背景所理解的某种关于“中国”的抽象概念之上，而是建立于这一历史环境之中，这一历史环境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在人们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动力的认识中表现自身；而正是这一历史动力转变了中国社会以前的历史情景，并且无可挽回地把中国社会放到了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之中。

中国的历史处境在 20 世纪有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它们对于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第一个方面是它的全球意义。中国从 19 世纪开始就被卷入到了全球的历史之中，在这个历史中资本主义是其最主要的动力。中国是否完全被结合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或者是否在这一进程中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目标都是抵御这一结合过程。

第二是它的“第三世界”方面。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和北美，但它同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和非洲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南美社会）一道经历了历史及其动力——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本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异国霸权的产物。当中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结合为一体时，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且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

第三是它的民族方面。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着它自身的历史特征。中国和全球历史的结合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它的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型构一样。这里所谓的民族意义，表面上似乎一清二楚，实际上并不清楚。爱里克·霍布斯鲍姆发现，在资本主义把其它社会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从而创造全球历史的同时，这一全球化过程也促动了一个与之相反的运动过程：19 世纪末叶，围绕着主权的民族国家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政治上的重新组合的高潮，这些民族国家对历史有其具体且狭隘的要求。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自然发生的民族主义对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依照欧洲经验所理解的普遍的现代性设想发起了最初的革命抵抗。继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其列宁主义的形式）为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在其反资本主义思想

中，为那些可能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所毁灭的社会展示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色彩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因此为了使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得不以民族声音加以重新表述。因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明放弃了普遍性要求的特定民族的经验；更糟糕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霸权的产物，但在普遍主义的外观下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走了资本主义霸权的老路。

然而民族声音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全部近代中国思想都很重要，而对理解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为关键。这个问题就是：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含？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 30 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 20 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具体的实践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 1927 年被赶到农村后，他们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面对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开展农村革命之矛盾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这使得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农村社会前现代的地方性文化面对面地相遇。不管这些源于其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何种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化倾向，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必要性需要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转译成人民的语言，特别是转译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和农民群体（甚至妇女）的语言。也就是说，在农村革命的形态下，阶级、性别和种族的问题使得民族语言的问题进一步变得无比复杂；而农村革命的处境并不适宜用一种都市的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范畴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这种“完全确定的”历史处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关键部分：（1）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的产物，这种现代化在欧洲缔造了现代性；然而这种现代性不是中国而是欧洲现代化的产物。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初遇到肇始于 19 世纪末叶的现代性问题时，现代化在任何有意义的物质层面或社会层面上都还处在未来的状态。诚然，“对落后的焦虑”是中国现代性中的一部分，它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下列事实而产生的，即现代化是正在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意味着中国的“落后”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种不可触及的现代性，而是强迫所有其它社会都进入其轨道，对它加以抵抗就会导致民族灭亡的现代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恐惧又伴随着人们的希望，即希望通过认识欧洲经验中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毁灭性，中国人也许能创造出更好的现代性，它不仅吸取欧洲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而且也吸收本土的资源。（2）现代性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它的直接的政治产物——民族主义问题上，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因素的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目的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后社会主义与全球性资本主义：当代激进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即出版）。这里我可能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前景，而且，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第三世界社会的现代化时也有助于“解构”马克思主义，并展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以暴露其中的若干矛盾。伯曼坚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正确的。

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来改造中国，但是，只有源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而将民族的特性铸就出来，它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历史遗产又似乎和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回到或逃避前现代过去，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民族则是服务于这个未来的媒介。在确定了这一使命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强调现代性的集体经验优先于特殊的个人经验以及阶级和群体的经验。(3) 现代性的经验作为一种外来的入侵因素而造成了对现代性(作为统治工具)之价值的怀疑和对本土价值观(从根本上讲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否定。民族主义必然要呼唤本土价值作为民族特性之源，从而强化了蕴含在这种现代性经验中的反现代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强调集体经验优先于部分经验，但它并不能包容现代性的矛盾。因为民族乃是虚构的，它的价值需要得到巩固；另外，当中国社会和现代世界的深刻结合把不同的社会群体逐渐动员起来时，这些群体对民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人们认为现代性经验既可能有解放意义又可能有压制性，这取决于其处在什么社会地位。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两者间的窘境就是：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民族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使社会视野多样化，并且相互对立。

如果我们依据其结构的复杂性而把握了上述这种历史处境的话，那么毛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最恰当地理解为对这一处境的反映(这里必须把对历史处境的反映和对处境的反映区别开来)。作为一种语式，毛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推论结构中刻上了层次多样的历史处境的印记，毛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处境中产生出它的问题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两个共存的过程也是对立的。它们充满矛盾地建构了一种语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历史处境构成了阐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观点在毛或其亲密同事的著述中随处都可找到证明。这些著述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关于本世纪早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参阅我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的第二章。

相连接。毛泽东 1940 年 1 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是这样一种登峰造极之作。这篇论文代表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经典阐述。“新民主主义”是指一种和中国的直接需要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结构（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混合经济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追求民族解放为目标的各阶级的联合）；但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进步适合于世界上一切与中国类似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命题是：（1）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然而这是一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民族解放是它的主要任务；（3）它也是一场民族革命，一场旨在创建一个新民族和一种新文化的革命，这种文化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以及从外国舶来的文化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这里所指的从外国舶来的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说到底，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理解为二者之间的完全重合，让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中国的环境所淹没或者把中国的特点完全纳入到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去，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毛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如果这样，就说明中国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角色过于被动了，这不符合毛对中国特殊性的一再强调；还可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值得争议的观点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离之处。毛在过去以经得起考验的方式提出的纲领或“具体化”最有说服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包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即必须把在前述意义上不能结合起来的東西结合起来。这里有必要用一定的篇幅来引用一段毛的原文，在这里毛第一次（也是描述最充分的一次）使用了“具体化”一词来表达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并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纲领，而是试图借助比喻的力量来抵消这一纲领所具有的矛盾性：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多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第 1 期上（1940 年 1 月）。

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不是为了解决其“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意识形态产品，在这一产品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决定因素，但是反过来用自己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帮助毛确立了他对新中国的理想，但是不能因此把这一理想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其它的基本来源。同样，对中华民族之需要的深刻认识是毛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但不能因为这种认识而把马克思主义淹没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之中。毛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包含着一些彼此不能化约的因素，这一点在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中得到了体现；这一路易·阿尔蒂塞式的结构明显表现在建构这一学说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虽然这些因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或者在理论结构中消失，它们在结构统一体中保持着相互矛盾的关系。这一结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造成的，这一结构也正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按照本文的理解，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是决定因素；它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种因素，这一结构的建构有多种来源。毛的马克思主义依赖于建构它的不同因素所提供的不同的视野而表现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耦合中，那些不同的视野要服从于对其结构复杂性所作的综合性分析。

毛的马克思主义就其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仍然是普遍性（全球性）的，因为在其规范的理论表述中，它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是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派生出来的。这一新的文本结构虽然在理论阐述方面带有分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但是在其它方面，无论是其政治宣言还是其理论概念都不足以把毛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分别。毛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社会革命”，其中心内容就是阶级关系的改造。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也有全球意义，因为无论其起源还是其展开都是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所培育出来的这一话语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毛的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所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相比，很难说毛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更少。毛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改造世界的观念，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反思中国社会，并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想来重塑它所反思的中国社会。毛甚至能把中国称作为一张“白纸”，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它上面描绘自己的图画！

然而在这一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毛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从第三世界的视野出发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全部历史中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引自竹内实：《毛泽东集》（10卷本）第6卷第163—263页。

对路易·阿尔蒂塞关于思想的结构效能及启示的讨论，参阅：费德瑞克·詹姆森《政治的无意识：作为社会符号艺术的叙述》，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8页。

关于毛的全球关系的杰出讨论，见：R.瑞申达《毛的马克思主义》，载R.梅利班达、J.塞维编《社会主义者名册》，伦敦，1971年版第53—80页。也可参阅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困境：毛泽东、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新阐述》，载《近代中国》第9卷第2期（1983年4月）第182—211页。

都表现为中国民族纲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为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地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在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无法和摆脱帝国主义霸权而获得解放的斗争分离开来。这一特点迫使我们修正毛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民族解放的使命使得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这一理论假设出现了问题（必然性的分离）；也是因为毛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承担这样的义务（这种义务和从资本主义欧洲起源的那个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即：建立国家以便使中华民族能够生存（这最终还将面临建构一个“市民社会”的问题），发展经济以抵御帝国主义霸权（发展经济不仅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创立基础），此外还要进行文化重建。这些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共同享有的义务，对于这些社会中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展开有着意义深远的效果。毛对这类义务的普遍性非常清楚，他显然是从第三世界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最后，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它是被一个中国人用中国的本土语言说出来的，这个中国人通过马克思主义表达了他对本地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关心。从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异国观念；而且从社会主义对普遍性的主张来看，它还是一种霸权观念。因此用中国的本土语言来重新表述它，把它吸收到中国人的日常意识或“心态结构”中未就很迫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主义的普遍化语言中有中国的声音。这里包含的内容还不仅限于引导第三世界把社会主义吸收到它的民族纲领中去。毛所进行的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声。如果说第三世界把社会主义吸收到其民族纲领中去具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那么，上述的又一个方面则明显有着社会文化意义。它企图通过赋予社会主义语言以来自中国特有历史经验的术语和风格来使社会主义通俗化。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在毛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它不仅表现在毛正式号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当中，而且更加令人信服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当中，毛运用这一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中国的听众，在这一语言中中国过去和当前的历史都被当作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沟通的媒介。在革命的年代里，这些听众就是中国农村的农民。这一点需要予以重视，它意味着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成功地协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特殊主义之间相互矛盾的

“心态结构”（Guoqing）这一概念见于 R.威廉姆斯《马克思与文学作品》，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28—135 页。这一术语对讨论“中国化”问题特别适宜。作者不仅把它视为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中国人所说的“氛围”与

施拉姆已认识到了毛的马克思主义中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参阅：《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13 页。尼克·奈特对毛的哲学本文的逐字分析，谨慎地提出甚至在《矛盾论》这样的抽象文章中，毛也经常使用源于本土的语汇。见《毛泽东的 矛盾论 和 实践论 ：解放前的版本》，载《中国季刊》第 84 号（1980 年 12 月）第 641—668 页、658—659 页。关于毛用中国成语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最有趣的讨论，可见《毛泽东八篇哲学著作成语典故人物简要注释》，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要求，在这方面革命“风格”。它通常被用于从“民族境遇”到“民族情趣”这样宽泛的意义范围。马克思主义是否与中国人的“心态结构”相一致，是这一时期人们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过程本身就表现为一个沟通全球理想和地方理想的过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成功地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结合在一起而言，本身也成了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相互抗衡。它们的抗衡本身是中国现代性的直接产物，在革命党人那里，这场抗衡带来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并让中国主动地出现在有关现代性的全球话语之中。毛于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里面既有自豪之情又有悲怆之感。

伟大的试验家

“矛盾”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即使不是唯一的关键词汇），它不仅出现在毛的两篇论文的标题之中，这两篇论文（连同另外两篇）被毛的信奉者们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矛盾”一词在毛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并在认识论上被作为理解世界的关键。

毛在上述论文（1937年的一个发言）中对“矛盾”的详尽阐述不仅是他制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对于理解毛的思想本身的矛盾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毛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而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把矛盾当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作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的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的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它们趋向未来——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来的未来；这样做的前提是，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明解决矛盾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其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效果则是破坏性的。

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处在不停息的、无止尽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在这个世界上，统一只能从其要素之间的矛盾性上来理解，没有一个实体是不变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矛盾而存在，也不可能在一个与其它矛盾不发生关系的地方存在。也许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以冲突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理论分析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多么不同的方式来建构冲突或编织社会结构，冲突这一概念都是在一些有限的范畴（生产、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内加以理解的，并且总是迫切地根据这些范畴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大小把它们列成等级。毛对矛盾的大量分析同这种排列的划分是对立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反对把矛盾归结为一些有限的范畴。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曾企图把矛盾归纳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描述中去；但是最终，由于他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产生了是否有可能进行这种归纳的问题，即使在既定的共产主义历史目标之下也不例外。

这一矛盾概念并不是毛的发明，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许多来源，其中包括本土的和外国的来源；但是毛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含义，改造了以往的含义，使之能够用于说明中国的经验（借助于现代性）；这一点在毛讨论矛盾时所运用的语言技巧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毛看来，中国近代史表明并标志

这两篇文章是《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参阅：H.莱维那《辩证法中的对话》，伦敦，1984年版第317—347页。

着“矛盾”这一抽象事物的具体展开。矛盾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因为矛盾不是中性的分析工具），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因为只有当解释结构同社会历史现实达到一致性时，矛盾作为认识论才会有效。我在前面曾指出，通过努力把一些相互矛盾的需要调和起来，“具体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这一解读有明显的结构）；但是反过来，“具体化”又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它所包含的不同要素不能相互化约。在此我认为，毛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概念，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他阐明中国的历史处境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从结构上说，矛盾概念的核心内容是由其不同阶段的矛盾性，以及将这种矛盾性表述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在结构上加以界定的。在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民族革命要求和社会革命要求之间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候，一场事先并没有理论准备的革命实践就遇到了更深刻的问题：一场在农业社会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借助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说明的社会构成成份来发动。在这个社会中，革命家们站在社会处境的外围（因而在他们与社会处境之间也有矛盾），为了不引起群众的反对、使自己免遭危险，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运用策略去对待大众；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马上把他们遇到的多重社会冲突转化成相应的理论范畴，而是不得不把这些冲突看成社会处境的不可化约的特征，然后用理论来描述这一处境。除了在民族斗争的层次上表述中国的现代性之外，正是中国的社会处境要求人们从大量的社会矛盾出发来重新构造理论，这些矛盾正是革命在实践层面上所遇到的。

用“矛盾”来取代对生产方式的单线条分析所产生的明显问题是，它使得未来无法从理论上加以预见；或者说，它指出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从矛盾的眼光看问题，“客观实在”不再是客观的，而是变成了解释和建构的对象。革命实践也许会将某一直线型方向从外部强加给这一处境，但是在毛看来，革命实践本身是允许进行各种解释的，因为成功的解释必须在其结构中把革命实践环境中的矛盾表述出来。为了实现作为革命蓝图而制定的革命理想目标，必须有意识地运用必要的压制手段来解决矛盾。毛在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时，为了维持自己对矛盾的解释、反对对矛盾的其它解释，曾多次重复这样做过。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把革命实践理解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并把它们带到政治层面上来，这就混淆了寻求矛盾和解决矛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革命目的（革命蓝图）和革命过程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他的革命理想使得革命本身乌托邦化了。

毛的革命实践后来表现为一场带有矛盾的试验，在理解中国社会的矛盾及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中，它也是一条“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这场试验不仅并不是真正开放的，而且同时也并没有完全为其未来蓝图所束缚；因为矛盾的逻辑可以取消任何预先确定的走向未来之路，并假定革命的理想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来。

毛进行革命试验的语言渗透在他的文字之中。下述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其中一个例子揭示了他的理论的形而上假定，另一个是毛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实践例子：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有限……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不变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

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钢）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出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子，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好的因素，乱子不怕，.....

不管在这些表述中毛把什么个人因素掺进了世界观的形式中，他的思想矛盾以及他在革命实践中寻求矛盾的行为，都和中国现代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后者的表达，也许应该说是最明显的表达。毛的马克思主义在鼎盛时期曾热衷于使自己具有通俗性。因为，毛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内外的许多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许多人的关注重点产生了共鸣。但是它后来之所以失去了人们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在取得自己试图取得的东西方面太成功了。它继续绞尽脑汁地坚持一种新的现代性，以克服那些由现代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

相比之下，毛是中国现代主义的悲剧象征。毛能在千百万中国人（和其他人）当中激发起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能超越过去和现在而创造一个新的现代，其结果反而只是回到并使人们承受了最深刻、最富有悲剧性的现代性的矛盾。毛比歌德小说里的人物更加具有浮士德精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他似乎并不在意他的革命试验会使现存的人们付出的代价，那些坚定地追求革命理想的人们最终成了毛的试验对象。

毛的经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悲剧性的。毛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所发动的破坏运动损失太大，以至于彻底动摇了一种革命理想（毛的学说也许是对这一理想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表述），又由此动摇了克服现代性的可能性。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的方面，文化大革命后来看来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最近 20 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显示，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性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

邓正来译自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 5 期，1993 年 11 月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纽约，1974 年版第 96—124 页。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纽约，1974 年版第 110 页、112—120 页。

[附] 延安道路*

[美] 马克·塞尔登

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1936年，也就是整风运动的前6年，共产党为了推进全国范围内的抗日运动，并在根据地实行一种坚强有力而又有节制的改革纲领，极为慎重地限制了土地革命。如果说，为了团结的利益，反对地主阶级斗争的革命色彩减弱了，那么，共产党的纲领对处于分散的战争环境中乡村社会组织却是影响深远的。在游击区，打破了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在日本人时常骚扰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和它产生的新制度之所以富有成效，是依靠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参与和积极支持。根据地政府通过提供军事保障、减租减息与建立一种公平的税收标准，有力地反映了贫困农民的基本需要。农民第一次自豪地把这些新的政权机构称之为“我们的政府”，而再

（*本文作者马克·塞尔登是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其著作《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72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界具有较大影响。虽然该书并非直接讨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但却对毛泽东延安时期理论创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具有辅助性作用。这里选译该书第六章，供读者参考。——编者不感到它是疏远和威胁的了。当此同时，通过宣传抗日民族主义和调整政治和经济政策，更促进了上层人士参加根据地政府。

1937至1940年，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30年代后期，游击区遍布华北，对日本在东亚的野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恰恰是这种纲领的成功，逐步损害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共产党力量迅速的扩张加剧了同国民党的尖锐冲突，这实际上终止了两党的合作。此外，到1941年，日本已经把主要的进攻方向从国民党人转移到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的封锁。这样，边区也同游击区一样，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财政上的威胁。

40年代初，这种运动处在非常紧张的形势之中，新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便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如果说，旧社会的上层显贵最露骨的剥削方式已经被消灭了，那么，这些偏僻的边区乡村生活的实质性方面，仍然同从前一样明显存在着。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以前的土地革命使许多农民从毫无希望的贫困状况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场运动面对着一种挑战，它必须创造出一些制度，不断地打破乡村生活的沉闷和停滞的气氛。可以肯定，这对于受压迫的农民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权和确立平均主义秩序，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行动。然而，这也是持久地保持革命热忱建设新社会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到1941年提出旧的上层人物能否再度支配乡村，甚至提出土地革命期间和其后涌现的领袖人物能否巩固现行的革命秩序，都不能说是不现实的问题。在地主的权力从未被土地革命彻底粉碎过的后方区域，地主士绅们惹的麻烦，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1938年后期，统一战线开始破裂时，共产党召开一系列最高级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1941年根据地遭受封锁，这些问题变得极为尖锐。在整风运动中，制定了许多新政策对付这些挑战，还在各地准备了干部来贯彻这些政

策。这些政策的实质是重申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近来经常得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现在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由破坏引向建设，由比如摧毁地主的秩序或消灭敌军，引向建设一个新社会。中心的问题是恢复和改造经济。所有其它政策的成功和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之关键是使停滞的农村经济获得发展。从 1942 年起，这个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村一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改进经济生活。这个运动在华北和华中每一块根据地很快发展起来。

整风运动中，通过党和政府在各根据地同时采取的一系列重大的方针，这一政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贯彻。作为一种完整的纲领，延安道路表现为一种通向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与人民战争的独特模式。它的显著特征是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创造力，相信人定胜天，最终会战胜贫困与剥削。它断然否定了由行政或技术上的显耀人物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进行统治，而强调民众参政、权力分散和社区政权。延安道路的基本方针，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理解，即认为人，所有的人都能够超越阶级、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创造性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活动。在详尽地分析这些运动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可以简明地考察一下它们的大致轮廓：

1. 精兵简政运动意在裁减部队特别是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和职员。这场运动限制了政府官僚机关的自主权力。地方行政官员像党那样同样享有新的广泛的权力。政府工作的重心从边区和县级的事务转移到村镇一级。简政的目的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权力从高高在上的官僚手中转给地方上的各种民主团体并倡导一种适于人民战争的大众化的领导作风。

2. “下乡”运动促使许多外地干部或“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去，使他们走上数百个分散孤立的民众组织的领导岗位。这场运动第一次使大量的干部直接在田野和工厂里进行劳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有教养的上层人物和乡村里冥顽未开的群众以及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障碍。

3. 减租减息运动唤醒了那些没有或很少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反对地主的政权和压迫的斗争中，积极活动的农民领袖涌现出来，成为建设农村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先锋，再次证明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可能性。

4. 以传统的互助形式为基础的合作运动，是共产党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努力。牢牢地植根于农村经济生活的合作原则，不仅对于农业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实质部分即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的取向，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5. 生产运动为边区经济提供了种种新的途径。其中之一是“组织经济”，它要求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干部都分担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从经营新式工业到集体耕耘属于当地党支部的菜园。干部参加劳动的目的是增加生产、减少税务负担、提供管理经验。也指望它能激励人们对体力劳动采取积极态度，以打破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隔阂。另外一种途径集中表现为“劳动英雄运动”，这场运动试图克服历来对体力劳动的蔑视，鼓舞和奖励那些在农田和工厂里的默默无闻的干活的人们，激励他们焕发创造性的活力。这些劳动英雄不仅被看作是他那个单位的模范，他们还要接受专门的培训，去领导实现向合作式的农业经济转变和完成其它的社会活动计划。

6. 普及教育运动扩大了教育范围，并修正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普及了文化，把新的观念传播到偏僻遥远的农村。在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变革中，这种新式教育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这些纲领有许多是新的，另一些在江西时就搞过或是在抗日根据地中产生的。这些纲领被高度地概括在领导这一概念中。其中发动群众作为党的基本方针被看作是最高的原则，用以指导战争、革命、政治和经济。在抗日根据地为了活下来而展开的斗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是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党与技术专家组成的合理化的官僚机构，也不足以打破乡村的贫穷与压迫的锁链。来自上面的革命决不能带领农民大众进入现代社会。农村变革的原动力只能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内部的革命力量中产生出来。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方针，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人物论者，主张一种合理化的等级制和集权制的组织，另一种（民粹主义者）则强调依靠由觉悟高的农民迸发出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发动群众怎样在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中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但是直到1942年，发动群众的方针才第一次在根据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的关键因素。1943年，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说：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

在陕甘宁和其它后方地区，整风时期的许多政策为独特的中国道路的产生提供了基础。1943年，战争与革命中发动群众的领导作风，作为群众路线而提高到理论的水平。如果要追溯它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并估价其意义，我们必须从1942年的许多政策改革谈起。

精兵简政运动

1941年，国民党加紧了封锁，中央政府停发津贴，边区随之发生了经济和财政上的危机，它直接导致了精兵简政运动。边区庞大的行政机构缺少供应与资金，这种物质上的困难，要求在各种机构特别是政府中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运动。这些问题在那些直接遭到日本人扫荡的敌后根据地更为严重。

在非党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建议下，十分谨慎地开展了一个调查政府行政效率的运动。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成为以后两年大规模调整政府组织的领导机构。运动初期，改组行政机构有两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是缩减行政组织的规模与费用，提高行政效率，特别要通过精简组织机构削减县与边区行政机关的干部。第二，为了加强政府的基层，特别是区与乡政权，在开展“下乡”运动的同时，从高级行政机关调动干部（主要是外地知识分子），输送到这些基层政权中去。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二个目标变得越来越显著。而另一个目的则是通过协调党、地方行政官员和置于各行政部门之上的一些综合性的委员会的功能来限制独立的行政机关的权力来实现的。总之，可以说精简政府机构是为了加强基层领导和进一步发动群众而广泛开展的打击顽固的官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按照1941年12月的设想，政府、党、自卫队与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精减指标是从7900人减至6300人，即减少20%，边区政府的官员首当其冲。它的“千余干部”要减少三分之一。分区、县和区一级的4021名干部必须减

至 3396 名，即减少 625 人（大约 15%）。部队计划进行有限的裁减。有 500 名警卫队队员复员去工厂干活。1000 名自卫军领导人作为正式的专职干部，继续保留在岗位上，但取消了薪水，重新靠农业劳动维持生活。最后，1100 名群众组织干部必须减至 600 人，即差不多减了半数。被裁减的那些人直接地转到另外一些岗位上，在重新分配之前进了学校，或到工厂、农村去干活。

精简干部最初是为了提高效率，消除政府机构的臃肿，改变受过专门训练的干部都集中在上层的局面。行政机构由于边区和地区的许多部门合并在一起而得到加强。精简下来的许多干部被派去发展和加强区、村下级政权。这样，就把新的领导和行政技能输送到基层，也使干部熟悉了农村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有一位专职书记，过去是个学生，后来成了行政干部，就被派去协助乡政府领导人进行基层行政工作。在许多情况下，一些书记被派到区政府工作，这是由于这些地方的政府在文化和行政效率方面水平都很低。

地方干部，比如乡、区一级的领导，大多是自土地革命起就忠于共产党的没文化的农民革命者，所以，这些书记就承担了这样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他要与上级机关保持联系，另一方面要培训地方的行政干部，以便后者很快接替他们。外地干部给一些偏僻的村落带来了新观念，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强调的那些观念。此外，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党的事业进一步联系起来，并由于摆脱了地方上人事关系而无拘无束。过去的那些行政干部现在被号召去作农村组织的领导人，接着也就委派他们在那里工作。

这些就是 1942 年初在边区进行的第一次精兵简政运动中贯彻的主要目标。完成最初的定额完成情况，没有一份综合性的资料是可靠的。但 4 月开始的第二次精兵简政战役使这一运动更加深入了。1942 年全年有越来越多的干部到基层去工作。比如，5 月份有 200 名边区机关的干部转到乡、区一级，80% 在区里，20% 在乡里工作。在第二次战役中，许多受过较高级专门教育的干部被派去提高下层行政管理水平。他们把变革农村生活当作最重要的工作，这样，他们新的工作就对边区的行政机关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同时，许多地方干部从地区和乡返回到他们的村子担任非专职的领导工作。例如，银川的八个区，共有 38 名干部，裁减了 17 名，其中 11 名返回原地，自谋生计，四名成为乡负责人，两名被派到延安培训。同时，到 1942 年夏天，许多地区努力实现了每一个乡配备一个书记，其它地方在继续配备。一般说来，这些变化不是均衡的。的确，他们经常造成紧张局面。这些新人不仅对于当地人和普遍的关系网、宗法网说来是“外来户”，而且他们发现在知识和行政经验方面他们也是准备不足的。另外，他们的到来常常挤掉了当地干部的位置。在下面要谈到的“下乡”运动中，党提出要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

1942 年 12 月，第二次精兵简政战役结束了。许多干部和学生下去了。然而，大幅度地削减政府开支的目标仍难以达到。1943 年初，发动了精兵简政的第三次战役。林伯渠在报告中说：在政府各级部门和直属机关工作的有 8200 名干部。这实际上超过了 1941 年 12 月简政结束时留用的大约 7900 人！此外，政府还供养着 3300 名中学生，军事学校还不算在内。如果计人全部受供养者（八路军除外），有 22500 人要公共开支维持生活。林伯渠重申，要减少干部，将中等学校的入学人数由 11500 减至 7500 人，即减少三分之一左右。同时，他强调，要提高领导质量，特别是要派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1944 年 1 月，当第三次精兵简政战役结束时，边区政府各种直属机关从 35 个减至 22 个；边区的各级行政部门通过合并减少了四分之一，分区和县的行

政部门则由八九个减至四五个。

行政改革的重要意义既不在于大幅度地削减了预算，也不在于大量裁减了“过剩”的官僚。减少吃公粮的干部数量的努力，作为长期问题，显然并没有完结。至少，最后的统计数字尚未公布。毋宁说，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导致了政府的观念、成分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层尤其是分级的管理机构大大加强了。外来干部，富有经验的行政官员或学生，由于不受本地各种关系的束缚而易于推进农村社会的改造，他们对来自上级的指示也比较敏感。过去在土地革命期间表现出领导才能但缺乏行政技能和经验的地方干部返回了家乡。其中许多人不久在 1943 年的生产运动中承担非专职的领导人。这些变化为广泛解决农村生活的问题准备了条件，而这些问题则常常是由于党和政府未能有力地依靠当地居民的积极参加而造成的。

垂直领导和双重作用

在简政的过程中，政府各行政部门的独立权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由于县级行政领导和各种管理委员会行使广泛的协调一致的权力，上述变化就增强了对个别部门的控制，也增进了党对政府各方面的影响。结果使政府更加接近人民并提高了政府对地方种种要求的反应。

从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最近几年开始以及在 1937 年以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政府的决策权集中在边区行政机关手中，而行政事务则集中在它的地区一级。由于工作主要由外地知识分子承担，所以这些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起强有力的分支机构和从边区直至下层的垂直系统。简言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传统的结构要素被引入根据地的行政机构中。1942 年以前，像财政、教育、建筑和民政部门，由于对稳定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专门知识的实际垄断，这些部门在行使其特殊职能中享有范围广泛的自主性，这就是垂直的统治。例如，边区政府的教育部门拟定教育政策。教育部门的指令直接下达到每个地区的教育局甚至更下层的教育机构或学校。在这样一种垂直的组织中，这个部门以外的党或政府的干部几乎不能约束这种部门的自主权。特别是，无论行政官员还是党都无法对地区行政部门施加有效的影响，因为行政部门的干部基本上效忠于边区本部门的上司。这种体制在各个部门内部建立了一个关于责任与控制的明确的链条，并把权力集中在延安。

地区各单位和它的下级部门的工作配合，对当地情况变化和突然事变的敏锐把握，由于权力集中在边区一级而变得极端困难。统一政府行政机关的代价是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僵化，这恰恰是同发动群众的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分权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政府的各项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交给一些专家完成，这使人联想起封建帝国的官僚政治，而与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的政治作风不相干。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是使国家实力如学校与工业集中在边区和地区的行政中心，因而在那里，行政效率和控制都得到最大的增强。这样，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和乡村都还没有或很少能提供新观念和引起社会与经济变化的学校和国营工业。

精兵简政运动冲击了并从根本上纠正了这些常规。双重领导体制取代垂直领导体制而成为主要的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广泛协调功能的党和政府官员领导重要性增加了。1943 年，在为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决议即《论领导方法》中，毛泽东以措词严密而又颇费修琢的手法就如何贯彻双重领导体制作了权威性的说明。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

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这里阐明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融为一体的发动群众的政治概念,对行政机构中僵化与官僚化的倾向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它所强调的是基于广泛的动员群众的战斗作风。依据这个方针,民众和干部齐心合力就会专心致志去解决那些紧迫而又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由行政专家们造成的对权力的垄断和过分的专门化被巧妙地排除了。在那些持久抗战的前线根据地,它是在乡村和城镇迅速地进行军事和政治动员的游击战的基本方针。而在遭受围困却仍安全可靠的陕甘宁边区,则把同样的原则用来改造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

在边区,新政策的直接影响在某一等级隶属于边区政府的各行政管理部门和植根于农村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1942年一开始,双重领导下的部门负责人就不再单独或主要地向他的边区部门内的顶头上司负责,但必须经常向县政府的同级委员会与地方官员汇报工作。此外,指挥系统也改变了,下达给地区行政部门的指令变换了渠道。例如,地区教育部门不再直接地从它的上级教育部门领导那里接受指令。这些指令在交给地区教育部门之前,先传达给由地方官员领导的地区事务委员会。同样,从地区教育部门下达给它所属的下级机构或学校的绝大多数指令及上报边区部门,都必须再通过这个管理委员会。政府的垂直领导模式与双重领导模式在形式上的不同可用下面两个图表说明:

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联系的渠道和责任

垂直领导

边区教育部



地区教育局



独立的地区学校

边区建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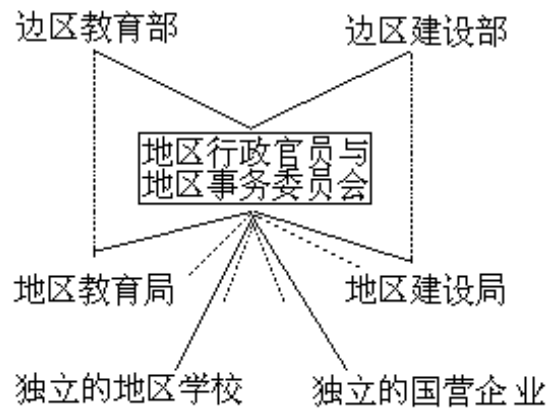


地区建设局



独立的国营企业

双重领导



——实线表示行政部门上下联系渠道

.....虚线表示行政部门负责的范围

地方行政官员总是试图协调与控制在他那个地区内的行政机构的工作，但他的权力受到这样的限制，即各级官吏均由延安的相应的上级领导任命并对后者负责。双重领导使权力重心从制订各种政策的边区机关转向执行政策的下级部门。双重领导使地区事务委员会和地方行政官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从高级行政部门往返的指令与信息，必须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由各部门传到下属机关的信息真实可靠。这是使地方主要官员掌握地区政府工作的第一步。其结果是增加了对处理本地紧迫问题的灵活性与敏感度，更多地依靠大众以反对官僚体制。此外，双重领导使当地干部恢复了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土地革命中很积极，在 1937 年以后被外来的行政干部削弱了权力。

同时，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还采取了另一些相应的措施。地区行政官员增加了人事方面的权力。虽然县委书记、各行政部门主任、地区自卫部队首长的任命仍属边区政府的权力，但从此以后，他们的所有下级职员雇用与调动均由地方官员自己掌管。地方官员的地位由于配备了两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干部作为一般事务的书记或专管政治事务的书记而得以加强。由于许多地方官员没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这加重了他们有效地处理地区内的行政机构的责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控制新书记们的活动。简言之，地方官员在加重权力的同时，也努力保证政府同高级机关的联系。

保证双重领导的另外一个步骤是创造一种体制，以保证边区与地区委员会具有协调各级行政机构政策的很大权力。地区事务委员会从原则上说每星期要在地方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制定范围广泛的行政措施。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行政部门、法院、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也包括党与军队的代表。这些委员会对本地情况与重要事务有切实的了解，并在各独立部门和群众动员的各种组织工作方面进行协调。

地方官员权力的增加与政务会议的建立从根本上削弱了行政机关的自主权。而且在各行政部门内，高度集中于边区一级的权力现在转移到地区。由于地区一级协调能力的加强，就使在延安垄断各部门内的决策权变得不可能。在行政部门和各部门间会议上，当场作出的重大决定日益增多。这样，行政机关同各部门的负责人相比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但它们受地方上更大的控制与干预。

双重领导体制下的地区行政机关的官员的任务比只是把从上面来的例行

政策传达要繁重得多。他必须更改与适应政策。首先要把这些政策在地区事务委员会提出讨论并说明。这恰恰和党在整风时期通过小范围的批评以求促进广泛讨论和团结队伍具有一样的性质。全面掌握本地情况并有能力协调各种不同政策的干部很受重视。这些品质对于地方官员有效地行使职责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官员在他不断扩大的职责范围内，通过动员各部门的干部和群众参加斗争以求在关键性的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当然是同早期行政过程强调集中化与专门技能大相径庭的。地方干部权力的增加，则日益强调发动群众政策的直接结果。

与垂直领导向双重领导的转移相伴而来的是党特别是地区和下级权力的增长。这使人回想起 1942 年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加强“统一领导”，即协调党的各种权力。行政自主权的减少，意味着党不断加强政府对政府的领导。

由于党员控制着政府各机构、军队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位置，同时又是它们的普通成员，所以党远比政治事务委员会更明显地适于协调各种活动与实现对政府与军队的统一领导。1942 年，新的指导方针使党在所有根据地具有下面的权力：

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指导……

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

在地区的政治与行政工作中，双重领导的重心是协调政策，而不是由党剥夺政府的日常行政任务或权力。共产党员继续参预有党外人士特别是有行政技能的非党人士的政府。但是，在 1942 年及其后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党和地区事务委员会一起，不断加强对全体干部和人民的统一领导。在论述这些运动和它们所体现的领导概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由于新的领导介入的结果，在边区的农村政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下乡”运动

由于边区政府与地区政府按照双重领导的体制加以调整，村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为了弄明白 1941 年以后农村生活变化的范围，我们必须简要地提一下 1935 年至 1936 年边区许多地方进行土地革命造成的有关后果。这种革命逐步瓦解或摧毁了地主显贵的权势基础，主要从贫农青年中造就了一批激进的新领导者。在土地革命结束并建立统一战线的政府以后，这些农民干部中的许多人继续支配着地方政权和党的组织。但第二次统一战线允许并确实鼓励在土地革命中逃走的以前的地主显贵分子返归故里。1937 年以后，有许多地主和过去的地主惹人注目地在政府中供职，有一些地主还加入了共产党。尤其在那些党组织薄弱的村落和土地革命从未发生过的地方，地主显贵常常保持了或恢复了对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

直到 1941 年，不但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而且那些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的新地区，大多由农民革命者与过去的要人们分享地方政权。除了对农民进行定期的政治动员以外，1937 年以后，官员们强调统一与稳定，允许许多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不断恢复到革命前的状态。一些外来的工作队偶尔住进农村。但是，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征兵，他们的暂时停留就不会给农

村带来什么变动。一旦和平恢复和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的农耕事务，地方行政工作与战备工作，就没有任何办法保持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在1941年的危急状态下，党的领袖们日益意识到这样不能打破农村社会的封闭局面与经济停滞。大体上可用这个事实说明原因，革命后的农村经济几乎是没有触动过的，即使在许多由于土地革命而使租佃现象大量减少的地区，“封建的”农业技术与生产方法依然占着优势，地主压迫（特别在那些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种种形式继续保持着。1937年以后，个体家庭经营的农业方式没有受到任何挑战。除了由当地煞费苦心选出的组织机构和乡村政府、某些群众性的政治军事组织及当地党的组织之外，农民生活的许多基本方面一仍其旧。缺乏的是一种能够带来一些根本性变化的活力，既能超越土地革命的平均主义要求，又能促进与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调整农村政策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更有效的地方领导，以开辟新的生产方向和社会活动的目标。重新把注意力贯注于地方政治的最早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并作为后来激发延安时代中国青年的民粹主义精神的象征，是“下乡”运动。1941年7月，“下乡”非正式地开始了。有报道说，这时一些干部和学生到农村去帮助秋收。干部在农忙季节下乡帮忙，这作为下乡运动的一个方面，在后来的年代坚持下来。但不久就产生了意义更为深远的内容。使用“非生产性的劳动”以克服临时的劳动力短缺这样一个实用性的和短期的目标为一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新观念所代替。这种新的观念是在外地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农民和当地干部的接触中产生的。

下乡的第二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与整风运动相关，发生于1942年春天。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延安学习，为下乡作准备，效果显著，因为没有事先树立新的目标，采取新的态度，知识分子就会同农民疏远并与农村生活脱离联系。这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农业的和其它的生产性劳动。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下乡的主要任务是当教师或协助地方党组织与政府工作。一个典型事例是，178名中学生离开延安到遥远的农村去创办冬季学校和教书。目的是通过知识分子与农民一起共事来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无知与偏见，缩小城镇与边远乡村的差距，铲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障碍。在农村简陋的条件下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将不但直接地体验农民生活的艰难，了解他们的问题，而且还会经历农村里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他们还给与世隔绝的农村带来新的技术与观念。“下乡”运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答案：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最有才干和能力的年轻人愿意把他们的才干与生命用去开发落后的农村区域？还有，如何在他们长大成人的发达城市以外有效地发挥那些才能？

另外，希望画家、作家、音乐家把他们在乡村或前线激发的灵感很快地表现在他们的艺术中，让艺术为抗日与改善农村生活的状况服务。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在一次对党内知识分子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下乡的目的是“使知识分子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知识分子的技能将以一种新的和充满创造性的方式加以运用，因为他们不是到了农村而不是留在边区或地区的首府即行政机关和学校集中的地方。20年前的五四时代，中国革命青年的民粹主义精神表现在他们到人民中传播革命的真理。现在，他们把一种干部和知识分子直接了解农村生活的各种问题，不仅教育农民而且向农民学习的纲领变成了制度。

“下乡”是当时行政机构改革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某

些技术家、作家、学生，而且边区地区机关的干部都被派下去加强当地的政治与行政工作。训练有素的干部下放减轻了农村的闭塞状态，使地方政权与上级更有效地联系起来，许多新的领导观念，尤其是在整风运动期间产生出来的那些观念得到采用。此外，“下乡”有助于提高当地干部与学生的文化水准与基本的行政技能，为他们担负起独立的领导任务作了准备。

对于那些被派去充当生产运动的骨干、克服农村生活的“封建残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教育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说来，“下乡”意味着什么呢？无疑，它对某些人，特别是对于那些日常机关工作的资格老经验多从事机关日常工作的干部来说，它是严厉的处罚或降级，也是对有效的行政工作的冲击。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说来，它显然是振奋士气与激动人心的事情。这从战争唤起的爱国主义和忠实于挽救民族和为大众服务的催人奋起的激情中可以得到理解。整风运动期间，干部与学生，老年与青年，都认识到中国的实质性问题决不能在城市，在行政机关或在学校中解决。不如说，他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去农村，到“生产前线”去，同人民一道向贫穷、压迫与经济停滞开战，在后方根据地则协助开展游击战争。大批从延安奔涌而来的干部和学生，是远征新世界的青年男女奥德赛，在他们的行进途中，就要挽救国家。战时中国青年的精神在下乡运动中不仅给农村的发展和社会改造带来激动人心的革命真理，而且引导青年与人民同甘共苦并向人民学习。

下乡精神是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在下乡过程中，青年们根本背叛了特权的与受过高级教育的阶级，他们不仅对中国问题有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且体验着一种当下献身于他们的崇高决定的激情。世界不属于他们的前辈。青年们的无尽的精力与智慧在为建设新中国开辟道路的游击战争中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对前景的想象显然比详尽拟定的具体步骤更多。青年们所有的是在不断探索的环境中获得的杂然无序但却热情澎湃的创造性。许多人意识到必须立即出发去帮助穷人与受压迫者。他们明白，过去由年长者或官员们所进行的官方或有组织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首先，他们有一种肩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感，有一种去于前所未有的工作的激情。这些令人振奋的体验源于他们所面对着的艰苦生活，他们所承受的战争与贫穷的沉重负担。这个运动建立了一个使青年的反叛精神得以伸展的新渠道。它也提供了一个途径，让青年们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边区贫困不堪的农村里的愚钝和压榨可以也必须扫除。

唯有热情并不能保证成功。当学生与干部、党和国家的精粹人材一同体验和改变农村的生活时，很快产生了磨擦。外来人的基础是薄弱的。在很多情况下，抗拒变革的力量是顽强的。下乡常常加剧农村的权力斗争。农村干部受到那些没有本地关系但忠心耿耿的新干部的威胁，这些新干部没有他们那样土地革命形成的经验。党的领导认为有必要反复重申：外地干部是帮助而不是夺取本地干部的权位。书记们对乡负责人是助手而不是当地政府的上司。最后，一种观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干部中的许多人是在边区以外或延安受过训练与教育的，他们带来一种向许多根深蒂固的农村价值观念挑战的革命与社会思想，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下乡运动力解决根据地农民生活的极难处理的问题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减租运动

战争年代的统一战线政策包括停止重新分配土地作为中共对农民的基本方针。在“十大政策”中，中共把“减租减息”的目标作为战时纲领。然而，

从 1937 年到 1940 年，在陕甘宁与那些新开辟的根据地，都没有作出实行减租的正式努力。这时，除了强有力地保护土地再分配后的革命果实与保证私有土地之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土地政策。地主所有制和与此相联带的剥削问题在边区的大部分区域已基本解决了。而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还几乎没有注意到。无论是 1939 年边区第一次参会的法令和文件，还是 1937 年至 1939 年间党与政府的大量出版物，都没有讨论减租。陕甘宁边区同其它根据地一样，在第二期统一战线的全盛时期很少注意农民经济和农村的社会及政治关系。

1938 年后期，随着统一战线的衰落，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在 1939 年和 1940 年间，国共两党的战斗使绥德的大片土地与陇东的一部分实际上处于边区政府有效管辖之下，有些地方的地主权力仍占有牢固的位置。这些地区的合并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这时国民党的封锁，国共之间的军事磨擦，以及党在全国范围内强化权力，所有这些促使共产党倾向于采取一种更激进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然而，直到党面临由新四军事件引起的危机局势和 1940 年至 1941 年日本扫荡的情况下，减租才被强有力地当作对农民与农村的新方针。

整风运动开始的前三天，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自抗战爆发以来党关于土地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的声明。这就是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议》。这个文件确定的基本指导路线到 1946 年仍然是有效的。它重新估价了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关于租税与新的政治经济的指导路线，并很快在根据地中发展起来。它强调三项基本原则：

(1) 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战争和进行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现农民的人身自由，保证农民的政治、土地和经济权利，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2) 承认大多数地主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还赞成民主改革。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土地、经济的权利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土地及经济的权利……

(3)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时期中国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现时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力量。……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和他们的生产力，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1942 年 1 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同战时初期关于统一战线或土地问题的见解没有明显的抵触。然而，它在两个方面与先前的正式声明不同。第一，它提出了“生产战役”的口号，并使之具有同抗日战争同等重要的地位。生产战役很快成为被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与其它根据地的工作重心；从 1942 年起，它们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农业生产率。用这个任务集中解决农村生活的问题。生产战役成为统一民族抗战和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第二，党在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民族统一的理想五年之后，试图再一次使用地主“封建剥削”这样的阶级语言，强调从根本上支持穷人与受压迫者。

正式的纲领强调：党“不应对地主或农民采取单方面的立场”。然而，当农民积极分子再次进行反抗地主剥削的斗争时，党关于“仅仅帮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完全取消封建剥削”的诺言，常常被忽略了。减租运动经常同税收与其它的财政措施结合在一起，有时则完全消灭了地主大量的财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更强有力的战斗，通过组织农民政权打破地主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

1942年1月“关于土地政策的决议”经常被用来证明党在战时的有节制的土地政策，它同1946年统一战线全部破裂以后的更强硬的土地政策形成对比。然而，从这个政策逐步发展的前后关系看，它的意义在于发动了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并向地主的无上权威提出挑战。这正是强调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五年之后又重新开始的任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向一种更激进的阶级立场迈开了一步，并在1946年全面展开的土地革命中达到顶点。

努力把土地革命的有限形式——减租同提高与改进生产联系起来，表明了党的注意力有了变化并在对农民和经济的政策方面变得老练起来。江西时期的土地革命是基于一种繁荣与平等的梦想，它煽起农民采取暴烈的行动。然而，与土地剧烈变动相伴而来的，是战争的蹂躏所造成的经济的严重破坏，工商企业被剥夺，对没收更多财产的恐惧，农民与商人两方面都难以把握新的经济的基本原则。不管怎样，一种粗陋的平均小农所有制经济确立起来，尽管它可以直接减轻贫困，却不能明显地促进经济发展。1942年政策调整取得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把土地革命（在减租的形式下）召唤出来的活力同农业发展与改变农村社会结合起来。

1942年初，整个边区都进行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普查，这导致了对边区全部土地的登记与重新登记，以查明所有权、面积、生产率和租借关系。这不是例常的簿记工作，其重要性在于发现违背与逃避土地法令的情况。例如，调查人员发现，许多1937年返回边区的地主非法恢复了从前被没收后分给农民的土地财产，或将公共土地据为己有。由于过去土地革命是在混乱与危急状态下进行的，土地常常为其新的占有者不恰当地予以登记。

在1940年和1941年在绥德完成示范性计划之后，党在1942年发动了大约十个地区的减租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绥德和陇东新区域，在那里，地主仍有令人生畏的权威。这个运动明确的目标是减租25%，确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全部收获物的37.5%。作为共产党人的若干战时纲领之一，共产党人谨慎地调整了立法措施，而这很久以来仅存于中央政府的各种书本里，从未加以实施。1942年开展的减租运动注意了节制与阶级合作。然而，到1942年下半年及在1943年秋收以后，减租运动达到高潮，不时有人嘈嘈着要进行暴烈的阶级斗争。在初期阶段，为了争取地主自愿地支援战争，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些著名绅士如富有的绥德地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发表声明，呼吁在减租运动中进行合作。这些声明被广泛地加以宣传。据报导，米脂马姓的地主们在为减租成立的委员会里很活跃。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对地主的压力增加了。地主合作的报道被那些反地主斗争的报道所取代。顽抗的地主，包括米脂县政府的两名负责人均因违反土地法令而遭到起诉、处罚与公开审判。

1942年下半年，运动不断深入。运动的重心变成动员农民协会和其它组织要求并实行减租。为了稳定和团结的利益整整克制了四年，其后就鼓动农民积极分子去发动群众。如果说他们的目标与手段都是很克制的（例如，据

说实际上没有侵犯人身)，那么，这就使人想起在土地革命的初期，所许下的平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诺言。

像土地革命一样，减租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消除农民对地主报复的恐惧。在那些以减租为目标的地区，农民生活在地主权力的阴影中，受着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也未基本改变的关系的束缚，他们在全副武装的地主们的容忍之下种地干活，怎么敢反抗地主呢？办法是创立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领导和力量能够和顽固的地主们对抗。群众大会消除了农民的恐惧，激起农民的战斗精神。当农民协会与地方政府坚决保证佃户权利并严禁地主任意重新占有土地时，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民的恐惧是很有道理的。例如，马姓的某些地主就曾经赶走了那些坚决要求减租的佃户，1940年，马聚堂（译音）的佃户要求把租降到30%，但在把他们赶走的威胁下，最后还是得交纳50%的地租，然而，在1942年后及在1943和1944年开展的独立运动中，更有力也更有战斗性的农民组织取得重大的胜利。1943年，马维新（译音）的佃户大张旗鼓地要求减租，双方于是达成了一项协定。不过，反对马姓地主和其他地主的斗争的事实反复说明，不完全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难以充分解决问题。许多东奔西跑、直言不讳地支持农民协会的农民却也在暗中补交地租。在这种环境下，农民的恐惧与不安全感是慢慢地消失的。

一项减租协议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冲击作用是有意义的，但很明显，它不能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期间发生的驱逐或枪毙地主，使他们威风扫地，彻底摧毁旧制度相提并论。正如威廉·欣顿和弗兰茨·范农的研究所生动揭示的那样，从一种窒息的秩序中迸发出来的自由感本质上是同积极地投身于推翻压迫者的剧烈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而在40年代初期的陕甘宁边区，这种情况是很少见到的。那时，农民的反抗表现为较温和的减租要求，要求限制而不是消灭地主权利。的确，尽管有了减租运动，边区的许多地主，还是通过巧妙利用复杂的出租土地的自由权保持他们的收入。但是，有组织的斗争，以及农民间进行合作的经验，在减租运动的高潮中为许多农民所理解。

减租是同时达到解放农民与发展经济的目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其手段则是发动民众，展开斗争。应该相信，减租能够提高“生产热忱”。获得大半收成的农民一定会更加勤奋地工作以增加收成。而且，较多的收入使农民可以购买较好的农具、种子、肥料，或许还有耕畜，从而进一步增加生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充满生气的群众运动中崛起的农民们将十分热情地对后面将会介绍的合作运动作出响应。

只要地主和对地主的恐惧依然存在，强制地减少租金总额的窘况就会继续使农民组织者苦恼。然而，自1942年以后，每年发动的成功的运动逐渐地瓦解着地主的权力。而且这是在没有先前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的情况下完成的。此外，减租使佃农放下了心理上与经济上的重负，并提供了一种创建集体组织的有效方法，充当减租先锋的农民协会后来在通过生产竞赛与合作运动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生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合作运动

1942年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出重新决定，着手从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调整农村生活。其核心是用新的办法解决农村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在此之前，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以改变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尝试，对家庭小农业体制没有多大影响。陕甘宁土地革命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

结果就是加强了自发的家庭农业模式，削弱了合作劳动的传统习惯。例如，直到 1940 年，延安和安塞两地从事互助生产的人数才达到土地革命前的水平。

共产党在 1942 年向边区农村的闭塞、贫困和压迫发起了正面进攻。行政改革和减租运动为组织农民大规模参加互助组这一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扫清了道路。互助生产将彻底改革和促进农业经济，同时也将构成社会、政治生活新方式的中心内容。土地革命和减租被视为改造农村社会的最初运动。但是二者既不能保证人民群众不断地参加，也不能保证持久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互助生产对社会发展给予不断的重视。正如 1943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

早在 1943 年合作社运动之前；共产党就已关心经济，努力组织发展经济。十几年前，在江西苏维埃就有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长征的首批部队到达陕北的几个星期后，就建立了同样类型的合作社。可是，1943 年前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几乎全是上级组织的，并由党和政府干部加以领导。在这种发展中，农民无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作用。因而，农民不把合作社看作自己的组织，仅仅看成是政府的机构。1942 年末，毛泽东叙述了早期合作社常用的组织办法。

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各地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派而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着公营性质的，多成为县、区政府的公营商店。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三九年后，提出了“合作社群众化”的口号；但各地仍多用旧方式在群众中扩大摊派的股金，来推行其所谓“群众化”。因此，合作社仍被群众认为是摊派负担，而不被认为是群众自己的。合作社的人员，仍然是和公务人员一样，要群众优工代耕，群众看不到合作社对自己有多大利益，反而增加了群众的劳力负担。

除了某些例外，这些最早组织的合作社对边区的经济生活影响甚微。合作社主要关心做生意，对农业生产没有一点帮助。到 1940 年，共产党认识到这个运动的失败，除了少数办得好的运输和消费合作社，实际上取消了所有当时存在的合作组织。其中幸存下来，并日益兴旺的模范合作社之一是延安南区合作社，1943 年以来，该社被多次作为这一运动发展的榜样。

南区合作社的创办和曲折发展过程说明了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情况。虽然南区合作社经常作为学习的榜样，但在历史上，它既有显著的成绩，也有明显的失败。该社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即在运输、消费、农业和工业生产等方面起着综合作用。由于不断地向新的经济部门扩充，合作社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到 1943 年为止，拥有 4000 多户股东的南区合作社，资金达 600 万元；不仅如此，根据它的官营盐业和政府提供的运输来估算，它还有“投资运输业的 1800 万元”。合作社成为整个延安县经济上的主要力量，在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起着关键作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包括买卖消费品、贮藏粮食，还经营饭馆、织布厂以及发放贷款。

“南区”的一些特点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它会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典型和范例。它在柳林的中心，地处连接绥德、延安和西安的公路上，这条公路是边区的主要贸易干线和唯一的公路。柳林离延安很近、在政治上得天独厚，便于干部视察。这儿早就成了来自人口稠密的绥德的移民和从边区外来的难民的定居中心。合作社帮助了这些人，他们也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

南区合作社越办越红火，根据需求和机会，合作社向新的常常是毫无联系的行业扩展，合作社内的分社和组织的联系和再联合，这些都是现代中国商业经营的特点。弗朗丝·舒尔曼很贴切地把这种结构描述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模式，即根据各个部门相当的自主性分散经营，这与福特汽车公司（还有苏联的）技术一体化集中控制的工业形成对照。但是，和通用汽车公司不一样，南区合作社主要不是靠合并已有的公司发展起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社是白手起家创办新行业，以适合社会或行政的服务需要。

虽然南区合作社最后被当作“民办”的例子受到赞扬，但是它一开始却是“官办”合作社。它的目的与政府的目的常常是分不开的。最初的财力和管理大部分是由县、区、乡政府提供的。

南区合作社“三十里铺”的历史是合作社早期发展的例证。1938年冬，区政府投资2000元建立了这个店铺。其目的是同一乡和七乡间的唯利是图的商人作贸易竞争。但是，不到九个月，该店就被迫关闭，政府方面作的解释是，由于负责干部没有能力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和群众的不满意，从而导致了店铺的倒闭。1939年11月区政府负责人鼓励群众投资，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了合作社分社。简述一下其方法是有趣的：“起初，他利用私人关系，请当地的一个商人万标流（音译）负责筹集私人资金”，其结果是由政府和商人合资经营了一家小企业，区政府投资100元，区合作社投资200元，七位个人投资700元，每人100元。如果说第一次组建一个合作社是直接向商人们挑战，那么第二次则是靠了商人们的积极帮助。当然100元是很少有人出得起的一大笔钱。由于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必须投资100元或更多的钱才有成员资格，因此私人要投资就只有赔上老本。在区政府和建筑部门的要求下，最后改变了这一规定。在这以后几年里，“三十里铺”很兴旺。据说，它的资本达14万元，还拥有300多名成员。

这个分社的历史使组织合作的人面临一个重大的矛盾：是和商人合作还是试图挤垮他们。是应该依靠那些开始几乎无兴趣，更无资金或经验，不熟悉商业和合作观念的农民群众，还是应该冒背离合作社服务目的风险，吸引商人投资和参加？如果鼓励双方都参加，要不要限制个人投资规模和为防止商人控制采取保护措施？大股东（商人和地主）和小股东（农民）是不是应具有同等的决定权？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是合作社的根本目的：合作社是不是通过分红利或降低价格来主要或仅仅服务和有益于它的成员？抑或是不是通过向贫困的人普遍贷款或对每个人实行优惠价来为全社会利益服务？最后，作为政府的工具它要服务到什么程度？在七年的试验基础上，在南区和别的合作社所犯错误的基础上，共产党准备放弃政府控制，以更多地发挥社会能动作用。由于仍存在想由政府管理的倾向，仍想把合作社同政府济贫和收税的目的的一致起来，由人民管理合作社的想法继续经受着考验。但是，经验证明，合作社如果要成为自给的和财政独立的社会组织，就必须立足于乡村，为它的成员的经济需要服务。

到1943年，许多困扰南区合作社的基本问题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得以圆满

解决。由于有保障的盐业贸易专营和政府对整个延安地区所起的杠杆作用，合作社在战争后期几年边区内部贸易发展中起了作用。政府控制和投资减少了，合作社逐步承担起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更充分地渗透到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然而，南区型的综合或联合合作社并没有给 1943 年合作社运动提供直接的模式。它的范围和观念太先进，不宜在整个边区普遍采用。最主要的是，它主要没有涉及边区经济的基本问题——农业生产。除此以外，它的经验表明至少在初创时期政府必须提供大笔投资，很明显，1941 年以后政府紧张的财政状况是不允许在边区范围内这么做的。但是，党从南区合作社的成败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发动了通过互助合作改变边区农业经济的运动。

互助合作和农业发展

除江西时期合作试验的较长历史外，现存的延安早期党的文献实际上没有关于合作农业的讨论。但是，1942 年，试验是以新的和传统的农业互助合作两种形式开始的。毛泽东在 1942 年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精辟地评价了许多小规模试验计划的结果。这篇鲜为人知的报告是毛分析农村社会问题的改造和最全面论述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报告对传统的互助合作方法对边区社会经济问题的适应和限制作了有洞察力的评价，为合作社运动提供了分析的依据和党解决农民问题新方法的核心。这次会议之后，立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农业互助组，这成为改变农业生产战略的最重要的因素。

陕北农民长期实行了互助的两种基本形式（还有许多别的形式），即“变工”——拥有土地的农民合作劳动的形式，和“扎工”——有组织劳动的集体雇工。在“变工”形式里，几乎家庭，通常是两三户，在农活集中时期（如耕种和收获季节）交换劳动。有时“变工”含括交换耕畜和工具。因为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变工”的传统是依靠久已形成的私人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仅限于亲属之间。而且，特别是涉及到耕畜时，“变工”更趋向于限制在富有的农民家庭之间。事实上，在贫苦农民中“变工”搞得好的例子是罕见的。

在集体劳动的“扎工”形式中，一组农民，常常是十个或十几个人，一块受雇于人。这些人实际是劳动帮，通常在本地为雇主干活，雇主则一律是富农和地主。“扎工”队由工头组织和领头，工头是劳动者，雇主或其他雇人的地主之间的联系人。“扎工”不是根据合作原则，而是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它没有“变工”特点的换工精神。而且，就工头和雇主而言，“扎工”有明显的剥削因素。

早期党的指示，毛的著名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和正式号召开展互助运动的 1943 年 1 月 25 日《解放日报》社论，都建议抓紧边区的经济问题，抓紧互助和社会行动的机会以解决经济问题。这些文章也反映了人们的热情，他们对社会有新的大胆的看法，相信自己有能力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毛的报告坦率地指出以前由上级组织合作劳动运动中容易犯的错误，即它们仅是由政府建立起来的作为国家的分支机构。此外，还明确承认在“变工”和“扎工”的互助形式中的剥削性质和私人关系所起的关键作用。必须取消传统的合作中的不良特点，通过组织新型的小互助组来提高劳动效率的劳动产量。合作经济的发展得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加，男女老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过去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经济来进行国家救济，但是现在对每个农民来说都有自身利益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合作能够成功的话，其成员就能

有希望大大改善他们贫困的生活。这里毛又重申了这样的原则：“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在边区开展的合作运动中，党致力于已经承担起来的最艰难的组织任务。当然，在土地革命中个人所冒的风险更大，但是胜利的成果是很明显的。党的太平盛世的号召在有长期反叛传统的贫苦农民中立即引起了共鸣。1943年，党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边区农村，不过这次的任务是带领农民改造农村经济。共产党敏锐地感到，互助的初期动力来自乡村以外，要派党政干部下去进行教育和组织。但从长远看，合作的成功要靠农民的热情支持和当地干部的发展，归根到底，除非互助在增加生产和影响社会活动方面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效果，否则，再内行的领导也不能克服农民的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随着1943年合作社运动的开展，党的文献反映出对这些问题有了及时的了解。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我们若果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而且反会降低。

再则，组织劳动互助，是最生动具体的事情，绝不能够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对待。比如我们今天要努力扩大那种民间劳动互助组织，所组织的变工从不应过大，不应以乡或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庞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最好是以自然村为单位……

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头领导。

这些基本原则——灵活地适应当地的情况，限制合作社单位的规模，选择村或者更小的单位而不是任何人为的行政单位作为互助的组织基础——表明了对普遍参加和支持问题的敏感。大型的互助单位，尤其是以好几个村子为单位，会产生联络和协调问题，极大地加重行政负担，首先是涉及到超越农民经验范围的人际关系问题。改造农村的长远目标还包括摆脱乡村的束缚，扩大社会关系，开阔视野。但是，要建设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不冒着被疏远和被抵抗的危险，是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的。组织互助组，建立脱离以家庭为单位的有效的社会经济网络，是把农民引向一个整体国家和新的社会的决定性的一步。在整风运动中，这一观念在各级干部中都被反复灌输和教育。由于贯穿于行政改革，“下乡”和减租等相互联系运动的这一基础，共产党不断地更改传统的互助形式，发展农业互助的新形式。

1943年春耕前，开展了使互助成为农村经济之基础的运动。据政府的报告估计，当时边区30万全劳动力有15%组织了互助组。到了夏季，各地有25%到40%的劳动力，或者说有7.5万多人参加了互助组。像除草这类夏季农活依照惯例一般是互助于的，因为于这类活没有交换耕畜那么复杂，是特别容易组织的。据1944年的报告，边区农民的50%至75%参加了互助活动，而1945年当运动进入紧缩和巩固时期，只有28%到45%。在初期阶段，由于过分积极的干部虚报实际上从未起作用的互助组，很多互助组只是名义上存在。有一个调查表明，1943年曲子县有6794人正式登记参加变工队进行春耕，实际上只有2700人参加。虽然统计数字还不准确，但是1943年到1945

年间，边区有数以千计的农民沿着合作的路线调整他们的经济生活。

我们不可能全面考察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涉及到各种形式的合作和集体劳动、领导方法，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动力等实验。我们将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分析运动中矛盾的倾向和解决这些倾向的尝试。第一个是自愿与不依赖政府控制及对农村里形成的领导力量从上面给予压力的问题；第二个是合作社的相互矛盾的目标，有的打算要确保成员的利益，有的要全面增加生产，有的要为社会和政府提供服务。

当合作社运动进行时，共产党不顾已经了解的传统形式的危险和局限，决定建立传统形式的互助。弗朗丝·舒尔曼这样观察到：

在现存的农村社会组织基础建立合作社不是件简单的任务，传统的劳动合作形式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诸如亲属和朋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局外人（党的干部）要渗透其中非常困难。不仅如此，富农和中农通常都最有力量影响劳动合作……

共产党得一再面对这一困境。利用传统的劳动合作形式看上去是明智之举。然而重视亲属关系的劳动小组极端地特别。一旦党的干部渗入这些小组，后者就会失去其特殊性和使他们结合的内聚力……在施加影响的组织和自己产生的组织之间不得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对于自发热情的问题深深地留在传统互助形式的优点和局限性里：“扎工”因前者受重视，“变工”因后者受重视。改变形式后的“变工”和“扎工”极为不赞成在偏爱最大限度的集体化和由于个人拥有土地和创造性才形成增加生产的基础的现实之间达成妥协。虽然变工组包括75人或更多，或者全村人都参加，但是10个劳力便可获得最适宜的效果，为克服以前变工组织能力不强的弱点，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坚持服从一个公举出的领导，突破朋友和亲属关系狭隘的限制发展成员，特别是包括贫农。变工组在生产的全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而不是在耕种或收获季节之后就解散了。

变换形式后的“扎工”经常帮助没有土地或资金的移民开垦荒地。在工头和雇主制度下固有的压迫被取消了。新的扎工队常常为自己劳动，然后一起划分他们集体开垦的地，而不是为雇他们的富农干活。除此而外，有时合作社或政府的贷款使穷人也能雇用扎工队，这在以前是有钱人才有的特权。

合作社运动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的标准，尤其是对劳动贡献以及劳动资料贡献（如土地和牲畜）进行估价。问题集中在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上。一方面，有很多土地和耕畜的富农因他们贡献生产资料和技术而受重视。但是，有人担心富农会牺牲穷人利益进行控制，他们认定劳动应该是收入的主要标准。到1943年，鼓励富农加入互助组。人们认识到劳动的成功需要保留私人所有权。在收入根据劳动和在土地、耕畜和工具上投资的双重基础进行核算时，最佳的生产结果才会取得，这是一种富裕人和穷人都受到极大鼓励的制度。过去劳动报酬是按劳动日计算而不考虑技术和生产能力。社会压力和领导都被引导来增加合作社成员和促进合作社生产。然而，由于没取消家庭农业，甚至，因为互助组的成员还保留私人耕种的土地，合作社必须进行经济竞赛，要么就面临无法解决的成员及所属和物力的退社。

在毛看来，合作社是服务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中间人。不是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而是最后由合作社替它们的成员交纳税款；当地方学校或民兵需要资金时，政府可以避免直接向人民征收，因为合作社的盈利能为此开辟

财源。合作社的潜力——最后在中国的公社里得到发展和体现——在于为指导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生活提供有效地大众化的途径。农村发展的立足点和关键既不在于个体的家庭农业，也不在于国家的管理，而在于合作社团。从 1943 年的互助小组到人民公社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互助组（包括在农村经济生活中自己产生的组织），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新的途径。虽然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鼓励，有时明显地为这一目的由派来的干部组织发动，但它们不是国家机构。互助不仅调整了基本的经济格局，为经济持续发展增加了条件，而且也为远离改革潮流的农村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创造了条件。合作社的原则对于 1943 年克服农民的狭隘观点，并在此过程中导致了农村变革和持续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1943 年的生产运动

1943 年，党把注意力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竭尽全力加强根据地建设。这个新目标就是建立根据合作和分享原则组织的自给自足和更加繁荣的经济。这是一个生产仗。这一仗开始在陕甘宁，很快又在其它所有根据地打响。这场战斗的基础——互助运动，由 1943 年第一次大规模采用许多革新而得到加强。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组织的生产”和在劳动英雄竞赛基础上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

有组织的生产要求党、政府、学校，特别是部队作出基本的经济贡献。1943 年开始，所有组织都全神贯注从事农业、简单工业和商业部门的经济。使用军队和文职干部生产不是新鲜事。1936 年埃德加·斯诺报道了一种“星期六突击队”的方法，“每个苏维埃干部、红色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以及附近的红军部队，都被动员至少干一天的农活”。但是，“星期六突击队”很快消失了，至少是再也没有听说过，虽然不久挑选出一些部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毛泽东描述了有组织的初期生产实验，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应急措施是怎样最终导致在党的领导观念上出现的新方针。毛指出，在江西因为粮食充裕，军队不参加生产。1938 年在陕北，部队开始试验种粮食、养家畜和做军鞋，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守卫边区边远地区战士的生活（也可能是提高士气），他们军饷不多，伙食不好。1939 年，为打破国民党封锁，开展了第一次全边区的生产运动。这时，党才发现在部队和其它组织中蕴藏着巨大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为什么这些强壮的人在完成战士、党政干部，或学生的任务之外不应该养活自己呢？因此，从军队开始，经营和指导生产企业。改善部队生活还可以相应地减轻加在人民身上的过重的军队财政资金的负担。然而，只是在 1941 年经济和财政危机之后以及整风运动中，有组织的生产才在整个边区展开。到 1943 年为止，为争取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运动才同部队和其它组织的自给自足运动一起进行。

1943 年的生产运动适应了发挥有组织的经济部门的全部潜力。从此后，所有的干部都要广泛地参加劳动和管理。党内每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委员，都从事通常是合作性质的某个方面的生产；将军和政府干部也同样如此。这些都不是孤立的行动。这形成为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新的干部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干部既是领导者，又是参加者。正像整风运动中采取小组批评方式，使领导者屈尊走上思想的和行动的斗争舞台，生产运动则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促进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干部和人民之间的团

结。

我们可以简要地考察一下军队在组织经济中的作用。虽然军队在生产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但它的行动还是比别的组织具有代表性。到 1943 年，所有部队都广泛地进行生产；他们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但还从事和经营商业和小型工业。的确，到这时，军事预算是根据削减政府津贴和接受部队部分自给自足的成果来考虑的，1944 年更是如此。王震的三五九旅是著名的模范单位，1938 年以来一直是南泥湾军队生产的带头人。

南泥湾的初期实验显然是模仿“屯田”制，即 2000 年前，汉朝和六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搞边疆军队殖民地。三五九旅被派驻的地方是一片极为贫瘠的荒原。三五九旅拥有的只是荒无人烟的山地。这片土地归该旅集体所有，不久发展起来的畜牧业、小工业、商业和这片土地上的生产成果，统统归该旅所有。

以下是王震对他的部队取得自给自足的初期努力的叙述：

四年前，我带领部队来这儿开始第一个军垦计划时，我们没有窑洞和房子住，买不到粮食，也没有工具，甚至连一个能够请来和我们劳动的农民都没有。

从总体上看，那时的边区十分贫穷，我们不能带足粮食，也没什么工具可带，我们几乎没有从延安政府那里要到钱。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得不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伐木搭简陋住处，还挖窑洞。我们号召每个单位开块地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还是没有足够吃的。

为换回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就砍伐坚硬的松树（邻近地区的人们喜欢用来做棺材），把松树卖给村上的人。你所经过地区的地方干部帮助我们愿意尽力帮我们的农民那儿借到一些旧工具。

我手下的年轻的刘连长，在山顶一座被遗弃多年的庙内发现一口铁钟，我们的工具问题最后得以解决。铁钟太重，没法弄下来，我不知道钟是怎么被挂上去的。刘连长在钟下面挖了一个大坑，就地熔化。我们找到一些愿意教战士制造工具的铁匠，用从钟上弄下的 2000 多磅铁和从远处村子里弄来的铁制造工具。

这些功绩就成了延安传奇的素材。南泥湾人和其他人的英勇行为经过加工，用故事、歌曲、舞蹈，特别是戏剧等形式，一再被传颂，这些艺术形式把全边区战士全力投入生产斗争的事实戏剧化了。

王震的叙述着重强调了部队生产运动的两个主题。第一个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用双手辛勤劳动来征服自然。三五九旅被派驻南泥湾时，没有工具，实际上也无资金，当然也没有经济发展的“专家”，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人力和资源和可得到的当地人的帮助。三五九旅的成绩应和第二个主题相联系：独创性。为满足生产需要设计出少花钱或不花钱的新技术。熔化铁钟就是这样一个功绩。很快，南泥湾成为来边区参观者的参观地点和全国军队生产的模范。到 1943 年，部队生产已是所有根据地军队生活不可缺少的特点。南泥湾精神成为勇敢献身的美德和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了。

1943 年，三五九旅提出一项预算，预算中它本身的劳动占收入的 82%。1943 年它要求所有部队要达到 80% 的自给自足，这一命令从来没有完成，但是部队确实逐步满足了自己的需要（1944 年大约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推动了整个边区的经济发展。

军队发挥经济作用代表着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和军阀的军队之间的显著差别。和其他欺压农民的武装力量相比较，共产党军队通过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和为维持靠土地生活的不断斗争，和广大农民建立了同甘共苦的关系。关

键之点在于没有失去中国的农民。在陕甘宁，由于努力实现部队的自给自足，供养大批部队的负担被大大地减轻了，而且，部队具有熟练的劳动者和组织经验，对边区中、小工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促进。

工业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私人方面的影响，有组织的生产虽起了有意义的作用，但显然不占主要位置。可是在工业方面，至少在商业方面，有组织的和政府发起的企业是努力取得发展和自给自足的一个决定的因素。在边区建立根据地以前，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业和手工业。商业在极大程度上被限制为输入棉纱和布匹、输出盐类。长征之后，便需要像印刷、纸张。军需品和农具这些项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这些项目都由国民政府花钱输入和付其中一部分款。但是从 1939 年开始，封锁迫使党的领导转向自己的资源，临时准备这些必需品的生产。由于缺少本地工业的传统，而且当地技术和办企业的技能也不足，共产党依靠政府倡议和筹措资金兴办工业。尽管政府的政策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对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怀疑，以及对战时战略物资控制的必需，自然加强了以上的决定。

表九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 1942 年 12 月

工厂类型	厂数	工人数	资本
布匹	18	1427	626900000
被服和制鞋	8	405	11001100
造纸	12	437	4100000
印刷	3	379	5200000
化学品(石油、肥皂等)	12	674	17030000
工具	9	237	3662792
煤炭	12	432	1777070
合计	84	3991	669670962

公营和私营有限的工业见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的表九。该表编制于 1942 年末，这些数字也说明发展工业的艰苦努力。表九里提及的几乎所有工厂都是 1939 年以后开始创建的，其中大部分是 1941 年创建的。当时封锁的加重迫使进行争取自给自足的努力。与此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暗示)这个 140 万人地区的基本发展水平，到 1941 年底，只有不到 4000 名“工业工人”在工厂做工，每个厂平均不到 50 人。

在其他大部分根据地和边区，最为重要的是纺织工业，它是工业迅速而又曲折发展的典型例证(见表十)。1938 年，不到 5%的边区布匹供应由自己生产，而这数量很少的布匹，大部分是家庭工业的产品。1939 年政府和合作社企业开始小规模的发展。但是，国民党的封锁不仅加强了提高布匹产量的决心，而且首次决定种植棉花，发展本地的纺纱工业。三年以后，毛泽东宣布差不多边区需要棉花的一半，约 180 万磅，是由自己生产的。

不断加紧的封锁导致了政府对工业部门总投资的增加。1941 年，这反映在扩大纺织工业上，犹如在提高自己生产棉花的努力开始卓有成效一样。到 1941 年底，拥有 1800 多工人的 29 家公营工厂生产布匹。但是，到 1942 年，这种迅速发展的局面倒退了。其它工业和纺织工业都进入了一个被迫紧缩的时期，这些工业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过集中和更严格的控制改进质

量，这实际上是在巩固行政组织过程中的精兵简政运动在工业上的翻版。到1942年底，国营纺织工厂减少到16个，工人数下降到1083人。由于工业变得更集中和更有效率，取消了可有可无的操作和脱产的管理人员。自1938年开始一直以年增长率30%到60%增产的棉布生产，在1942年没有比1941年增产。巩固纺织工厂是更大紧缩的一部分。在这一紧缩中，各种类型的工厂从97个减少到62个，而工业总产量要保持稳定。这次削减国营工厂只不过是1943年另一次的发展浪潮作准备，但是这一次是依据工业发展的新观点进行的。纺织工业的国营厂家又一次急剧地增加（和别的工业情况一样），生产成倍地增长。但是，这时增长最突出的既不是在国营工厂，也不是在私营工厂，而是在家庭纺织业。

表十 1938年~1943年陕甘宁棉布生产

生产类型	年代	车间数	工人数	匹数
国营工厂	1938	1	96	125
	1939	1	210	1426
	1940	11	850	14740
	1941	29	1845	1875
	1942	16	1083	14565
	1943	23	1257	32968
	合作社工厂	1938	—	—
1939		2	25	400
1940		4	82	850
1941		22	352	4600
1942		27	385	4500
1943		38	374	6000
私营工厂		1938	5	34
	1939	16	154	5690
	1940	20	185	4500
	1941	40	205	8460
	1942	50	310	12000
	1943	—	702	19634

(续 表)

生产类型	年代	车间数	工人数	匹数
家庭生产	1938		5000	5625
	1939		8000	8750
	1940		10000	12500
	1941		13000	14500
	1942		13500	14158
	1943		41540	45700
	所有类型	1938		5130
1939			8369	16266
1940			11117	32590
1941			15402	46310
1942			15278	45223
1943			43973	104302

来源：根据 Hsu Yung—ying 资料编制，《陕甘宁边区的调查》第二册，第 93 页，最初的资料见《新华日报》（1944 年 5 月 29 日）一匹布的标准为长 120 英尺，宽 3 英尺

1938 年，在政府兴办的纺织工业发展以前，估计有 5000 名妇女从事着占边区所有织布的 76% 的家庭生产。但是，后来注重工厂生产，因此家庭部分的生产便黯然失色。在 1943 年生产运动中，共产党第一次认真地努力发动、训练和组织边区的人们，尤其是妇女从事家庭工业。到 1943 年底，在家织布的妇女人数从 13500 上升到 41540，其产量达 4.5 万匹，大大超过了工厂的生产。

边区纺织业发展的情况说明了 1943 年的基本革新。这年共产党广泛应用了对当时工业发展很有特点的基本原则和富有特色的方法。“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就是把计划和确立的延安主要经济目标统一起来，同时与边区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济联系起来。实际上，政府提倡和鼓励优先发展边区的经济，但是，完成这一目标，不是靠一个集中的官僚机构，而是靠遍及全边区的合作社、公营和私营工厂以及家庭。这也部分地说明要努力“解决生产和分配的矛盾”。在一个交通极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把工业集中在几个中心地区意味着加重原料和成品分配的运输费用。例如，1941 年以后，在边区广泛地分散种植棉花。分散就是当地纺纱，在当地织布，在当地销售。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农民学会纺纱织布的基本技术，而且，在远离布匹生产集中地的最落后地区，也有了平等消费布匹的机会。1943 年，共产党放弃了集中工业生产和加紧政府控制的政策，利用当地的创造精神，降低运输费用；这个政策逐渐加强了对全边区家庭工业和大众经营工业的信赖。

家庭生产的发展是分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2 年，绞尽脑汁的经济计划制定者们敏感地察觉到劳动力短缺将阻碍边区的发展。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动员一切可动员的非生产者。我们已经注意到党政干部、学生和部队参加了经济活动。在纺织工业方面，共产党依赖家庭织布的传统。从这一传统出发，再加上互助组，他们利用本地可行的专长发展纺织工业。1943 年和以后的几年里，共产党成功地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农民妇女在简陋的家庭织机上利用空闲时间织布。

就每架织机的产量来衡量，家庭纺织生产与工厂生产相比效率是极差

的。和私营工厂的 80 匹和合作社的 33 匹相比，公营工厂的织机每年平均生产 73 匹布。家庭织机每年平均仅生产一匹布。但是，因为家庭织机利用了以前的“非生产者”和农闲季节的其他人，因为家庭织机没有运输和工厂的成本，所以被证明是极有效的。到 1943 年，自给自足的运动使当地纺织工业（主要开始于四年前）能生产 10.4 万匹布，或者说，能生产边区全部布匹需要量的 32%，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记录。此后，这一纪录被进一步提高。这些布匹产量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家庭织机上织出的，这个比例此后还不断上升。

在决定分散工业中，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起主要作用。一个是战术上考虑，零散工业比较不易受敌人的攻击。另一个是期望在边区普遍传播新的经济和政治观念，努力破除妨碍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顽固的传统价值观（这将在下文讨论）。用家庭生产的方式把工业引向落后闭塞的乡村，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不是把工业集中在能很容易用先进技术管理的发达地区——城市，而是把工业交给人民，让人民广泛地获得利润。这就是“下乡”和加强地方政府运动的工业之必然结果。和推广合作农业相联系，采用家庭手工业进一步使农民走改造农村生活的道路。

纺织工业为抗战期间的工业发展基本模式提供了榜样。因为缺少资金和技术，工业运动是通过有最先进的行政技能的机构——政府和军队开辟途径的。早期方法反映了要求迅速发展的愿望和有限的财力和技术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过分发展和紧缩，但也具有总体意义上发展的局面。最终，迅速发展和分散相联系，由于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家庭工业，大大发挥了她们的经济作用。

在后方根据地，通过合作社和织布运动，首先是作为妇女对游击战积极贡献的结果，正改变着中国妇女的作用。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农村妇女为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使中国妇女走出家门，投身于中国社会的洪流中，抗战时期是极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争取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和经济上的权利有重大进步，同时妇女也积极为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

边区工业发展的另外一些重要方面，突出地表现在经过艰苦努力生产出铁和当时所需的军火。当然，这个地区以前从未生产过铁，军事和工业上所需的少量的铁靠外地输入。但是，1941 年，第一次用边区开采出的铁矿石和煤冶炼出粗生铁。在缺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现代设备情况下，“土高炉”生产出了制造武器和工具急需的铁。据说，到 1943 年，“土高炉”已能成功地加工所需铁的三分之一。冈瑟·斯但因曾生动地描绘了边区一个非常简陋的兵工厂：

一个兵工厂的厂长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工厂时说：“在边区我们不能炼钢。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利用部队从日本人占领的铁路上拆下的钢轨。但是通过敌人防线到延安十分困难，一般说来，我们对当地炼出的较多的铁感到满足。我们甚至用铁造出很好的迫击炮。”

这个 330 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滚轧机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十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土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

兵工厂的各个车间制造铸铁，看上去很光滑的迫击炮、子弹、刺刀、维利式信号枪，还有铜制注射器（自从各地农民享有优先权后），在预防牛传染病时供兽医使用。

这样的工厂是边区的骄傲。从 1943 年开始，在可利用的质朴的人和自然资源基础上进行了令人激动的实验，努力破除有影响的农民宿命论的心理障碍。这些工厂一生产生铁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铁是生产武器和工具最有用的原料，不仅因为从人力和财力方面看，自己生产铁比通过封锁运铁更经济，而且还因为这象征着人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对可能性的新的理解，在抗击强大的日本武器的战争中，在克服边区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发挥无法以数字估量的人的力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从 1943 年以后，共产党就集中财力和人力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个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对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特别是以前的非生产者，包括党政干部、学生、妇女、移民，以及游手好闲者。在有组织的经济里，在“面向乡村”和合作社运动中，在工业分散经营中，建立了新的确定形式，这一形式包括了经济中所有这些类型的人，它为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奠定了基础。

劳动英雄

如果长期的发展要靠社会活动和农民的积极性，那么必须提供有效的鼓励和动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利用劳动英雄作为带头人和模范。在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经验和中国人仿效孝顺榜样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共产党又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新东西。为了有力地推进生产运动，1943 年夏天开始了第一次劳动英雄运动。在每一个村、乡、县选出杰出的劳动者，给以荣誉，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这一运动的高潮，是每年在秋收之后，都把全边区 180 名劳动英雄集中到延安开两个星期的会议。这些男女劳动英雄的事迹被广泛地宣传，他们代表着工、农业各方面，包括优秀的党、政、军干部。

毛泽东在 11 月 29 日欢迎劳动英雄的讲话中，指出了生产运动目前的状况和发展方向。在详细论述了过去的成就和组织经济的重要性之后，毛谈到了开始彻底改革边区生产的多种合作劳动。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1943 年共产党为有效地加强对人民的经济生活的领导，发展和应用了种种技术。当时，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运动使对边区农村的“封建”状况的全面进攻得以推进。正像互助和家庭织布一样，这些运动强调创造性地发展本地的形式和传统。劳动英雄自然是带头人。他们具有创造力，十分熟悉农村生活，这使他们能够找到解决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土办法。

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杰出人物相比，党在 1943 年的生产斗争中，不是从工业化的西方而主要是从中国农民最富有创造性的因素中获得鼓舞和树立典型。当然，党和领导人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之中。而且，他们广博的领导经验使他们很好地了解到改造农村社会的障碍。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当农民积极分子的创造可能性和由一个上面派来的受训练的优秀

干部进行革命所带来的局限性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派来的干部可能发动和加速变革，但是，最终的改造需要扎根于社会并投身于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社会的领导者。这个观点是在劳动英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迄今为止，只有勇士或政治人物是英雄，但是现在劳动者也能成为英雄。”

劳动英雄运动为鉴定、训练干部，为激励干部投身农村革命改造提供了机会。第三世界受过教育的青年积极分子涌向城市，实际上使农村处于停滞萧条的长期性问题，早已在延安通过突出农村发展的挑战，奖励乡村干部和为不断的经济和社会改造疏通渠道等方法加以解决。被选出赴延安的为数不多的最光荣的劳动英雄，和乡里、县里的劳动英雄，是准备带着新思想、新动力和推进生产运动的声望返回农村或工厂的。劳动英雄也是在个人、工厂、部队、合作社和全县之间展开竞赛的先锋，这一竞赛是1943年经济一个显著特征。

与土地革命和以后减租运动中出现的领导一起，劳动英雄向传统的乡绅专权提出了又一个挑战。同时他们也向脱离而且常常无视农村生活问题的职业官僚主义领导方式挑战。劳动英雄和当地其他积极分子以及1942年下乡运动中派来的干部一起，构成了能推动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和调整的乡村领导核心。

延安经济发展模式

1943年由党发动的生产斗争不仅仅是应付紧急情况的一个对策，从总体上看，这是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综合方法。不仅如此，很明显，这一时期的新方法成为以后农村改造和发展的中国道路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点。在1942年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把党的新政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相对照，强调了党的新政策的历史意义：“过去五年的国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士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人民的需要，还只能由党政予以组织推动，由人民自己动手去解决。”

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这就要在农村动员群众。所有可利用的人力、物力，包括以前的非生产者部队、党政干部、学生、妇女和无业游民——都要加以利用。这些人都合理地纳入合作性质的组织劳动。初期，党和政府对生产运动作了大部分的发动和指导工作。但是，筹集资金，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以及后来的发展，都大大地依靠本地的资源，尤其是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加。延安的领导者能够为农村的社会和经济改造制定出大的指导方针，但是，如同进行游击战一样，生产运动的成功要靠各个有自主权的集体的主动性，献身精神和生产技能。这是一场生产战斗，是一种游击战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和后方根据地争取生存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延安道路。

在为这个计划辩护时，毛痛斥了失败主义者，这些人藐视在落后的边区有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认为这种发展与党赢得战争胜利的直接任务毫不相干。他同样也批评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批评了主张应立即把经济资源投入重工业的观点。毛在讲述作为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时，又一次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杰出人物孙逸仙相提并论。但是，事实上，

为 1943 年的方针提供启示或指导的，既不是孙的经济观点，也不是毛自己 1939 年未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经济方面的简短和相当抽象的部分，为三年以后广泛开展的改革没有作出一点指示。延安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在战争引起的危机所带来的惨痛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在 1942 年整风运动中趋于具体化。

我们必须估价这些陕甘宁经济发展方法所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可供总结经验的那个时期是短暂的（1947 年共产党被迫撤离陕甘宁），而且缺乏有关经验的材料。如果早期的农业生产统计数字比总的估价或有根据的测算有出入的话，那么 1942 年以后的统计数字则更是有疑问的。1943 年农业发展计划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政府的分权和经济分散，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统计方面的困难。然而，除了缺少确切的统计数字，某种广泛的结论却是很清楚的。首先注意到在合作社基础上调整农业经济的劲头十足的努力，以及在动员成千上万的非生产者没有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大规模混乱，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一开始很多农民处于互助网络之外，但是，从个体经济到合作经济的转变看上去非常平稳。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共产党在熟悉的农村背景下熟练地掌握了传统的合作习惯。当农民被逐步地引导到新的但并非完全不熟悉的合作实践时，核心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和拥有土地的单位被保留下来。在三年时间里，朝创造合作经济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作为地区经济的基本经济指标的粮食生产，虽然在整个过渡时期有稳定的持续增长，但不是惊人的增长。据报道，给人印象很深的生产成果是 1943 年边区主要工业的纺织生产，但是，以后几年的统计数字是无效的。有组织的生产，特别是 5 万名常备军人的贡献，照我看来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取得的彻底胜利。战士和一些政府干部不仅是宝贵的劳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多人具有边区缺少的工业、商业、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技能。特别是从 1943 年起，他们被广泛地、有效地应用于支持经济发展。利用动员方法，再加上重新兴起传统合作形式和家庭织布，这些代表着一个对农村发展生产短期特别是长期可能性的精辟估价。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变化对农村生活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最重要的是，从以后中国革命进程的观点来看，1943 年开展的生产斗争，党认为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不仅建立了一块根据地，而且就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给当地干部指明了可行的方向。

教育和社会改造

1942 和 1943 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农村发展远景的重要特点。从合作运动我们已经看到，基本思想是建立当地民办和民管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民办的观念，包括人民群众参加和由社会管理以前由官僚、技术行家或地主豪绅垄断的活动，很快体现在农村生活的所有方面。意义深远的教育发展——对教育来说，的确是激进的新方法——是改造农村生活的关键。

1944 年在边区开办了许多民办学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的需要，适应变革中农村的需要。在数千个未有过、做梦也从未想到过建立学校的村庄，地方干部、劳动英雄和村领导人承担起建立合适的当地教育形式的责任。与此同时，采用扩大社会责任的原则，在边远的农村宣传卫生基本知识。结果，在文化运动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从 1942 年起，“秧歌”成了边区大众文化的象征。秧歌是民歌和舞蹈相结合，带有戏剧情节的节目，用以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宣传新社会的道德。秧歌以一种没受过教育的农民能够接受的形

式生动地表现当前的问题和政策。从 1942 年开始，秧歌队深入到边区各处巡回演出，给数以千计的农民直接带去了新的文化。其目的是利用传统的大众化形式，并加以发展，把这些形式带到农村，给人民以娱乐和教育，使文化和农村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般说来，边区行政部门在卫生、教育和大众文化方面的贡献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陕北这种荒凉、贫困、被人遗忘的特定环境下，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把一切开支都压到最低限度的时期，边区行政部门在克服贫困的人们无休止的失望和绝望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为人们扩大受教育的机会才行的，人们过去总是认为教育只是为有钱人办的，还要通过向人们介绍基本的卫生知识来减少因疾病死亡的人数，而他们过去的医生却只是道教徒；还要介绍充满革命和希望的大众文化。但是，到 1942 年早期的努力才明显地出现局限性。很多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丝毫未受这些发展的影响，而且采用的方法常常是从发达的沿海地区移植过来或借鉴西方的，而不是从边区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出来的。这便出现了问题。文化和教育必须而且也能够由人民自己通过有效的社会途径创立和管理，这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证实。其结果是有了新的方法，以削弱名流的控制，使教育和社会改革与社会需求休戚相关。

我们不能对当时社会和文化运动一一作详细叙述。但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进展为发展中的农村改革观念增添了意义重大的内容。我们必须简略地考查一下它最突出的特征。整风运动中，在对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关提出批评的同时，也批评了教育。到 1942 年，除了五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体制仅仅是对边区严重的文盲情况作了肤浅的探讨。党积极鼓励农民参加扩大学校系统。但是，教育仍保留着一定的高贵地位，集中在县城。这只能满足那些出钱供孩子上学的家庭的需要，而大多数农村则没有学校或没有方便上学的机会。1939 年底，在校小学生数从 1937 年初的 5600 猛增到 22000，在 1944 年初又增至 29500。然而，这意味着在 165000 学龄儿童中，仅仅有六分之一正在接受甚至是最起码的正规教育。尽管在改编课程，但到 1944 年初评论家指出，学校课程大部分与农民生活无关。学生们不是准备在乡村带头进行农村革命，而且学会了轻视生产劳动；而随之发生的便是，在他们回乡后，对家庭和乡村常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把受教育看作是向上爬的阶梯的第一步，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观念甚至在边区的学校里也很微妙地被强化。人民群众期望他们受过教育的子弟能帮助家庭，但是他们却跻身权贵，享受特权，而不是参加劳动，在自己村子里起带头作用。

从 1943 年起，当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和其他农村问题时，教育制度的结果，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假若教育将为延安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出力，教育就必须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上与农村生活相结合，即立足于农村，解决当地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财力极度紧张，到何处去找教师和资金大力发展教育？难道在家乡的土地上，在反对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观念的斗争中，反动的乡村习惯势力不会取胜吗？最后的结果将仅仅是已经很糟糕的教育质量再下降吗？这些大众教育与正统教育、社会管理学校与专家管理学校，以及在变革的社会中教育的政治和技术环境等问题，成为 1944 年教育辩论的中心问题。

1944 年一系列大众教育的大胆实验面临着这些问题。大众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普及文化基础知识和能在农村获得明显效益的实用经济技术。1944 年

“发展生产、扩大教育”的口号使这一目标明确化。教育与合作社和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小学校坐落在县城，受县政府的行政管理，教育部门常常是另外设立，并且是在乡、镇，甚至是村的管辖之下。一些学校仍继续留用原来的老师，而很多新老师，常常是没有正式教师文凭和经验的男女青年，则成为扩大当地学校的骨干。

还有对工人农民进行业余教育的新型学校，包括夜校、半日制学校、冬学和经常与生产单位直接有联系的识字班。这些学校根据“民办公助”的原则办校。这表明教育行政干部继续从大的方面为课程提出建议，并通过提供教师给予一些帮助。但是，财政、人员配备和课程设置的基本责任从教育部门和专职教师那里交给当地的积极分子和村干部。事实上，学生和教师经常根据当地需要调整课程。校长或老师也常常是一个有名的劳动英雄或当地干部，也许他自己不识几个字，但他对教育和生产充满新的希望和信心。老师中常有从上一级派到村上的干部或学生，他们帮助扫盲，培训当地老师，为已经改变着农村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奠定基础。这些老师在村与村之间巡回教学，走后留下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当“小教员”，继续教课，直到他们返回。犹如在整风和“下乡”运动中，党试图在干部和人民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在大众教育运动中，党也试图明确教师的作用。人所共知和公认的权威人物将让位给一个教员，而他的成功则是因为他真正关心人民的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老师常常自己就是一个学生。年轻的和年纪大的，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农民和干部都可以在老师和学生中发现。因此，这些新型学校在当时努力消除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使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团结一致这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民办学校与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是分不开的。学校的学生住在自己家里，学生和教师都经常劳动，从事帮助家庭和村子的其它活动。甚至在城镇，课程正规的学校和干部学校也强调参加生产，强调教育为生产服务。学和干结合起来，教育责任由学生、老师和社会共同承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型大众化教育是参与制的教育。例如，新的中学提出的课程是“以养成为边区人民服务始（边区建设），以掌握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技能终（生产和医药知识）”，教育强调的是实际知识，对当前和历史情况的分析，尤其是服务。

1944年边区的教育表现了其它群众运动的许多特点：把高级专业人员的权力转移到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干部和劳动英雄手中；强调大众化教育，而不是“特殊化”，使教育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相结合。党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正规学校，或是故意不要质量。虽然教育经费极为紧张，但是对教育却是优先考虑的，在一些发达中心地区的教育因为群众利益而受影响。1944年，教育的预期目标是让男女老少完全受教育。假若要依据职业标准大多数新式教育是粗糙的，假若要说一些实验被证明是寿命不长的，但是，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技术、新观念被有效地运用到进行农村社会改造的时期，这次运动使几百个落后闭塞的村子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而且，这还为一个个急需社会关注的地区进行社会管理创造了一条途径。

紧接着合作运动发生的1944年的教育运动，灌输了社会行动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意识。在面对农民根深蒂固的宿命论和价值观（常常与运动的有力和合作的推动相对立）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大胆的革新。然而，领导者不是任意取消一切传统价值和习惯，而是试图有选择地依靠农民

的力量，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大跃进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两条腿走路”观念的第一次提出，和这些原则的最明确的表述，可以在1944年10月30日毛的讲话中发现：

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凡是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正像在政治和生产方面一样，毛坚持认为要取得持久的进步，得通过对立面的综合，或新与旧共同组织“统一战线”的双重发展。党和政府为发展和变革提供了总的方针、领导方法和热情支持，但是成败与否则完全靠人民的主动性、决心和创造力。在1944和1945年边区的教育运动中，应用这些原则在整个边区普及了基础文化知识、合作劳动和卫生的新观念，以及新的艺术形式。

群众路线

整风运动中，党在方针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已经不仅仅在于发展经济，而从更高的层次，着眼于革命中的人和社会。这时完整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以便在根据地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里，确立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为中央政治局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对群众路线原则经典的也是最早的阐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强调领导者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从游击战经验中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在人民战争中，领导权的取得在于能够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而这些需要和期望只有通过和人民群众保持不断的接触才能知道。经济学家杰克·格雷很敏感地分析和了当前正在发展的社会有关的群众路线之方法：

……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有政治觉悟的领导者与当地社会的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些群众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大部是文盲，而且政治觉悟低）。了解他们的期望，对可能性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怀疑和问题；根据更加广泛的经验和责任以及领导方法的理论来总结这些观点，再以明确的方式告诉群众，提出新的问题；然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使由此而产生的决定付诸实践，同时再研究其结果。这种政治方法的好处是可以防止为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所左右，这样可以使全体人民积极地讨论并明确地参与政治，这样形成了一个教育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民群众可逐步克服他们的沉默不言，对变革的怀疑，对现代技术和组织可能的不了解，克服他们狭隘的家庭和宗族观念，极端短浅的经济眼光，克服他们无视其它地方可比较的情况和天生地畏惧政府。这在尽量限制权贵的趋向和让人民有发言权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

群众路线适合于解决农民社会的问题和弥补其局限性，也有利于在基层

发挥农民积极分子和社会的巨大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在 1943 年的经济和社会运动中以及在抗战中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旦农民被给予采取行动的权力和受到鼓励,他们就会不仅在军事斗争中而且在改变农村生活的事业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 1942 至 1943 年的整风和生产运动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是理想的共产党人的新概念。这种理想的人超越了专业分工和个人身份的束缚,在一个人身上兼有劳动者、领导者、战士和学生的品质和才能。当地的积极分子就是具有这种品质的榜样。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村子或工厂介绍和宣传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在游击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还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并在“空闲时间”教育别人。因此,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明显地缩小了。在战争和生产中,社会上形成了共同斗争的紧密联系。劳动英雄或当地杰出的积极分子是上级领导和农村之间非正式的中间人。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建立各种社会联系和促进行动,推动改造农村生活。

领导工作的群众路线概念,使每个青年人或成年人,不管其阶级、正规教育程度或家庭成分,只要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就能得到荣誉和地位。如果农民可以通过斗争和自我教育“升”为领导者,那么,学生、官员和传统的社会名流则可通过“下乡运动”和生产运动而“降”,在农村中去团结和领导人民。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领导者同过去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决裂,并承认应该发挥在传统上是截然分开的多种多样的职能。

延安时期的伟大贡献,是发现了将动员人民参加游击战争同发动社会力量来广泛地解决农村问题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会的行动渗透到每个乡村和家庭,涉及每个人。这就需要新的领导方法,这种方法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的最后几年里,群众路线已经在根据地和整个中国战场扎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取得的。1943 年,群众路线被作为党的基本领导原则,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卓鸿蒙摘译自《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二章毛泽东的比较研究

导言

比较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其产生与人类认识史一样古老。或者更确切地说，比较是人们评价事物不可或缺的工具。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是这个意思。曾有学者认为，比较方法是人们了解世界并实现生活目的的能力。

在历史研究和理论叙述中，比较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简单地说，它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比较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参照物。通过对比，显示和突出研究主体的特征，这样更有利于对研究主体的性质进行判断。显然，不能说除去比

较方法就不能进行判断，但是经由“比较”，可以使本来被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情节得到放大、增色和突出，这样则能以更鲜明、更强烈的刺激能量，调动人们的认知敏感，使主体更为清晰，进而使判断更为准确。其二，历史学本质上是建立在还原基础上的解释理论。当人们根据历史发展的结果去反推其发展的原因时，解释的过程就开始了。在一连串事件、人物和行为中，隐藏着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关系式。在特定环境下，这些因素的强弱、倾斜、斗争及其妥协，造成了历史的最终或阶段性结局。在这里，进行历史因素的比较，实际上就形成了“解释”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此，我们才可能解说历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

本章中，我们是在狭义的角度上使用“比较研究”一词的，主要指的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比较。其中，按比较的性质和目的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历史人物之间性格、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语言风格的比较，显示其差异；第二类是在不同战略思考、行为方式和理性判断的角度上，理解历史的关系式；第三类则是以“隐喻”（metaphor）为桥梁，显示不同“话语”（政治学与物理学）之间共同的思维基础。

比较当然是有限度的。失去“可比性”的对照，不仅是智力浪费，更可怕的是它将导致荒谬。在这个意义上，比较研究难免要冒主观臆想的风险。

毛泽东与爱因斯坦——革命的隐喻

〔美〕爱德华·弗里德曼

1955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进行了爆炸性的干涉，他的哲学出发点之一可以说是某种特殊的爱因斯坦认识论。现在看来，很可能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已经以某种特殊的乐观主义理解爱因斯坦革命在认识论上的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爱因斯坦曾两次访问中国。许多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高喊着“民主与科学”这个流行口号，这标志着列宁的革命民主主义与爱因斯坦的革命科学的结合。这种把革命运动和爱因斯坦主义等同起来的中国乐观主义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牛顿后物理学代表的爱因斯坦主义对知识持悲观的看法，它认为真理只是主观的和局部的，而毛泽东和西方文化对爱因斯坦认识论革命的理解与科学史学家们的共识相差甚远，后者认为，爱因斯坦实际上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物理学家，而且他从未接受 acausality、模糊、概率等等的新观念。把爱因斯坦视为新物理学的代表，对玻尔和海森伯等人是不公正的，因为正是玻尔和海森伯两人撼动了牛顿力学的基础，他们的贡献大于爱因斯坦。然而，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人们一提到新物理学总是简单的称为“爱因斯坦的”。

毛 1949年前也曾提到海森伯、玻尔等人，但已知材料很少且内容含糊、不连贯而琐碎。但是，如果毛后来的记忆是准确的，那时毛已经说过：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是正宗的，因为它符合爱因斯坦主义。按照毛的看法，知识和革命波浪般向前发展，一次新的实践跟着另一次新的实践。革命实践不能照搬书本或者莫斯科的经验，只能靠中国实践的每一个局部胜利的积累。要想知道电子的位置，只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实验。

但是在毛这么说的唯一一段话里，比起他后来讲到他的爱因斯坦式认识论时所用的丰富的含有隐喻意味的解释，他的语言就显得苍白无力。他是这样说的：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在毛的脑子里，这个知识论的真正意义可能在于，它为他提供了一种理由，可以不听从远在莫斯科的人及其在中国的朋友们的分析。毛的中国经验是更科学、更真实与更具革命性的。

从毛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兴趣。他想要真正理

在 DrnnisRyan 等人编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百年文件》（纽约，AMSPress，1982）中的《爱因斯坦与毛：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一章中，我找到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源。

非常典型地，周恩来在 1922 年说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爱因斯坦主义一致所以是科学的，他说：“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与“相信爱因斯坦学说的人”做法完全一样。（《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56—35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7—288 页。

解生物学、微观物理学、认识论和宇宙起源论的本质，理解生命、物质、知识和宇宙的本质。与我们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作出这样那样的结论，以求和他理解的当代微观物理学关于物质的理论达到共识。然而，没有多少理由认为，早在 1949 年，毛就认定了某一特定形式的爱因斯坦主义，这种主义会为继续革命、不平衡发展和永无结束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教条提供合理化基础，这个教条是不可凭借理智或者只凭经验就能够制定的。但是毛后来这样做了。到 1955 年时，爱式毛主义的迹象已非常明显。

毛喜欢同原子物理学家们讨论物质的本质问题。他和第一流科学家进行交谈，比如钱三强，北京清华大学 1936 年的毕业生，曾在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工作，进行原子裂变研究，1946 年获法国科学院的 Henri de Parville Award 奖。

这时，所谓奇怪的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这对于原子理论意味着什么？在 1955 年 1 月召开的研究原子科学发展的会议上，毛说道：“只要我们有了人和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被创造出来……”在毛的隐喻中，新物理学预示的是奇迹般的变化，是前人从未设想也从未做过的崭新事业，也就是说，革命就是向不为前人所知的新领域迈进。

毛的科学家朋友们向他推荐一位观点与他相似的日本物理学家的著作，这位日本物理学家名叫坂田昌一，是一个有哲学思想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战积极分子，他是第一次读毛的著作。毛和坂田发现彼此的哲学观点非常一致。1955 年，郭沫若和廖承志被派到日本京都大学去见坂田并且邀请他到中国来。1956 年坂田访问了中国。

钱三强：《怀念毛主席》，《北京周报》第 42 期（1977 年 10 月 15 日）第 22 页。朱洪源在其文章《回忆层子模型》的 9—10 页（未发表，是提交 1980 年 1 月香港国际物理学大会的论文）对此事的描述与钱的描述略有不同。朱没有提到政治。我非常感谢朱教授给了我一份他的这篇宝贵论文。

1978 年 6 月 22 日在东京，位田昌一的遗孀和饭田认可的哲学顾问 Takeani Mitsuo 慷慨地回答了我关于垣田的问题。这些已由 Martha Caldwell 博士和 Fujim Oto Yoichi 博士译出，对他们我深表感谢。Taketani 教授给我看了垣田的日文和英文著作，内容从回忆录到科学哲学。

郭听了爱因斯坦 1922 年在日本的讲座。

坂田昌一 1911 年 1 月 10 日生于东京。他的父亲是内阁书记，在日本政界很有名气。坂田与富家子弟一起上学，但对无处不在的下公正现象感到不安。他与 1929 年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日本学者成为朋友。坂田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并且同情那些在中国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人们。他因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主义两次入狱。他熟读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唐诗。（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6 日）坂田与汤川秀澍一同工作，后者受到老庄思想的极大影响。混乱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汤川秀澍后来因介子理论（muon）研究获诺贝尔奖，坂田也参加了此项研究工作。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美国军事情报报告说，坂田“被认为是有关原子能科学的世界级权威之一，有些权威人士声称，在此研究领域他远胜于汤川秀澍博士。”（总参谋本部，军事情报部，远东军总司令部，1949 年 5 月 18 日）我感谢 John Dower 为我提供了这份文件。毫无疑问，坂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物理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的物理学家 LGren Brown 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坂田和井上的理论，它在 1943 年预见 pion 电子衰变链，1947 年被观察证实，这标志了 pion 的发现，坂田理论还把电子—中微子与 mtion—nutirino 子区别开来。”（《介子物理学在日本（1934—1948）》，提交 1978 年 10 月 27 日在麦迪逊举行的科学史学会年会的报告第 6 页）坂田的多项贡献见 Jagdish Mehra 的《索尔韦物理学大会：1911 年以来物理学发展的一些方面》（波士顿，D.Reidel，1975）242，299，320，328 页，还有 J.Mehra 编辑的《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的观念》（波士顿，D.Reidel，1973）中 Gtegor Wentzel 和 Sin—Hiro Tomonaga 的叙述，398—399 页和 409 页，坂田经常

1954年苏联公开批评毛，因为毛在《矛盾论》中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生和死的关系都是一对对矛盾，是可以互相转换的；1956年李森科在苏联受到批评，此事件“吸引了中国党和政府的注意”。在此种背景下，当时正在寻找一条优于苏联道路的中国式道路的毛可能想把自己同坂田的正宗爱因斯坦科学观联系起来，以对抗反毛并因李森科的伪科学而丢脸的苏联。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此时期坂田的作品表露出的观点与毛惊人地相似，毛后来明确而强硬地把这些观点作为毛式社会科学中心。

坂田著作所用的语言和隐喻是毛式的——实践、唯物主义、革命、马克思等等。坂田引用康德和拉普拉斯，引用自然就是一种永远的生死转换过程的观点。毛对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军人大谈拉普拉斯和康德。

坂田认为知识分为质量不同的层次。学习知识的过程就好像剥一只多层皮的洋葱。你解决了一个层次上的矛盾，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矛盾。在“新的基本粒子……几乎每个月被发现出来”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寻找粒子中的粒子，寻找新的层次理论。

1956年5月初，坂田从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周）对毛来说，坂田的访问似乎在不止一个方面具有意义。坂田是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的时代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重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允诺说要把更多的日本第一流物理学家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兑现了。这会使中国更多地摆脱苏联的控制。那时中国已经参加了在莫斯科以北100公里处的杜布纳核能联合研究院，但是这个决定代价昂贵。中国要付预算的20%，并且要答应承担五年计划期间的一部分预算。中国作了10年该研究院的成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使中国难以脱身。

除了使中国逐渐独立于苏联的一些实际帮助之外，坂田和爱因斯坦主义带给毛的，是对未来的中苏分裂的理论认可，即认为分裂是自然的、进步的。坂田在中国期间会见郭沫若、周恩来和周培源，还有高级政府官员和朱洪源等在原子物理学部门工作的科学家。中国要把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的努力给坂田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坂田在中国的权力最高层有声望，但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可能损害周恩来关于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计划。坂田研读了周恩来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开放政治的“百花齐放”方针，并且表示赞赏。

在北京期间，坂田除了与毛和周进行亲密的谈话，还得到了许多机会宣讲他的科学哲学。他在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讲演，他受到报界的采访，他的讲

在其它一些地方也做出发现，从美国到苏联。这些同时的发现获得了许多荣誉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这使日本的一些圈子认为坂田受到了歧视。

坂田昌一：《科学家与社会》，东京，Iwanami Shoten 1972年版第347、348页。我非常感谢 Yasuko Kurachi Dower 为我翻译了此文及坂田的其它著作。

王若水：《辩证法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第3期（1981）第6页，李培山：《牢记历史经验教训》，《自然辩证法通信》第1期（1981），见 JPRS 卷 70194 号第44页。李森科主义可能还未在中国绝迹。见 Fox Butterfield：《中国，在苦海中生活》，纽约，Times Books，1982，第376页及其后。

《理论物理学进步的补充》1971年版108页。

《毛主席关心天文学的事》，《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2日，第2版。

周培源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物理学之后，又过了几年，曾去普林斯顿就学于爱因斯坦。回中国后，他把这段经历告诉了于光远和毛的圈子里的其他人。

话被译出并在电台上广播。他讲的题目是毛喜欢的哲学题目：集合粒子和理论物理学。毛更加热衷于把爱因斯坦主义理解成一个继续革命的隐喻。中国的粒子物理学研究进程将要以坂田的 1955—1956 年的理论干涉作为一个转折点。“早在 1949 年，Fermi and Yang 提出了介子结构的一种模型。”

1956 年和 1957 年，在这个较多地应用科学以提高生产的时期，中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把他们自己同周恩来、坂田昌一以及毛式爱因斯坦主义联系起来。因此，当中国宣布发现了一种“中介子”的时候，很自然地，这被归功于坂田的理论预见，并且对存在绝对的基本真理的观点是一种哲学上的否定。

“新的粒子与权田理论所预言的那种粒子非常相像……在新发现的基本粒子中又发现另一种介子说明：‘基本粒子’不仅可以出现并消失，而且还可以互相转换。”

在坂田离开北京的两日之前，他得到两本毛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他当然已经读过。坂田走时带着一份给其他日本物理学家的书面邀请信，他们后来在 1957 年应邀来访。

到这时，似乎毛已经开始用爱因斯坦的思想思考每一项重要的新举动。甚至 1956—1957 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也是这样，因为它与新物理学在隐晦的意义上是协调的。1957 年 1 月，毛发现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的民主党派应该和核子电子的运动保持一致。

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好几个火车头的力量。（这就是说，份量较轻的民主党派不可能分裂或者损害共产党——引者注）核子外围的电子则很轻，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是没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统一的。

现在毛有信心，微观物理学的新发现证明，自然界和社会的真理都是由无数分裂的矛盾的统一体构成的。于是，在 1957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泽东发言时用他特有的爱因斯坦式语言，为中国的全球政治辩护。他使听众们目瞪口呆，他用他乐观的爱因斯坦主义来说明矛盾以及分裂是非常自然的：

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中国的物理学家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他在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相对论）告诉坂田，毛当时非常看重关于粒子的哲学观点隐含的意义。“我还听说毛主席非常后悔在（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没有把哲学问题写进去……”对于毛来说，哲学，爱因斯坦哲学，即新物理学的真理，越来越具有优先的意义。

显然，中苏的分裂不可能是毛的爱因斯坦主义造成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不可能看不到的是，毛越来越看重爱因斯坦的革命的隐喻。毛在这

周培源：《回忆层子模型》6—7 页。

《光明日报》1956 年 9 月 7 日。

坂田昌一：《科学与创造和平》，东京，Iwanami Shoten 1963 年版第 142、333—365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86 页。

毛泽东：《党年团结的辩证法》，1957 年 11 月 18 日。

坂田昌一：《科学的清风》，东京 1966 年版第 19 页。

些观点上越来越教条，他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

毛和他的科学哲学界、物理学界的同事们密切地注意着坂田及其著作。1957年朱洪源在东京的一个和平运动会议上拜访了坂田。毛也邀请坂田和他的朋友们在1958年初来华。但是恶劣的天气以及在长崎发生中国国旗事件之后北京和东京之间的麻烦使坂田未能离开日本。1961年，周培源去日本参加一个禁止核武器大会时拜访了坂田。

坂田在与毛的科学哲学界朋友们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继续以毛欣赏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坂田作结论说，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在对自然达到完全的理解之后到来，因此进行革命必然要经过许多步骤而且可能要无限地继续下去”。

在此期间，毛在1958年领导中国与苏联分裂，这样做的前提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即精神力量可以被爆炸性地转化为物质力量。中国依靠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可以从苏联的核保护伞和它的束缚下独立出来。“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可以被看成是精神变物质的又一个例子……”中国在大跃进中解放人民的精神力量，就可以从对苏联经济的依赖中摆脱出来。“毛泽东说，‘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发生的一个飞跃。’对于毛来说，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是对革命超验的乐观预言。

似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嘲笑毛的爱因斯坦隐喻是浪漫的臆想。对他们说来，毛的能力是笼罩着光环的。毛仿佛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理论高深的科学家喜欢与他交谈，一个普通人想要反对他的理论观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在革命战略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他说粒子不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正确的，错的是那些物理学家们。他仿佛知晓一切，从神奇的到平凡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很难断言说毛不懂宇宙的运动规律。

对于大跃进持反对论调的陈云和其他一些人指出，1955—1956年的小跃进在最初明显的进展之后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对此，毛的回答是爱因斯坦主义。陈云说中国需要渐进的、稳定的、平衡的发展，毛以爱因斯坦的逻辑证明不平衡是合理的，毛说：

不平衡的法则宇宙发展的规律。……进步是曲折的、螺旋状的。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发生变化，叫做跃进……突变。……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和麻烦事是好事。

毛极力主张让群众的能量充分释放，让“劳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爆发出来”。他争辩说，大跃进会使群众产生前所未有的极大能量：

现在群众的热情就像原子弹。释放这个能量。十五年后我们就会有四千万吨钢……

毛不同意社会主义的计划发展应该稳定而非大起大落的观点。毛说，与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年7月23日。

坂田昌一：《科学家与社会》348—349页。

坂田昌一：《理论物理学进步的补充》169页。

吴江：《一些问题：毛泽东知识理论的简短思想讨论》，《光明日报》1981年11月10日第5版。

参见《当代亚洲杂志》第10期（1980）第191—192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149、213页。

同上，第192页。

同上，第155页。

他成功的革命战略一样，进步呈波浪状而非一条直线，这是自然法则。毛承认他不懂经济学，但他确信自己在科学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这类问题上有敏锐的判断力：

换句话说，积累成波浪形或螺旋形。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本身都是一个矛盾，一个对立物的统一体，因此它的运动和发展也是波浪状的。太阳发出的光线叫做光波，电台发出的波叫做无线电波，声音由声波传递……这就是一切事物中的对立面的运动的波浪状本质。

波浪状前进。一切运动都是波浪。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和电磁波。一切运动都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法则。它是客观的存在，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我们的所有工作……也是波浪式地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波浪式的前进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它有起伏，一浪接一浪。如果有人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今年的冒进奇怪了。明年会有一些收缩。就是这样。

作为回应，地方党报告告诉它的读者们，把不平衡作为借口停止跃进的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一种几乎等于叛变的严重罪行。最要紧的是速度。追求平衡是不科学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总的法则。”

尽管毛用爱因斯坦物理学为他的大跃进政策进行哲学辩护，但此后他再没有试图重复这种灾难性的经济运动。想把中国从毛的经济爱因斯坦主义拉回来的人们声称，社会主义意味着有计划的发展比例和总的平衡，他们以此来对抗毛的波浪式运动和不平

衡理论。然而，毛强调的全力以赴发展优先项目占了上风。毛的优先项目钢铁和粮食使其余的一切成了中国发展中的次要问题。

毛为其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辩护，称之为爱因斯坦智慧的化身。

这之后，毛开始用爱因斯坦的隐喻思考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毛的问题是，需要采取何种分裂和跃进以防止中国成为已丧失了革命动力的南斯拉夫和苏联。

到这时，毛的爱因斯坦隐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思考新事物的方式。隐喻是认知世界的无限方式。隐喻可以弥补知识上的缺陷，提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对爱因斯坦术语的误用是为社会主义转折时期寻找一条新的革命化道路。这个隐喻的含义是，还未取得的成就是会取得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有道理的。求助于爱因斯坦隐喻也是一种劝说和吸引人们的方法，使

经济不能够“一直上升”，因为生产“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个毛主义的课学得很好的河北农民干部这样告诉我说（在1978年6月11日）。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382页，参见383页。

同上，第51页，参见59页。

同上，第149—150页，并参见266，206—209，213页。

《河北日报》社论，1959年9月22日。

施拉姆在他的论文《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理论》中说，毛关于“因为受许多事件的影响必须不断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的观点，可以被称为毛的侧不准原则……”（《中国季刊》1971年1—3月第231页）。请注意海森伯的不可决定论如何在毛的隐喻这里改变了，不是讲知识的局限，而是讲激发了革命行动。

这段关于隐喻的简短论述从Richardhyd.ThomasKuh和ZenonPylyshyn写的论隐喻与科学的论文中借来了一些东西，这些论文见AndlewOriony编辑的《隐喻与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版）。

他们相信毛的计划在科学上是有可能性的。这个社会炸药必须安放在这儿。有科学理解力和道德责任感的人会发现导火线并且把它点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中潜在的核能并且把它释放出来。

正如毛的爱因斯坦主义使 50 年代似乎是跃进的、U 字形发展的经济灾难有了合理化的解释，在 60 年代，这个隐喻又以科学的名义把一个特殊的、暴烈的、造成分裂的继续革命运动推上中国的舞台。毛更加坚决地捍卫新物理学，特别是坂田昌一的哲学理论，以说明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件是自然的、必要的。有科学依据的。1963 年 12 月，毛仔细地阅读坂田的作品。

这时，毛想向全世界宣传他的爱因斯坦观点。他马上安排了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特别会见，想通过她宣传继续革命的观点。后来安娜由于“未能抓住毛关于电子所说的一切……”而受到原谅。1964 年 1 月 17 日安娜被召见来倾听毛谈话，毛把与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应用在毛的革命战略（波浪式前进、巩固、再波浪式前进以至永远）中的爱因斯坦科学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总结出来了。毛说，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安娜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毛把这个题目（如何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而赢得革命战争）和他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核心”的总原则联系起来。以原子为例。他说，人们一向以为这是物质的绝对原则。然后人们又发现原子可以被分成核子和电子，而且学会如何释放电子，利用它的能量。后来人们又发现核子可以被分成许多粒子，释放更多的能量——核能。“电子还可以再分吗？”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电子世界的法则也还没有被发现。但是我想电子是可以再分的。

爱因斯坦主义给毛这一观点以支持，即年轻的新的事物会以强大的浪潮推开旧的事物。毛用坂田物理学的隐喻来帮助他设想下一步中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的不少权力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毛坚持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会有许多阶段，有质的变化。对毛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充满了希望。他要求大家不要忽视，粒子和反粒子正在不断地被发现。

“电子还没有被分开。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如果说它是可穷尽的，那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是发展的。这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都是无限的。如果是无限的，就是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一百万年以后也有事情可做。我确实喜欢坂田在《全国科学研究手册》上讲基本粒子的文章。我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文章。”

“从未见过这样的文章”，在马克思或者列宁那里？从来没有。坂田就要来北京参加从 1964 年 8 月 2 日到 31 日召开的一个物理学研讨会。坂田带来了受到周培源直接邀请而来的其他日本科学家。坂田这次从柬埔寨的金边途经香港飞来北京。这次他的好运来了。在机场，他受到周培源、于光远、朱洪源和廖承志等人的欢迎。外交部长陈毅和朱德元帅出席了开幕式。坂田得知，周恩来正在医院做手术而不能出席这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发言的除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6 日。

原稿在北京图书馆。非常感谢那里的馆员们让我在 1980 年 6 月读到它。还要感谢 N.E.H 使我能够到图书馆去。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476 页。（原文未注明版本）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60 页。

了郭沫若和周培源以外，还有聂荣臻元帅，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项目的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出席了闭幕式。

考虑到毛对坂田理论的哲学兴趣，坂田以及从他的母校名古屋大学随他前来的几个人都应邀在会上讲他们的科研方法、他们对粒子物理学的看法、坂田的模型以及受其启发在 10 年后出现的层子模型，还有他们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等等。坂田惊喜地得知毛一直在读他的哲学著作，不过，于光远告诉他，那是从俄文本转译过来的，有许多错误。

坂田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科学家和学生们中间的那种非封建的气氛，还有工作不仅仅凭经验，许多东西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在坂田的回忆中没有丝毫地方暗示要开展文化革命——针对坂田觉得既民主、又爱国，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运动。

坂田此行的高潮是 8 月 23 日与毛的会见。坂田认为毛作为政治家兼哲学家是“我们时代的高峰”。毛只是告诉坂田“我读了你的文章”。坂田感觉到毛和陌生人谈话不大容易。

尽管如此，毛可满脑子都是坂田。第二天，毛召集他的科学哲学高层人士周培源、于光远及其他人开会，讨论权田作品的意义。毛像平日一样随意漫谈，但是在闲谈中涉及到构成他的真理、他的爱因斯坦主义的所有方面。他说得很清楚，仅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足以解释真理和跃进、知识和变化。到这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意他的观点，即变化的毛不是变化的马克思。

毛回忆他在山里打游击的经历如何造就了他，使他优于那些说“我没有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毛谈到他一直对变化惊异不已：生与死、细胞、宇宙、庄子、实践，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在美国的伟大中国科学家（他们是中国人民才能的证明）。毛把科学当成他的象征、他的精髓或者他的变化表，随你怎么看：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变化（的过程），物理学也是变化（的过程）。牛顿力学也是变化（的过程）。世界从没有牛顿力学发展到有牛顿力学，然后又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相对

苏联人翻译的坂田著作要比中国人多。区别是毛对他的哲学感兴趣，而莫斯科对他的科学感兴趣。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德米特里·依万宁柯在评论“宇宙学与微观物理学相结合之中的问题”时写道，“我相信，非线性统一理论，即物质的价值、磁的重要成果已经与实验的数字近于吻合，它给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使人们有道理感到某种程度的乐观，这个理论可以被认为是 deBroglie 的溶合理论句 Fermi—Yang 及坂田的现象理论的一个最合乎逻辑的发展……”（Wolfgang Youryrau）编辑的《物理学、逻辑与历史》（纽约，Plenum Press，1970 110—111 页）。1970 年 9 月 27 日，坂田的日本同行们正式抗议把诺贝尔奖授予 Gell—Mann，他们认为此项研究是坂田先做出的。（Taketani 会见，1978.22.）中国物理学家以相似的方式似乎也认为：Dallitz 和 Morpurgo 在 1965 年和 1966 年独占了本应与中国人共享的荣誉（朱洪源：《层子模型的回忆》15 页）。这就是说，在中国物理学家得到 Daliiz 和 Morpurgo 的论文之前，中国科学家就已经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坂田昌一：《科学的清风》第 10—73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561—567 页，根据于光远的说法，这是他的会见记录。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他保证这是准确无误的。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使这个重要论点成为他写的一本论毛的哲学的书的主题。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66 页。

论。这就是辩证法。

正如我一直想表明的，很多年来，对毛来说，辩证法就是走向相对论的过程。他的爱因斯坦革命隐喻使表面的平衡变成了革命的超验。问题并不在于哲学讨论，也不在于物质可以转化成为能量、精神可以转化成为物质，而是要在实际上把科学的能量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否则，毛在谈话的时候就不会发现，人们仍没有强调分裂、分解或爆炸性分裂的观点，还在提倡‘合二为一’并且反对我”。

我们很难不把毛论及坂田的这段话放在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谈。文化大革命是不久以后毛针对他的假想敌发动的一场运动。爱因斯坦主义是这场运动最深刻的合理化解。它使毛得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遇见的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毛把他的认识论建立在爱因斯坦主义上面有几个很大的好处。以新物理学造就的世界观面对变化使教条无处存身，包括马克思主义教条。如果说生活和科学就是从前牛顿物理学到牛顿物理学，再到后牛顿新物理学，然后到别的什么东西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那么，毛说：“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生、长和死亡”就是很自然的了。未来会嘲笑今天的傲慢。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用革命来解放被压迫者。那时我们需要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实际地克服、研习和超越通向解放道路上的新的困难。

在政治问题上，毛比马克思要聪明许多，他知道政治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对毛来说，斗争永远在继续，就好像生命永远在继续一样，永远都有左、中、右。获得的还可以失去。不平等以及为此而设的各种体制与使不平等合法化的努力，都是不可避免的。

毛的人类实践创造新世界、需要新理论的观点要比马克思主义教条优越得多，后者总是企图用 100 多年前马克思的一段话来调和新的社会创新。那就是保守的宗教教条主义，像想要维护一种信仰的神父簇拥着裸体的皇帝，为并不存在的永恒真理外衣欢呼。毛绝不要这个。他的以坂田为基础的爱因斯坦主义要不断地重新思考始终在变化发展的新宇宙。但是，在毛自己的政治学中，毛要使他的革命隐喻变为现实，而他采用的方式将把中国社会和中国的人搞得七零八落，即使世界已经进入原子科学时代。

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必须面对毛的要求，即在 1965 年继续研究坂田 1955 年的理论，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研究夸克。朱洪源报告说：

由于我们不知道夸克或者其它权田的变体是否能正确地描述 hadrons 的构成，我们把这些成分统称为“层子”，是否只有三种层子，它们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钱三强受命去领导一个物理学家小组，任务是做出层子模型。

物理学家一般都不愿过多地承诺超出资料和有用的理论范围之外的命题。但同时，他们的工作具有一种宇宙意义。把他们自己和一种假说联系在一起，这种假说相信物质成分之中还有成分、运动以前进方式永远进行下去，

同上，第 565 页。

同上，第 562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04 页。

朱洪源：《层子模型的回忆》第 8—9 页。

他们与毛式乐观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法一致，与当时的“谈话方式”保持一致。

把事物是不断可分的观点作为物理学和革命的真理，在这点上坂田帮了毛的忙。1965年党小组会都要讨论坂田的著作。坂田1961年的文章，即毛读过的《关于基本粒子的一种新观点的对话》被从《日文日本物理学会进展》上译成中文，发表在1965年夏季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这是一个非常事件。据我所知，在这个刊物上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此之

后也再没有刊登过这类文章。更不同寻常的是，在一两个月后的一期《红旗》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此文的重要意义。

党内对毛提出批评的人们说，毛从1962年以来在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地方推行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党内的本可以通过和平的劝说方式来解决。对这些批评，毛申明了两点。毛式爱因斯坦主义是这么回答的：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一个统一体总是要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否定“分裂”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无限性就是否定自然界和社会的无限发展，否定人的理解力的无限发展，是把辩证法从中间割裂开来，停止和破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矛盾只有通

朱洪源（在《层子模型的回忆》中）写道，“科学史提醒我们‘物质的基本一致性’的观念只是幻想。……很可能，甚至 hadrons 的一致性也不是物质的基本一致性。它们可能只是尚待发现的物质结构的多个层次之一。提出同样的‘层子’是为了说明这个思想。”（第9页）。

虽然，总的说来坂田的理论和物理学的标准语言是可以译出的，但是中国科学家们一定担心政治对研究工作的扭曲性影响。一个与中国人合作的美国物理学家告诉我，他的中国朋友们开玩笑说：假如他们能发现一种粒子并且把它命名为毛粒子，政治也许就可以靠边了。但是，朱洪源把毛粒子归功于哈佛的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 S.L.Glashow，他写道：“洋葱还有另外一层吗？夸克和 Leptons 有共同的基本一致性吗？一些中国物理学家在这个思想上是领先的。我建议把这种假设存在的一切物质的建筑材料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是他坚持自然本身的统一性。”（《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当前论题大会记录》第161页）对于毛所坚持的东西，Glashow 也理解错了。

《理论物理学进展补充》，1971年版，185—198页。在此文中，坂田像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引用了恩格斯1867年6月16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在一段关于预料中、新的、化学的革命骤变的论述中，坂田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原子——过去认为可分性的极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交点，这导致分裂的质量变化”（187页）。但是，如果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是确切的，坂田很可能在转录时把恩格斯的意思搞错了。恩格斯写道：“原子——过去认为可分性的极点——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227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注重点总是在于有关反映的全局，而不在于无限可分性的问题。恩格斯写道：是黑格尔讨论了“分裂的无限的系列”。“分子作为能够独立存在的物质的最小成分，是非常合理的类别，是黑格尔所说的在分裂的无限的系列中的一个‘交点’……”关于分子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无意义了。然而，恩格斯接受了它。但是与毛和坂田形成对照，恩格斯强调的是——这正是此问题的哲学要点——现实作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作为无限可分性的问题。值得怀疑的是，恩格斯是否会理解坂田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恩格斯身上，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上。恩格斯告诉伯恩斯坦，这本书“对当代物理学或者物理学史都没有意义”。恩格斯还说，“我坚信，当恩格斯发现许久以后人们给他当初的审慎企图加上了那么重要的意义，他一定会觉得可笑。”（引自 Sidney Hook 的《我与恩格斯的争论》，见 Comfimentary 卷 74.1 号（1982.7.第40页）。

《红旗》，1965年第6期。

《红旗》，1965年第9期。

《红旗》，1965年第9期，第45—46页。

过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

作为对照，被称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苏联在矛盾、分裂和斗争这些问题上也犯了认识论上的和相应的实际上的错误。

在坂田 1961 年的文章中，就是毛在 1963 年读过并在 1964 和 1965 年推广的这篇文章中，坂田除了为微观物理学中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理论之外，还明确地提出他的哲学假设。他以这种或那种提到关于绝对真理或知识的局限性的理论，一直追到古希腊，从数学公式讲到寻求物质的简单性，从玻尔的“哥本哈根之谜”讲到海森伯的“Urmaterie”。他为一个层子理论争辩，就是任何一种物理学理论仅在某个特定层次上是偶然有效的。构成偶然性的因素会引导研究工作者进入更深层次。这里的层次是无限多的，肯定存在新的法则。知识的革命不仅是继续不断的，它还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这是毛坚信的一点。这给毛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即在他现在要考虑的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中国需要新的实践和为新现实提供理论。

坂田又一次受到邀请，请他出席 1966 年夏天的物理学研讨会。他没有来。这从一个小的方面说明，毛的爱因斯坦隐喻不能为他赢得他追求的成功。他的革命隐喻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破坏性后果。

毛坚持与苏联彻底决裂的态度使坂田不愿与中国靠得过紧。毛的反苏主义使日本的和平运动分裂成亲苏和反苏的两派。虽然坂田始终尊敬作为一个革命哲学家的毛，但坂田明白，要想在日本的反军国主义圈子中发挥作用，他就不能采取仅仅反苏而亲中国的立场。

坂田的一些日本同事出席了物理学研讨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培源，他是毛讨论爱因斯坦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周培源后来写道：

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领域中。Shuzo Ogawa 教授提出了他的论文《基本粒子理论近来的发展：论坂田模型》。坂田是第一个认为基本位于是可分的物理学家，并且提出了现在称为坂田模型的这种新结构。

中国方面由年长的物理学家们领头，报告了 30 个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他们主要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毛 1964 年讲了坂田的重要性之后受命开始这项研究，目的是在基本粒子领域建立层子模型理论。

“他们认为‘基本’粒子是可分的，是由所谓的许多‘层’组成的。每一层有一层状的内部结构。这个理论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这个时期毛很忙。1966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起了久已有哲学预兆的分裂运动，对党内上层人士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在此次会议开始的一周之前，7 月 25 日，

同上，第 60 页。

坂田没有再访中国。他的真正贡献从未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坂田长期奋力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日本传播核武器。在科学上，他是一个天才，能够用简陋的材料设计出杰出的实验。他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主要在介子理论上贡献很大。在社会问题上，他试图打破学院中高级教员与低级教员之间、教员与学生之间主仆式的封建关系。坂田的这些民主改革为他在日本的科学界赢得盛誉。但是对于毛——并通过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印象——坂田只是一个讲永恒分裂的哲学家。

周培源，《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建设》1966 年 10 月第 41 页。

胡曲（音译）：《光明日报》1977 年 7 月 20 日。

毛利用物理学研讨会的机会大讲现实的本质。然后，在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的前夜，晚间 10 点，毛挤出时间会见参加物理学会议的代表，探讨坂田模型的可应用性。Nativism(狭隘民族主义) 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的动乱使正在研究层子理论的中国物理学家们沉默了。所有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杂志都停刊了”。未被邀参加 1966 年夏季的物理学研讨会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说，他们被排除在外，以此说明中国物理学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年轻的科学家们把老一辈的同事们赶出实验室，赶上街头。上至张劲夫——科学院的党委书记，高级科学家们都被赶了出来，读大字报、改造思想。研究层子理论，把毛的爱因斯坦隐喻引入物理学，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也许这件事与周恩来手下的关系太近。坂田、爱因斯坦和毛的年长的物理学家们都被毛的文化大革命分子斥为“资产阶级权威”。中国的物理学家们甚至不敢提到坂田或者爱因斯坦的名字。当华裔的高级美国物理学家如李政道和杨振宁访问中国“询问关于层子模型的实际内容”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缄口不言。“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只可能在极少的机会很简短他讲一点。甚至没能提到作者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不但没能实现革命爱因斯坦主义的预言，反而产生了针对新物理学的斯大林式攻击。观点被当作斧子来进行攻击和破坏。在实验室里和在社会上一样，实际的结果恰恰是毛所希望的反面。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阶段刚刚过去，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同事就开始设法恢复经济、教育和科学工作。首都的两所主要大学受命起草一个报告，内容是如何促进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为了这个目的，周恩来请国际知名的华裔科学家来华提供帮助。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1972 年来访之后，周说：“杨振宁讲了真话。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也表示同意。”这些著名的外国科学家很乐意协助周振兴和重组中国的科学工作，把重点放在有直接成效的实际研究课题、数学和基础研究上。毛尽管对继续进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感兴趣，但也同意科学研究应该着重基础理论和实际结果。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受周总理之命撰写有关政策的正式报告。

1973 年，毛又一次深切地对微观物理学及其意义表示关心。坂田在 1971 年去世，毛只好把坂田的妻子和同事们请到中国来讨论坂田的贡献。毛还叫来了几个重要的帮手，如汪东兴和高级军事指挥官许世友，来听毛大讲特讲科学哲学。

为了讨论哲学和无限可分性，1973 年 7 月 15 日，毛邀请了美国物理学

《北京周报》1980 年 1 月 14 日第 25 页。在 1980 年毛被说成反对林彪的理论——即中国已经达到知识的“顶峰”。也可能毛说了这话。然而，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多的政治理由，由于毛的讲话一直未公开，看来最好还是不要了解毛到底讲了些什么。

周培源：《科学史的里程碑》第 43 页。

朱洪源语。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6 日。

朱洪源语。

《围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5 页。

《围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 页。

与坂田遗孀的会见，1978 年 6 月 22 日。

《光明日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

家杨振宁，周恩来和周培源做陪。“使我吃惊的是，”杨回忆道，“毛对基本粒子和结构‘感到强烈的兴趣’。显然，毛一直在追踪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发展步伐，特别是在基本粒子是否可分这个问题上。我告诉他，到现在为止就此问题还有激烈的争论，还没有明显的结论。”

会见中毛泽东问道：“现在光的量可以分吗？”杨回答：“这个问题还来得到解决。”其实毛知道如何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毛评论道。

毛此后再没有邀请杨来谈话。但是杨一直每年返回中国，与周恩来的人合作帮助中国科学争取创造性的成功。周着手重新启用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学无术者们批判和威吓的技术人才。

在周恩来生病以至最终因癌症致死之后，邓小平被重新启用，接过周的科学计划。周一邓政策认为，科学、生产等专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要由懂行的人来管理。为了给这种政策寻找理论根据，邓引用毛 1942 年在延安的讲话，毛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物理学的原子和电子理论。邓开始非常自觉地在科学问题上取消毛的思想并加以改造。邓小平甚至嘲笑毛所认为的基础科学就是研究最大的、最小的和生命本身，就是研究宇宙、粒子物理学和生物学。邓在 1975 年 9 月 26 日评论说：“我要说考古学也是一门基础科学。”

邓以他典型的方式，使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们明白，按照他的看法，即使是反革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即所谓的“白专”分子，只要为中国的利益工作，就比那些破坏生产、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文革捣乱分子“更好”，后者“只是闲逛、制造帮派斗争、为所有的事情制造阻碍”。

显然，这种态度与毛为科学建立哲学基础并甚至把它置于马克思的教条之上的做法相去甚远。毛的革命隐喻被周恩来的改革者们埋葬了，他们的努力是要使科学满足国家的物质需要。同样，那些不学无术分子实际上也抛弃了爱因斯坦、坂田和毛的革命隐喻，尽管他们自称是毛的文化大革命遗产的继承人，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引入中国的科学。这样一来，甚至当毛在 1973 年企图再次重新思考他的无限性概念时，中国政治的两大集团把科学引向两个极为不同的方向。从毛主义的最抽象的哲学基础来看，即使毛还在世的时候，毛主义也已经死亡了。

到 1970 年，由理论家陈伯达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用类似于斯大林主义反对相对论的逻辑，给爱因斯坦扣上了一顶反动的、资本主义学术权威的帽子。陈的权力被剥夺并不能够平息斯大林主义者的怒火。姚文元和他的“上海帮”命令上海科学界组织一个“革命大批判”小组，批判爱因斯坦。姚的目标是“为自然科学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

杨振宁：《思想家、领袖、极为实际的人》，《新中国》（1977 年春）16 页。

《光明日报》，1978 年 9 月 10 日。杨教授——我在 1979 年 12 月 5 日与他谈过话——与毛对待科学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杨继承的是爱因斯坦的理性主义传统。就是说，杨对发生“奇迹”的这几个重要地点以及数学的抽象美引出了决定性的物理学数据感到惊讶。对杨来说，这就是四维空间和狭义相对论、Reimann 几何学和广义相对论、希尔伯特空间和量子力学和纤维束 WitffopoIRical.Complexofiesandgaufe。

齐新（音译）：《四人帮之案》，香港，CosmosBooks，1977 年版第 228 页。

同上，287 页。

同上，第 293 页。另见 Goldman 的《中国知识分子》第 7 章。

《批判姚文元的自然科学观点》，见《红旗》1978 年第 4 期 66 页。后来陆定一说姚的立场就是所有的

姚文元的小组坚持说，正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现在无产阶级的兴起也将产生一种崭新的科学观，压制资本主义的科学观。从1959年以来姚就说，未经马克思预言的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不能被视为是科学的。对于姚来说，天文学必须清除掉宇宙的观念；物理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抛弃所谓的保守观念，如能量的保存、守恒以及许多东西的保存。在地质学、化学、历史等无论什么学科中，任何自称真理而未以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基础的东西部被斥为黑色，也就是反革命的。

姚一伙企图低毁周培源的计划，并想威吓北京大学参与这一合作计划的人。张春桥宣布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人想用爱因斯坦、杨振宁和其他“著名物理学家来制服我们，那么我们也可以物理学家们来制服他们。”

姚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人相信，周恩来依靠的是那些“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老一辈科学家。因此，“上海帮”网罗了一群年轻科学家，据信他们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来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周的老年科学家联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这样一种思想所吸引，即科学应该政治化，否则就会像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科学家那样听命于一个可能是罪恶的国家政权。

“上海帮”似乎因为周恩来总理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很高而愤愤不平。周对来访的一个德国代表团说，最伟大的两个德国犹太人就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使姚和他的一伙人狂怒，因为周居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联系起来。

低毁爱因斯坦的任务被姚和张交给“上海帮”的理论写作班子，它的笔名是罗思鼎，由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两名毕业生领导。在复旦，他们收罗了一批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开展研究、讨论并发表文章，证明我们所需要的所有基本理论都来自马克思，证明爱因斯坦科学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亦指国民党政权——译注）和反社会主义的。

上海主持的讨论会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反映了“四人帮”一伙的无知的观点，以为相对论理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对爱因斯坦的攻击首先出现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其后的1974年又出现在“上海帮”的新刊物《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从唯理论的、经验主义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那里来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概念与毛的“一分为二”的观点，与运动的物质的观点十分矛盾。这些不学无术者

答案都在“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里找，比如说“爱因斯坦必须打倒”因为“自然科学属于资本家”。（《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第3版）。这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容不得毛的残余的人道主义——他认为古人也有智慧，比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在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问题上的洞察力。（与杨振宁的会见，1979年12月6日）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红旗》1976年第4期第56、58页。

赵瑞强（音译）：《科学与哲学论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34页。

《政治斗争》，第29页。不学无术者们要求把参加国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送到农村去，用他们掌握的外语批判地主。（周培源，《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0日第1版）

《政治斗争》，第33页。

同上，第39页。

《光明日报》1978年1月18日第3版。

罗思鼎一伙对有些科学问题完全摸不着头脑，比如爱因斯坦想解释这样一种观点——太阳也可以被看作

的结论是，爱因斯坦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他的信念绝对化，这正是走向衰弱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是资本主义这种迫切的政治需要的集中反映。”

据我们所知，毛从未赞同这种胡言乱语。“上海帮”也从未想利用毛对坂田和无限可分性的兴趣。他们的语言游戏作为纯粹政治学、作为对斯大林式谩骂的伪科学解释而告终。他们企图利用批儒运动给周总理抹黑。他们称爱因斯坦为“所有西方科学家中最伟大的儒家”。他们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争论，说什么认为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表示仇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

思主义是理解自然的唯一基础。被姚文元一伙控制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说爱因斯坦的观点受到“反动的不学无术者”的极大影响，所以走到“有限的宇宙”这种反革命理论，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比自然科学“更深刻”，它的观点也更有优越性。

1976年毛去世而姚文元、张春桥等人被捕之后，毛喜爱的无限可分性爱因斯坦模型——层子模型被“放进了博物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朱洪源在1980年1月的理论物理学大会上发言，对毛的爱因斯坦主义与中国物理学的关系作了历史性总结，就是《回忆层子模型》。

朱继续推进毛的所谓无限的进步的乐观爱因斯坦主义。他说自从坂田1955年的文章以来的25年的实验“结论性地证明”：“物质的结构是有无限的层次的”。另一方面，朱承认：“在坂田模式结果和实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结果，从中国当时的研究项目中，“只拿出了夸克理论的结果”。朱主要想告诉外国物理学家的是1964—1965年间中国高级科学家们所做的有用的工作，也就是不学无术者们曾经埋没了的工作。朱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可以把层子模型交给历史，交给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坂田25年前（1955年）的设想是探索 hadrons 的内部结构的开始，现在我们就在迅速走向对更深一层的物质结构的探索。看来我们现在正面临物理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虽然坂田和层子被“放进了博物馆”，爱因斯坦却被捧为英雄。他的形象被抬出来吸引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许许多多有关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哲学贡献和局限性的文章发表出来。不同的人用爱因斯坦的传记支持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允许对爱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了，这却使有些人争辩说，在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中，重要的并非如那些不学无术者所说的二者都是资产阶

围绕着地球旋转。

《批判爱因斯坦的世界观》，《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

《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哲学研究》1979年第五期第59页。

若愚（音译）：《马克思主义不可篡改》，《红旗》1977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红旗》1976年第4期第53—58页。

《人民日报》，1980年1月7日第1版。

朱洪源：《回忆》，1980年2月10日第19—21、29—30页。这个立场在《高能物理入门》（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220页的“坂田模式”中用详细的数学、物理学术语作了论述。

比如《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特点》，《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第4版；《正确评价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79年5月17日第4版；《让我们讨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学习杂志》，四川，1979年版第26—33页。

级唯心主义，或者像毛身边的哲学家们和上一辈的中国大学生们学到的那样，说爱因斯坦比玻尔高明，因为爱因斯坦不满足于玻尔粒子两重性，而是继续斗争去寻找深层的真理；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论战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科学真理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百家争鸣”。爱因斯坦与玻尔作为科学家有根本的分歧，但是他们互相非常尊重。即使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解决基本的哲学问题，但他们长达 30 年的论战使许多问题得以澄清，使科学得以发展。应该注重的是使他们的论战得以不断进行的条件。真理只能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才能得到完善。

党内民主派写文章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也用新物理学爱因斯坦的事情来反驳中国的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有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证明，真理是尝试性的而且还要被不断检验，要变化，要前进，要接受新的真理，而爱因斯坦应该被看作这些科学家之一。到现在，爱因斯坦已经像其他最伟大的创造者们一样，被人超越了。这篇列出一个“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的变化表的文章，与毛这以前讲的不断前进的爱因斯坦预言和非形式的民主一致。

爱因斯坦的最有力的坚定维护者是周培源。他与爱因斯坦一起搞过研究，与周恩来合作过，也受到过不学无术者的批判。周培源说，爱因斯坦把科学与人性相结合，拒不受狭隘的唯物主义的摆布，与进步事业站在一起，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敬重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无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谬误是什么，他做的这一切远远超过这些可能的谬误。周培源做结论说，爱因斯坦的敌人就是所有进步人性的敌人。

为了替自己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热诚辩护，周培源引用爱因斯坦 1949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

……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计划经济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的奴役。

社会主义要取得成就，就要求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使行政官员手中的权力不致过分大？如何保障个人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力的民主制约？

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于光远说，必须以一种不断的批判性理解来看待爱因斯坦，这样才能使科学和民主共同发展。他还说，必须考虑到 20 世纪科学的特殊性，即科学和科学规律也是生产力。曾经领导层子模型研究

《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哲学研究》1979 年第 5 期第 59—65 页。

《论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百科知识》1979 年 5 月第 44—49 页。

见《红旗》1980 年第 5 期第 37—41 页。

周培源：《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962 年，中国的学者开始翻译、编辑一个多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这个工作在基本完成时被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从 1969 年开始，这些学者们受到攻击和谴责。到 1974 年 9 月，文集又一次准备出版。1976 年 1 月终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在北京出了两卷，但是所有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并且在序言中说爱因斯坦的政治思想是“混乱而动摇的”（《爱因斯坦文集》之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3 页）。第三卷在 1979 年出版，其中收有一篇文章为爱因斯坦以及政治文章辩护。还有 1978 年 3 月写的序言，讲到出这几个文集的艰难过程。编者是许良英、赵中理、张宣三、李保衡和方大年。英文原文中的斜体字是“有深远意义的集中化”、“官僚”和“官僚的权力”。

于光远：《谈科学的科学和关于“物质”的概念的对话》，《自然辩证法》1979 年第 11 期第 12—14 页，第 24—30 页。

的钱三强在 1980 年 7 月 24 日对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做了三个小时的讲话，主要讲于光远的这个观点。

钱三强还以嘲讽的态度谈到 19 世纪末物理学界的观点，即认为物理学已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他谈到爱因斯坦，“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物理学家”，说他“认识到了不可避免的革命发展趋势”。“20 世纪物理学的基本点、特殊点就是：它打破了认为原子是绝对不可分的、永远不变的概念。”

钱三强解释说，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神经机械学、系统科学等等——是“以爱因斯坦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它使科学与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所有的一切，从计算机、食品、生物化学到原子能，都会出现以持续发展的科学进步为前提的不断进步。因此，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上的距离，这样也就是缩小与它们之间经济上的距离。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阶级性。钱三强说，有开放与民主的气氛，科学才能最快地发展。物质生产反映着科学进步的水平。发展和民主要携手共进。

钱三强以一种类似毛泽东早期的非教条方式讲述这种关于永恒变化的毛式爱因斯坦主义。“物理学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是没有尽头的，玻尔、海森伯、爱因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工作者对此做出了贡献，他们从许多不同的前提出发，但是做了扎实的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被作为一个变化表，作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未来必定会来到的一种诺言。

总之，党内民主派把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坚持的“全面专政”导致的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假如你不承认生活的不同方面有其不同的规则，你就会把一切都变成阶级斗争、变成压迫与专政。

然而，共产党民主派的反对者们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仍然企图把他们自己的观点注入毛的爱因斯坦隐喻之中。“在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上……”，毛的正确性还是不容争辩，而且没有人超越毛。为了能够与仍然起作用的毛的头脑保持一致，反爱因斯坦的观点在继续。

为毛、为他们自己和所有中国人的建设成就感到自豪的中国爱国主义者们，不同意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大跃进时期以来是一个灾难。如果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那么就必须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并且动员人民努力奋斗。那么就必须接受毛的基本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就

《光明日报》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 版。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2 日第 2 版。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钱三强：《怀念毛主席》，《北京周报》第 42 期（1977 年 10 月 14 日）第 22 页。

邓小平的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指出，毛自己也说过科学实验是“人类三种社会经历的一种，正确思想的三个来源之一”，毛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时，它（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赵任强：《科学与哲学论丛》第 29、31 页）。

曹志英（音译）：《批判“现代物理学的斗争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读书》1980 年第 2 期第 39—47 页。

吴江（音译）：《一些问题：对毛泽东的知识理论的简短思想讨论》，《人民日报》1981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是毛爆炸性的爱因斯但隐喻。经 20 世纪 70 年代大庆模式的成功为象征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精神，就是这可贵的毛主义传统的一个极好例子。

不希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过分独立的统治集团，以及需要为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同政见找到理论基础的党内民主派，都很自然地倾向于恩格斯和列宁对待科学的态度——他们认为自然与社会都是以同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作为前提的。理解这些原则的共产党的领袖是当时唯一知道如何领导国家的一些人。姚文元及其一伙不学无术的斯大林主义就根植于共产党专政的为自我利益服务的土壤之中。毛的爱因斯坦主义——想以它来发动就业不足的中国人民、释放他们之中蕴藏的极大能量来满足中国经济的需要——为这种普通的斯大林主义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尺度。

层子模型可以被“放进博物馆”，党内民主派可以把爱因斯坦科学看作一种对科学兼民主的隐喻。然而，支持和赞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个人和机构还是强有力的。对这个隐喻的内容之争还在继续下去。

郭晓惠译自《中国季刊》1986 年
春季号

瞿秋白与毛泽东：革命精神的文学家和文学气质的革命家

〔美〕保罗·皮科威兹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自己的民族风格，盲目崇拜西方，认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他们甚至提倡“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和文学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那些拒绝中国的东西，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规律，所以他们不愿意学习和发展它们。这就对中国的艺术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1956年瞿秋白是富有特色的一代左翼文艺思想家中的一员。他的大多数同伴，包括茅盾、丁玲、巴金、叶圣陶、郭沫若、夏衍、阳翰笙、郑伯奇和钱杏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继续活动，1949年以后又在人民共和国担任重要职务。实际上，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里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在瞿秋白遇害后几十年，他的关于“五四”作家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问题的文章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例如，瞿秋白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文学艺术的著名文章有联系吗？

江西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被共产党的领导者奉为楷模，他们在南方的失败和艰苦的长征以后试图恢复革命运动。1936年红军长征落脚的陕西北部比起江西来，人民更加穷困，土地更加贫瘠，文化水平更低。但是，共产党使用的战略是同样的。这种战略就是，通过创造一个革命的“国家”，或一系列“自由区域”来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在这个“国家”或“自由区域”内，社会、经济和政治部被改革成有利于大多数农民参加进去。这就是说，这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基础变革方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对于夺取全国政权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大众文艺运动的发展被认为既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整个革命的重要目标。

延安的文化运动是以瞿秋白在江西所设计的规划为模式的。李伯钊等一批在江西起重要作用的人经过长征活了下来，他们又在延安活跃起来。话剧运动的开拓者赵品三，于1937年2月带着400多名学生和几个话剧团到达延安。徐特立（瞿秋白在江西时的副手）被任命为延安的教育部长。当时有人告诉斯诺：“从南方来的大多数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成了教员”。毫不奇怪，鲁迅艺术学院和抗大是以高尔基戏剧学校和红军大学为模式的。

像江西时一样，延安的大众文化运动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了。文化活动的分子由农民中吸收，在中央地区经过两年训练，然后再派回各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像在江西时一样，中央剧社派遣流动剧团去农村和前线演出。威尔斯描述了一次为期六天的剧团旅行：“他们每天步行，在七个村共演出了31小时。演出的目的是在露天向陕西群众解释延安政府的方针，动员他们参加在这年7月15日开始的选举活动”。

当时的报告还指出，延安文化运动的许多理论原理都是以瞿秋白在江西概括的许多思想为基础的。由于扫盲仅占5%的比例，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页。

雷蒙·威尔斯：《红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184页。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第114页。

雷蒙·威尔斯：《红尘》第194页。

因此，大众文化运动更加注重音乐、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强调用群众喜爱的活动来鼓励人民积极参加革命。延安艺术的内容仍然集中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形式也主要是传统的，这样能让大多数农民喜爱。延安的政府仍然认为文化工作者必须紧密联系农民群众，并且强调要使用简单直接的人民的语言。

不过，延安和江西的文化活动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这些区别影响着文化规模的发展。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区别，江西那些年所表现的痛苦的国内阶级斗争的主题，在 1936 年底以后改变为国共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主题。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强调，异族仇敌当前，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必须广泛地联合起来。任何人，不管阶级背景如何，只要他真正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在延安都将受到欢迎。为了吸引那些在过去被作为农民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爱国的中国人，延安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方针被修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这些方针。

江西与延安的第二个区别是，大量的城市和欧化的作家来到了延安，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延安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更愿意，并且能够更好地抗击日本侵略。哈里森·福曼在评论这些来自上海的作家所遇到的问题时说：“那些来自上海的欧化的高级文学艺术与中国穷乡僻壤的农民文化相距何止万里：这些文人学士离开了上海，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对他们来说，瞧不起那些愚昧的农民、工人、士兵是非常自然的事，这些人也同样对他们反感”。一大批城市作家努力适应新环境，并为大众文化运动做贡献，而另一些作家对这种运动没有兴趣，他们继续保持着城市风格。这与江西比较起来，就有了更多的现代文学活动，而不是清一色的大众文艺运动。实际上，有两种艺术趋向：一种是向着人民大众的运动；一种是服务于城市知识分子的欧化文学运动。这两种趋向是矛盾的。但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批有价值的力量，工农群众应当欢迎而不是孤立他们。显然，阶级调和与合作的政策与革命政策恢复大众文艺、建立新型社会的要求是冲突的。尽管这些“五四”一代的作家们并不反对功利主义的艺术，但是，他们仍倾向于拒绝那种艺术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的概念。这个问题在江西时就产生了，在延安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大多数著名观点。这使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生们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文学专家，并且也很少谈及文化艺术。其次，他的大多数著名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写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而毛泽东的追随者却倾向于通过抹煞这些文章的历史内容来抬高这些著作，从而为宣传他们的功利主义目标服务。结果，尽管事实上毛的著作只讨论了有限的，并且是有选择的一部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延安统一战线的环境中产生的，但是，毛泽东论艺术的著作还是在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被看作是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后，最重要、最辉煌的文学艺术论著。的确，毛泽东的表述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没有人比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受到那些从 20 年代初期就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的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第 253 页。

哈里森·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第 88 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的影响。仔细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在毛泽东的观点和早在 10 年前瞿秋白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方面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虽然，毛泽东和瞿秋白的思想并不相同，但是，瞿秋白没有提到的问题，毛泽东也说得很少。第二，或许也是更有意义的一点，他们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瞿秋白采取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

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研究的一般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与瞿秋白没有多大区别。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常常承认，“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毛泽东仅仅在形式上接受了这一传统的、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公式。在其它地方，毛泽东坚持认为，上层建筑不仅能够影响经济基础，而且在某种条件下，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能够在推动革命前进方面起到决定的作用。1937 年，毛泽东论道：“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人们得到一种印象，即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大力强调作家和艺术的功利主义作用对于革命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时，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成分。”在毛泽东看来，作家的作用并不限于被动地反映由客观历史规律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是“唤醒群众，激发他们的热情，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为改变自己的环境而斗争”。毛泽东认为，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毛泽东对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唯意志论的解释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文学阶级性问题的论述上。一方面，毛泽东似乎肯定艺术的唯物主义概念，他写道：“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力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和瞿秋白一样，毛泽东评价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却倾向于使用主观的标准。例如，绅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将不在任何客观意义上受到限制，他们或者创造封建艺术，或者创造资产阶级的艺术。如果他们的意识转变了，那么，他们甚至可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来。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应该如何看待文学遗产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瞿秋白同样的态度。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即使在革命性质转变后的时期，过去的文化仍然与现在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在 1938 年，毛泽东宣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同瞿秋白一样，采用这种标准概念来强调他的深刻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观。当然，他不否认外国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但是，他拒绝那种认为欧洲模式应当在现代文学运动中居支配地位的观点。毛泽东接受了“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理论概念，但坚持只用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59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19 页。

同上，第 76 页。

同上，第 2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34 页。

来代表中国自己过去的文化。自然，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应当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显然他认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本身，是独特的，它不可能按照外国的模式来发展。相反，马克思主义应当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应当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且，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毛泽东承认，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在关于资本主义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劳动分工造成了个人审美感受的异化，所以，群众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是，和瞿秋白一样，毛泽东拒绝承认物质丰富和工业生产的高度发达是普通群众取得文化解放的前提条件。相反，毛泽东设想，在中国的情况下，经济基础的转变是以文化革命为前提的。其实，毛泽东和瞿秋白一样没有看出，一个独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不能产生于一个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因。不过，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瞿秋白的定义。第一，毛泽东坚定地认为，文学应当与延安创造的新社会完全融为一体。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¹尽管他大概也知道，现代文学运动的活力在于创造一种自由的环境，但是，毛泽东仍暗示，左翼文艺运动继续自由地发展将会损害革命的政治运动的利益。实际上，毛泽东相当明确地号召在中国把艺术与社会重新统一起来。第二，当毛泽东说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时，他显然认为这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必然是在行进的政党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反复强调了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的必要性。“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区别，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现代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一个概念，仍然与瞿秋白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五四”阶段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已经在中国失败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仍然必须完成，即使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们都承认，需要完成资产阶级的文化“阶段”，而他们却重新对这一阶段作了定义。他们指出，目前阶段的革命文化运动将不再提倡资产阶级文化，而应当超越它。这样，瞿秋白的“无产阶级的五四”文化阶段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被表述为一种既不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也不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提出的那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²像瞿秋白为无产

阶级的“五四”所作的解释一样，毛泽东试图把夭折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与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统一起来，而所有这

¹《毛泽东论文艺》第 23 页。

同上，第 25 页

²《毛泽东论文艺》第 74 页。

同上，第 84 页。

些都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学与社会问题的总的看法，但是，他打算如何将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付诸实践呢？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毛泽东和瞿秋白同样认为，没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他们所设想的文化运动就不能实行。毛泽东还了解到，这个运动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来源于“五四”分子的一些劣根性上。因此，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五四”一代左翼作家的评价。尽管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瞿秋白，但是他们对于“五四”一代人的批评惊人地相似。

总之，对于“欧化”现象的看法是毛泽东批评“五四”一代人的主要特征。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节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941年毛泽东又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由于欧化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因此，现代作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知道得很少，群众也把这些作家看作国内的外国人。

像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似乎一直认为欧化对于左翼文艺运动有两种主要的影响。毛泽东对于左翼内部存在的削弱联合与影响

的宗派主义争论问题的分析，远远不及瞿秋白的细致与全面，但是，他似乎也认识到，欧化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作家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早年感兴趣的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联系在一起。而毫无批判的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将可能重复“全盘西化”的错误。因此，毛泽东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与瞿秋白不同，毛泽东没有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流派，但是，他对托洛茨基的简洁的批评显然是与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相联系的。

同样，毛泽东并未指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流派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谈论了作家的政治倾向和这些倾向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瞿秋白曾批评自然主义和冷静的客观主义为宿命论者，而毛泽东不同，他把这种态度批评为“真正的投降主义和尾巴主义”。他也指出“左倾”的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革命队伍中孤立起来。不管毛泽东是否知道20年代以来各种“无产阶级”派别的活动，但是，他对一些文学团体的精英领导作风的评价却与瞿秋白对左倾浪漫主义的批评相同，同时，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完全一致，即他们都认为鲁迅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家。在10年前瞿秋白曾深刻论证过的主题上，

毛泽东宣称：“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

《毛泽东文化观》第74页。

同上，第84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62页。

同上，第10页。

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

前的民族英雄。”¹人们可以看出，瞿秋白和毛泽东都为了一个根本原因而歌颂鲁迅，这就是，鲁迅不是一个肤浅的欧化主义者。

毛泽东也认为，欧化使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运动与普通人民相脱离。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产阶级不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断言，在根据地的欧化作家仍然不知道革命文学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结果，“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²毛泽东还使用了瞿秋白在10年前所使用的语言说，即使是善意的左翼作家，“对于工农兵群众也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关于“五四”作家的语言问题，毛泽东说，“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这样的左翼文艺运动是失败的，它将造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隔离。因此，它阻碍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左翼作家缺点的论述与瞿秋白的观点相同。不仅如此，而且，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论述也与瞿秋白的论述惊人地相似。他们俩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一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的长期过程，开始于严格的自我检讨，结束于“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为了解决“无产阶级文学运

动”与人民的矛盾，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因为“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绅士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要成为无产阶级，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种民粹主义的运动将产生三种有利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内容将更加多样化，并且更加直接地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作家将使用人民的语言；

知识分子将会探索人民所熟悉的大众艺术形式。毛泽东和瞿秋白一样，敏锐地了解到欧化左翼作家思想中文化虚无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认为，只有领导文学运动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注重中国的民族形式，现代文化运动才能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在上海和江西的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背景下，

瞿秋白要求作家采用“传统的大众文艺形式”；在延安的统一战线情况下，毛泽东则号召他们注重“民族形式”。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强调大众的、民族的艺术都是对虚无主义和欧化作家的批评。

毛泽东解释道，反帝国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文化。

毛泽东显然也和瞿秋白一样承认，在消除知识分子与群众隔离的问题

同上，第13页。

同上，第6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5—6页。

同上，第19页。

上，有两种基本的（稍微有些矛盾的）态度。一些批评强调作家需要使他们的欧化作品“大众化”，以便于人民群众能够理解他们；另一些批评则强调应当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便于他们能够欣赏更高级的文学作品。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合理的，但是，他指出欧化的左翼作家“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

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__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作家把“提高”解释为把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预定的资产阶级或外国的水平上来，其实不是群众应该被“提高”，而是文学艺术本身应该提高。总之，毛泽东认为，大众化和重新认识优秀作品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毛泽东所设想的新标准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毛泽东运用了瞿秋白经常使用的唯心论—唯物论的二分法，指出：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而“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__“五四”文学，包括革命的作品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在人民中产生效果。为了适应“新”的标准，作家必须注意使他们的作品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和瞿秋白同样认为，

中心问题出在作家，而不是群众身上。普及，而不是提高，是第一位的工作。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五四”一代作家的批评没有瞿秋白全面。但是，他认为，他所论述的矛盾如果不被延安的作家们重视的话，那么就可能成为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没有使用“多余的人”这样的字眼，但是，他警告说，欧化作家“看不起工农兵”__的倾向有可能导致他们成为梁实秋那样的不革命的人物。

虽然，瞿秋白和毛泽东在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上有这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瞿秋白的评论在许多方面仍然比毛泽东的更激烈。正是统一战线这个背景，才使毛泽东建议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倡导的无产阶级的“五四”文化。毛泽东全心全意地接受“无产阶级文艺”这样一种提法，但是，他不像瞿秋白，他没有讨论在这个运动中要求群众直接参加进去的重要问题。在《讲话》以及另一些著作中，毛泽东似乎认为，群众将由知识分子来提供“无产阶级的文学”，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在意识上转变了，无产阶级化了。当毛泽东提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只是说到为工农兵的文学，并未说由工农兵创作的文学。__与瞿秋白的著作截然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几乎全部限于讨论知识分子在新的多阶层群众运动中的作用。

由于和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无关，所以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概念与毛泽东的有所不同。自然，瞿秋白提到了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变问题，但是，这通常是指在“无产阶级的五四”的第一阶段内，这一阶段将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文化活动。与毛泽东不同，瞿秋白曾反复强调群众直接参与文化运动的阶段，并且，他暗示，到了那个阶段，人民将不再依赖绅士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毛泽东却从没有提及什么时候，

怎样解放群众的文化潜力和创造力。

不过，应当承认，毛泽东未提及瞿秋白著作中的乌托邦式的主题并非因为他对人民的文化解放缺少热情，而更多地是因为当时战争环境在政治上的

限制。例如，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中没有写任何人民直接参加的内容，就意味着它不赞成在延安的徐特立和另一些人制定的江西式大众文化纲领，其实，这个纲领与毛泽东对革命的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毛泽东和瞿秋白提出问题的政治环境不同，但是，他们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文化问题的观点却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如何解 342

释这些共同点呢？我认为，毛泽东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并且受到瞿秋白的影响，尽管毛泽东从未承认过这种影响，甚至都未提到瞿秋白的名字。（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瞿秋白在革命实践和著作上的贡献。他在 1950 年 12 月 31 日的题词中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译者注）因此，很难证实瞿秋白的著作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源泉。然而，比追究毛泽东是否受到瞿秋白的影响这一问题更有意义、更有趣的问题是，思考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下，思想家们可能对于历史、革命和文化问题分别作出相同结论。瞿秋白的研究领域显然比毛泽东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他的论文学艺术的著作表明，他提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本质总体设想中的若干因素。关于文化问题，瞿秋白的观点则简直是“毛主义”式的。

瞿秋白和毛泽东对于革命问题的总看法中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态度。尽管瞿秋白最初承认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但是，他和毛泽东一样，对资本主义充满了敌视。与马克思相比较，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毫无二致。他们都在文章中反复指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可能会自然地走向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正常的畸形的发展。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促进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尽可能避免资产阶级革命，超越这个异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和瞿秋白对待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构成了他们批评“五四”一代左翼作家的思想核心。由于他们对外国文化的共同看法，因此，他们都强调“五四”作家忽视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孤立于人民，成了国内的外国人。

瞿秋白和毛泽东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本身的独特的中国式的态度。他们不相信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是经过马克思设想由各个阶段的客观力量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像民粹主义者一样，强调人类意志的力量，把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愿望强加于历史。他们尤其相信，如果能够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那么不利的客观条件就更能有效地被克服。对毛泽东和瞿秋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革命首先在文化领域突破，尽管这种突破并不是必然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的进步能够促进革命的进步。如果封建的和外国的文化基础没有遭到破坏，那么革命也会受到阻碍。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瞿秋白和毛泽东都十分强调知识分子这个上层建筑中居于最重要战略地位的群体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他们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无产阶级化”。

谭青、季国平译自《书生政治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

毛泽东与蒋介石比较

〔美〕高沃龙

一、蒋介石为何失败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对苏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确保了苏联对中国战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英国、美国和纳粹德国都不愿意介入其中的最危急的抗战第一阶段。在日本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之前，尽管蒋介石没有使苏联像他所企盼的那样直接参与对日作战，但总的来说，除 1940 年苏联与轴心国短暂的“调情”时期外，蒋介石一直保持住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成功地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尽管此举曾使中苏关系一度急剧降温，但蒋介石还是继续得到了斯大林在下列问题上的认可及承诺：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不再支持毛泽东的革命运动。

此外，19 世纪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抗战期间得以废除，尽管此事与斯大林并无直接联系。最后，蒋介石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与毛泽东共同战胜了日本。

然而，相对于中国的实际力量而言，这些成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蒋介石的策略技巧，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蒋的战时目标与苏美两国战时的偶然联合呢？很清楚，蒋介石的成就主要来自对一系列事变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不是有计划地影响一系列事件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蒋介石试图影响主要大国关系的努力——如挑动苏日战争爆发、阻挠苏日睦邻中立、促进战时苏美合作以及后来加剧苏美在远东的对抗等——全部归于失败。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蒋介石虽然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却是一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的大师。他抓住苏日之间敌对情绪的增长，苏联迫切需要与西方合作和斯大林害怕两线作战的机会，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当时机成熟时，他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收回了新疆。通过打出美国害怕中国与日本停战这张牌，他得以说服华盛顿劝诱莫斯科支持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归还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假设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是成功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领域中蒋介石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为什么他的统治会在日本投降后如此迅速地崩溃呢？既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呢？

对此自相矛盾的疑难似乎有狭义和广义的两个答案。狭义的答案与雅尔塔协定、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中国公众对它们的反应有关。这些条约和协定使蒋介石的成就黯然失色。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蒋介石也许已尽其所能了。但是，人民中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期望太高了。现实政治需要妥协，民族主义却好走极端。实际上，蒋介石已陷入一种无法取胜的境地，他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妥协，却遭到了激越的民族主义感情的轻慢。

简言之，蒋介石似乎没能设法把他的成就转化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或许算不上一位现代领袖，他统治国家的风格不是群众动员和公众参与，而只是与各种类型的精英集团玩弄谋略和讨价还价。在这方面蒋介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也许并非巧合，上层外交也正是一种重视这类技巧的艺术。可是，除得到军队支持外，蒋介石从未推动一种有组织的形式来控制 and 引导被他的成就激发起来的群众支持。当毛泽东建

立起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和行政机构，以尽可能动员人民时，蒋或是害怕，或是根本不理解这种公众机制。由此可见。蒋介石也许只是一位传统型的领导人。

此外，蒋介石在国际上的成功还可能冲淡了国内改革的紧迫感，使蒋和他的追随者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自信心。对蒋来说，这种事态无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在领导中国打赢一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战争之后，在使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确立了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他本人竟然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也许属于那类陶醉于国际事务的巨大成功国内不得人心的领导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他很相似。尼克松在国际上取得了重大成功——美苏缓和、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结束越南战争，但他本人却因其国内政策为人民所不容而失去了总统宝座。如果要在这类领导人中找出共同点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蒙骗了他们，并使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国内人民的支持。

人先自惑，而后自灭。

对那个矛盾疑难的广义的答案是，可能由于战争结束并且胜利了，与国内大政相比，国际手腕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蒋介石在解决农村问题、稳定货币、改组军队、满足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需求等国内大政上的失败最终超过了国际上成功的价值。假如中国共产党不打起民族主义大旗，那么公众对国民党国内大政方针失误的不满也许不致于变成对中共或是直接、或是心照不宣的支持。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成了深受人民信赖的民族主义者。

二、毛泽东为何成功

毛泽东抗战时期在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或许也是他一生中最大成就，是他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众所周知，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巅峰时期，取得如此成就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只是由于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中心主义的发展和人们对共产国际的严酷控制已逐渐淡忘，才使取得这一成就的艰巨性湮没无闻。

毛泽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仔细思考假如毛失败了，中国革命将会怎么发展而得到阐明。如果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手划脚俯首听命，那么中共很可能会在抗战中牺牲更多的骨干，华北革命根据地可能会在抗战后进一步削弱，中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也可能会交给蒋介石。无论如何，当蒋介石的统治面临重大的政治困难时，绝对无法肯定，一个软弱的中共能够成功地对其进行挑战。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走上法国共产党或菲律宾共产党的道路：永久地处于反对党地位，或是进行长期的、但最终却无结果的游击战。

历史表明，许多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都没能利用二战后震荡着他们国家的广泛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相对的软弱无能，部分地应归因于他们对斯大林的唯命是从。例如，在资产阶级因 1940 年战败和随后与纳粹当局频繁合作而声名狼藉的法国，共产党的活动条件非常有利。此外，至少在 1941 年 6 月后，法共能够宣称自己是抵抗力量中的重要一支。到 1945 年，法共能够有充分理由说明，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给法国带来了可怕的战争，带来了 30 年代的经济崩溃，带来了 1940 年耻辱的军事失败和遭受纳粹德国的占领。当然，法国还拥有长期的革命历史传统和一支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队伍。然而，仅仅几年之后，法共却沦为一个终身反对党。坚定地忠实于斯大

林是导致这一结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数法国人曾亲眼看到，法国共产党人于 1939 年 8 月的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由奋起反对法西斯变为暗中破坏法国的战争准备，后来又热心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到 1941 年 6 月，他们又神速地转变为武装抵抗德国的势力。尽管法共是在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和条件下寻求政权，但中法两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样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以适应斯大林的战略需要。中法两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结果导致了两党命运的截然不同。

仔细考察一下毛泽东使中共冲破斯大林束缚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苏联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打消了中国人具有一种反对苏联控制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观念。显然，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亚于中国人，但西共和法共都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斯大林极尽奴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他最初的 14 年中，也是共产国际中一个温顺的“支部”，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还不足以反抗苏联的控制。

中国儒学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俄国人在种族血缘和文化上都与中国人迥然相异，此种情况在欧美国家间是极为罕见的。对俄国人或其他西方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学习汉语要比学习欧洲语文困难得多。因此，中国与欧洲在哲学和智慧方面的巨大差异，使西方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很难理解他们的中国同志正在干什么。但这一事实只能提供部分答案。要知道，尽管都是斯拉夫人，南斯拉夫共产党却表现出不愿追随斯大林的意志。

很明显，德国入侵苏联造成的机会，是毛泽东最终成功地摆脱斯大林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当苏联人全神贯注于对付希特勒军队入侵所造成的致命威胁时，毛泽东才得以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彻底消除斯大林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在 1942 年前，毛泽东尚不得不与斯大林妥协，但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而不管斯大林接受或不接受。在南斯拉夫，铁托也同样利用了苏德战争的天赐良机。但苏德战争的良机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世界上许多其它共产党都遇到了这种良机，但他们却没能抓住它，只有毛泽东和铁托抓住了，为什么呢？其答案也许归结为这两位非凡人物的天才。

一旦确定了摆脱斯大林控制的方针，成功地达到这一目标就变成了毛泽东施展其政治技能的活动。他争取并赢得了其他一些同样对斯大林控制深感不满的中共资深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的支持，将这些人团结成一个可靠的核心，并依靠他们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隔离到一定程度，然后，毛泽东逐渐地扩大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基础。1937 年底，他赢得了周恩来、陈云的支持，1938 年，康生也成了他的得力干部，毛泽东还开始注意培养像刘少奇和林彪这样忠实的助手。偶尔，毛泽东也向党内的“国际派”和斯大林挑战，但一旦需要，随时准备为保持权力而采取妥协。毛泽东同样是一位深谙计谋的大师。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摧毁了斯大林控制中共的机制，一再地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指挥。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实于斯大林的公众形象下进行的。毛泽东还特别擅长于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唤起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阐述和写作中共党史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教育他的同志们：中国革命运动所遭受的许多失败都是苏联干预的结果。根据毛泽东的历史观所阐述的中共斗争的历史教训，对毛泽东本人是极为有用的。正由于赞同毛泽东关于只有摆脱斯大林控制，中国革命才能

取得胜利的思想，中共党内很多人才成为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并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党的多数派。

三、未来的历史前提：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透析

政治领导人经常就他们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根本动机作出结论，并且用这些历史教训来解释其后的现象。既然最初的教训源于成年前最易受影响的年代，那么，分析一下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从 1937—1945 年的动荡关系中可能获得的历史教训，想必是适宜的。

中国人铭记难忘的一个重要教训与别国利用中国来钳制其他入侵者有关。蒋介石，以及其他机敏的中国政治家心里都十分清楚，1941 年前斯大林对华援助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对日本的防御。他们肯定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出于同样原因，罗斯福、希特勒和丘吉尔才与斯大林一样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并企图利用中国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斯大林援助中国抗战是为了减少苏联两线作战的危险；希特勒希望中日停战以便使日本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而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中国抗战则是为了使他们“先欧后亚”的方针得以实行。蒋介石对这些人各自的动机洞若观火，实际上，蒋的对外政策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原则上，斯大林、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可以玩中国牌，但他们为此必须付出适当的代价。蒋介石的战时对外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确定这些代价的筹码而展开的。

看到这一特殊的历史教训并不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担心被人利用而不愿与苏联或美国形成过密的战略关系。1965 年，毛泽东告诉斯诺，苏联企图使中国陷入一场与美国人在越南的战争。又如，80 年代初期，当美国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随意地谈论着玩中国牌以对抗苏联时，中国人民表达了深深的愤慨。毋庸置疑，有多种理由可以解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并且对本国有可能被个别大国利用一事极度敏感，但中国人对抗战时期的教训记忆犹新也是与此相关的原因之一。

苏联人从 1937—1945 年期间所得到的教训之一与中国人担心被人当枪使的心境完全相同。在 1943 年中期之前，蒋介石一直企图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为达成这一目标而不遗余力。虽然一些挑动苏日战争的笨拙努力（如杨杰将军 1937 年的活动和中国方面 1943 年 7 月经苏联中亚向中国运送英美援华物资的交易）不能归咎于蒋介石，但这些行动仍然是符合蒋的对苏政策目标的。更重要的是，它帮助形成了苏联人对中国的某种认识。避免两线作战是斯大林不可动摇的目标。而且，它也可能是苏联经受住二次大战的严酷考验而幸存下来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蒋介石却在向与此完全相反的目标努力。

这一历史教训也对当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曾怀疑毛泽东企图以 1958 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来挑动苏美核大战。而且，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攻击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了利用苏美冲突从中渔利。有鉴于此，当 1963—1964 年越南以中国为后盾抗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时，赫鲁晓夫有计划地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人们从抗战时期获得的另一个教训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运动和制度的利益之间经常性的矛盾有关。当 60 年代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及其后他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反对党内修正主义者时，他可能联想到抗战时期与党内“国际派”的斗争。毛泽东确信，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这

些“修正主义分子”像王明一样，企图为了与苏联“联合行动”而放弃“革命”。毛泽东的结论是：像抗战时期党内的“国际派”一样，50—60年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也同样是苏联的代理人，他们钻进中共党内并阻碍中国革命，其目的是为了遵循莫斯科路线。由于他们像王明一样操着马列主义语言并且能够“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是危险人物。当然，这种看法对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来说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与王明不同，他们所追求的中国革命的前景并非使中国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寻求与苏联的合作。关键在于，毛泽东与莫斯科长期进行斗争的经历，可能使他倾向于把中共党内任何亲苏的反对派都视为苏联的走狗。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探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以求解释为什么毛会将自己的国家引入“文革”的动乱之中时，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毛泽东从他在抗战期间与斯大林长期进行斗争的生活中获得的历史教训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斯大林在中国进行渗透的可能性深感忧虑。当然，在谁是苏联代理人的问题上，毛、蒋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干涉中国事务，其目的是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发展引向符合苏联利益的道路。

毛泽东肯定问过自己，假如斯大林通过王明和他的“国际派”控制了中共，他将希望中共做些什么呢？毛认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斯大林可能会通过两种方式利用软弱的中共。一是以中共为筹码压蒋介石作出更大的让步；二是将部分或整个中国置于受苏联指挥的软弱的中共控制之下。在此两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儿十年后，当毛泽东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像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搞帝国主义这一结论时，仍然反映出毛泽东早年与斯大林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曾认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但毛泽东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的功劳实际上也是中共与他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中国人需要记取的最后一个历史教训是：无论如何，斯大林毕竟接受并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除外蒙和在东北、新疆的部分权益外，斯大林并没有为此而无情地索价。总的来说，苏联保证了中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需要，尤其是在抗战初期两年和最后两年。正如斯大林 1945 年 8 月所解释的那样，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站在自己一方对抗日本。1937—1945 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事实非但如此，而且也只有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对抗苏联。在 20 世纪的最后岁月里，这一教训仍将深深地影响到苏中关系。

刘戟锋译自《对手与盟友：1937—1945 年的中苏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的第 9 章

王稼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35—1945）

〔德〕托马斯·卡朋

一、导言：王稼祥，毛泽东的浮与沉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而王稼祥却只有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者才知道，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详细地研究过他的生平。但是，近来中国的出版物表明。有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经历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本文将揭示：王稼祥不仅在30年代那场权力斗争中支持了毛，并促使斯大林承认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身份，而且在建立毛泽东思想体系方面，扮演了一位起决定作用的角色。

毛泽东和王稼祥在1931年春首次相遇。当时，毛泽东正逐渐失去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地位，而王稼祥则很快地进入了党的领导集团。20年代末期，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王明与1926年到达莫斯科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秦邦宪一起，在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成为学生中的少数派，从而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闻名。1929年至1930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陆续返回中国并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1931年1月7日，斯大林的中国问题顾问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布尔什维克”们成功地排斥李立三，王明成为中共非正式的领导人。随即，王稼祥与前共青团书记任弼时被派入江西苏区，于4月抵达。此时，24岁的王稼祥只有三年党龄，在政治和军事工作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但他还是被任命为分管外交的人民委员、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成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干部之一。

“留苏学生”在王明的领导下，不仅成功地在上海把李立三赶下了台，而且也减弱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影响。与此同时，由朱德、王稼祥和彭德怀领导的新军事委员会更削弱了毛泽东的地位。1932年10月12日召开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从而使毛泽东失去了军队中的任何决定权。次年，毛泽东成了反“罗明路线”运动的批判对象。毛泽东的许多战略思想受到抨击。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便失去了他在苏维埃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新领导人的政策却导致了苏维埃的毁灭，红军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

二、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初，红军在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后顺利地渡过了湘江。之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以及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期间，毛泽东由于他对军事战略的独到见解，一方面得到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到总书记秦邦宪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反对。据周恩来讲，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在我们从黎平向西北方向通过黄平，渡过乌江最后到达遵义的路上，斗争越来越迫切，在斗争中，毛主席得到了许多中央局的同志的信赖；他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伍修权作为李德在长征期间的翻译，支持这种看法：

……遵义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实际上是王稼祥同志……他经常同毛泽东同志见面并且在休息或晚上宿营时，他们经常分析当时的军事战线，在不断的谈话后，王稼祥同志

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体中作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

这些情况表明，发起遵义会议的当首推王稼祥。作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领导层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样，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还能说服一些支持王明的人。

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一直延续到17日，有近20位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参加。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秦邦宪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和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批评之后，王稼祥以自己的经历谴责了以往的军事领导并支持了毛泽东。聂荣臻最近有如下的描述：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最近在周恩来逝世10周年纪念日出版的周恩来中文传记中，也描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935年1月贵州的一个小城遵义召开，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认清将来的前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请求解除对秦邦宪和共产国际驻中国苏区的代表李德对军队的指挥权和总的领导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反复提及并一再肯定了王稼祥的贡献。1972年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王稼祥：

他曾经给予我很大帮助，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在遵义会议中，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王稼祥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建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你（周恩来同志）和王稼祥——我们从王明的追随者手中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反复指出的，尽管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突破，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军队的领袖。事实上，他在遵义会议之后，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常委还包括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秦邦宪和王稼祥等。当秦邦宪和李德失去军事指挥权之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依旧保留了他们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同时，周还继续担任红军的总政治委员。

1935年3月4日，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宣告成立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指挥部。3月11日，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它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1935年6月，毛泽东刚在第一方面军确立了指挥地位，随着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汇合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张不仅是党诞生时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还率领一支十分强大的队伍。正因为如此，张成了军事委员会的第三位副主席。7月18日，他取代周恩来成了红军总政委。直到毛的部队与张的部队分道而去，这场斗争才告结束。张国焘（和朱德）进入西康，而毛泽东则率队进入甘肃。当第一方面军到达陕西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于11月3日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从而毛泽东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红军军事领袖地位。

1936年，当毛泽东无可争辩地保留了军事领袖职位时，他的政治和意识

形态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微弱的，因为在 30 年代中期，政治局仍由张闻天领导并被“布尔什维克”们及其同盟者控制。但毛泽东作为军事领袖在遵义会议以及遵义会议之后的崛起，主要得归功于王稼祥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迈向领导层的第一步。

三、王稼祥的莫斯科之行与六中全会

在红军抵达陕北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近况及变化，顺便医治他那日益恶化的创伤。在几经周折后王稼祥于 1937 年 7 月初抵达莫斯科。王稼祥在苏联逗留一年。在此期间，他几次会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准备在 1937 年 11 月返回中国，季米特洛夫决定由王稼祥接任。但是王稼祥也想回国，所以只是勉强答应并希望中央尽快派来新代表。王明、康生回国之前，和王稼祥同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这次会见给王稼祥一次报告中国情况的机会。在 11 月初的另一次更深入的会见中，季米特洛夫告诫王明：“你回国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

1938 年 3 月，中共派任弼时去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共产国际代表职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4 月 14 日，5 月 17 日，6 月）会议上，王稼祥和任弼时汇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以及中共的行动等情况。他们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1938 年 7 月王稼祥返国之前，季米特洛夫与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会谈。王后来写道：

季米特洛夫同我和任弼时谈了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 年 9 月 14 日，在王稼祥回到延安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在报告中说：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的报告最后还教训了王明：

在领导机关中出现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路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张闻天在 9 月 29 日致的开幕词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不但打破了王明想成为总书记的梦想，确立了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而且也结束了中共领导内部不团结的严重局面。

1935 年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军事领袖的转折点，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则对毛泽东成为政治领袖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的成功主要得归于对手的软弱以及王稼祥在此过程中的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王稼祥在同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时，努力使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相信：毛泽东应该以中共领袖的身份得到承认。事实上，莫斯科的作用远比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要重要的多。但正如 1935 年 1 月一样，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成功并没有导致党内领导出现戏剧性的变化。1938 年以后的四年里，毛泽东也没有由于自己成了中共的正式领袖而强大起来，更没有成为党

的意识形态的领袖。

四、整风运动

1938年夏天，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后，再一次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当主席毛泽东有其它的事，而另外两位副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不在延安时，王稼祥便有效地处理了军委的日常工作。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和总政常委会主席，他于1939年1月创办一份《军政杂志》。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写了发刊词，王稼祥撰写了第一篇文章。当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正式出版时，毛泽东的那篇发刊词，便与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王稼祥阐释此决定的文章一起发表了。次年，王稼祥又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起草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和指示，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文章。1939年12月，王稼祥担任了新成立的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职务。

王稼祥全力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不久，王稼祥起草了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这个决定于1941年7月1日经政治局通过，成为整风运动中最重要文献之一。

1941年9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毛泽东发表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谴责了1932年（应为1931年——编者）至1935年的政治路线，尤其谴责了那场反“罗明路线”的运动。在“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一段中，毛泽东建议成立一个学习研究组，研究自1928年以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文献。“中央学习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这一段讲话不仅证实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且也说明王稼祥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并且被期望在这场运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1941年9月2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研究组。王稼祥编纂了从1928年6月至1941年11月的557篇党的文献，并于1941年12月以《六大以来》为题出版，成为运动的基本学习材料。

1941年10月13日，书记处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研究党的历史，并委托王稼祥起草有关中共历史的文件。据最新研究表明，王稼祥于1941年秋天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事实上是1945年最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雏形。

次年，王稼祥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该决定于1942年9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终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与此同时，王稼祥也因出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地位有所加强。

约三个月后，毛泽东要求王稼祥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的文章。6月5日，王稼祥完成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并发表在1943年7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重要文章是最早运用和阐释“毛泽东思想”术语的文献：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

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1943年7月王稼祥的文章出版后，“毛泽东思想”一词就经常出现在党的文件和中共党员的讲话中。王稼祥对这一术语的阐释也出现在1944年5月由王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1945年的党章和1945年6月11日刘少奇关于党章修改报告中的许多思想和阐释，都可以在王稼祥的文章中找到。

五、王稼祥与中共七大

1942年夏天，王稼祥的病情日趋恶化，以至无力继续工作。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并安排一架飞机送他和正在生病的王明一起赴莫斯科接受彻底的治疗，但此行耽搁了。一直等到三年以后，也就是1946年5月，王稼祥才飞往苏联，在那里接受手术。由于病魔缠身，王稼祥未能参加1944年5月21日开始举行的七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由任弼时代替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王稼祥也未能参加中共七大。此时，王稼祥不仅承受着病魔的折磨，而且承受着整风运动的影响。当然，这场斗争主要是针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成员的，但是他不能避免别人对他的早期行为进行批判。他与“布尔什维克”形式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的细节和六中全会是党的秘密事务，只有政治局极少成员知道；由王稼祥起草和众多干部知道并遵守的决议和指示，通常是以中央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而不署作者的姓名；加上王稼祥身体不佳，他通常只能在办公室里而不能到公共场合向广大的听众发表演说。所以，当1945年6月9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王稼祥落选了。这一结果使许多中央委员尤其是毛泽东感到震惊。次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表示支持王稼祥，要求代表们选举王稼祥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得了204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去议。一次是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38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的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样呢？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就是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39年巩固党的决定，41年增强党性决定，42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都是他起草的。……

但上面这些是外面不大知道，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这里必须讲一讲。……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支持王稼祥的干预行为清楚地表明：王没有成为正式中央委员不应归于“主席方面没有明显的感恩”。没有毛泽东的帮助，王稼祥就不可能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七大选举也表明王明集团已经失去了影响。甚至王明的前支持者们（如王稼祥）早在 10 年前就已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也不能得到这一时期影响日增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追随者的信任。1945 年 6 月 10 日，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的二中全会上，他升为正式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任新中国驻莫斯科的第一任大使和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副部长，再一次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层。

六、结论

从中共六大（1928 年）到七大（1945 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着戏剧性的增长，王稼祥不仅是中共高级干部之一，而且还对毛泽东的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 1934 年至 1935 年长征开始时，王稼祥促使遵义会议召开，并使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层。

2. 1937 年至 1938 年逗留莫斯科期间，王稼祥（和任弼时）努力说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承认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最终导致了王明的倒台，从而确立了毛泽东作为党的无可争辩的政治领袖的地位。

3. 王稼祥在 1941 年至 1944 年整风运动中的组织和理论贡献在于：促使人们重视毛泽东思想，并于 1945 年把它作为中共指导思想体系写进党章。

但是，在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崛起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并且他自己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 1945 年的七大上和 1973 年的十大上表现特别明显）的同时，实际是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这当然得归因于他那糟糕的身体妨碍他出席党的七大，但导致他落选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与王明集团的早先联系。当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支持王稼祥时，500 名会议代表中的大多数却很怀疑这位前“布尔什维克”。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

钱宏鸣译自英国《现代亚洲研究》杂志 1989 年第 4 期

毛泽东与斯大林比较 (1946—1950)

[苏] P. 梅德韦杰夫

整个 1935 至 1946 年期间,中共的主要政治军事指示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毛的领导虽然已为大多数共产党人所接受,但是在党内还有反对派,不久前回到中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党的领导班子中派别斗争还在以很隐蔽的形式进行,但其结果却使毛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40 年代初,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这是中共的一次规模很大的思想运动。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外国模式”的口号下,毛泽东摧毁了党的领导班子中的最后一批不可低估的反对派残余。应当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领导人是在那个时期唯一能够卓有成效地领导同国民党和同日本的斗争的。因此,像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以至高岗这些与毛有很大区别的首领也都支持毛,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基础。毛的政策含有民族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只是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证明他正确。难道斯大林在持久、艰难的对德战争时期和在短暂的对日战争时期没有利用过民族主义口号?100 多年间,中国受到很大侮辱,在这里,民族主义已成为伟大的改造力量,轻视这种力量那是荒唐的。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米·肖说:“中国人民不是驯服的羊群,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有丰富的历史,有崇高的民族自我意识和高尚的人类正义观。为了民族自尊、人类正义和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愿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日本法西斯把它变成奴隶。”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是很诚恳的。

到 40 年代中期,在中国,正是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这在当时是任何一个别的党所没有的。当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帅对军事技术和现代战争策略的了解不如苏联的统帅,但是他们同时还是政治领导人,而斯大林则尽量使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离开政治决策系统远一些。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活动总的来说有助于中共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到 1945 年,还没有谁能对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

我们 70 年代的出版物,指责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试图在 40 年代初同美国建立联系,可是这有什么罪过?当时苏联把美国看作是自己同法西斯作战的盟友,它不仅利用美国的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而且坚持要求增加这些援助。苏联没有能力援助中共军队,就连 1941 年 6 月 22 日以前给中国解放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援助也无力提供。当时美国正在同日本进行艰苦的战争,它的援助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提请美国注意中共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它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是很自然的。1945 年,苏联同日本开战并向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提供巨大援助,美国却采取了片面地无条件地援助国民党的方针,这时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还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共在特区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草拟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基本轮廓,通过党的新的章程和组建中共新领导班子。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题目本身已表明,党愿意避免内战和在近期赶走日本占领者后同国民党联合,建立新的政府。但是中共不打算放弃解放区和军队。中共向国民党作出妥协,是以中共作用的增长为基础,以结束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为前提

的。然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早已不是革命的政党了。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准备向日本发动战略进攻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党章的报告。正是刘少奇宣布毛泽东是“党找到的领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对毛泽东的崇拜（当时人们称毛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成了中共的政治指示和日常实践。中共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它的力量和它的团结。今天没有必要去论证，对毛的崇拜后来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害，也没有必要去论证，中国的首领效仿了苏联。这个时期，所有大的共产党都以联共（布）为榜样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国家或党越大，它的领导人也越“伟大”。

1945年底和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是各派力量在政治上展开激烈角逐，国共两党首领举行谈判，几次发生军事冲突和准备大规模内战的时期。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军队，收编了日本组建的傀儡军。美国不仅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武器、弹药以及空军，而且向中国派遣几支大部队，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军事顾问了。到1946年中期，国民党常规军数量已比共产党多两倍。

中共也加强了自己的军队和对解放区的控制。苏联从东北撤军时不仅给中共很大一部分战利品——日军武器，而且还给了很大一部分苏联师团的武器和弹药。苏联在东北设立了代表组，有效地指导了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各种联系。苏联帮助中国重建许多工厂，修复许多道路和桥梁。油料、汽车、布匹、鞋、糖、盐、医药等必需品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到东北。苏联还帮助中国训练了军事干部。为了巩固后方，中共中央还决定在解放区再一次进行土地改革。中共的正规军约有150万。此外，在这些地区还组建了300多万人的民兵队伍和1000多万人的自卫队。

1946年秋，蒋介石军队开始向共产党地区发起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队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蒙受了很大损失。到1947年春，国民党的进攻暂告停止。这期间，中共巩固了后方，将正规军扩充到200万。不久，共产党部分转入进攻，重新控制了以前失去的地区，并且还控制了东北许多大城市。实际上中共已把东北地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国民党政府却未能在中国其他地区扎下根，尽管有美国从财政、政治和军事方面给予巨大支援。

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引起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不安，苏美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和杜鲁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待中国的事变。斯大林对中国出现与“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的局面相类似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很满意。他希望中共促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妥协：他的政府保留对华南、西南和华中省份的管辖，而共产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其实，斯大林在1945年底就有这个愿望。1946至1947年间，他曾在这方面向中共领导人施加压力。斯大林会见小罗斯福时曾暗示他愿意同美国在远东采取“共同政策”。引人注目的是，1946至1947年间，苏联报纸以及西方各国共产党报纸，几乎都没有报道有关中国事变的消息，苏联报纸读者根本不可能了解国共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斗情况以及中国东北发生的革命变革。斯大林几乎确信，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成功地展开攻势，美国就会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和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原来日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美国借助于蒋介石则可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

军队不仅可以在欧洲和日本，而且也可以在苏中边界建立军事基地。斯大林在同中共领导人交往的信件中表示了这种担心。但是他肯定还有另一些可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更大的担心：他害怕世界上出现比苏联更强大的、在其政策上可能独立于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的共产党国家。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早就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不太听莫斯科的劝告。斯大林同欧洲一些共产党首领之间已经出现困难，因此才建立所谓“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及其机关刊物编辑部所在地，一开始选在贝尔格莱德也绝非偶然。在波兰召开的那次做出建立“情报局”决定的会议，甚至都没有邀请中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总之，无论是蒋介石在中国的胜利，还是中共的彻底胜利，都不会使斯大林感到满意，因为中共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打破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治地位。斯大林感到东方的“铁托主义”幽灵比巴尔干较小国家的“铁托主义”更为危险。正如戴维·弗洛伊德后来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俄国人在满洲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有利，但是斯大林本人并未表现出任何帮助他们把国民党排斥在政权之外的愿望。相反，1948年斯大林自己承认，战后他曾劝告‘中国同志’放弃上台执政的打算。”然而，当时中共领导没有认真对待斯大林的劝告。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全线反攻。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高级军事指挥官率领的中共军队顺利向南推进，渡过黄河，占领几个大城市。

戴维·弗洛伊德：《毛反对赫鲁晓夫》，伦敦，1964年版第2章。

事态发展之快，甚至也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毛认为，中共同国民党的战争至少要用5年时间，但到1948年下半年内战就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连续进行的几次大战役中，国民党的全力被彻底击溃。济南、锦州、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相继落入中共之手。整个东北和中原宣告解放。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国民党本想在广阔的西南省份固守，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中共军队稍事休整后，再次发起攻势，这时已势不可当。4月24日，攻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5月，中共军队解放武汉、南昌和上海。1949年6月，长江以北的国民党抵抗力量被彻底消灭。7至8月，中南、东南和西南的主要城市和地区转到中共控制之下。到1949年9月底，几乎从所有中国大陆领土上清除了国民党军队。仅有一些孤立的小股部队在继续抵抗，持续到1950年中期。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庄严仪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苏联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家。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并决定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就此给毛泽东发去任何个人书信。斯大林的沉默是很奇怪的，更何况紧跟其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发去一封很长的亲笔信。

1949年10月、11月，中国较迅速地成立了中央政权机构，包括政务院。12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基本就绪。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庞大代表团出访苏联，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他同其他共产党首领一起参加了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尔后同斯大林进行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很困难的谈判。斯大林拒绝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许多要求，没有经常会见毛，有时毛不得不扮演有失尊严的请求者角色。其实，

发生困难的原因还有：斯大林在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勉强恢复了元气。此外，苏联的潜力还不很大。

毛泽东和他的代表团是在莫斯科过的元旦。直到 1950 年 2 月中旬中苏才签订为期 30 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议。据此协议，苏联将保留几年它在旅顺和大连的海军基地，其借口是防止日本的再次侵入。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人们可以看到，用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国伟大人民的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 20 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事件。中国的统一和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家，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那时起中国结束了分裂局面，就像德国和意大利在 19 世纪结束分裂局面一样。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过程，是客观必然性的实现。但是正如德国的统一没有俾斯麦，意大利的统一没有加里波第难以想象一样，中国的统一没有毛泽东也难以想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假装看不见他的功绩、他的错误或过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图，但还不是“战略三角”的建立，因为中国宣布自己是苏联的忠实的永恒的盟友。那时西方不仅要考虑苏联在制造核武器，而且也要考虑其盟国领土从西德边界到南中国海连成一片。当时谁也不确切知道中国人口有多少，估计有 4.5 亿到 5 亿，但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还要加上 1 个亿。

路远摘译自苏联《亚非人民》杂志

1989 年第 5 期

